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

一九八七年
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

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

紫禁城出版社

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一九八七年晋江年会论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北京华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16 印张：11 字数：225千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7—054—7/K·20 定价:4.00元

目　录

河南唐三彩的创烧、发展与外销

赵青云

唐三彩是驰名中外的艺术杰作，因创烧于唐代而得名①。它是用高岭土作胎，经过素烧之后，再用铜、钴、铁、锰等元素加入铅釉中作催化剂，涂在器物的表面，再入窑烧造而成。它以黄、绿、蓝三色做基调，经过复杂的窑变，进行自然调染，而流淌成多种颜色，一般釉色呈深绿、浅绿、翠绿、蓝、黄、白、赭、褐等多种色彩。

过去曾在洛阳和西安一带出土过大批唐三彩，但其产地和创烧时间一直是陶瓷学术领域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先后在河南巩县发现了烧造唐三彩的窑址②；八十年代又在陕西铜川耀州窑发现了烧造唐三彩的窑炉和作坊③。经过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实物标本。现就河南唐三彩的创烧、发展及其外销诸问题论述于后，就教于陶瓷界的专家、教授、学者。

一　河南唐三彩的创烧与发展

我国早期瓷器均属青瓷系统，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的随葬品中，最早出现白瓷④，此后在濮阳李云墓内又发现有白釉加绿彩的四系罐⑤，到了隋代的安阳张盛墓，还随葬有白瓷点黑彩的瓷器⑥。两色釉的出现，打破了早期青瓷的单一色调。显然，白瓷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器的基础，为我国制瓷工业，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表明，唐三彩是在两色釉的基础上创烧成功的。当时已经掌握的色釉技术和工艺条件加上唐代盛行厚葬的风气，为唐三彩的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唐代实行厚葬，可见于当时的典章。明文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吏，死后要随葬相应数量的三彩明器（包括各种器皿和俑类）。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王公百官，竟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兼士庶。"由此可见，唐三彩的生产无疑是适应了这种厚葬风气而兴起的，所以得以较迅速的发展。从有纪年的唐墓考察，早于高宗时期的唐墓没有出土过三彩陶器，因而说明唐三彩从唐高宗以后才开始烧制，而它的极盛时期当在开元时期。对巩县黄冶三彩窑址的调查与试掘结果表明，始烧于隋代的巩县黄冶窑的早期产品，是白瓷、青釉瓷和灰釉瓷。这些产品多为厚胎、假圈足，胎的瓷化较高，均已达到了结晶状⑦；到唐代早期，黄冶窑开始出现了多种单色釉器物，如黄釉、酱釉、蓝釉等，然胎质仍较粗，外壁皆上半截釉，有的釉面不平，故欠光洁；有的釉面较薄，光亮莹润，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黄釉点绿彩的新工艺。此后，由双彩又逐渐发展为三彩或以黄、绿、蓝三色为基调，经过自然调染，窑变成五彩缤纷的唐三彩。这一事实，既反映了我国古代陶瓷由单彩到双彩再到多彩的工艺过程，也与多年来在各地唐墓出土的随葬陶器的实际相吻合，特别是盛唐前后，随葬唐三彩的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均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唐三彩很快发展成为珍贵的艺术品，蜚声国内外，受到各国人民的赞赏，并大量输出海外，成为中国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中外文化交流

的实物见证。

从洛阳、郑州、南阳各地墓葬出土的唐三彩看，初唐的三彩器，釉色单调，一般以赭褐色、赭黄色釉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彩。采用蘸釉法，点施在肩部或白地素胎的印花、划花上面。由于釉厚，釉面不匀，往往形成蜡泪状，色泽暗淡无光，具有明显的初创的特征。盛唐时期，工艺进步，技术成熟，进而得到较迅速的发展。除了三彩器皿，更由于厚葬之风兴起，各类俑也大量出现。施釉除蘸釉外，还采用多种施釉技法，使器皿多上满釉，釉层匀净，色泽晶莹。色彩除绿、黄、白三种，又加以蓝彩和黑彩，别开生面。器表更富于装饰，除了划花和印花，还采用堆贴和捏塑工艺⑧。花卉内容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引人注目。到了中晚唐，政治动乱，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渐衰，新兴的三彩工艺也走向了下坡路，生产低下，技术衰退，虽勉强维持生产，但大多器形较小，造型简单，色调浓淡不一，施釉单薄，并常有脱釉现象，显得很不景气。

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事物在发展。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工艺，在历史的变革中，终又获得了新生，如河南北宋时期的宋三彩⑨，便是三彩器复兴的最好见证。从精美程度看，宋代三彩器正是在唐三彩工艺技术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还有所创新。

二　河南唐三彩的品种与工艺特征

河南唐三彩以巩县窑为首创，鲁山、宝丰、禹县、密县、济源各地，晚唐直至北宋时期也相继生产，而巩县窑规模最大，品种尤多。根据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标本，其种类可分：

1.生活器皿：三彩三足贴花奔马炉、三彩三足炉、三彩盂、三彩壶、黄釉壶、褐釉壶、素烧扁壶、绿釉注子、三彩罐、三彩碗、素烧碗、三彩瓶、三彩瓷盆、三彩杯、三彩豆，此外还有青瓷花瓶等。

2.生活用具：宝相花盘、绿釉水盂、三彩水池、素烧兔枕、三彩虎枕、三彩象枕。

3.三彩俑：骑马俑、三彩抱瓶俑、三彩女坐俑、素烧罗汉俑等。（从河南洛阳、郑州、南阳、新乡等地唐墓出土的俑类则更为丰富，有马俑、牵马俑、骆驼俑、牵骆驼俑、文官、武士、侍从、贵妇、少女、技乐、舞俑、天王俑和各种胡人俑。另外还有人身十二生肖俑、镇墓兽等。）

4.三彩玩具及其它：三彩卧狮、三彩小龟、三彩小狮、三彩小象、三彩小羊、三彩小狗、三彩叠猴、三彩小轿车、三彩鸡、三彩小马、三彩铃、三彩猴头哨、绿釉塔、素烧蹲狮、洁白瓷蛋丸等。

上述丰富的三彩造型，也显示了唐三彩制作的工艺水平。唐代不仅盛行厚葬之风，而且佛教也极盛行。佛教艺术对陶瓷工艺也颇有影响，如唐墓中出土有一种塔式罐，上有圆锥形盖，罐下另加一高把座，整件甚高，上小下大，恰似塔形。盖上常常堆塑浮雕装饰，器座饰有莲花纹样，整个造型和装饰艺术，都具有典型的佛教特征，再加上三彩的装饰美化，更显得美观大方，别出新裁。

鸡冠凤首壶在唐代也很流行，如在新乡发现的凤头龙柄壶，造型精巧，壶身贴有瑰丽的纹饰，从造型到装饰，特别是以三彩美化瓷面，具有形神俱佳，装饰新颖的独特风格。

总之，唐代三彩的器物造型，由笨拙粗重，逐渐变为精巧优美，色彩丰富，式样繁多，雕工精细，形象逼真，工艺娴熟，独具风格。尤其各类俑的制作，更是姿态优美，准确生动，对于不同身份、年龄、性别的人俑，塑造得完美得体，各具特色。如贵妇俑，身着宽服长裙，体貌端庄，神态安祥，文静大方，少女俑则俏丽飘逸，身姿窈窕，含羞微露，轻盈俊秀；

而武士俑，身躯彪壮，威武有力，表情威严，气势逼人；侍从俑体态亲善，表情恭顺；舞乐俑千姿百态，或群舞欢跳，或高歌伴唱，或击鼓吹奏，记录了当时舞乐的欢快场面，同时也刻划出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唐三彩俑以纯熟的技艺和独特的手法，显示了各种人物的不同性格与精神面貌，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⑩，加上色彩富丽，莹润明亮，装饰华贵，更加惹人喜爱。

河南唐三彩的烧造工艺分素烧和釉烧（即复烧）两道工序，并可分陶胎和瓷胎两种。一般烧成温度较瓷器偏低，在800℃——1000℃之间，其中唐三彩俑的坯胎烧成温度在900℃左右；唐三彩器皿的温度大都在1000℃左右。一般唐三彩釉料中所含原料的化学成份为二氧化硅（SiO_2）、二氧化钛（TiO_2）、三氧化二铝（Al_2O_3）、三氧化二铁（Fe_2O_3）、氧化钙（CaO）、氧化镁（MgO）、氧化钾（K_2O）、氧化钠（NaO）和氧化铅（PbO）。氧化铜（CuO）在各种色釉中也普遍存在，仅黄釉中未有发现。蓝釉是一种较晚出现的釉色，除了含有上述化学成份外，还有氧化锑（SbO）、氧化钴（CoO）两种化学成份。上述各种色釉的化学成份，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比例。如氧化铁呈色剂，在褐色（红色）釉中含量为4.3%，绿色釉中含量为0.2%，黄色釉中含量为1.5％，蓝色釉中含量为1%左右；又如氧化铜呈色剂，在褐色（红色）釉中含量为0.31%，绿色釉中含量为0.2%左右，蓝色釉中则为0.3%。尽管如此，由于对色泽深浅浓淡的具体要求不同，同一种釉药，在配制过程中的各种呈色剂及其化学元素的含量的比例，也不尽相同。因此唐三彩的烧制，不仅造型讲究，雕塑完美，工艺精湛，特别在色釉上，对于各种元素的配方比例，能严格控制，以不同的含量比例，呈现更多的色彩，从而使唐三彩器成为万紫千红、绚丽多彩的艺术品。

考古资料表明，河南唐三彩，除少数红色陶胎为普通陶土烧成外，多数为比较纯净的白色高岭土加工而成，含铁量为0.5%左右，素烧后胎为白色。这种泥料的基本特点是："一、吸水性能强，可以使粘接部分坚牢，又能在凉干时不致裂口；二、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在塑造时不粘手；三、经过火烧，强度大大增加，较一般陶质结实；四、素烧后胎质变白，挂釉后釉色鲜艳。"⑪正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加上造型生动，颜色鲜艳，窑变美妙，五彩缤纷，唐三彩成为中国古陶瓷艺苑中一支盛开的奇葩，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为我国陶瓷工艺美术史，增添了灿烂的光辉，为宋元以后，直至明清历代的各种美术陶瓷，开拓了新的境界，成为我国古代陶瓷艺术宝库中一颗绚丽夺目的明珠，在我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三　河南唐三彩的外销

唐代河南各地窑口兴起，瓷业勃兴，不仅生产日用的陶瓷，最大限度地满足当时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特别由于李唐一代，盛行厚葬，唐三彩成为风靡一时的新工艺和畅销产品，除适应当时的厚葬之风，还大量输出海外。这对于中国和当时的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物质文化交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目前资料可知，河南唐三彩在日本、朝鲜、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伊朗以及东南亚国家均有出土⑫。

目前大家公认，中国的陶瓷输出路线，一条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远销西亚；而另一条则是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所称的海上航线——"陶瓷之路"。

1954年—1969年日本玄海滩发现唐三彩陶瓷碎片二十二片，在奈良市大安寺的金堂与讲堂之间的烧土层里还发现有唐三彩陶器和绞胎陶枕，仅绞胎陶枕就有三十多件，这应属于巩县窑的作品无疑。1969年在奈良县福原市安部寺旧址面北出土有唐三彩兽足残片，在药师寺

西僧房遗址，还发现有中国的白瓷和长沙窑的青瓷壶等。

在印度尼西亚也出土有唐代越窑、长沙窑的产品，与其同时出土的还有河南唐三彩器皿。

埃及上京的福斯塔特城，十三世纪初叶已成废墟。考古学家曾在这里发现许多中国的陶瓷碎品，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从中拣到越窑青瓷六百余片，还有不少唐代白瓷和三彩器碎片。

河南陶瓷中的唐三彩、白瓷以及绞胎等，在不少地方皆有发现，说明当时的窑口，不仅满足了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而且还远销国外，这对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河南洛阳是我国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大都会，也是当时我国对外关系中水陆两路的交会点，即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东端，外国商人经广州、洪州、扬州，而抵洛阳西去长安的水路的终点，是东方和南方到达西京长安的必经之路。洛阳等地唐墓出土的各类胡人俑，反映了当时我国与欧亚各国进行丝绸贸易的情景，另外在不少唐墓中也相继发现外国的银币和文物。在出土的三彩器中除人物俑、动物俑（包括马和骆驼）外，还有圆口小瓶和凤头壶等。这些皆为中原烧制的三彩器，在丝绸之路沿线和海上交通线附近的不少国家内均有发现⑬。这些文物，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

---

①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 《巩县唐三彩窑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巩县黄冶"唐三彩"窑址的试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③ 《铜川黄堡发现唐三彩作坊和窑炉》，《文物》1978年第3期。
④ 《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⑤ 《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第9期。
⑥ 《安阳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3期。
⑦ 《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⑧ 《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⑨ 《济源勋掌宋三彩窑址》，《河南古瓷窑址资料汇编》，1985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印；《两件宋三彩枕》，《文物》1981年第1期。
⑩ 《中国陶瓷》，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⑪ 《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⑫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⑬ 《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

顾　风

一

1965年2月扬州博物馆的同志在扬州汽车修配厂（今扬州客车制造厂）附近征集到一件出土的双耳绿釉大陶壶，此壶造型饱满，胎骨厚重，釉色匀润，长颈丰肩，鼓腹小底，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以为这是一件鲜见的唐代绿釉陶器。

1982年开始，扬州市在新拓宽的三元路北侧开始进行市政建设，有人在三元路副食品商店基建工地上又采集到一种表面带有突起的弦纹、连珠纹和锯齿形棱角的绿釉陶片，当时也未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1983年下半年，冯先铭、李知宴两位专家先后来扬。经冯先生鉴定，这种采集到的绿釉陶片是波斯陶片。时隔不久，李先生在扬州博物馆参观时，认定扬州博物馆馆收藏的那件双耳绿釉大陶壶是典型的波斯安福拉式陶器，从而引起了扬州文博界同行的注意和重视。

之后，人们又在扬州三元路北侧的人民银行、纺织品公司、邮电局、市直机关幼儿园，扬州城北的教育学院学生宿舍大楼，汶河路西侧的扬州商场、文园大酒家等基建工地，以及扬州南通西路唐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发现和采集到一批相同的标本。前后累计，总数达二、三百片之多。

扬州出土的这批波斯陶片，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一是胎色多呈淡黄，且色泽鲜妍，与我们以往所见到的汉唐陶器，包括三彩类陶器有明显的区别；二是这类陶器胎质疏松，胎骨和釉层往往厚于国内同时期的釉陶器皿；三是胎釉结合比较紧密，除在部分标本的釉层上发现冰片状的裂纹外，基本无脱釉现象，反映了波斯生产的这类陶器胎釉膨胀系数大致相同，而且，胎釉的烧融温度也比较接近；四是这类器物的口沿上留有支烧痕迹，说明这类陶器是单个覆烧或对口合烧的；五是这类陶片标本中既有釉质匀润，发色鲜艳，表面具有玻璃光泽的优质产品，也有表面凹凸不平，黯淡无光，带有明显烧造缺陷的劣等产品；六是这批陶片釉层表面，尤其是内表面都有云母光泽或粘有云母状的物质，类似我国汉代绿釉陶器和三彩器表面的“银化”现象①。

扬州出土的波斯陶片，曾取样送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分析。现根据该所张福康先生所作的化学分析得出的结果②和该所以前发表的东汉绿釉陶器胎釉分析数据③，列表加以对照研究：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波斯陶的胎釉化学成分与我国汉代绿釉陶器有着明显的区别。波斯陶的胎体氧化钙的含量竟高出我国汉代绿釉陶胎体氧化钙含量的9倍。尤其是釉的化学成分，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更大。波斯陶釉中二氧化硅的含量为我国汉代绿釉陶中二氧化硅含量的一倍左右，我国东汉绿釉陶器的生产使用的是铅釉，而波斯陶器所用的则是一种不含铅的碱金属釉。铅的化合物在釉中能起降低熔点增加流动性的作用，所以，铅釉在700℃

		化学成份	SiO_2	Al_2O_3	TiO_2	Fe_2O_3	CaO	MgO	K_2O	Na_2O	MnO	P_2O_5	CuO	SnO_2	
胎	含量%	波斯陶	49.66	13.10	0.49	6.26	10.52	6.36	1.29	1.88	0.14	0.72	—	—	
		汉釉陶	65.78	15.85	0.99	6.23	1.84	2.19	3.30	1.60	0.13	0.10	—	—	
		化学成分	SiO_2	Al_2O_3	TiO_2	Fe_2O_3	CaO	MgO	K_2O	Na_2O	MnO	P_2O_5	CuO	SnO_2	PbO
釉	含量%	波斯陶	67.02	5.19	0.16	1.31	6.44	2.56	3.80	7.71	—	—	2.49	0.20	
		汉釉陶	33.88	6.20		2.31							1.26		46.89

左右便开始熔融。我国汉唐以来的釉陶产品都是采用的含铅量较高的低温釉料，波斯陶的釉中既不含铅化物，那么，它的烧造工艺就可能与我国釉陶器的生产工艺不同，也许这类陶器是在高温条件下烧成的。

波斯陶的釉中不含铅化物，结果除了一部分优质产品外，不少标本表面都粗糙黯淡，出现不同程度的"桔皮"、"针眼"、"气泡"等烧造缺陷④。可见，宏观观察的现象与微观分析的结果是相互吻合的。

铅釉技术的发生问题，是我国陶瓷研究有待解决的课题之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碱金属硅酸釉早已在埃及发明，后传到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西域一带，我国的铅釉技术是从西域引进的⑤。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铅釉是祖先自己创造的⑥。考虑到釉是一种玻璃质，它的成分与玻璃大体相似，因此，对中外古玻璃标本进行定性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研究并解决我国铅釉的发生问题。根据以往国内外研究者对我国古代遗址出土的玻璃器物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认为我国战国和西汉的玻璃（料器）的化学结构属于$PbO—BaO—SiO_2$系统，而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玻璃，其化学结构到目前为止均属$Na_2O—CaO—SiO_2$系统，只有少数玻璃含有少量的氧化铅⑦。这次对波斯陶釉成份的化学分析，得出的结果很有可能与以往国外研究者对西亚地区出土的玻璃材料化验分析的结果相近或相似。因此推测，这种波斯陶器的釉料成分也应属于$Na_2O—CaO—SiO_2$系统。如果确实无误的话，那就为我国自行发明铅釉技术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旁证。

据目前国内已发表的资料而论，出土波斯陶器的只有福州和扬州两个城市。发现完整的波斯陶器仅四件，即1965年扬州东南近郊出土的一件双耳绿釉大陶壶；1965年福州市郊莲华峰五代南汉国南平王次女、闽国第三主王延钧夫人刘华墓出土的三件孔雀蓝釉的陶罐⑧。由于刘华葬于长兴元年（930年），有绝对的年代，因此，作为随葬品的波斯陶器就有了断代的依据。同时，也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的断代和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福州刘华墓出土的三件波斯陶罐，敛口、广腹、小底，肩部有三或四个环耳，腹部还贴饰半圆弧条纹或平行的绳纹⑨，造型修长秀丽，发色偏蓝，造型风格和装饰手法都与扬州出土的双耳绿釉大陶壶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推测，扬州出土的双耳绿釉大陶壶与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陶罐，在制作年代上可能有早晚之分。

扬州陆续发现的波斯陶片数量较多，它们基本上都是壶罐一类器物的碎片，虽然品种不多，但每种器物的器型有大、中、小之分，而且，发色也不尽相同。其中既有类似本地出土的双耳绿釉大陶壶的碎片，也有器表纹饰类似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陶罐的碎片，还有纹

饰和发色与两者都不相同的标本。这批陶片除少数出于宋元扰乱层中，大多数都是在距今地表1.8—2.2米深的中晚唐、五代地层内发现的。与这批波斯陶片伴出的都是中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其中有越窑青瓷片、宜兴涧众窑青瓷片、长沙窑青瓷片和彩釉瓷片、寿州窑青瓷片；邢窑、定窑、河南巩县、密县等地烧造的白瓷片、三彩陶瓷片，以及过去鲜为人知的唐代青花瓷片等。

扬州出土的双耳绿釉陶壶的征集地点在今扬州市东南近郊。根据以往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所掌握的资料，这一带是唐扬州罗城外的唐人墓葬区。征集到的波斯大陶壶保存十分完整，很可能就出自墓葬之中。由于过去这一带及其邻近的地区发现的几乎全部是唐代中晚期的墓葬，因此，那件双耳绿釉波斯大陶壶应是中晚唐墓葬中的随葬器物。根据波斯陶在扬州的出土情况，参考福州刘华墓的出土资料，我们认为，1982年以来，扬州发现的波斯陶片，除少数时代可能稍晚一些以外，大多数应是八世纪晚期至九世纪的产品。

日本出版的《波斯美术》一书中介绍过一件波斯青釉双耳壶，壶高22.5厘米，造型和装饰手法与扬州出土的双耳壶极为相似。但书中标定的年代为“前二——后三世纪。[⑩]”显然断代偏早。

国外发现并得以完好保存的这类波斯大陶壶数量不多，其中菲律宾吕宋岛八打雁地区的塔尔遗址也曾出土过一件。壶高35.66厘米，双耳细颈无花纹[⑪]。日本已故著名陶瓷专家、多年致力于波斯—伊斯兰陶器研究的三上次男先生认为，“从这只壶的造型，釉色和制造工艺看，均可确认它是公元十世纪前后制造的青绿釉陶器。[⑫]”

斯里兰卡的西吉利也出土过残破的波斯青釉水壶和一些陶片，伴出的还有越窑青瓷五件和部分青瓷碎片[⑬]。国外研究者认为，这批波斯陶是十三世纪的东西，而中国的越窑青瓷是十世纪的产品，两个距离遥远的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产品竟同时出土，有些不可理解，他认为，“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事。[⑭]”根据波斯陶在扬州的出土情况我们推测，斯里兰卡西吉利出土的那批波斯陶片同与其伴出的中国越窑青瓷时代相近，均为九、十世纪的产品。西吉利波斯陶的出土情况，不仅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事实，而且对扬州、福州所出土的波斯陶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扬州出土波斯陶片，是当时我国和西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进的实物见证。

我国和波斯都是世界上古文明发达的国家。据史籍记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两国便开辟了陆上和海上的贸易通道，并建立了政治联系和文化交流。到了唐代，这方面的活动更达到了一个高峰。从贞观十三年（639年）二月，到长庆四年（824年）九月，见于史籍的交往就有三十次之多[⑮]。

中西交通经过了大约九个世纪的发展，到唐代已经形成了七条与外国交通的主要线路[⑯]。其中“安西入西域道”和“广州通海夷道”都是与西亚陆上和海上联系的重要干线，当时两国的交往，早期主要经由“安西入西域道”的陆上通路。河陇一带沦陷于吐蕃以后，“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通路便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唐以前，南方的交州、广州一直是国内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贸市场。外国商人从海上运来珠宝、香料等奢侈品，带走的是丝绸等物品。由于当时陆路是中外交通的主要途径，加之航海业还不很发达，所以到公元四世纪末的萧梁时期，“每年舶至不过三数”，最多“岁十余至[⑰]”，而且贸易活动的范围仅在港市附近。逮至唐代，海上交通渐趋发达，加之政策

有利，所以取道海上来华贸易的商人不断增加。他们除了在沿海几个港市进行商品交易外，还逐渐把贸易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内地。唐代前期，外国商人在广州登陆后，北上谋利多取道大庾岭，经洪州，再沿赣江人长江，而后抵达扬州。或再从扬州沿大运河转赴洛阳、长安。很长时间，扬州一直是外商由东南沿海北上长安的必经之地。中唐以来，对外贸易不断扩大，扬州已拥有当时国内最繁荣的贸易市场，吸引了大批外商。外国商船循海路人长江，直接驶抵扬州，显然比他们在广州卸货后再行转输要方便经济。上述种种因素，使得扬州港的地位不断提高。“隔海船通舶，连河市响楼”⑱、“江火明沙岸，云帆碍浦桥”⑲、“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⑳，当时港口的繁荣，从中可窥一斑。

由于扬州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和对外交通的直达港口，所以在扬州活动的外商特多。这在史籍和唐人笔记小说中屡见不鲜。仅《太平广记》援引的唐人著作中有关波斯、大食商人在扬州活动的记载就有许多条㉑。他们在扬州坐贾行商，主要经营珠宝、香料和药材，同时还买卖丝绸，并高价收购中国的奇珍异宝。他们还开设“邸店”，代客商存放货物，拨兑银钱，甚至还发放高利贷。他们以扬州为基地，到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活动。有人“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㉒。

据《旧唐书·邓景山传》记载，肃宗上元年间（760—761年），“会刘展作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商旅死者数千人”。曾经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在他的著作《东游记》中提到，晚唐时期广州的外国侨民有十二万人之多。而扬州在中晚唐时期的经济地位和繁荣程度都在广州之上，估计当时侨居在扬州的大食、波斯等国的商人，其总数也相当可观。

扬州在唐代虽然是国内外商贾云集并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地方，但由于唐末“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生，广陵之雄富，扫地矣”㉓；加之距今年代久远，当时的遗物、遗迹已经不多，能反映中外交通的文献资料更为稀少。1963年，扬州市东北近郊五台山一带曾出土了一方唐光启二年（886年）“河东郡卫氏夫人墓志”。据志文记载，卫氏“育子五人，二男三女，长子曰延玉，次曰波斯”；1975年，在扬州城西苏北农学院（今江苏农学院）唐代手工业作坊遗址中，发现了一些胡人陶范和三彩人面；同年，扬州的唐墓中还出土了几件高鼻、深目、虬髯、张口露齿的胡俑和著翻领胡服的侍女俑；1980年，扬州北郊又出土了一件唐长沙窑的青瓷背水扁壶，壶身正面有釉下绿彩书写的阿拉伯文，意为“真主最伟大”。唐人为儿子取名“波斯”，又以波斯、大食、马来、印度等国人的形象制作陶瓷玩具和陶俑。这些出土的文物资料从侧面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在扬州的外商人数多，影响大。而1965年，特别是1983年以来，扬州出土的波斯陶才是直接反映外商在扬州活动的珍贵资料。

除中国的扬州和福州以外，据国外发表的有关资料统计，亚洲地区发现这类波斯陶器的有伊朗的席拉夫（Siraf）遗址、内沙布尔（Nishapur）遗址；伊拉克的萨马拉（Samarra）遗址；巴基斯坦的班波尔（Bambhor）遗址；斯里兰卡的曼泰（Mantai）遗址、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遗址、西吉利遗址；菲律宾布端（Butuan）市的安巴高（Ambago）遗址，吕宋岛八打雁（Batangus）地区的塔尔（Taal）遗址；泰国的柴亚（Chaiya）遗址等。这些出土地点都是公元九、十世纪繁荣的都市或海港，是东西方海上贸易通道上的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在上述地点发现大量的中国陶瓷和数量不等的波斯陶器是不足为怪的。

这类波斯陶器除在位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交界处被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十字路口的

斯里兰卡大量发现以外，在东南亚、东亚地区过去只有零星发现。中国扬州发现数量较多的波斯陶不能不算值得注意和重视的一个特例。

据斯里兰卡曼泰遗址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文物分析，那里出土的波斯陶和中国陶瓷的数量大致相等或稍多一些，并与同时代的伊朗的席拉夫遗址、巴基斯坦的班波尔遗址出土文物的情形非常相似⑨。这就说明波斯陶器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外销商品。但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些伊斯兰陶器多数是作为油、葡萄酒、水的容器，"⑩与商人水手在海上长期生活有关。曼泰、席拉夫、班波尔都是海上交通地位十分重要的海港城市，是商人和水手经常出没居留的地方，这类日用器皿兼作商品也未尝不可。此外，如果葡萄酒是当时波斯重要的外销商品的话，这类陶器便是装葡萄酒的容器了。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陶瓷生产王国，陶瓷已作为一种主要商品不断外销。三上次男先生认为，斯里兰卡以东地区之所以发现的波斯陶数量不多，原因就是受到了中国优质外销陶瓷的持续排挤。但这类陶器被带到中国以后，却以它鲜妍的色彩，新奇的纹饰，丰满匀称的造型备受唐人的青睐，以致被作为王妃的陪葬器物。虽然如此，从扬州出土的情况看，波斯陶在这里还不足说明是作为单独的外销商品出现的。

根据国外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资料分析，中国的陶瓷作为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进入九世纪以后的事情。在亚洲上述的这些重要遗址，以及日本、朝鲜各国同一时期的遗址内，出土的中国陶瓷主要品种为青瓷、白瓷、长沙窑彩瓷。从这一基本组合规律中我们了解到，当时中国外销瓷的主要产地和窑口，即是以生产青瓷为主的浙江的越窑、以生产白瓷为主的河北的邢窑、定窑、河南诸窑和以生产彩绘、模印贴饰青瓷为主的湖南长沙窑。我们在扬州罗城（今扬州市）范围内调查发掘了二十几处中晚唐时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瓷片。瓷片的基本组合与国外许多同时期遗址的出土情况十分相似，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唐代，扬州是与交州、广州、明州并列的四大港口。其中交州、广州与东南亚、西亚各国海上交通历史悠久，是众所周知的中西海上交通的直达港。具有明显外销倾向，并带有浓郁西亚风格的长沙窑陶瓷产品除在国外被大量发现以外，国内仅有扬州、明州等少数城市出土，而扬州出土的数量多，品种全，堪称第一。扬州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业都市和港口，过去，由于缺乏出土资料，对她在海外交通的地位未能充分认识，现在在这里不断发现大批优质的长沙窑产品，越窑青瓷，河北邢窑、定窑，河南诸窑的白瓷产品，还有数量较多的波斯陶片。因此可以确认，扬州港在我国早期海上陶瓷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她不仅是当时中日交通的直达港，而且是中国与西亚各国海上交通的直达港。

---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115—116页。
② 周长源《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年第2期。
③ 同①。
④ 同①。
⑤ 叶喆民《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75页。
⑥ 张福康、张志刚《中国历代低温色釉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1期。
⑦ 于福熹、黄振发、萧炳荣《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
⑧ 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
⑨ 同⑧。
⑩ 《オムエントの美术》101页，图版103。

⑪ 三上次男《从陶瓷贸易史上看东南亚出土的伊斯兰陶器》，《白水》NO.10，1984。
⑫ 同⑪。
⑬ 三杉隆敏《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92页。
⑭ 同⑬。
⑮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112页。
⑯ 《新唐书·地理志》。
⑰ 《南史·萧劢传》。
⑱ 李洞《送韦太尉自坤维除扬州》。
⑲ 祖咏《泊扬子津》。
⑳ 李绅《宿扬州》。
㉑ 《太平广记》卷17《神仙类·卢李二生》、卷33《神仙类·韦贪》、卷220《药类·句容佐史》、卷402《宝类·宝珠》、卷402《宝类·李勉》、卷402《宝类·守船者》、卷403《宝类·紫羖羯》、卷403《宝类·玉清三宝》、卷421《龙类·伍顼》等。
㉒ 《太平广记》卷402《宝类·李勉》。
㉓ 《旧唐书·秦彦传》。
㉔ 同⑪。
㉕ 同⑪。

从扬州出土的陶瓷资料看唐代的贸易陶瓷

周　林

扬州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以来，迄今已有二千四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有的自然条件，历秦汉至隋唐，在经济上一跃发展成为我国的东南重镇。唐代的扬州不仅是国内最负盛名的经济都会，而且还是主要的商业集散地和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在中国陶瓷对外贸易中也起过重大的作用。近几年来扬州市区先后出土了大量的古代陶瓷资料，特别是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八三年举办古陶瓷鉴定班以来，师生们结合教学，在市区各基建工地上发现采集了一批重要的古代陶瓷残片，这些陶瓷资料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效果，并为我们研究古代经济发展史和古代对外贸易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本文拟以采集到的部分唐代陶瓷残片资料结合同时发现的国外陶瓷工艺品对唐代的陶瓷贸易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基础汇集着众多的陶瓷品种

扬州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内侧，唐时东至大海仅二百里左右的航程（扬州东至海陵界九十八里，海陵东至大海一百零七里），① 又居我国东部沿海的中心点，上有江西、湖广、四川等广大区域作腹地，下可使船舶直接进出。特别是公元六世纪末叶，隋炀帝开运河促使扬州处于长江和运河的交会点，因而成为我国东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和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所谓“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② 正说明了这一点。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东西南北的陶瓷产品汇集扬州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扬州自身发达的经济基础也是众多陶瓷品种汇集而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内部因素。否则商人无可买卖来此何为。有关唐代扬州经济繁荣的情况，史书中不乏记载，如“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③ 、“扬州富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④ 等等。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扬州经济发达的情况，更主要的是扬州周围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和发达的工场制造业以及精良的制造技术，农副产品资源也很丰富。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开元、天宝中扬州的贡品即达二十四种之多。这样就更吸引了四方商贾，同时也为扬州开展陶瓷贸易带来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陶瓷是商业贸易中的重要产品之一，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与陶瓷产品的需求量是成正比的。随着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陶瓷生产也呈现出一派生机。这时期的制瓷业打破了以往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南青北白”的新景象，扬州港也以其优越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社会经济使全国各大窑系的产品汇集到一起。近年来扬州出土的唐代陶瓷产品数不胜数，全国各大窑口品种均有发现。现将扬州出土的陶瓷资料中当时影响较深的几个主要窑口的产品情况简介如下：

长沙窑：这是近几年扬州出土的陶瓷资料中数量较多的一个窑系。品种有壶、罐、盒、盆等，还有各种瓷塑玩具，小巧玲珑，形态生动，使人爱不释手。从釉彩上来讲有青釉、黄釉、白釉、绿釉、酱釉、黑釉、青釉绿彩、青釉贴花、釉下褐绿彩、釉下彩绘、白釉绿彩、酱釉印花和带诗文词句的壶、罐类器物残片等。其中以扬州汶河路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大罐最为突出，是长沙窑产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力作。⑤另外还发现了长沙窑产品中以铜红为着色剂烧制的釉里红器物残片，这对探讨我国釉里红瓷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

越窑：唐代南方青瓷的主要代表。器物残片中有的釉色青中微带黄色，俗称"艾色"。胎色多为灰白，少量的颜色较深，质地致密，釉层匀净、滋润而不透明，好似黄玉。造型以碗、盘、执壶为主，还有油盒、水盂等。碗的形式较多，有荷叶形碗、海棠碗、葵瓣形碗等。前期多玉璧底，后期为玉环底。执壶往往为瓜棱状，壶咀较短。纹饰有刻花和印花两种。

邢窑：唐代北方白瓷的代表。出土器物主要有碗、执壶、托盘、盒、盘、盏等。其中以碗、壶居多。胎骨坚实致密，胎色洁白、瓷化程度高，釉色雪白滋润，很少开片，釉厚处呈浅水绿色，修坯工整。碗、盘圈足多为璧形底，轮旋极规整，玉璧底心多施釉，底足外缘多切削成斜棱状。

曲阳窑：北宋定窑的前身。以烧白瓷为主，出土器物基本和邢窑相同，分粗、细两类品种。细瓷和邢窑大致相似，只是足根轮旋不太规整，玉璧底心很少施釉，釉水凝聚处多呈青绿色，釉面有开片和垂流现象。粗瓷胎较厚实，断面较粗，胎色略发灰黄，施化妆土，釉面白中闪黄。碗多厚唇，有的还有卷口，有玉璧形足和玉环形足两种足型。

巩县窑：据《中国古窑址瓷片展览》介绍"河南巩县窑创烧于隋，唐代有很大的发展，以白瓷为主，开元时曾为宫庭烧贡瓷；巩县窑唐代还烧三彩陶器……。"由此可见巩县窑也是以烧白瓷为主。在扬州不但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巩县窑白瓷，还发现了极其重要的唐代青花瓷片资料。出土品种有碗、盘、壶、枕等，其中碗类最多。器形有侈口、圆尖唇、腹壁浅而微曲、玉环底、浅圈足的；有侈口、翻沿圆唇、腹壁较直而微曲、圆饼状实足的；有侈口、口缘略外撇、曲腹、口沿作四葵瓣形、碗里沿四葵瓣口凸起四条直棱、玉璧形圈足等造型。胎质粗松厚重，胎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土不纯，含有小沙粒，有较为明显的小气孔。器物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黄，釉表多见细密的冰裂纹。青花发色鲜艳，个别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斑点。纹饰分写意和几何型图案两种，往往有晕散现象。唐代巩县窑青花的发现把青花的起源上溯到唐代，从而更新了过去的某些看法。

扬州唐代陶器的出土也很丰富，数量最多的为多彩釉陶器，也就是通称的唐三彩。最具代表性的有扬州双桥乡出土的唐三彩双鱼壶⑥以及三彩三足香炉、三彩抱鹅童子俑、三彩玩具等。从众多的三彩标本来看，大部分是实用器皿，还有一部分做工精细小巧的玩具。和北方地区常见的三彩明器不同，其胎色分白、土黄和黄中泛红三种。有可能其中一部分为扬州附近地区烧制，这将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来加以证明。在扬州出土的三彩器中值得一提的是发现了浮雕人面三彩像，作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并有一种似马来人形象的人头陶范，可以模制。⑦从这一点可以说明陶瓷这一商品所具有的国际意义。

古代扬州不但汇集着众多的国内陶瓷，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产品——波斯陶在扬州也有发现。1983年，古陶瓷研究专家冯先铭先生来扬州陶瓷培训中心讲学，首先确认了当时很多同志还以为是汉代绿釉陶的波斯陶器。波斯陶胎质粗松，吸水率大，胎色偏黄，釉为绿色，釉

表泽厚呈乳浊状，其中扬州博物馆收藏出土的波斯陶壶最为突出。这些波斯陶器为何聚集扬州？这一问题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在扬州经商的外国人很多，尤以大食、波斯胡商居首，有“胡商”、“胡客”之称。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刘展叛乱“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商旅死者数千人。”⑧对照文献记载，我们认为这些波斯陶器是当时的波斯商人带进中国的生活用具，波斯陶的发现是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二　扬州唐代陶瓷外销路线和国外发现的唐代中国陶瓷

如前所述，唐代扬州的交通十分发达，各大窑口的陶瓷应有尽有。九世纪时大食著名地理学家考尔大贝所著《道程及郡国志》中就提出：“中国唐代有四大商港，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可见扬州是唐代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当时扬州对外交通路线大致是这样的：

（一）汇集扬州的陶瓷装运上船，从扬州港出发由长江东出直航海外。这条路线东通日本、北到朝鲜。沿海南下经南沙群岛，可达越南、加里曼丹、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等。穿过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航行可到缅甸、孟加拉、印度，向南至斯里兰卡，横渡印度洋穿过阿拉伯的亚丁，由亚丁沿阿拉伯半岛南岸经阿曼进入波斯湾；或沿海航行，由马拉巴海岸出发，顺印度西海岸北上经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口的班布尔进入波斯湾，由亚丁穿过红海到达埃及，往东南可达东非。

日本圆仁和尚和我国高僧鉴真大师的进出路线以及国外沿海各地所发现的陶瓷遗迹可以证明扬州是当时海外贸易的直达港。圆仁和尚在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一卷起首部分明确记载了他从日本出发经南岛，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扬州的一段旅程。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诸遗址、爪哇的波罗波多尔和普兰伯南遗址、斯里兰卡的满泰遗址、巴基斯坦的斑胡遗址、伊朗的希拉和尼夏迫遗址、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等，都有晚唐中国陶瓷的发现。⑨

（二）从扬州沿运河、淮河北上到洛阳、长安，经唐蕃古道通往西域诸国。

（三）由扬州南下经长江、赣江到洪州，越大庾岭直达广州，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各国。

太和八年，唐文宗曾下过这样一道上谕：“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⑩这样就促进了陶瓷贸易的繁荣，扩大了中外各国的贸易往来。早在唐宣宗时，大食商人苏莱曼的《东游记》就有赞誉我国瓷器之辞，并记述了我国商船行驶于波斯湾的情况。不难看出，我国商船进入波斯湾，必然要道经南洋，这样一定会把我国重要的商品——贸易陶瓷带到沿途各地。唐代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以及长沙窑彩瓷在朝鲜、日本、印度、中亚细亚、埃及等地屡有出土；东南亚的柔佛河流域古遗址，婆罗洲的文莱、马来半岛彭亨属哥拉立毕等地也发现了唐代陶瓷碎片、唐青釉两耳尊、青釉凤头壶、青瓷四耳尊等瓷器。⑪日本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先生在有关文章中也介绍菲律宾群岛的八打雁、布土安等地区发现有中国唐代邢窑、定窑、巩县窑等地的白瓷；越窑青瓷钵、水注、壶；湖南长沙窑釉下彩绘钵和贴印纹水注，还有其它一些窑口的产品。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亚、加里曼丹及其它岛屿和泰国、斯里兰卡的部分地区都发现和菲律宾出土情况一致的中国唐代陶瓷。据英国考古和东方文化专家罗森女士介绍，在伊拉克的萨马拉地区发现有类似中国唐代巩县窑青花瓷的陶瓷残片。在东非肯尼亚的曼达地区发现中国唐代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⑫总之，在我国商船所经沿海各地

到处可见唐代陶瓷遗迹，从而通过陶瓷这一侧面向人们展现唐代海外贸易的繁荣景象。将扬州出土的陶瓷资料和国外出土的唐代陶瓷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国外所发现的中国唐代陶瓷品种在扬州出土的陶瓷资料中都有所发现，而在其它同期的商港广州、泉州等地，有些品种就没有或很少发现。如唐代巩县窑青花、长沙窑铜红釉下彩、波斯陶等。这就表明，唐代扬州是担负全国陶瓷输出任务的主要港口之一，它的货源来自全国。而其它港口的输出品种主要是来自港口周围地区。第二，扬州和国外出土的陶瓷资料从造型和品种来看，很大部分属于中、晚唐接近五代，盛唐和初唐比例较小，可见陶瓷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大量行销海外当始于中、晚唐，它为以后的陶瓷贸易奠定了基础。第三，中外陶瓷的贸易交流，为我国陶瓷品种的创新带来了生机，一改过去以单色釉特别是青瓷为主的面貌。出现了白地蓝花、三彩等新的品种，纹饰图案也出现了异国情调，如巩县窑青花瓷枕残片上的纹饰很近似波斯地毯的图案。崇蓝尚白是伊斯兰教传统的审美观念。当时大批的波斯、大食商旅来华经商显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他们的爱好。另外中国陶瓷工匠们也会制造迎合国外商旅喜爱的品种，从而提高自己产品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中外陶瓷贸易交流促进了我国陶瓷生产的发展，繁荣了我国陶瓷的花色品种，为中国陶瓷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

由于扬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唐代扬州海外交通极其便利，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这样就为我国陶瓷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同样，全国各地陶瓷生产的发展又成为扬州对外贸易的物质基础，从而使唐代扬州一举成为我国沿海的四大港口之一，成为闻名世界的著名东方大港，在我国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　唐末五代战乱扬州衰落使海外交通阻隔陶瓷贸易走向萧条

唐末五代曾经繁盛至极的扬州，无论是城市自身，还是海外交通以及陶瓷贸易方面都陡告萧条，一落千丈，探其原因，首先是战争的摧残。自唐代末期，军阀混战，烽火连年不息，几乎使整个城市都荡为废墟，何谈与国外贸易往来之有！军阀割据又使南北交通阻塞隔绝，还谈什么海外交通！有关扬州遭受战乱破坏情况，史书不乏记载，诸如“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锺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⑬“扬州雄富甲天下，自师铎，行密，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饥相仍，其地遂空”⑭等等。

影响扬州港繁荣，致使海外交通、陶瓷贸易萧条的第二个因素是地理位置的偏移及镇扬河段和大运河河床的变迁。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因素。唐代晚期瓜州靠向镇扬河段北岸后，把北岸线向南推移了二十五里，从而使扬州与北岸线相距四十五里，在当时可说是遥远了许多，因此交通十分不便。加上镇扬河段北岸和大运河的严重淤积，使扬州港逐渐丧失了大船停泊的条件。这就加速了扬州港海外交通、陶瓷贸易等方面的萧条。另外其它沿海港口的兴起取代了扬州港海外交通贸易的地位。后来虽屡经努力有所复苏，但扬州只能成为国内航线上的枢纽，而再也不是一座对外经济贸易的港口，从而结束了它直接对外贸易的使命。

古代扬州的兴衰史实告诉我们，一座城市的繁荣发达，离不开安定的政治局面、正确的开放政策、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活跃的商品经济。这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也是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

---

① 《资治通鉴·唐纪》卷二〇三。

② 《南唐会要》。

③ 《旧唐书·秦彦传》卷一八二。
④ 《资治通鉴·唐纪》卷二五九。
⑤ 《文物》1978年第3期图版1。
⑥ 《文物》1979年第9期图版1。
⑦ 《南京博物院》集刊第3期，罗宗真文。
⑧ 《旧唐书·邓景山传》卷一一〇。
⑨ 三上次男著、张仲淳译《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
⑩ 《全唐文》卷七十五。
⑪ 转引叶文程、丁炯淳《明代我国瓷器销行东南亚的考察》。
⑫ 转引马文宽《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
⑬ 《旧唐书·秦彦传》卷一八二。
⑭ 《新唐书·高骈传》。

试谈长沙窑销售路线和兴衰的主要原因

周世荣

"长沙窑"又叫"铜官窑"或"瓦渣坪窑"，追溯其渊源，则实为唐代"岳州窑"的后期制品。

"岳州窑"是唐代的名瓷之一，在陆羽《茶经》中位居越州、鼎州、婺州之后，名列第四，而倒数第三。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局面，八世纪后期，它开始吸取南北各种窑口的优点，而逐步烧制出釉下彩瓷和用印花帖片等新型工艺装饰的瓷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长沙窑"体系。

长沙窑的生产伴随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兴起、发展、衰落，由于本身具有许多为西亚地区阿拉伯人所接受的装饰而行销海外。多年来，不断有许多长沙窑产品在国内外发现，为研究长沙窑提供了丰富资料。

一　国内出土长沙窑瓷器概况

国内长沙窑瓷器，绝大部分出土于唐代的商业贸易中心和港口，如扬州和宁波等。此外安徽、广东、广西、西安、武昌等地也有出土。

现根据出土地点的不同，分四种情况试作介绍：

①外销港口出土的长沙窑瓷器　以浙江宁波（古代叫明州）港为代表。其长沙窑制品有鄞县鄞州桥区出土的印花双系罐、新昌西岭乡庙前地村出土的贴花褐斑执壶、镇海小港出土的黄釉施绿彩的盒。从镇海、鄞县和义路水上交通要道出土的遗物来看，有些破损，但从釉的光泽来看，均无使用痕迹，当是因运输受损而遗弃的。此外墓葬中还出土了不少完整的长沙窑瓷器，从出土瓷壶上的印花贴片装饰来看，有大眼高鼻吹笛的"胡人"，骑马的勇士和花鸟图形等等。明州是唐王朝对外开放的港口和商埠，其长沙窑产名数量之多，仅次于扬州，居第二位。

②国内商埠出土的长沙窑瓷器　以扬州为中心。根据长沙窑产品出土的情况来看，广东地区出土不多，1974年西沙群岛打捞出一件贴花壶，耳流之下贴附印花；1975年在离汕头不远的揭西县曾出土一件长沙窑执壶，壶的双耳和流下为印有热带植物的贴花和对鸟、对鱼等图案装饰；1976年高州军墟后岭亦出土一件耳流之下贴附叶脉状印花的曲柄壶。此外广州东北的增城县还出土了一件方柄葫芦形壶，番禺县石马村出土过青釉罐。泉州至今尚未发现长沙窑制品①。扬州则不然，1983年在扬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调查时，就发现了不少长沙窑制品，如黄釉带彩篆（？）字壶、黄釉绿彩雁纹壶、青釉联珠纹带彩罐、印纹带彩盂、褐彩盘、青釉褐彩花卉碗、块状釉系纽壶和器壁上书有阿拉伯文"真主最伟大"的背水壶等。②

③水井中出土的长沙窑瓷器　湖南长沙、衡阳、郴州和浙江新昌水井中均出土过长沙窑

产品。其中1973年湖南衡阳市人防工程建设中发现了水井23口，水井内除了素面青釉詹口坛、双系罐、四系罐和盂、钵、盘、碗外，还出土了具有长沙窑特色的印花贴片系组壶、连珠纹点彩双系罐、釉下彩绘花朵水禽执手壶等。印花贴片壶上，饰有清真寺状的建筑、舞蹈者和“胡人”。

1985年湖南郴州市饮食公司基建工地中发现6口古井，古井中除了长沙窑青釉双系罐、四系罐、詹口坛和盏、碗外，还出土了具有长沙窑独特风格的带有印花贴片装饰的执手壶、泥塑小动物。贴花壶上印有葡萄纹和对鸟花朵③。浙江新昌西岭乡前村地于1972年修水渠时，砖砌的小方井中也出土了长沙窑印纹贴片系组壶一件，纹饰为骑马飞奔的勇士和吹笛的胡人④。唐代水井中经常出土各种长沙窑制品，说明长沙窑产品除了外销，也是国内人民所喜爱的日常生活用瓷，拥有一定的国内市场。

④古墓中出土的长沙窑瓷器　除了湖南长沙、益阳、醴陵等处外，宁波、安徽、西安、武汉、广西等地亦有出土。其出土数量除了宁波与扬州外，则以安徽为最多，这些瓷器绝大部分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少部份收藏在合肥、淮南和寿县等县市博物馆，共计近百件。器型有壶、罐、盒、水盂、砚滴和镇纸等。其中具有长沙窑独特风格的有人物印花贴片执壶、双鱼印花执壶、椰子树印花贴片双耳大罐、点彩双耳罐、釉下彩飞凤纹壶、釉下彩走兽纹执壶和狮形镇纸、兽形砚滴等。巢湖地区会昌二年（842年）墓曾出土一件，八棱形流、瓜棱形腹、釉下绿彩飞花鸟纹执壶，据该墓墓志铭记载‘墓主人叫“伍府”。上述长沙窑瓷器多半出自安徽的江淮地区，如合肥、肥东、肥西、巢县、寿县、淮南、定远等市县。淮河以北的宿县和亳县也有少量出土。据安徽省博物馆王业友同志分析，安徽目前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并非从长沙直接运入，而是来自它的重要集散地扬州。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长沙窑瓷器的主要销售市场大致如下：

国内——“岳州为百越、巴蜀、荆襄之会”（《读史方舆纪要》卷77《岳州府》）。唐时长沙窑瓷器沿湘江至岳州，然后过洞庭入长江，抵达扬州。并以扬州作为主要集散地。然后再由明州（宁波）运往海外各地，而主要运往西方。长沙窑瓷器诗句中也有“借问舟轻重、附信到扬州”句，说明扬州是主要中转站。

国外——主要运往伊朗、伊拉克。在伊朗的波斯台岸的西拉福、达依尔，以及内陆的尼夏普尔，伊拉克和以东的许多国家均有发现。

其次要销售市场如下：

国内——湖南的永州为湘南的贸易中心，当时“巨舰遭回”、“商筏逶迤”（光绪《湖南通志》卷265《艺文》引唐李谅《湘中纪行》）。唐时长沙窑也可溯潇湘而达五岭。但由于广东与广西地区出土长沙窑瓷器甚少，故湘江西路决不是长沙窑瓷器外销的主要途径。

另一条路线是五代马殷与外商来往运茶的渠道，所谓“运茶至河南北，获利几十倍”（李肇《唐国史补》下）。其路线是出洞庭，过长江，顺运河北上，转陆路经开封、洛阳，过潼关而至西安（京兆长安）。也可根据黄巢进军北上的路线出沄州至鄂州，经宜州过洛阳，而至长安。

国外——从明州（宁波）东至新罗（朝鲜）和日本；另一线；从明州至广州，跟随越窑产品运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

二“长沙窑”兴起的历史背景

长沙窑瓷器兴起的历史原因，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谈：

①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以后，黄河流域不堪战乱之苦，大量人口南迁，经济

重心南移，而这时商人的政治地位也逐渐有所改变，如各地军阀势力与商人相互勾结等，对促进地方经济起了一定作用。

唐代初期则不然。唐王朝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如法令规定："工商之家不得與与士"。[5]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6] 等等。

安史之乱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军阀往往亲自兼营商业，积聚财产。如大军阀安禄山在反叛前，就曾"分遣商胡诣诸道贾贩，岁输珍货数百万"[7]。中唐以后，不仅商贾贿结官吏成风，甚至自宰相及至县令各等官职，皆标价列肆出售[8]。僖宗时，因国库虚竭，朝庭对商人采取了让步政策，商贾的政治地位因而起了很大变化，有些商贾不仅富比王者，而且交通豪贵，倚富逞势。从此江南一带甚至出现了"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或"赋出天下，江南什九"的局面[9]。

那时，湖南的经济情况也大有变化，所谓"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10]"又：自唐玄宗天宝（742—756年）至宪宗元和（806—820年）期间，湖南境内没有出现大的战乱和灾荒。因而户口增长、经济繁荣、再加上北方唐三彩等多种陶瓷工艺的影响，对孕育长沙窑的成长也起了促进作用。

②唐朝政府鼓励发展对国外的商业贸易。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谕令在广州、泉州、扬州置"三路市舶司"；太和八年（834年），文宗又诏谕："南海番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结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1]。因而阿拉伯沿海和中亚、西亚地区的番客，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接连不断地来到扬州、广州和泉州等地行商贸易。《旧唐书·李勉传》记载，李勉在广州任官时，每年来华的外国商人达十万人以上。其中主要是波斯、大食等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中国对待外商货物，只征百分之三十的关税，乃将货物发还原主出卖；对待回教商贾，政府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故伊拉克商人皆颂声载道。唐朝时期，伊斯兰教商人可以和汉人结婚，开设商店，可以"占田"，也可以科举应试、任官。因而"唐时扬州常有波斯胡店"[12]"贞元三年（787年），胡官留长安者，约四千余人，皆有妻子"、"自天宝以来，西安、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13]。大食国人李彦升还参加科考，次年竟以进士名显。"大中（847—859年）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色目榜花"[14]。由于唐朝政府对兄弟民族和外商采取友好政策，所以他们纷纷前来经商，阿拉伯旅行家麦斯俄迭也说："广府城人烟稠密，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人和火袄教人，就有二十万"。

③隋唐以来，除了沟通南北交通的大运河和陆上的"丝绸之路"外，还出现了海上的"陶瓷之路"，对中国陶瓷的外销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长沙窑适应新的时代要求，采取了面向阿拉伯，以伊斯兰教徒为主要销售对象的方针，为适应这些地区人们特殊需要而设计出形式多样，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装饰图案。特别是瓷器上的彩画在古代埃及新帝国时代和罗马拜占庭时代，曾流行一时，具有较浓的西亚风格，这些彩画和狮子、棕榈树、鸟的图案等具有颇多为伊朗及美索布达米亚居民所接受的性质[15]。造型上，长沙窑瓷器摹仿金属器的特点，并迎合胡人喜爱饮酒的习惯，设计出多种酒壶和酒盏，有的还以西方制酒原料中的葡萄作为装饰，有些壶上还出现了赞美酒家的诗句。如"陈家饮

美酒”、“二月春豊（醲）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近入新丰市，唯闻旧酒香，把琴酤一醉，终日卧（垂杨）”。

长沙窑瓷器自身的特点使其在海外特别是西亚地区很有市场。因此，在唐朝经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日益扩大的形势的刺激下，长沙窑的生产也日渐发达并大批外销。

三　长沙窑的衰落

长沙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

①外商遭杀害及商品来源遭到破坏，是导致长沙窑衰落的主要原因。

长沙窑生产的贴花、印花等新产品主要销售对象是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教徒等外商，国内市场大部分也是为了供应侨居国内的胡人。但是九世纪末叶的黄巢起义，几乎摧毁了长沙窑的销售市场。这在当时的中外文献中不乏记述。

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初阿拉伯商人所著《中国印度见闻录》曾详细描述了外商惨遭杀害的情景：

“在中国，出了一名叫黄巢的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民间崛起的。此人初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后来便抢夺兵器，打家劫舍……在众多的中国城市中，他开始向广府（*Khānfū*广州）进发。这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广府居民起来抵抗黄巢，他便把他们困在城内，攻打了好些时日。这个事件发生在回历264年（即公元877年9月13日至878年9月2日之间）。最后，他终于得胜，攻破城池，屠杀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这四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

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了。我们特意提起桑树，是因为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一直喂到蚕把自己包裹起来（藏在茧中）为止。因此，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的原因。”

又说“他洗劫广府以后，又接二连三地捣毁其他城市……皇帝只得舍弃京师，逃到邻近西藏的穆祖（*Mudhū*成都）。”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也记述了广州伊斯兰等十二万商人惨遭黄巢杀害等情况，并说：“这个事件对阿拉伯一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事件发生后，阿拉伯至广州的通航中断了。”

又：马斯欧迪《金草原》也有类似的记述：敌人（黄巢）还砍倒了广府市区周围的桑树。桑树因其叶可喂养吐丝的家蚕，而备受人们珍惜。由于桑树遭致砍伐，中国丝绸向伊斯兰教国的输出陷入停顿状态。”

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的有关史料：

乾符六年五月（879年）“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书，求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之奏闻，朝廷不许。……九月，黄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诟执政，急攻广州，即日陷之。”⑯

乾符六年（879年）“闰（十）月，湖南奏，黄巢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陷潭州（今湖南长沙）。”⑰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正月乙卯朔改元诏：“近日东南州府，频奏草贼结连……东南州府遭贼之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就中广州、荆南、湖南，盗贼留驻，人户逃亡，伤夷

最甚。"⑬

又说："广明元年八月黄巢之众渡江寇淮南。"

《新唐书·高骈传》还说："巢逼扬州，众十五万"。

从上面列举的史实可以看出，黄巢的起义军对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及商品流通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此外漕运的衰落，也对长沙窑瓷器的外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僖宗时，震撼唐王朝的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断绝了江淮运河的交通线。僖宗重返长安时，藩镇割据加剧，其中对漕运影响较大的，为控制运河与长江交会点的高骈，自中和二年（882年）起即断绝贡赋。割据淮南的杨行密，于昭宗天佑三年（906年）"抗拒王师，邀截贡赋，窃据州邑，断绝梯航"。由此可见，各地藩镇"皆自擅兵赋"或者劫杀商人，重征商税，从而对水上的正常交通往来起了阻碍作用，再加上外商遭到杀害，商品来源遭到破坏，而造成外贸中断，或陷入停顿状态，长沙窑产品滞销，这些都是导致长沙窑衰落的主要原因。

至五代时期，割据湖南的马氏家族，对海外商人也大行杀戮，据《十国春秋·衡阳王世家》记载：

"王（马希声）性恶而爱货，海商鬻犀带者，直数百万，昼夜有光，洞照一室。王杀而取之"。"海商"无疑是指当时与湖南有贸易往来的外商而言。

由于以上原因，"自中国有上方所述之大乱以后，地方官长无法律公道可言，其善意全不可恃，商人乃裹足不前。船舶皆于此中间港口相会，交易货物也"。⑲

②长沙窑瓷器大部分未达到瓷化的程度，因而胎质疏松，并有脱釉现象，它既不如邢瓷之细白，又不如越瓷之坚细。而我国民间陶瓷，尚"实用"。当时以青瓷为代表的越窑，在国内外很有盛名，国内许多地区出现了仿烧越窑制品的现象，湖南也不例外，如衡州地区的蒋家窑，大规模地烧制类似越窑的青瓷制品，五代之际，岳州洞庭湖一带的鹿角窑，也大量烧制青瓷。从而给长沙窑的国内市场也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③长沙窑废品残瓷遍地，龙窑重叠密布，挖取瓷泥的洞穴紧密相连。由于瓷土来源短缺，燃料不济，也使长沙窑的继续生产发生困难，迫使长沙窑的窑场往上游或向下游搬迁，或转烧青瓷或其他产品。

---

① 李知宴《论越窑和铜官窑瓷器的发展和外销》，《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
② 扬州博物馆《扬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调查》，《文物》1985年第10期；蒋华、古健《唐代长沙铜官窑彩釉瓷双系大罐》，《文物》1978年第3期。
③ 郴州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郴州发现唐代水井》，《考古》1987年第2期。
④ 潘表惠《浙江新昌出土长沙铜官窑执壶》，《湖南考古辑刊》第3期。
⑤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表》。
⑥ 《旧唐书》卷一七七《曹确传》。
⑦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⑧ 《玉泉子》。
⑨ 《韩昌黎集》卷十九《送陆歙州诗序》。
⑩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卷一一三《崔瓘传》。
⑪ 《全唐文》卷七五。
⑫ 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二。
⑬ 《资治通鉴》卷四八《唐纪》。

⑭ 钱易《南郊新书》丙，《学津讨原》本。

⑮ 〔日〕三上次男《伊朗发现的长沙铜官窑瓷与越州窑青瓷》，《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

⑯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

⑰ 《通鉴考异》卷二四、三一《实录》。

⑱ 《旧唐书·僖宗纪》。

⑲ 麻赫提《黄金牧地》308页。

唐山陶瓷的产生及外销

赵鸿声

说起陶瓷史，河北省有古老的磁山文化，有著名的唐代邢窑与宋代的定窑和磁州窑，这是家喻户晓的，然唐山陶瓷却不见经传。作为窑口，它是近代叶麟趾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最早提到的。笔者认为，明隆庆四年《丰润县志》卷三、卷六提到的“丰润窑”也当指唐山窑，因为唐山东西缸窑一带也曾属丰润管辖。①

唐山解放后的几次重大考古发现证明，在市区大城山一带有龙山文化遗存，出土有陶鬲足、陶环、网坠及大量黑、黄、灰色陶片。另外还有石斧、石刀、石杵等生产工具。还有兔、羊、猪、鱼骨及鹿角和蛇的化石。从这些遗物可以了解远在四千年前，先民就已选择了这片背山傍水的地区从事劳动和生息。从发掘的碗、盆、罐、鬲、鬶等陶器来看，这些器皿已被当地的人们普遍使用。在器皿的造型上也有了美化的要求，刻印了绳纹、麻纹、附加堆纹、方格纹和弦纹等复杂的纹饰。特别是黑陶器，里外黝黑，表面磨光，陶胎又匀又薄，非常坚实实用。还有陶制的纺轮，反映了纺织工艺的发展；骨针骨锥，说明当时人们服装的裁剪补缝已很普遍；玉环、陶环、陶珠、骨簪等装饰品，则反映出人们对美化生活的追求。②据报道，大城山龙山文化总的特征与典型龙山文化相距较远，属沿海地区龙山文化中地方性较为浓厚的一支。③与大城山隔河相望的贾家山发现的龙骨洞，也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里的贾各庄遗址中，还发掘了战国、西汉、东汉的墓葬，其中有春秋战国的瓮棺葬6座、战国墓22座、汉墓11座。从唐山战国墓出土的全部陶器来看，属于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的范畴。如鼎、豆、壶、尊、簋等，在其它区域都很常见。这些器型除基本承袭中原文化外，还有一些变化。同时还有一部份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陶器，除了易县燕下都之外，当时在其它区域还没有发现过。唐山东矿区及滦南县也有商周陶鬲残器和陶罐出土。1956年12月，河北省在唐山滦县调查夷齐庙遗址时，采集了细把灰豆、纺轮、鱼骨、盆罐、盆口沿等。陶质有加砂红陶、加砂灰陶、泥质灰陶。多为轮制。形制与河北省各地战国遗物类同。同贾各庄战国墓相似的遗物，1972年在丰润县也有发现。就唐山燕国陶器的典型性而言，受到考古界极大重视，后来各地燕文化出土陶器，皆以唐山出土对标。因此，虽然唐山尚未发现古代窑址，但这里人们栖息生存并有了陶器制作，可以说是不须怀疑的了。

唐山在商周是孤竹国地方，战国属燕，汉为海阳县地方，属辽西郡，魏晋同，南北朝时属肥如县，隋属卢龙，唐、五代、辽、金、元为石城县，后唐时属契丹的辽兴府，金属滦州，元属永平路，明清属永平府的滦州。民国时分属滦县和丰润县。近三十多年来，各代陶器均有出土。专家们认为这些器物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在许多器物的造型上，亦可看出其历史承袭关系。

然而，在有这么悠久制陶历史的唐山地区，而且邢窑、定窑、磁州窑又均在省内，为何唐山迟至明永乐二年才开始有了粗瓷生产呢？这的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唐山地处冀东，南濒渤海，北靠燕山，中间是一片沃壤良田，陶瓷原料多露头裸现，煤炭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具有发展陶瓷的良好条件。由于这里自古就是中原通向东北地区的走廊，既是民族友好交融的地区，又是屡经频繁战事之地，人民常常在拉锯战中东奔西逃，不能长期安定生活。北宋靖康之变时的徽钦二帝被掳也是经此北去的。这里在历史上多次被战争搞成无人区，后来又不得不靠移民填补，文化时断时续，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永乐二年（1404年）以后，具有烧制粗瓷技艺的山西介休与山东枣庄移民先后来到唐山，利用这里的原料和燃料资源条件，与当地人一起从事缸盆的制作，在生产有了发展之后，按窑户群落分布的大体位置，东西缸窑的地名开始形成，并使产品逐渐演变统一，后来形成了唐山特有的地方风格。⑤ 在《畿辅通志》中标有缸窑镇，距龙王庙三里⑥。关于永乐二年移民，在流传至今的当地田氏族谱中，也得到了证明。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顺治十五、十六年（1658—1659年）曾到过唐山一带。在他写的《营平二州史事》的序言中说："郭君造卿以其余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其后七十年，炎武得游于斯，则当屠杀圈占之后，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与时移。"

"屠杀圈占"就是清初上层统治者的"跑马占圈"，是一种对农民的疯狂残暴的土地大掠夺。一般上些年岁的人都听长辈叙述过。清末八国联军从唐山一带登陆，大肆蹂躏。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也在唐山一带制造过骇人听闻的无人区⑦。

以上这些实例足以说明唐山人民苦难的过去。性命都顾不上，何谈安居乐业发展陶瓷生产呢？这就是迟至明代唐山才有了粗瓷以及后来的陶瓷生产发展亦非常缓慢的根本原因。

成书于明末的《古今图书集成》有关于"成化间毁永平窑"的简略记述。永平窑当属永平府。永平府设在卢龙，辖迁安、抚宁、昌黎、滦州、乐亭、临榆诸县。就这几个县生产陶瓷的最大可能，应推滦州唐山，所以永平窑说不定即指唐山窑，或因唐山窑之兴起而废弃永平窑，这均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丰润县志》有"唐山产煤"及"用以烧窑"的记载。但烧的什么窑，没有说明。那时用煤烧瓷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故可以认为包括烧瓷。

嘉庆庚午版《滦州志》(1810年)记有"瓷器出唐山一带，只有黄黑粗瓷，瓮、盆、盘、盂之属。"这是较为明确的记载。

1876年重修的《永平府志》有如下记载："瓷器出滦州唐山、开平一带，黄黑色，用烧瓮瓮诸器。"这说明其质量比半个世纪前没太大变化。

在邯郸彭城陶瓷的影响下，光绪年间，唐山有了化妆土白瓷及花瓷的生产。在唐山来说，这是一次飞跃。

1911年前后，西窑田鹤群（1862—1926）、田子丰父子制作仿古瓷，当是唐山最早出现的白瓷。田家窑仿宋瓷品种颇多，并可为古瓷修补残缺和配对，几可乱真。但数量很少，也失传了。

1916年5月再版的《直隶风土调查录》记有"滦境煤矿、东西缸窑，沿海渔盐，此三者于工商大有利益，皆人民赖以谋生者。"这说明此时陶瓷生产已是地方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

1932年《工商半月刊》的《中国陶瓷工业调查》中提到"光绪末年，于景德镇、醴陵、重庆、成都等处先后设立陶瓷工厂。惟连年受时局影响，遂多停顿，除江西瓷业公司、四川

新瓷公司、蜀瓷公司、川北瓷厂……河北唐山启新瓷厂等尚能勉强维持，开厂制造，其余屡次停办。”上述唐山启新瓷厂，创建于1914年。这段文字正好说明唐山陶瓷是清末民初才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已经开始列入现代陶瓷工业之林。

直到1936年的《滦县志》才对唐山陶瓷有了较多介绍。据启新瓷厂85岁的退休老工人田世佑1976年时的回忆，启新瓷厂于1915年以后，陆续烧出了耐酸、耐碱、耐潮湿的各式铺地砖、理化用瓷、电瓷，以及卫生瓷等。

唐山陶瓷在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在现代工业推动下，有了一个小小的起飞。这就是1936年《滦县志》中较为详细地反映的唐山陶瓷生产许多方面的历史背景。其中除了启新、德盛，还有个自明代就已建厂的新明瓷厂。到这时专派人才，悉心研究改进，添置机器，出品日精，于1931—1934年连获四届河北省国货展览会特等奖状；1933年获北平各界提倡国货运动委员会超等奖状；同年全国铁路沿线生产货品展览会给予超等奖状。

近代的唐山陶瓷工业，可以说是在现代工业城市的形成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1877年，唐山建起了现代煤矿；1882年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接着，水泥、纺纱、铁路工厂相继建成，并有了电力工业。启新瓷厂一开始即使用了电力和球磨机、粉碎机等设备。本世纪20年代以后，该厂又从西欧引入了各种机械设备。不过，这时它生产的瓷器质次胎灰，因此被称为“洋灰瓷”。启新瓷厂也生产仿古瓷，有窑变色瓷和花瓶。该厂1921年由德国人昆德包办，产品也冲破了原有的传统瓷器品种结构，并将市场扩大到国外。1927年开始出口建筑瓷砖，品种有黑、白、紫红、米黄等颜色的铺地砖和内外墙砖。到1935年又增多了品种，有便器、洗面具、水箱等卫生洁具，主销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当时启新瓷厂的出口，也由德国人经营的华平洋行包销。为了争夺国外市场，他们把产品先送到天津，加饰“德国制”字样和外文款识，然后包装发运。具有典型的殖民地经济色彩。一直到解放前都基本上如此。

唐山陶瓷在三十年代前后，通过铁路将卫生洁具、铺地砖、电气瓷料运往北京前门、塘沽、天津，年约7800吨；缸砖、缸管、瓷器、耐火土每年运出万吨，运上海千吨、汉口数百吨、海州千吨。⑨其中有些是出口国外。

唐山陶瓷的真正起飞，是解放以后的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唐山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人阶级队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虚心学习各地的技术，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出了优等的工作水准，使唐山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行业配套、结构较为完整的生产经营体系，进而跻身于国内少数几个大型陶瓷生产基地之列。朱德委员长1961年题词赞誉唐山为“第二个景德镇”。从那时起，唐山被人称为“北方瓷都”。

唐山的建筑卫生瓷1954年恢复出口，1956年6月日用瓷开始出口，并出现了第一个全部生产出口瓷产品的厂家。到1956年年底，全市已有七个瓷厂近百种产品出口。唐山陶瓷厂（即原启新瓷厂）出口增长很快，该年一季度出口量达49%，二季度出口量即达85%。销往印尼、泰国、缅甸、埃及等国家。

今天的唐山陶瓷，在全国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卫生洁具的产量占全国1/3以上；釉面砖产量占全国13%；洁具连续保持三十多年的独家出口局面，在全国七次产品质量评比中获七次第一；参加全国面砖评比亦获七次第一，面砖出口占全国1/4；日用瓷，唐山陶瓷公司是全国五大陶瓷公司之一；理化用瓷产量占全国90%；高压电瓷的一些产品，在全国30多家同行中名列前茅；生产难度很大的电镀槽、大浴池等，多年来在全国仍为独家生产。唐山不

仅拥有多家出口瓷专业厂，还有不少大中小型企业，甚至集体和乡镇企业也都有些产品出口，为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① 《中国的瓷器》324页，331页。
② 唐云明、孙德海《大城山古代文化遗址》，1955年12月3日《唐山劳动日报》。
③ 唐云明《关于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中的几个问题》，《考古》1964年第7期。
④ 赵鸿声《唐山陶瓷古今谈》，《河北陶瓷》1986年第3期。
⑤ 同④。
⑥ 《畿辅通志》（明）卷五十四舆地九、疆域图说九：第1976页滦州、2438页丰润。
⑦ 李远、赵鸿声《唐山陶瓷史》（初稿）。
⑧ 《河北省滦县事情及唐山市事情调查》，1940年1月新民会出版。

耀州窑外销陶瓷初析

禚振西

我国的陶瓷业，在世界各国早享盛誉。陶瓷器的输出，亦有悠久的历史。唐以前，数量小，且多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那时，外国使者来华入朝，通常都带着本国的名产，如宝石、琉璃、狮子、名马之类。中国朝庭亦回赠和赏赐各种礼品。各种陶瓷器也往往作为礼品被输出到国外。这种"礼尚往来"的特殊交换形式，曾起到加强中外友谊和中外人民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间接外贸作用。中唐以后，陶瓷器的外输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输出的数量不仅大大增加，而且改为贸易渠道进行。在我国晚唐以后的整个外贸输出中，外销陶瓷占有很大的比重。它的外销，不仅加强了中外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曾经为国家的财政经济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收入。

从目前国外所获资料看，我国唐宋时期的陶瓷输出，具有窑口多、品种繁、数量大、销售范围广等几个特点。在此时期的众多外销窑场中，耀州窑就是其中的一个窑口。

关于耀州窑的外销问题，在古文献中不见记载；以往，也没有专题论述，在研究工作中还是个新课题，目前探讨，资料也比较少。笔者仅就个人所见的国内报导，不揣冒昧，写此小文，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期待着深入一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和学友指正。

一 海外发现的耀州瓷及其出土地

耀州瓷在国外的很多博物馆都有展出和收藏，但它们的来源，目前得知尚少，在没有搞清这些器物的来源之前，不论它们之中是否有外销瓷，当前都不能做为我们研究的依据。留下来可供研究的可靠资料，只能在国外的古遗址中的出土物内寻找。

国外古遗址中出土的外销耀瓷，现在已经确认出来的，为数不多。它们分别出土在日本的京都、阿曼的苏哈尔、埃及的福斯塔特，以及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现将这几处的情况叙述于后。

1.京都

日本的京都，位于本州的关西，这里依山临川，位置适中，具有封建社会建都的理想地望。从桓武皇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建成平安京开始，直至近代前，这里一直是日本的国都。日本的奈良和平安时期，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和留学僧、留学生来华学习。采用条坊布局的平安京，其整体规划和营造本身就是学习唐长安城都市建设的结果，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1987年10月，笔者有幸参观了京都博物馆，看到这里收藏了很多平安、镰仓、室町、桃山直至江户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其中，以平安和镰仓时期的东西较多，反映了当时文化和商业往来的频繁。因为京都南距大阪湾很近，且有鸭川、桂川、宇治川、本津川数条河流环绕和汇通，国内和海外的交通都比较方便。在历史上，它也就成了中国向日本进行贸易输出的一个重要城市。伴随着平安京的建立，从九一十世纪起，

中国的陶瓷器就已输出到这里。在京都市平安京遗址内曾出土过不少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长沙铜官窑黄釉褐彩瓷等。十一世纪以后，外销到这里的中国陶瓷更是数量大增。日本的考古部门京都市埋藏文化财研究所，曾在京都市左京三条三坊的十二世纪时期的水沟中，发现有耀州窑的印花纹青瓷碗①。它显然是北宋时期耀州窑输往日本的外销瓷器。

2.苏哈尔

阿曼的苏哈尔也叫苏法尔，位于今首都马斯喀特市的西北，曾经是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古老城市。这里，地处从东亚、东南亚、印度半岛通往阿拉伯半岛、东非、北非、以及欧洲的海上交通的枢纽部位。在古代，是由印度洋驶入阿拉伯海，再通往红海和地中海，必须经过和停留的要港，也是从印度洋、阿拉伯海驶往波斯湾的门户，还是沟通中、西亚大陆与世界各地联系的咽喉。这种特别优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在古代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使它成了古代东西方国际贸易和“陶瓷之路”的重要转运站与集散地。中国的外销瓷也在这里留下了遗存。根据考察报道，苏哈尔“从1980年起，在城外约几十米远处陆续出土了中国几个朝代的许多瓷器残片。在这些出土的瓷器残片中，有我国唐代浙江越窑的青瓷和类似河北邢窑的白瓷；有宋代南方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和北方耀州窑的青瓷，以及第一次在阿拉伯半岛上出土的广州西村窑的瓷片等②。”从发表材料看，这里不仅曾经销过外销耀瓷，而且还曾输入过耀州窑系的广州西村窑瓷器。

3.福斯塔特

埃及的福斯塔特，位于首都开罗的南郊，它兴盛于公元七至十世纪，是现今开罗市的前身，这里紧靠红海和非洲最长的河流尼罗河的入海处。在尚未开拓从大西洋或印度洋绕道非洲好望角彼此通航的国际航海路线前，中西交通唯一的航线是由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经红海再转入地中海，最后到达大西洋。在这条沟通世界文明的中西交通航线上，福斯塔特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地处欧、亚、非三洲交通的中枢地位，是东方的商品从红海转入地中海的陆路中转和集散中心。在中世纪，这里不仅是埃及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亚非伊斯兰世界的都市中心，还是欧、亚、非三洲国际贸易的重地和东西文明的一个交接和交融点。本世纪初期以来，欧、亚、非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家，对该城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外销古瓷。据三上次男先生统计，“福斯塔特遗址仓库里的陶片中，中国陶片约有一万二千片之多”③。是目前国外出土中国外销陶瓷标本最多的地方。出土的中国瓷，以越窑青瓷最多，其次是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定窑白瓷，还发现有耀州窑的刻花和印花青瓷④。耀州瓷的数量，已确定的不多，但它在福斯塔特出土，起码说是耀州窑向北非销售产品的实证。

4.基尔瓦

基尔瓦是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在海域中的一个岛屿。坦桑尼亚地处东非中部，在中世纪，是一个海洋贸易发达的地区，沿坦桑尼亚的印度洋海岸及岛屿区，布满了中国瓷器的出土地。据英国的福里曼·格林威尔的报告，五十年代中期的三年间，仅在坦桑尼亚西海岸发现的出土中国陶瓷片的遗址就有四十六处⑤。来此进行考古工作的惠勒曾说：“从十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葬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耀州窑的外销瓷，也参加了谱写坦桑尼亚地下埋葬史的行列。外销到坦桑尼亚的耀州瓷，发现在基尔瓦岛的北部，那里曾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城镇和商埠。经过较大规模的发掘，揭示出中世纪的宫殿和清真寺遗址，在遗址范围内，出土了大批的中国瓷器，其中也有耀州窑的青瓷标本，是耀州瓷远销到东非的实

证。⑥

上述四个亚非国家发现的耀瓷标本，全部都出土在中世纪的遗址中。它们的出土地点，均位于古代世界的"陶瓷之路"上，或国际贸易的中转枢纽与要冲，或是我国古代贸易的重要都镇与货物集散地。因而，上述几处遗址中出土的耀州窑瓷器标本，都应该是外销耀瓷。这种可靠性，决定了它们自身的价值。它们的出土，不仅填补了耀州窑外销产品资料上的空白，为耀瓷的研究增加了新课题，而且也为我国古外销陶瓷增添了窑口，增补了资料，在我国古外销陶瓷史和外贸史的研究上，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二　外销耀瓷的销售范围和运输路线

现已发现的外销耀瓷标本，数量不多，可靠的出土地点也很有限。在这方面，有待日后的考古发现来表明的事还太多，以此为基础来研究耀州窑陶瓷外销的范围及其运输路线，显然难以深入展开。这里，只能就此问题勾划出一个粗略的大轮廓，以期见一斑而窥全豹，从而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促使问题早日解决。

从现有的四个确凿可靠的外销耀州瓷的出土地点看，日本的京都，位于亚洲的远东；阿曼的苏哈尔，位于西亚南部的阿拉伯半岛；埃及的福斯塔特，位于北非的地中海沿岸；坦桑尼亚的基尔瓦，位于东非的沿海岛屿。出土地点虽然只有为数不多的四处，但其间的距离在万里以上，且均分布在亚、非两大洲古代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或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耀州窑外销瓷的标本在这些地方的中世纪古遗址中有出土，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个中国的名窑所生产的外销制品在海外的销售地域和范围非常广阔。它东达远东，西到西南亚和非洲的地中海及东部沿海地区，在横跨亚非地区万里以上的辽阔区域，都有它的销售市场。对于地处中国大陆中心之渭北高原的耀州窑，能在距今千年左右以前，用中世纪古老的水陆交通运输工具，将容易破碎的陶瓷制品，辗转远销到万里之遥的异邦，所凭借的只能是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的精湛工艺和高质量的优秀产品。那些销往海外的精美耀瓷，体现了我国古代与亚非国家及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交往。在所到之处，交流了文化，传播了工艺和技术，也播下了和平和友谊的种子。

销往远东、西亚和非洲的耀瓷，是用什么载运工具，沿着什么路线运去的？对此，不见古文献记载。要解决它，除藉助于考古资料外，还要结合古代和中世纪中西交通路线进行分析。

从公元前后的古代，到近代以前的中世纪，连接中国和中亚、西亚及地中海世界（包括北非和西欧）的贸易通路有两条。这就是陆上商路和海上商路。

陆路交通贸易道，以汉唐时期的国都长安城为起点，西经河西走廊和新疆南、北古道，横跨亚洲中部的沙漠、草原、河流、山脉，越过古波斯，到达地中海沿岸。汉唐及稍后时期，在这条沟通中西经济往来的国际商路上，通过驼帮以"沙漠之舟"为运载工具，将中国的丝绸和其他特产，运往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各国，又将当地的土特产运回中国。这条国际贸易商路，由于主要向外运输中国蜚名世界的丝绸，从十九世纪起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名为"丝绸之路"。因"丝绸之路"已在世界享有盛名，不仅研究文章频多，更有中日合拍的实地考察电视深入千家万户，所以此文不再多述。

海上通道，以中国东南沿海的古代港口为起点。向东，通往朝鲜、日本，或通过中国东部的岛屿，直达日本；向西，出中国的南海，绕过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经印度的东海岸，越过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通往波斯湾或红海与地中海的伊斯兰世界。

中国的海上远航，开辟于公元前二世纪。秦朝时，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令，曾率三千童男童女入海东渡到日本，开辟了中国通往远东日本的航路。到公元前后的汉代，又开辟了通往南亚的航路，已有远洋航船到印度半岛去经商和通好。在指南针尚未使用到航海业中的一段时期里，海上的航路是由东、西两段组合而成的。东段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出发，绕过印度支那和马来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西段从欧、亚、非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中心埃及出发，经红海，穿亚丁湾入印度洋。在印度洋上利用这一区域的季风规律，冬季出现逆时针季风洋流，顺洋出海去印度半岛；夏季出现顺时针季风洋流，顺洋回到亚丁湾，从而达到横跨大洋，往返于印度半岛与西亚和北非之间的航行。这样，中国和西亚、欧洲、非洲的货物，分别通过上述东、西两段航路在印度半岛汇合，实现了以印度半岛为枢纽，沟通两段分驶航路，从而达到了中西世界友好往来和互通有无的目的。有关此一时期海上商路东段航线的情况，《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明确的记述。书中载：中国的海船"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航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航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航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致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书中的"都元国"，《通典》等古文献中也译作"都昆"或"都军"，位于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东北，是中西航海中必须经过的第一站。"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都是汉时中南岛上的小国。《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以为都在今缅甸境内，"邑卢没"在勃固附近，"谌离"和"夫甘都卢"在伊洛瓦底江沿岸。这些国家或部落出现在海船经过的航线上，表明航船从苏门答腊以北的马六甲海峡穿出后，又朝北上，绕过马来半岛西部沿海，驶向中南半岛的东南，然后沿该半岛沿岸北上，在今缅甸首都仰光附近，横穿孟加拉湾，抵达印度半岛。《汉书》中的航海目的地"黄支国"，故地一般以为在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附近（《辞海》历史地理分册），正是印度半岛的东南岸。中国的远航船到此，将所载货物，或销售在当地，换回明珠、璧流离（也就是琉璃璧）、奇石异物；或是卖与由亚丁湾和波斯湾来的大食商人，由他们的"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再运往中亚或地中海沿岸。在这一段时期里，海上航线是两段，中国船往返于东段，埃及和波斯湾的船往返于西段。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也是两批，中国与大食商人各自经管东西，印度半岛则起着中间媒介的特殊作用。

随着指南针在航海事业中的使用，远洋航海事业得到了发展，中西海上贸易商路的状况，亦相应得以发展和变化。到了唐代，这条海上商路已从东西两段各自分航发展到可以整体全线通航。在局部航线上，也有所调整。中国船舶和外国的番舶均频繁往返于全线性的航运中。航海的路线，从中国东南港口进入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后，不用沿马来半岛西岸绕道北上，而是向西驶入茫茫的印度洋深腹，走直路经过锡兰岛进入波斯湾，或沿阿拉伯海，穿过亚丁湾直入红海。中唐以后，由于海上航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政府在扬州、杭州、泉州和广州等地设置了专门机构市舶司和专职官员市舶使，负责征收外贸关税。以后，海上商路和航海国际贸易，更加昌盛。由于入唐以来海上商路以大量向海外输出中国的陶瓷器为主，因而本世纪六十年代末，被著名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专家三上次男先生提名为"陶瓷之路"。长期以来，他通过对海上商路沿线的古遗址和博物馆的实地考察，认识到海上的"陶瓷之路"和陆路的"丝绸之路"是同样重要的两条国际贸易通路。这

两条跨越上万里的商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有所侧重。“丝绸之路”昌盛于汉唐时期，被频繁使用的时间到八、九世纪为止；“陶瓷之路”虽然也始于公元前后，但昌盛于中唐以后。自八、九世纪“丝绸之路”萧衰之后，海上的“陶瓷之路”就成了东西贸易的主要路线。

对于唐宋时期的海上“陶瓷之路”运载外销陶瓷制品的情况，十二世纪初（北宋宣和年间）成书的《萍洲可谈》作了较明确的记述。据该书载，当时的远航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下以储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泛指陶瓷器——笔者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畏风涛，唯惧靠搁，谓之凑浅，则不复可脱。船忽发漏，既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国古代航海运输事业的发展水平。那船体“深阔各数十丈”、“海中不畏风涛”的先进造船术；那能够随时“入水不瞑”，潜在水下可以填补漏缝的船工；那能够“观星”、“观日”、嗅“海底泥”，在白昼、黑夜和阴雾中稳操航向的舟师，就是使这条航程万里处处惊涛骇浪的“陶瓷之路”，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畅通无阻的条件和保证。

从已知的外销耀州瓷的四个出土地点观察，日本的京都，地处远东海屿本州，耀州窑的产品必须通过海路才能输送到那里。其他三地，阿曼的苏哈尔，是波斯湾的门户和中西海上商路的要冲；埃及的福斯塔特，是沟通红海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坦桑尼亚的基尔瓦，亦是东非的海屿，三地均处在中西交通和贸易的“陶瓷之路”上。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来判断，那里出土的外销耀州瓷，应该是沿着海上的“陶瓷之路”用海船运去的。

另外，目前国内发现的考古资料，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87年笔者在福建参加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晋江年会期间，曾随会议代表参观了泉州海交馆，在陈列室内见到了泉州宋代古遗址出土耀州窑外销瓷的说明，当即向馆内同志了解，进而得到了证实。会议期间，扬州文物培训中心的负责同志还告知，在扬州也发现了不少耀州窑的瓷片标本。扬州和泉州，在唐宋时期曾是重要的外贸进出口港，两地都曾设有市舶司和市舶使，负责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和税收。现在两地的古遗址都出了耀瓷标本，证明了耀州窑的外销陶瓷曾经由关中运到扬州和泉州在两港装船出海。

除此而外，新疆的李遇春先生早些年也曾告知，他们那里的古遗址内亦出土了耀州瓷的标本。新疆是陆路交通“丝绸之路”的通道，如果在那里的古遗址中出土了耀州瓷，很可能预示着耀州窑产品的外销路线除去海上的“陶瓷之路”以外，也曾走过陆路通道“丝绸之路”。在此我们应该考虑到，我国古代生产外销瓷的窑场，距离“丝绸之路”的起点唐长安城最近的就是耀州窑。位于今铜川黄堡的耀州窑中心窑场，离长安城所在地西安市只有一百公里。“丝绸之路”从长安城开始后，大体上是沿着现在的西兰公路经过凉州（今平凉市）走向河西走廊的。因此，从交通方便、经济效益好、并少冒风险的角度考虑，耀州窑亦有可能还曾选取过陆路交通线来推销产品。在西夏王朝尚未占领“丝绸之路”必经的凉州、沙州（敦煌）以前的唐和北宋时期，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大的。新疆地区出土的耀州瓷标本，能否说就是这一时期陆路输出时留下的遗物，还有待日后的考古资料来做判断。

三　耀州窑外销陶瓷的时代和品种

目前得知的外销耀瓷标本，无论是亚洲的日本和阿曼，还是非洲的埃及与坦桑尼亚，所见报导均属北宋时期的产品。品种是一色橄榄釉青瓷；器形多见碗、盘两种；采用刻花或印

花工艺装饰，在凸起的阳纹刻花草叶和花卉上，亦往往出现阴纹细线篦纹划饰。从发表的器物照片观察，都属宋代耀州窑的典型青瓷制品，还未见到其他时代和其他品种的报导。

从耀州窑多年来大规模发掘的实物资料看，此窑创烧于唐代，历经五代、宋、金、元，中间没有中断。在连续烧造的约七百年左右的时间里，除了生产它的代表性品种青瓷外，还生产过唐三彩、唐代的低温釉单彩、黑釉、白釉、褐黄釉、茶叶末釉、黑剔花填白彩（有同志建议称镶嵌瓷）、素胎黑彩、白瓷绿彩、釉下白彩、外青内黑双色釉、外白内黑双色釉、花釉、酱釉、黄釉、酱地褐斑窑变釉、白釉黑彩等陶瓷品种。在全国上千座古陶瓷窑址中，目前已公认以北方的耀州窑和南方的吉州窑，生产的陶瓷品种最多。这就给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只发现了耀州窑外销宋代的青瓷，而未见外销其所烧造的其他时代和其他品种的陶瓷产品。是那些产品确实没有外销呢，还是某些产品曾有外销，目前还没有在国外出土；或是在国外虽有出土，但还未被认识。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应该考虑到下面的这种实际。对于耀州窑和它烧造的产品，五十年代以前、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曾经历了三次很大的变化。在五十年代初期以前，人们只从古文献记载上知道它，还和实物对不上号。它的很多精美传世品，都被认做“北龙泉”、“北丽水”、“北方青瓷”、“汝瓷”，并以上述品称标入国内外出版的书籍图版中。六十年代经多次调查和窑址发掘，在国内纠正了上述错误（国外仍如旧），但着眼点多集中在宋代青瓷上。七——八十年代，经过大规模发掘和出土，整理和对比了数十万陶瓷标本，对于它的各时代产品特征及各品种内涵，国内学术界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但国外对这些考古资料了解的很少。这种实际，必然要影响到对国外出土的外销陶瓷的窑口的判断上，不认识或误认的可能性应该说是存在的。

需要附带一谈的是中国学者还一直没有机会沿着“陶瓷之路”对有关的古遗址和当地的博物馆进行一次详细全面的实地考察。此项工作，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主要由日本学者进行，取得突出成果并写出《陶瓷之路》专著的是三上次男先生。但遗憾的是三上次男先生对中国的古瓷窑遗址的实地考察很少，不仅未到过耀州窑址，对其出土的标本也见的很少。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耀州窑外销陶瓷的时代，绝非仅限于宋代；外销陶瓷的品种，亦绝非仅限于青瓷，因为还有某些“蛛丝马迹”很值得注意。

近几年，在铜川黄堡耀州窑遗址的唐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一种伊斯兰造型的瓷器。这种器物束颈、深腹、平底、单把、敞口带流，饰茶叶沫釉和低温单彩棕黄釉，在泉州海岸曾有出口，耀州窑生产它，显然是为伊斯兰国家特制的。它的销售对象，可能有唐长安城西市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有在扬州、泉州、广州等海港的番坊中寄居的伊斯兰人。此外，也不能排除外销到中亚、西亚和北非、东非的伊斯兰国家。

另外，目前已知在西亚、非洲、远东的日本和朝鲜等古遗址中，都曾发现过中国的唐三彩标本。这些实物标本，不论通过外交途径，还是通过外贸途径，均是唐代由中国输往国外的三彩器遗留品。而烧造唐三彩的窑口，现在得知的有河南的巩县窑、陕西铜川的耀州窑、河北的邢窑。这三个窑口的产品虽然各具特征，但这些区别和特征目前尚不十分显明。因此，要明确国外古遗址中出土的唐三彩的窑口归属问题，同样是困难的。这中间，亦不能排除某些三彩器物是耀州窑生产和输出的可能性。

考虑到这些情况，笔者以为，在探讨耀州窑外销陶瓷的问题时，我们既不能只着眼于宋

代，也不能只局限于青瓷。还应该看到其他时代，看到低温釉彩陶和其他品种的瓷器，在更加广泛的时间和多品种的范围内去了解和探索。有些问题目前虽无力解决，但只要国内外加以重视和注意，以后一定可以解决。

四 耀州窑外销陶瓷的作用和地位

耀州窑的外销陶瓷，渡重洋、跨大海，越过千山万水，销售到亚非的国际市场，不仅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外人民的友好经济往来做出了贡献，为国家的财政经济增加了收入，而且在耀州窑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它扩大了耀州窑产品的销售范围，为其商品的销售开拓了新途径，从而增大了市场，增长了社会对其产品的需求量，广开了财源，为窑场增加了经济收入，为耀州窑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耀州窑繁荣鼎盛和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金与销售市场的基础。通过对耀州窑遗址大面积的发掘可以看出，该窑场唐代的作坊和窑炉，集中分布在铜川市四中（原黄堡高小）至灯泡厂以南的漆水河两岸。其他地方，只有零散发现。而宋代的作坊和窑炉，在分布区的宽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后人号称的"十里窑场"，指的就是宋代时耀州窑的规模。此时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其产品国内市场的广泛和国外市场的扩大是紧密相关的。

其次，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和社会需求量的增加，耀州窑自身的发展受到促进，其制瓷工艺和生产技术得到提高。如前所述，该窑场在唐代曾生产过三彩、低温釉单彩、琉璃建材，以及十多个品种的瓷器。如此众多品种的陶瓷器在一个窑场内大量生产，既反映了其生产的蓬勃发展，也说明了它还尚未找到最适合反映自己矿藏原料和传统工艺特征的产品种类，他还未打出具有自身特征的最佳名优产品。换句话说，反映了窑场的生产还处于多方探索和寻求方向的阶段。这种情况，到五代时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唐代的多品种争相斗艳，发展到其它品种相继停产或减少生产，青瓷的烧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一跃而占居了主导地位。入宋以后，耀州窑青瓷的生产工艺，在原料加工、造型、装饰和烧成上有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突出的成就是在唐代出现、五代发展的划花工艺基础上，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刻花新工艺。这种刻花工艺，是将用于装饰的花卉禽兽，用一竖一斜两刀走的手法，深刻出外轮廓，再用篦形工具阴划出花叶的细部筋脉。纹样的轮廓凹凸鲜明，具有较强的立体感；花叶的细部精致有变，与主体轮廓相陪衬，达到了强与弱、刚与柔、凸突与凹入、主与次之间矛盾的和谐统一。犀利的刀法、圆活的线条、优美的图案、生动的造型、晶莹滋润典雅古朴的釉色，所有这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争得了我国宋代青瓷刻花之冠的荣誉。烧制的产品，遍布中国，远销海外。到宋代中期，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耀州窑在自己独具特征的刻花工艺基础上，又采用了新的压模印花工艺，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己原有的刻花工艺特长，又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工效。这种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和提高，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是不可分割的。

再次，耀州窑自从推出了独具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产品后，因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其工艺技术对周围的一些窑场影响较大。迄今，西到陕甘交界一带，东到河南的豫西和豫西南，很多宋代瓷窑的遗址中，都出土有与耀州窑的釉色、造型、纹饰以及装饰工艺技术很相似或相近的标本。更有甚者是与耀州窑远隔数千里，位于或靠近港口的广东西村窑和广西永福窑，也发现了与耀州窑瓷器纹样相似或相近的产品。这些发现表明，耀州窑的工艺技术曾在宋代的一些窑场中得到传播和推广。而这种传播和推广，是在其产品的内销和外销

中得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耀州窑陶瓷器的外销不仅促进了自身的提高和发展，也促进了宋代六大瓷窑体系之一的耀州窑系的形成和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耀州窑在向国外推销陶瓷产品时，有它的不足和局限性。与沿海的窑场相比，耀州窑存在距离"陶瓷之路"的出海港太远和交通不便的问题。它与唐宋时期的重要港口扬州、杭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地，均相隔数千里。货物从渭北的漆水河沿岸的窑场运往上述各港，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没有河流或大路直通，需要经过水路和陆路的多次辗转运输。因是长途，运费势必昂贵；又要经过多次的装卸和转运，增加运输的困难和商品破损的比率，又增长了昂贵的运费，从而使它的价格要比沿海窑场的产品高的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地理位置上的劣势，在交通不太发达的中世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再加上十一世纪初（1032年）西夏王朝成立后，势力向西南扩张，切断了由关中通往中亚和西亚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增加了上述不利因素。因此，在整个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发展史上，耀州窑的外销产品，一直竟争不过沿海窑场，始终站不到前列。如果说北宋时期它是靠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青瓷刻花之冠"弥补了地理和交通方面的不利因素，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欢迎，使国外的销费者宁可多出价钱去获得它。那么，当它逐步失去了自身的长于它窑的特点后，就只能在古外销陶瓷的行列中败北了。这就是靠近沿海的属于耀州窑系的西村窑、永福窑以后取代耀州窑向国外推销陶瓷的原因。这个历史经验，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振兴中华的今天，是值得内陆的厂家和企业记取的。

---

① 王仁波《日本的千年古都——平安京》，《文博》1987年第4期。
② 李辉柄《阿曼·苏哈尔出土的中国瓷器》，《文物天地》1983年第3期。
③ 〔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④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
⑤ 同③。
⑥ 同④。

瓷器的外销与衡阳陶瓷业的繁荣

冯玉辉

一 引言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东西宽168公里，南北长148公里，全市总面积为15.248平方公里。解放以来，通过几次文物调查和文物普查，在这个区域内发现七十二处陶瓷窑场，约四百座窑址。其中大部分是青瓷窑，也有少部分彩瓷窑。衡阳市古陶瓷业如此繁荣昌盛，其主要原因，是受我国外销瓷器的影响。笔者即此发表刍议：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唐以前，产瓷主要在江浙一带，唐以后传统的说法是"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当历史推进至宋代，中国陶瓷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江西景德镇就享有"瓷都"之称。

湖南也是我国古代陶瓷器的重要产区之一。长沙铜官窑是湖南古陶瓷的最早代表，它大致兴起于八世纪后期、盛于九世纪中期、而衰于十世纪初期。至于衡阳地区的瓷窑，过去我们知之甚少。通过文物普查，我们了解到衡阳市区域内有青瓷、青白瓷和以衡山窑为代表的彩瓷窑，星罗棋布，产品种类繁多，可说是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瓷窑体系，一个逐步形成的庞大产瓷基地。它是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发展，对外输出逐渐增多而兴起的。

二 衡阳地区陶瓷业的发展

衡阳地区瓷窑史迹，除有些家谱间有零星记载外，其系统资料阙如。近年来在文物普查中得到了一些新的收获。我们开始认识到衡阳地区的瓷窑的兴起，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唐至北宋，以烧青瓷为主；第二期自北宋至南宋或元初，为彩瓷的产生和繁荣期；第三期自南宋至清，为青白瓷的产生和发展时期。

衡阳青瓷系统的窑场主要分布在湘江沿河两岸，也有的在耒水、洣水、蒸水、舂陵水、宜水的河道两旁，几乎遍及全区。以湘江为例，自祁东的归阳镇至衡东石湾，长达300余里江岸线布满了古青瓷窑址，现在在这一片古窑场上，遗存的青瓷片和匣钵，遍布山坡台地，有的还堆积成丘。可见当年相当大的规模和相当长的历史。

第一期，本文试以衡阳蒋家山窑为例。该窑是1981年发现的。这年10月至12月配合筑路工程清理了古窑一座，产品胎色为浅灰或赭灰，个别制品因氧化程度不同而成褐红色，釉色虾青或光洁如玉，也有作青黄色的。其早期制品，往往不施底粉，在深色胎壁上，釉色更加发青；晚期制品多施底粉，增强了釉色的亮度，因而釉色或作淡黄色。碗、盘托、器底出现葵花型器口与荷叶边器口；壶、尊、坛类制品中出现浮雕或刻划莲花的装饰手法，这在长沙墓地出土的晚唐至五代青瓷中多见，北宋墓中有时也常有出现。①蒋家祠窑中还出土了几种纪年擂棒："太平三年"（618，即唐武德元年）、"大中年"（847—859，唐宣宗时期）、"至和二年"（1055，北宋赵祯统治时期）。因此，可证蒋家祠窑的相对年代约相当于

大中时期至五代之际。目前衡阳地区已发现青瓷窑场出土的产品，胎质、釉色、主要器形都与蒋家瓷窑相似。因此，衡阳地区的青瓷窑与蒋家祠窑是同一窑口，其起至时代也大致相同。刘茂同志也认为，衡阳蒋家祠窑是在长沙铜官窑趋于衰落的晚唐时期兴起的，烧制年代约在晚唐—北宋前期。该窑产品受长沙铜官窑的影响较大②。

第二时期彩瓷（粉上彩釉绘花）出现，以衡山窑为例。衡山窑位于衡山县西南，沿湘江逆流而上25公里的贺家公社湘江大队的渡口边和赵家堆。产品有碗、碟、壶、坛、缸、瓶、炉等。

衡山窑的彩瓷工艺是多样的，有粉上彩釉绘花、釉下彩绘花。粉上彩釉绘花在素胎上涂一层白粉，再用彩釉绘花，最后通体罩上一层淡青色薄釉，一次烧成；釉下粉彩类是用白粉浆在素胎上绘花，最后外表罩上淡青色透明薄釉，烧成后素胎上呈茶叶沫色，所绘花样呈白色或微泛青色的效果；仿彩绘白瓷，胎色深灰，为了烧出白瓷效果，而在深色胎壁上涂一层很厚的白粉，上层将彩绘花朵外罩透明度强的薄釉，外观很象白釉。其次还有印花、雕塑、刻划花、双彩、单彩和素胎等。花纹装饰的题材以莲花为主，还发现牡丹或荔枝。也有以水波纹为地，主纹穿插游鱼、莲花和书写文字为装饰，多吉祥语③。

衡山彩瓷窑是新发现的我国古代陶瓷工艺中的一朵奇花。

该窑址的年代，周世荣同志认为出土的折沿盘、高足杯与大量的不同类型的小口瓶、鸡腿罐、带流罂罐等产品，具有宋或元代的特征，其相对年代约相当于宋元之际④。

第三期即青白瓷时期。衡阳青白瓷窑主要分布在耒阳、常宁的舂陵水流域和衡山石湾区域内，现已发现青白瓷窑二十余处。以耒阳磨形、太平青白瓷窑址为例：其造型以轻盈秀丽、小巧玲珑闻名。品种中有碗、杯、碟、盘、瓶、执壶、香炉、粉盒等；胎质洁白细腻，致密坚固，扣之发音清脆；烧成温度在1300℃以上，这样的密度高温，使器皿全开冰裂纹细片；制作精巧，在瓷器精坯上洒上透明细净的白釉，经高温烧成，表质光泽润清、柔和淡雅，釉色晶莹发亮，色调青白，瓷似影青。

这些窑的产品中，出现两种釉色：一种为青中有白或白中泛青；另一种在光泽晶莹的白瓷中，微微可辨出一些似蛋青色的米黄釉。

瓷器的装饰技法以压印花为主，纹饰的部位根据器型而定，如碗、杯一般在内壁与内壁底部，偶有在外壁的；盘多见于盘内及口沿；炉、壶多见于外壁。纹饰题材极为丰富，以莲瓣为大宗，其次有插梅、双鱼、水草、卷叶和珍珠纹。这些都是花纹装饰在器物上组成的图案，工整而不繁缛，疏密得体，布局完美。盛开的莲花和一朵朵初露水面的荷叶，含苞待放的梅，缠枝的花卉，浮动的双鱼、配以淡雅的水色，显得十分雅致娇妍，充满诗情画意。大多数的碗、碟、盘内外壁边沿一周，以一正一反的回纹图案装饰在内壁边缘一圈，更增添器物的奇巧、完整与统一。

这些器物的造型大部分是继承本地青瓷窑场的产品而发展的，纹饰景物的装饰，取材于当地现实生活。有些产品的造型，施釉技术和花纹装饰也受外地兄弟窑烧制技术影响。因此，笔者认为耒阳的磨形、太平两乡青白瓷窑的产品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青白瓷窑址采集的标本有敞口弧壁芒口碗。这种碗的造型和印花装饰、莲瓣双鱼回字纹的图案、烧制方法，都为景德镇南宋时期所常见。这些窑还有较多的深腹大碗和不平滑短浅足。圈足外面向足心切削，里壁离心倾斜。腹以下厚重，具有明显的元代风格。

笔者于1984年曾将这些标本寄出27件，请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鉴定。确认27件中有20

件属于南宋，7件属于元代。

综上所述，耒阳磨形、太平两乡古瓷窑早期青白瓷应属南宋至元代产品。

衡东石湾青白瓷窑址出现了一件带有“延祐四年”（1317年）纪年的擂棒。延祐为元仁宗年号，可证衡阳地区青白瓷窑之年代，上限为南宋，下限至元末，它的兴起与发展和衡山彩瓷是可以衔接起来的。

三 衡阳陶瓷盛产的原因

湖南瓷器的发展，从目前考古资料看，是以长沙铜官窑为始祖的。它的产品在很多国家都有出土，这表明其产品已畅销海外。至于它的生产历史，过去很多专家有个共同的结论，认为其大致兴起于八世纪后期、盛于九世纪中期、衰于十世纪初期。长沙铜官窑具有世界威望，却在我国瓷器外销兴盛阶段的宋、元时期趋于衰落，这是有它的主观和客观原因的。主观上是它的坯料化学成份欠佳，难以制出质地特别精美的产品；它的外销路线是由湘江出洞庭湖入长江到上海、扬州等城市，路途遥远，跋山涉水，运抵海港，再转而外销。运输量大则必然提高成本，随之是价格的昂贵，竞争就处于不利地位。客观上，广州石湾和江浙一带，特别是江西景德镇等各地瓷窑兴起，烧瓷质量和运输都比铜官窑更具优势，铜官窑在竞争中自然是失败者。

铜官窑衰落后，衡州窑场兴起，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五代时马殷割据湖南，能巩固统治和繁荣经济，最主要是湖南产粮食、茶叶和手工业发达，而手工业又以瓷器为大宗。因此，铜官窑衰落之后，统治者必须另辟新天地，寻找新的瓷业基地，这也是自然的。

五代以后，衡阳地区的陶瓷业发展较快，理由有四：其一，从古代的疆域划分来看，衡阳在战国中、晚期属楚国，秦时属长沙郡，西汉属长沙国，东汉属长沙郡地，三国分长沙为湘东、衡阳二郡，至宋为衡阳郡，属荆湖南路，由此可见衡阳几度划为长沙的管辖之内。这样，晚唐以后，衡阳变为铜官瓷业的继承者是无疑了；其二，衡阳瓷泥和高岭土藏量极为丰富。有史为证，同治《耒阳县志》记载：“县西南产白细泥”。耒阳磨形一带现在瓷泥还很丰富；衡阳界牌瓷泥质量和藏量居全国之首；衡东石湾小初瓷泥，目前还源源不断往外运。从窑址的遗物来看，大多数窑场起于晚唐、五代至北宋，发展迅速，下限到宋、元，有些到明、清以至今天。烧制时间如此之长，说明瓷泥丰富和产品销售顺利；其三，自古至今衡阳地区有窑址的地方，均产大量的木材和煤；水路交通在江南来说，也较为发达。这就为昔时衡阳被选为各代烧瓷基地提供了优越条件；其四，中国自西汉以来的“丝绸之路”到唐宋以降的“海上丝绸之路”即“陶瓷之道”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播及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瓷器是唐宋以来对外交往的主要商品之一，其销售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不亚于西汉以来的丝绸。当时亚洲各国还没有瓷器，中国瓷器是独一无二的。入宋以来，封建政府对海外贸易相当重视，海外贸易成为宋代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部份。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为了安享江南半壁河山，大力发展手工业，以补充财政不足，瓷器在浙江、江西、湖南得以迅速发展，并为我国瓷器外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史》载：“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设广州市舶司。其后十八年，太祖端拱二年（989年）前后，设西浙市舶司，哲宗二年（1087年）又设泉州市舶司。虽然有几个口岸，但是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船只都是到广州口岸。宋代海外各国到中国航线的记载中，几乎都以广州作为定向来计算其相隔的道里或航行的时日。周去非《岭外带答》卷二记载：“者婆国（印尼爪哇）又名莆家龙，在海东南势下故日上岸。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日发舶，顺风连昏

且一船到，层檀国（非洲桑给巴尔岛）在西海旁城距海20里。熙宁四年（1072年）始入贡。海道便风，日行六十里。径勿巡、古林、三佛齐国，乃至广州。”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更建议“更建设，罢明州、杭州市舶司。只就广市舶司一处抽解”⑥。为此修定的“广州舶条”规定“往复必使东诣广，不得没其货。”⑦这些规定，使广州对外贸易算盛一时。麇集在广州载货南航的海舶，朱彧《萍洲可谈》载：“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这就说明，在北宋时期，大批的陶瓷器从广州输出国外。宋福建路市舶提举赵汝适作《诸蕃志》，书成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是一部记载宋代中外交通与贸易的重要文献。书里记载亚非地区五十六个国家。其中用瓷器进行交易的占四分之一以上。这些国家属于今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等国家，距中国广州口岸的航程是很近的。因此，广州口岸可以大量地出口瓷器。这些出口瓷器，除本地瓷窑生产以外，还得从各地窑口运进才能满足外销。宋代我国南方的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等瓷窑产品运到广州，是必不可少的。但路途遥远，转运具有一定的困难。李知宴同志在《论越窑和铜官窑瓷器的发展和外销》一文中指出：“长沙铜官窑烧制的陶器，主要由湘江进入广州，过灵渠进入漓水，由漓水进入桂江，由桂江入西江而到广州。另外可能还走一条水路和陆路相结合的古道。即：由湘江到衡阳、由衡阳入耒水，在广东与湖南交界地方走一段陆路，由陆路进入武水到韶关，由韶关入北江到广州”⑧。由此可见，当时铜官窑产品是广州口岸外销瓷的主要货源之一。铜官窑在我国瓷器外传兴盛阶段的宋、元反而趋于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衡州一带的陶瓷。其产品销路无疑是步铜官窑的后尘入广州的。但运输方面，无论水路陆路，都比铜官窑方便得多。

南宋王朝建都临安（今杭州），临安遂成为当时政治、经济中心。而福建的泉州与杭州相隔很近，很自然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便从广州移至泉州，泉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心港口。广州由于失去了海外贸易的中心地位，出口的陶瓷数量减低。衡州地区的瓷器要由湘江运往泉州口岸比运往广州困难的多。由于路途艰辛，瓷器易受损破，获利不多，这就迫使衡州地区大多数青瓷窑场纷纷停烧，并一直湮没至今。

据考古调查，衡阳青瓷窑虽倒闭，但不是就此消失，相反的却因此而撞出一条新路子，创造出中国古陶瓷工业中的一朵奇葩——彩瓷，这种彩瓷，1983年第一次在衡山贺家乡发现；宋元时期又出现了青白瓷（即影青瓷），这种瓷窑第一次发现是1984年初在耒阳县磨形乡与太平村，共五处。通过近两年文物普查，又有很多新的发现。彩瓷的窑址有祁东的归阳窑、衡东甘溪镇的大沅窑、谭家头窑、桂公祠窑、窑堆子窑、桐子堆子窑等；青白瓷窑有衡东石湾乡、小初乡，共六处。在耒阳又新发现七处以及常宁、蓢田两处。窑群分布都较密集。

这些青白瓷，釉色、花纹装饰、胎质透明度与造型，在当时可说是登峰造极，与江西景德镇产品毫无差异。景德镇创制独具风格的瓷器，是外销珍品，在国外享有盛誉。衡阳地区青白瓷窑场这么多，窑场的分布又是在沿湘江支流的舂陵水，洣水、耒水两旁以及耒阳通往广州的古道边，瓷器外运极为方便。并且这些地方的瓷泥和其他自然条件，对烧瓷都非常有利。例如衡阳界牌瓷泥，目前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在此处却未发现青白瓷。由此推理，衡阳地区的瓷业是应当时瓷器外销的需要而繁盛的。

在考古发掘中，遗存的衡州地区青瓷产品所见不少。1978年衡阳发掘水井出土了大量的青瓷器⑨，同时在墓葬中也时有发现。但唯独衡山窑这种彩瓷和耒阳、衡东的青白瓷，在当地宋元墓葬中根本没有发现，民间传世品中也少发现，就是在瓷窑密布的耒阳磨形、太平乡、衡

东的小初乡也未见到过。刘茂同志在《湘江中、下游地区三处古窑址调查》一文中指出：值得注意的，衡山瓦子墩窑和营田窑生产模印花器物和笔绘花纹器，在湖南地区的宋元墓葬中尚未发现。以致为数很少的这类传世品，单被当作唐代器物。很明显这类器物一般不用来随葬，是否有作贡品或外销的可能⑩。

衡阳地区曾经大量生产的青瓷，近年在有关刊物发表过一些调查报告。对于衡山窑的彩瓷仅仅只有周世荣与刘茂同志在《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中发表了一篇文章，但对整个地区的彩瓷与青白瓷的发现未作系统的调查研究。所以不便于国内外开展研究，因此探讨衡阳地区古瓷器外销的文章几乎没有。但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文物普查，我们发现衡阳地区古瓷窑品种繁多、窑址密布，有一定的价值。为了使全国陶瓷界研究中国古陶瓷外销向深度发展，于是不揣冒昧，抛此引玉之砖。

---

① 周世荣、冯玉辉《湖南青瓷与青花古窑址调查报告》，《湖南考古期刊》第二期。
② 刘茂《湘江中、下游地区三处古窑址调查发掘集》。
③ 周世荣《湖南首发现独具彩瓷工艺风格的古窑址—衡山房》，《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
④ 同③。
⑤ 同②。
⑥ 《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一。
⑦ 同⑥。
⑧ 李知宴《论越窑和铜官窑瓷器的发展和外销》，《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⑨ 周世荣、冯玉辉《湖南衡阳南宋至元明水井的调查与清理》，《考古》1980年第一期。
⑩ 同②。

长沙铜官窑瓷器在广东

宋良璧

长沙铜官窑在湖南长沙市望城县境内的铜官镇采石渚湖一带，南距长沙二十七公里，北与洞庭湖北滨的湘阴县邻界，东依连绵的山丘，西濒湘江，交通便利，窑址范围相当广阔，约在二十万平方米以上，堆积十分丰富，可见当时制瓷业相当兴旺发达。长沙铜官窑是唐代独树一帜的釉下彩绘瓷窑址，所产器物品种丰富多彩，为唐代瓷窑中所少见。釉下彩绘别具一格，所绘花鸟、山水、人物、斑点图案各尽其妙，更为当时其它窑所不及，为后世釉下彩绘的发展开了先河。铜官窑瓷器遗留的范围很广，说明当时的销售地区也相当大，所知国内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均有出土。① 国外的伊朗、日本、朝鲜、巴基斯坦、伊拉克、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斯里兰卡、埃及等国亦有发现② 。铜官窑虽未见文献记载，但其规模大，瓷器的工艺价值高，销售的范围广，当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广东是湖南的近邻，自古贸易往来密切，近十余年来，在广东的西沙群岛、揭西、高州、增城等地均有铜官窑瓷器出土，我馆所藏铜官窑瓷器也不少，约在百件以上。过去虽然对出土铜官窑瓷器作过一些报导和介绍，但较零散，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笔者为此对出土铜官窑瓷器作了进一步调查，并结合馆藏铜官窑瓷器作统一介绍，对它的外销和对广东瓷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馆藏铜官窑器物介绍

馆藏铜官窑瓷器（出土器物另计）九十余件，有壶、罐、水注、碗、瓶、盘、水盂、杯、灯盏、油盒、人像、鸟兽玩具等品种。具体介绍如下：

（一）壶类，三十八件。分10式：

Ⅰ式　五件。小侈口，短直颈，桶形腹，至底部一深弦纹，成饼形足，并条形双耳和执，多角流；施青釉和青黄釉两种；均为贴花装饰，有贴人物、葡萄、双鱼、热带植物等图案于流和双耳下边，后在图案上再浸以褐色釉；高在17至22.5厘米之间。

Ⅱ式　八件。喇叭口，颈稍长，多为瓜棱腹，只一件为桶形腹，多角短流，并双条形执；均釉下彩纹饰，在流下以褐绿彩画莲荷、花草、小鸟和诗文做装饰。诗文一为：“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一为：“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怨北风吹。”前首曾在长沙铜官窑出土多件③，后首尚未见过，此式壶高在10至24厘米之间。

Ⅲ式　四件。盘口，小短颈，丰肩，瓜棱腹，多角短流，条形双耳，执有条形和麻花形两种；青釉褐斑，褐斑多在流、耳和执下，平底灰白胎；高在17.5至18.2厘米之间。

Ⅳ式　一件。小喇叭口，短颈鼓腹，并三条形双耳和执，多角流稍长，平底，青釉，灰胎；高19、口径6.7、底径12厘米。

Ⅴ式　四件。葫芦形，均多角小短流，条形执，饼形足；有绿、褐、黑、青等釉色，青

釉和绿釉均点褐彩做装饰；高仅10厘米左右。

Ⅵ式　一件。盘口，单横柄，圆筒状长流，柄为模印半圆形，上边近肩处有二字，似“赵记”两字，平底稍内凹，灰胎；施黑釉不到底；高11.7、口径6.3、底径9厘米。

Ⅶ式　一件。喇叭口，管状流，弓形执，四棱腹；施黑釉至足处，浅圈足无釉，高20.7、口径7.3、足径7.7厘米。

Ⅷ式　一件。喇叭口，多角流稍长，腹稍高呈橄榄形，扁带执，饼形足；施青釉有细小开片，灰白胎；高25.5、口径7.3、底径7.7厘米。

Ⅸ式　五件。均为扁体形，腹有瓜棱和圆形，均直颈小折边口，多角小短流；腹部饰褐绿彩直道相间纹，一件肩部绘小圆点一周，青釉有小开片，足无釉，淡黄色胎；高10.5、口径4.8、底径9.1厘米。

Ⅹ式　九件。为翅翼式小壶，均小短流，腹分瓜棱和圆形两种，和流相对处装一鸟形尾，腹两边贴双翅；饰褐绿彩不规则斑点，颇别致，饼形足无釉，灰白胎；高8、口径3.3、底径6.3厘米。

（二）罐类，八件。分6式：

Ⅰ式　直口丰肩，腹向下稍收，肩立模制梯形有孔双耳；耳下部为贴花装饰，施褐釉不到底，可明显看出是先施褐釉后再罩以青釉的，釉色光润，虽无釉绘，也很雅致；高14.5、口径10.3、底径11.3厘米。

Ⅱ式　二件。小卷口，直颈，桶形腹，肩至颈部贴条形双耳，平底内凹；灰白胎，腹饰釉下褐、绿色斑点图案形纹饰，施青釉，甚别致。此罐和《中国陶瓷·长沙铜官窑》59图相似，但我馆藏品完整，纹饰清晰。高13、口径8、底径8.8厘米。

Ⅲ式　一件。小卷口，直颈，桶形腹，肩部立方形圆孔双耳；施青釉不到底，甚莹润，可明显看出为两次施釉，耳上点有绿彩，平底灰胎；高14.6、口径9.2、底径10.8厘米。

Ⅳ式　一件。小卷口，短颈，瓜棱腹较丰满，条形双耳；施青釉至足，有鱼子纹片，釉甚明亮，可明显看出两次施釉；高13.5、口径11、底径11.8厘米。

Ⅴ式　一件。小折口，短颈，瓜棱腹，丰肩至足渐削，饼形足；肩部绘褐、绿相间条纹彩，青釉较滋润，灰红胎；高15.2、口径10.6、底径10.9厘米。

Ⅵ式　二件。唇口短颈，鼓腹较矮，条形双耳，饼形足；施青釉，灰胎；高8.6、口径11、底径13厘米。

（三）文具类，九件。

1．笔筒　一件。圆筒形，平底；里外施青釉，有小开片，底无釉，灰胎；高10.5、口径12、底径12.3厘米

2．笔洗　一件。敛口，鼓腹，在口边沿处贴双耳；耳浸褐斑，施青釉不到底，内满釉，圈足较厚，足无釉，灰白胎；高10.1、口径15.6、底径7.5厘米。

3．水盂　五件。基本相同，高3.5至6.3之间；均为小口鼓腹，饼形足，肩部点釉下褐绿彩或条状褐彩，也有无彩的。

4．砚滴　二件。分2式：

Ⅰ式，一蟠螭为执，头朝口处，饼形足，施褐釉；高9厘米。

Ⅱ式，为狮形，口张为流，四卧足，扁形尾；腹施褐绿彩釉，甚别致；高6.6厘米。

（四）碗类，二件。分2式：

Ⅰ式　口稍内收，弧形腹，浅圈足；内绘釉下褐绿彩花卉，口沿浸四褐斑相对称，施青釉不到足，足无釉，灰胎；高5.5、口径15.5、足径5.6厘米。

Ⅱ式　撇口，矮圈足；内绘釉下褐花朵数朵，施青釉有小开片，足无釉，灰胎；高4.3、口径13.9、足径5.7厘米。

（五）盘类，三件。分三式：

Ⅰ式　四瓣口，矮圈足；灰白胎，口沿瓣间各绘褐彩四瓣花朵一朵，内画釉下绿褐彩花卉，施青黄釉，有冰裂纹片，甚雅致；高3、口径13.5、足径5厘米。

Ⅱ式　口稍内收，弧形腹，矮圈足；内底绘釉下褐彩花卉，施青黄釉，有小开片；高4.1、口径15、足径5.5厘米。

Ⅲ式　侈口小折沿，矮饼足；四边沾褐釉，盘内外心留无釉方块，在内心无釉方块处绘褐彩花卉，别具一格；高3、口径14.3、足径5厘米。

（六）　杯类，三件。均为椭圆口，喇叭形高足；有青、褐、黑釉，有的内心还印有花朵；高6.2、口径7.9—13.5、足径6厘米。

（七）　灯盏，一件。形似小盏，饼形足，内腹间有半圆形条状纽，以穿灯芯；内施褐釉过口外沿；高4、口径12.3厘米。

（八）　油盒，二件。均为圆形，子母口；一为绿釉，一为青黄釉；高4.6、口径12.3厘米。

（九）人像，三件。分3式：

Ⅰ式　头披发饰，脖系围巾，拱双手，盘脚坐于莲花座上，似为神像；施黄褐釉，灰胎；高8.7厘米。

Ⅱ式　头戴荷形帽，双手托一小鸟，为半身孩童；青釉泛褐；高5.5厘米。

Ⅲ式　头戴线织带缨小帽，半蹲半爬的裸体小孩；高4.5厘米。

（十）　玩具类，二十二件。

1.　小猪　一件，短嘴，大耳，身椭圆而肥胖，前有两小圆孔，右侧一小圆孔；施黄褐色釉；高5厘米。

2.　小狗　五件。多为手捏而成。高鼻梁，身躯肥胖，鸟形尾，胸前贴三叶状饰物，均大耳卷尾，四足蹲于椭圆形座上，多有提梁；高4至5.4厘米之间。

3.　王字纹小龟　二件。皆伸颈爬行状，龟背八角甲壳内饰“王”字，有一纽，平底实身；施黄褐釉；高2.8厘米。亦可作镇纸用。

4.小鸟　十二件。形态各异，一般均为肥胖的躯体，有二至三个小孔，可以吹响；黄褐色釉；高4至6厘米。

二　在广东出土的长沙铜官窑瓷器

广东出土长沙铜官窑瓷器的有四处，出土器物以往提到的仅五件④，经笔者再次查对实为十三件：即1975年在西沙出土贴花人物壶一件；1975年揭西唐墓中出土贴花壶一件；1972年在增城一墓葬中出土绿釉葫芦形壶一件、莲花碟六件、黑釉灯三件；1976年在高州出土贴花壶一件。以离广州最近的增城出土为最多。现介绍如下：

1.双耳贴花壶　一件（揭西出土）。小侈口，直颈，多棱短流，并条形执和双耳，饼形足；灰黄胎施青釉，流和双耳下均贴四瓣花及热带植物和双鸟组成的图案，并浸褐斑，此图案与石渚长沙窑出土印模相同⑤；高22、口径9.5、底径14.5厘米。

2. 贴花人物壶 一件（西沙出土）。小侈口，直颈，多角短流，并条形执和耳，饼形足；施青釉，多已脱落，流和双耳下均贴站立的武士，浸褐斑覆盖其上；高21.7、口径5.2、底径7厘米。

3. 贴花壶 一件（高州出土）。器型和1相同，只是纹饰稍有区别；高24、口径10厘米。

4.绿釉葫芦形带盖壶（增城出土）。弓形执，管形长流，有盖，盖和壶口各有一小环，可以系绳；施绿色釉无纹饰，釉多脱落，青灰胎，此壶和《石渚长沙窑出土的瓷器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一文图四：24图相似⑥；通高21.7、口径5.2、底径7厘米。

5. 莲花碟 六件（增城出土）。器型基本相同，均六瓣莲花形。分2式：

Ⅰ式，碟内印已开放的正面莲花一朵，里外施黄褐釉，外釉不到底，平底无釉，灰胎。此碟图案和长沙铜官窑出土的宝相花印模相似⑦。风格亦和长沙窑同类产品相同；高2.3、口径12.2、底径7.6厘米。

Ⅱ式，碟内印侧面莲花，里外施黄褐釉，外釉不到底，灰胎；高2.3、口径12、底径8.2厘米。

6. 灯盏 三件（增城出土）。均相同，似茶盏，口稍内收，内腹近底处有一纽，饼形足；内外施黑釉，外釉只过口沿不远，此类灯盏长沙铜官窑出土不少；高4.2、口径12.2厘米。

广东出土长沙窑瓷器，从数量来说并不算多，但从广东出土的唐、五代以前的瓷器来看，外省瓷器在广东出土的数量，长沙铜官窑还是首屈一指，独一无二的。从出土地点来说，在国内一个省能有四处以上的也不多见。再者范围较大，西至高州，东至揭西，南至西沙，东北至增城的广大地区，说明当时的长沙铜官窑瓷器在广东的销售面是相当广阔的，销售量也不会少，因销往国外的多在广州成交出口，仅增城一墓就出土长沙窑瓷器十件之多，也是证明。也说明长沙窑瓷器物美价廉，讨人喜爱，不然的话也不会买那么多长沙窑瓷器去陪葬。

三 广东是长沙窑瓷器外销的重要港口

广东地处我国的最南方，大部临海，有全国最优良的港口，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就是我国岭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河港和海港，到了唐代广州已成为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都会。据《蒲寿庚考》载：阿剌伯人与中国通商，虽屡经盛衰，而自唐经五代至宋连绵继续未尝中辍，有宋一代其盛遂极。据北宋所收关税以观，广州所征居全税十之九以上，故唐与北宋之互市均以广州第一⑧，向达《中外交通小史》称唐代广东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国家，贸易往来极为频繁，居住在广州的番商（包括传教徒）就有十多万人。《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广州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堆积如山，舶六、七丈，狮子国，大食国、唐骨国、白蛮、赤蛮等地往来居住……"⑨，广州之繁盛可见一斑。湖南是广东的近邻，交通便利，长沙窑瓷器可由湘江逆流而南，过耒水至湖广交界处再转一段陆路便可到广东的北江，由北江顺流南下，便可到达广州。也可由湘江进入广西，过灵渠进入漓水，由漓水入桂江，由桂江入西江到广州，虽绕了一些路程，但都是水路，可由长沙乘船直达广州。长沙窑既和广东较近，又有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会大大的降低成本，在极为繁盛的对外贸易大港广州的吸引下，必会运输大批的长沙窑瓷器来广东销售。广东近几年来在揭西、高州、西沙、增城等地先后都出土了长沙窑

瓷器，就是很好的证明。长沙窑瓷器到广州，主要是为了外销。广州是对外开放的港口，据唐宰相贾耽所著《从边州入四夷道》记载，唐时我国与西方交通的海道，是从广州经南海西沙群岛、越南东海、印尼、马六甲海峡到印度西南的故临，再西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复傍波斯湾的西海岸到亚丁附近⑩。又据《蒲寿庚考》载：关于阿拉伯商人来华的航线，"多自波斯湾经印度洋，绕马来半岛以抵达今之广东（即广州）⑪。"说明唐时来去上述地区，广州都是必经之地。这一地区的伊朗、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斯里兰卡、伊拉克、埃及等国均出土有长沙窑瓷器。运销到这些国家的瓷器应多是走水路从广州运出的。

从馆藏和出土的一百余件长沙窑瓷器的来源看，一件是在西沙出土，无异是外销的遗物；一件是从广东外贸购来的，当然也是为准备出口的商品，其余多是省文管会从不能出口的文物中拨来的。总的看来，大部份虽是现在打算外销的商品，但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外销的魅力，古今皆然，唐代繁盛的广州港必然也吸引着离广州不远又有水路交通便利条件的长沙窑。

四 长沙窑对广东瓷窑的影响

长沙铜官窑瓷器，以其独创的釉下彩绘、贴花、斑点纹饰和诗辞吉祥语在瓷器上做装饰，大大的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效果，多种多样的瓷器造型和小品玩具都超过当时唐代的所有瓷厂，长沙窑瓷业的兴盛发达，也对当时和后来的一些窑厂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釉下彩绘瓷器更是如此。这里暂且不谈对其他省影响情况如何，只就广东的情况谈点看法。广东是长沙窑的近邻，民间向来来往密切，广东的一些窑厂向长沙窑学习，或互相学习都是可能的。据观察广东石马村五代南汉墓出土的青釉夹梁罐和长沙窑出土的青釉竖耳横梁罐⑫大致相同，两罐同是两边凸出一带孔的长形片，罐肩部两边有竖立的带孔双系，盖子盖合后，圆孔可以系绳。还有同墓出土的四系罐，罐的三并条形耳、釉色、器型等都与长沙窑罐的耳、釉、形相似，石马村墓出土的瓷器虽还没找到窑址，但器物受长沙窑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有的同志还提到石马村五代南汉墓出土的瓷器可能就是长沙窑所产。潮州北郊窑出土的唐代潮州窑青釉提柄壶⑬，亦和长沙铜官窑的绿釉柄壶相似⑭。潮州窑的瓜棱壶亦和长沙窑的瓜棱壶类似。较晚的广州西村窑瓷器有不少是继承了长沙铜官窑的遗风，如青釉点彩瓜棱小罐、青釉点彩水注、青釉撇口碗、青釉绘花盘等⑮，都和长沙铜官窑的同类产品相类似。还有海康的一些白地褐花釉下彩绘窑，出土不少以吉祥语诗辞做装饰的器物，也和长沙窑器有相似之处。以上所举这些，都可以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长沙铜官窑的一些影响。

---

① 肖湘《长沙铜官窑》，《中国陶瓷》1983年版《长沙铜官窑》分册。
② 同①。
③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唐代长沙铜官窑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第一期。
④ 李知宴《论越窑和铜官窑瓷器的发展和外销》53页；曾广亿《略论广东发现的唐宋元明外销瓷》118页，均见《古陶瓷研究》1982年版第一辑。
⑤ 《中国陶瓷》，《长沙铜官窑》分册118图、125图。
⑥ 周世荣《石渚长沙窑出土的瓷器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1984年版234页。
⑦ 同⑥。
⑧ 《蒲寿庚考》4页。
⑨ 转引自曾广亿《略论广东发现的唐宋元明外销瓷》，《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一辑。
⑩ 同⑨。

⑪ 《蒲寿庚考》3页。
⑫ 《中国陶瓷》，《长沙铜官窑》分册126图。
⑬ 广东省博物馆编《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图版34。
⑭ 同注⑤79图。
⑮ 广州市文管会编《广州西村古窑址》图版。

试谈四川的古外销贸易瓷

陈丽琼

四川瓷器的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东汉晚期就能烧制胎白、釉亮、纹饰独特的青瓷器①，经过两晋南北朝至隋的不断改进创新，到唐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宋时是它的极盛时代，其繁荣盛况是前所未有的。制瓷窑场遍布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各地。在唐时不仅和全国一样是青、白瓷并驾齐驱，还有著名的邛窑三彩与湖南长沙铜官窑媲美；到五代时有前蜀王建的秘色瓷与浙江越窑秘色瓷贡奉于中原王朝；到宋元时代，有彭县瓷峰白瓷与定窑白瓷，广元窑黑釉瓷的鹧鸪斑、玳瑁纹与江西吉州窑黑釉瓷，重庆涂山窑的油滴、玳瑁、窑变纹中的"曜变"纹，与福建建窑的"曜变"和山西介休、陕西铜川耀窑的黑釉印花、窑变纹争艳斗胜。由此可见四川的唐宋瓷器，与我国南北各地名窑皆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从汉代开始我国瓷器就已传到国外，到唐宋时，我国的瓷器就作为新兴的商品列入国际市场，并成为中外文化交往的纽带。

在唐宋时代，四川瓷器是否列入国际市场，是否有外销的可能？要回答这个问题，到目前还难于找到详实的记载和确切的答案，现就笔者近十年来的考古调查，和检阅有关资料，结合邛窑三彩、唐五代青瓷、宋代黑釉瓷与外销名窑瓷器比较研究，认为四川陶瓷在唐宋时代，很有外销的可能。

一　四川邛窑系与铜官窑的关系

1.邛窑系的主要窑址

四川瓷窑，在唐以前多分部在川西平原地区，其主要的窑场有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十方堂窑、新津白云寺窑、双琉牧马山窑、郫县大坟包窑、灌县金马窑、玉堂窑，还有1987年新发现的江油青莲九岭、云水窑②。它们的特点是，在隋唐前以烧青瓷为主，到唐时兼烧褐绿斑彩、联珠纹、芳草纹等，除烧造时代有先后和生产地域有别外，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施白色化妆土、轮旋方法、装烧工艺，均极相似，若不加标记，则很难分辨其窑口。但是，这些窑场中，以成都青羊宫窑、江油云水窑、邛崃十方堂质地最佳。若以青瓷排比，当以青羊宫窑、云水窑领先；若从釉下彩来看，又以邛崃十方堂为胜。而引人瞩目的是，它们都与湖南长沙窑相似，尤以江油青莲云水窑碗、罐、壶的质地、釉色、造型等，与铜官窑相似之处达到难以辨认的程度。

2.邛窑系与铜官窑的关系

以烧造历史而论，邛窑系始于东晋至南朝，持续到南宋中期；铜官窑始于隋，兴于唐，衰于北宋中期。邛窑系是我国釉下彩的开创者，始于隋；铜官窑是邛窑釉下彩的继承发扬者，它们同是我国唐代釉下彩艺术传之久远的一对孪生的工艺之花，为我国陶瓷装饰艺术开创了一个绚丽缤纷的新局而。

以唐代的产品而论，铜官窑与邛窑系，好似姊妹窑一般。其胎色有灰白、青灰、灰黄、

灰红等，而以灰白为主。质地坚硬，烧成温度在1150℃至1200℃。上釉之前多施白色化妆土，釉色以青釉为主，且青中闪黄。釉下彩有绿、黄、褐、蓝等色，其纹饰多以褐斑、黄斑、绿斑、联珠纹共似。两窑的蓝绿色釉，均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邛窑的褐色是以氧化铁着色，Fe_2O_3含量为8.02%，氧化铅含量小于万分之一，氧化钙含量高至18.81%，证明是石灰釉。铜官窑釉下彩也是石灰釉，氧化钙含量17.49%，而氧化铅含量0.5%③。由此可见它们的胎质相近相同之处很多。至于制坯方法中的轮旋纹更是难以区别。故冯先铭先生在《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一文中说："邛窑与铜官窑，两窑所烧瓷器，基本上差不多，青釉褐斑、绿斑的风格一样，轮旋方法也相同，这些特点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④

综上所述，邛窑系瓷器与铜官窑瓷器，不仅烧造时间相差无几，其工艺特点也极为相似。如不进行细致研究找出其差异，是极容易混淆的。例如在江苏扬州唐代遗址中出土的露胎呈紫黑色的邛窑青釉短咀壶，南京博物院定名为"铜官窑青釉壶"；重庆市博物馆收藏的贴花青釉褐黄、褐绿斑壶、罐，露胎部分呈黄白色，曾定名为"邛窑三彩壶、罐"等。这些器物的釉彩、胎质极其相似，难于分别它们属何窑口。因而，对于流传海外的类似铜官窑的瓷器，皆认为是铜官窑产品，而忽略了邛窑产品存在的可能性，是不全面的。

根据考古材料，在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东北端的玛哈的尔，巴基斯坦的班布尔，印度河的布拉明纳巴德，伊朗的席拉夫、内沙布尔、米纳布、累伊、尼夏普尔，伊拉克的萨玛拉等地都有青釉、褐斑釉瓷器出土⑤。国内外古陶瓷学者，多认为是属长沙铜官窑产品，而不认为是邛窑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文化的交流，逐渐开始对以上各地的釉下彩纹瓷器提出异议。如在40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氏，在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时曾去邛崃十方堂进行调查，他在《邛窑陶器》的附注中写道："为了写邛窑陶器这篇文章，我获得机会访问欧美一系列的博物馆……在大英博物馆中，藏有底格里斯河（Tigris）附近萨玛拉（Samara）和勃罗明纳巴德（Brominrbad）遗址(原位)出土的中国瓷器，这些属于公元800—900年的瓷片与邛窑出土遗物极为相似"⑥。最近余祖信也提出："在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出现的中国瓷器，是否也有可能是邛窑系生产的呢！"对于这种观点，笔者持肯定意见，因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二　邛窑系的青瓷与越窑的关系

四川邛窑系的青瓷，以成都青羊宫和江油青莲九岭窑青瓷最佳，与浙江早期越窑青瓷相比，邛窑青瓷系的质地与工艺是略逊一筹，但到唐、五代时，四川青瓷确有了新的进展，如邛窑系十方堂的精细产品，侈口弧壁玉璧底青瓷碗、荷叶形盏，无论是造型、釉色都可与越窑青瓷媲美。正如冯先铭先生在《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一文中评论说："邛窑瓷器中仿上林湖越窑式样、花纹很多，还有印花鹦鹉小盒和海棠式杯等"⑦。可见邛窑产品仿越窑产品，与越窑产品相似，这是古陶瓷研究者共同承认的事实。

到五代时，邛窑系青瓷继续向前发展并不断有所改进和创造。越窑青瓷也在不断发展、创新，并都能烧制一种名贵的秘色瓷。"秘色瓷"据《唐氏肆考》云："蜀王建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⑧。此时，浙江钱氏亦有贡物，据《十国春秋》吴越三记载："吴越清泰二年（935年），王贡唐…金棱秘色瓷二百事⑨"。从这两段记载可知，在五代时割据四川的前蜀和浙江的吴越，都烧造镶金棱边的"秘色瓷"贡献中原王朝。

从现存的实物结合文献研究，都能证明邛窑古瓷与越窑青瓷关系密切，有其相似之处。如1982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日本三上次男先生的论文《从工艺观点看中国古陶瓷与穆斯林陶瓷间的关系》⑩，用彩色幻灯片介绍在中东出土的一件所谓“越窑”碗，时代为北宋，器型为敞口，宽口沿，斜弧壁，平足，青黄色釉，外釉不到底，内底有五个支烧疤痕。据我看，这种工艺的青釉碗，绝不是真正的越窑瓷器，而是道地的四川邛窑系产品，特别是五个支烧疤痕。在北宋时，越窑是不见支烧疤痕的，只邛窑系青瓷才盛行这种装烧工艺，故笔者认为三上次男所介绍的这件中东出土的越窑青瓷碗，应当是五代末宋初的邛窑青瓷碗。

三　四川黑釉瓷与“建窑”及其它窑的关系

宋代是四川黑釉瓷发展的极盛时期。窑场分布在四川各地，其中主要的窑场，川北有广元瓷窑铺⑪，川东有重庆涂山窑⑫。它们以盛产黑釉瓷著称。

广元窑胎多灰白、胎体厚重、釉层厚薄不等，外釉不到底，多流聚成堆，在施釉之前上化妆土。器型纹饰与建窑相比，都有大、中、小型的敞口碗、束口窄底茶盏，釉色均有漆黑、黑褐、绀黑、兔毫纹、鹧鸪斑等。同时，还有精致的外壁下足上紫黑色瓷衣的茶盏，这种茶盏，从外形看，具有“建窑铁足”的特征，而这类紫黑色瓷衣盏，当是仿“建窑”而作的。此外，广元窑还与河南禹县扒村窑多相似。和江西赣州窑也有相似的产品，如一种内施满釉，外壁无釉的卷沿直颈鼓腹、腹上刻划线纹、腹颈之间饰鼓钉纹的圜底壶⑬，就与江西赣州窑刻划鼓钉罐相似⑭。

重庆涂山窑，胎灰白或白色，釉色与建窑、广元窑相似，但最大区别是不上化妆土，露胎为灰白色、白色等。同时在茶盏中亦有胎上专饰紫黑色瓷衣类似建窑的盏子，其仿制之精，使鉴别者稍不注意就会误认作“建窑”茶盏。此外，其黑釉瓷的油滴、兔毫、印花纹盏、碗，还与山西介休窑相似。然而，最主要的是它与“建窑”关系密切。日本学者奥田直荣在《天目》一文⑮，称“曜变是建窑盏中最上品，世上独有，黑地施有浓淡的琉璃斑点，又有黄色、白色等各种颜色浓淡交融，光彩如谲，诚以万[illegible]的[illegible]哉。又据日人小山富士夫著《天目》中亦说：‘建窑”，是生产曜变、油滴、兔毫盏、灰被等天目的地方，是天目产品的主要窑址。从这两位学者的记述看，建窑不仅产油滴、兔毫，还产世上珍贵的“曜变”天目。可是，至今在建窑遗址还未发现一片“曜变”天目，而在中国发现“曜变”天目的，在目前仅只重庆涂山窑一处。当然也不能肯定建窑不产曜变天目，可能是发掘面不大之故。1938年美国葛维汉氏在重庆黄桷垭涂山窑采集的黑釉瓷器中，有兔毫纹、油滴纹、玳瑁纹茶盏。其他品种有碗、盏、瓶、罐等。葛氏称之为“重庆的建窑遗址⑯”。并说“重庆近郊的建窑遗瓷是否在宋元时有外销到东亚诸国？”笔者认为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多年来即在探索之中，但苦于文献记载罕缺，以及掌握资料亦不够充分，只能持怀疑态度。现在根据近来在东亚邻国的考古新发现，有三处出土物颇似四川广元黑釉瓷。第一是南朝鲜新安沉船打捞起来的乳钉纹罐；第二是日本山梨县热见村出土的褐釉擂水壶与广元窑的刻划篦纹乳钉壶相似；第三是日本富田太良遗址出土的天目釉碗（盏）⑰，与广元窑黑釉瓷盏极似。村上勇先生认为，富田太良出土的天目碗产地难以辨别。笔者根据造型、釉色和露出的化妆土判断，很可能是广元黑釉瓷盏。与此同时，结合日本现存的宋代所谓“建窑天目曜变纹盏”，与重庆出土的“曜变”纹盏残件思考，很同意日本矢部良明在《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中的记述：“把我国出土的大量黑釉瓷天目茶碗，看做是仿建盏制作，属分支的诸

窑的产品，大概是妥当的吧。”[⑱] 这一新的论点，说明了东亚邻国出土的黑釉瓷，不一定全属建窑产品，它也包括了我国其他各地烧造的黑釉瓷器，四川黑釉瓷也应当是其中之一。

四　古外销贸易瓷输出路线

四川与西亚商品流通的存在，早在西汉之际。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曾看到了四川的“邛竹杖、蜀布”，据说是经印度转运而去的[⑲]，说明蜀地商品运往西亚至迟不晚于西汉中期。在汉代，我国和亚欧一些国家已有交往，马其顿（今欧州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商人马易士的许多代办人，常旅游大夏，由大夏到所谓的产丝之国（即中国）贩卖丝织物品[⑳]。到唐时唐王朝与波斯（今伊朗）关系极好。波斯使节常来唐朝，仅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到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计148年，正式遣使见记载已有37次[㉑]，波斯王子俾路斯与其子泥涅师都久居长安直到去逝[㉒]。同时，还有不少波斯人定居中国，与中国人生活很融洽，如波斯香药商李苏沙之后裔李舜弦、李珣等，随僖宗入蜀，其后李舜弦成为前蜀王衍的昭仪[㉓]，为宫中高级女官，地位仅次于皇后和四妃，列九嫔之首，长住成都。李珣家居梓州（今四川三台）善词能诗[㉔]。许多波斯商人，开设“波斯店”，做香料、珠宝生意等，中国文化不断输入波斯，波斯物品不断输入中国，故波斯语汇中常有冠以“中国”的词语，如肉桂叫“中国木”、白铜即称“中国铜”、制瓷的高岭土叫“中国土”。七世纪初，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他声称“求学问尤当去中国”等等[㉕]。

由于西亚人不断到中国，及至四川的川西平原成都等地，因此邛窑系瓷器亦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古波斯经常使用联圆和联点的线”等装饰纹样[㉖]，在邛窑釉下彩瓷器中广为采用；还有男、女的胡人瓷造像、瓷塑狮子等。这些不是偶然的事例，应当是四川同域外文化商务联系的记录。邛窑系瓷器外销，是盛唐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宋时，封建王朝更重视海外贸易，即在东南沿海先后设立市舶司，输出的瓷器，有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瓷等。四川地区这时是以烧造黑釉瓷为主，其产品外销是很有可能的。

四川瓷器外销的路线分陆路、海路二条，从邛崃经雅安、西昌、会理，到云南省姚安达楚雄；经大理到保山或腾冲、德宏，至缅甸走印度与西亚大食相接，再到东罗马及欧洲诸国；或到缅甸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进入印度。此外还可从邛崃到成都过广元到长安，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到新疆沿丝绸之路再到中、西亚。海路方面，从广元顺嘉陵江而下至重庆，沿长江东下，从扬州、宁波启运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或从湘江到漓江至广州出海，到东南亚与西亚，直至阿拉伯，以及波斯湾沿岸。

关于四川古外销贸易瓷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掌握的资料极为贫乏，这篇短文，只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很不成熟，甚而错误甚多，敬请海内外学者提出批评指正。

---

① 陈丽琼《试谈四川古代瓷器的发展及工艺》，1982年《四川省史学论文集》。

② 江油青莲乡九岭、云水瓷窑是1987年4月新发现的窑场，分布长达20华里，经初步调查有10个窑址出土瓷器与邛崃十方堂窑极似，同时质地较白，与湖南长沙铜官窑胎色接近。

③ 陈尧成、邓演仪等著《历代青花瓷器和青花色料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④ 冯先铭《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文物》1960年第3期。

⑤ 李知宴《论越窑和铜官窑瓷器的发展和外销》，《古陶器研究》1982年第一辑。

⑥ 〔美〕葛维汉著、陈恩元译《邛崃陶瓷器》，《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4年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

⑦ 同④。

⑧ 《景德镇陶录》卷七"秘色窑"。

⑨ 《十国春秋·吴越文穆王世家》卷七十九。

⑩ 〔日〕三上次男著《从工艺观点看中国古陶瓷与穆斯林陶瓷间的关系》，《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文摘，1982年。

⑪ 重庆市博物馆《四川广元瓷窑调查收获》，《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⑫ 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涂山宋代瓷窑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10期。

⑬ 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照四二，198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

⑭ 薛翘《宋元时期外销日本时赣州陶瓷》，《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一辑。

⑮ 〔日〕奥田直荣著、丁炯谆译《天目》，景德镇《陶瓷资料》1978年5期。

⑯ 《Drvid Crockett Grrhrm Chien Yro Site Nite Nerr Chung King Szechuon》，《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10卷，第193—194页，1938年。

⑰ 〔日〕村上勇《富田三太良遗迹出土の陶瓷》，《贸易陶瓷研究》。

⑱ 〔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1983年第三辑。

⑲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⑳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418页。

㉑ 《陈垣学术论文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548页。

㉒ 刘泽华、扬志玖等《中国古代史》，752页。

㉓ 同⑳548—549页。

㉔ 《辞海》1979年版，1268页。

㉕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四册507页。

㉖ 〔日〕三上次男《唐末作为贸易陶瓷的长沙铜官窑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1983年第三辑。

安徽古代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初探

李广宁

安徽作为中国的东部省份，正处在南北方文化的交接点上。自古以来，这里盛产瓷土，森林及煤炭资源丰富，水陆交通方便，发展制瓷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史籍记载看，我省历史上就是一个产瓷器的重要地区，有不少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窑场，如寿州窑、宿州窑、泗州窑、宣州窑等。从现已发现的古瓷窑遗址来看，我省历史上的制瓷业也是十分发达的。本文拟就所掌握的材料，试谈一下安徽古代瓷器的生产与外销。

一　近几年安徽古窑址新发现

我省古代窑址的考古调查工作过去做得较少。在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能列举出的安徽古瓷窑址仅有寿州窑、肖窑、繁昌窑三处。这三处窑址均是五十年代由省内外老一辈专家寻找发现的。六十年代，由于"文革"动乱的影响，十几年内这项工作基本没有进展。但近几年，由于全省各地开展文物大普查，加上省里一些专业工作者不懈地努力调查寻找，我省发现的古瓷窑遗址数目已大大增加。此外，即使是过去已发现的窑址，近几年来也发现了不少新的烧造地点和遗物堆积。总之，安徽的古窑址基本遍布全省各地，其数量是可观的，堆积是丰富的，有必要认真加以调查、发掘、整理、研究。为方便起见，现将安徽发现的古代窑址列简表于下：

	名　称	地　点	时　代		名　称	地　点	时　代
1	寿州窑	淮南市、凤台县凤阳县	六朝晚期——唐	8	瑶头岭窑	泾县瑶头岭乡	北宋
				9	窑峰窑	泾县窑峰	北宋
2	曹村窑	宿县曹村乡	六朝晚期——隋	10	刘羊窑	太湖县刘羊乡	北宋
3	岩前窑	休宁县岩前镇	唐	11	下符桥窑	霍山县下符桥乡	北宋
4	竦口窑	歙县竦口乡	唐——北宋	12	庐江窑	庐江县果树乡	北宋
5	琴溪窑	泾县琴溪乡	唐晚期——北宋	13	繁昌窑	繁昌县城郊	北宋——元
6	肖　窑	肖县白土镇	唐晚期——元	14	当涂窑	当涂县太白乡	明初
7	霞间窑	绩溪县高迁乡霞间村	五代——北宋				

二　安徽省古代瓷器的生产状况

早期寿州窑与宿县曹村窑，为六朝晚期至隋代专门烧造青瓷器的窑址。寿州窑以淮南市为中心，涉及到凤阳的武店等地，散落面积较大；而曹村窑仅在宿县曹村西南的山下平原上发现一些因挖塘取土翻出的遗物。其被深埋于两米以下的地层中，目前还无法查清其全貌。这两处窑址烧造瓷器的品种主要有盘口壶、深腹碗、杯、钵、辟雍砚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明显受北方青瓷粗犷风格的影响，造型敦厚稳重、胎质较细、火候高、青釉深沉晶莹、玻化

程度较高。有些器物因釉厚而形成积泪，泪点上往往带有该时代典型的窑变色彩。其所使用的窑具主要为三岔或四岔的支钉，喇叭形托座等。曹村窑的窑址座落在平原上，窑炉大致应为馒头型。从所出土的窑汗等烧结物看，其燃料可能已使用煤。

皖中、皖西和皖南地区的古窑址，一般都建筑在低矮的土丘陵上。其窑型均为依山竖向修建的龙窑。我省目前已发现的唐代窑址，有寿州窑、岩前窑、竦口窑、肖窑及琴溪窑。唐代寿州窑一改前人烧造青瓷的传统，转而以氧化焰烧造黄瓷，间或也烧黑瓷。其产品主要有碗、盏、执壶、瓷枕等。由于该地瓷土所含氧化铝成份较高，而寿州窑改用氧化焰明火烧造后温度不如从前高，难以烧熟，故显得胎质粗硬。有的出土器物生烧剥釉严重。尤其是大型的碗，造型粗笨而厚重，简直令人难以接受。完全丧失了早期青瓷器物稳重熟练的风格。这种转变似乎是发生在唐代中期。究其原因，常常令人感到困惑。从史学的角度看，是否是由于唐王朝打击淮南一带的割据势力而造成的生产力衰退，抑或是唐代社会上存在着某种崇尚黄色的风尚所致（唐代长沙窑、邛崃窑均改烧过黄瓷）？总之，这还是个未解之谜。相对地说，寿州窑产品中的执壶、瓷枕、罐及小型的盏一类器物，烧造的就好的多。尤其是一些黑釉器，是以还原焰烧成，较为熟透，乌黑发亮，甚至有的还带点乌金釉的效果。这类器物上往往有些装饰，手法有刻花、印花、堆塑等。过去有的同志常将这一类器物的黄釉器与湖南长沙窑器物相混。通过近几年来省内外学者专家的一致努力，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明白地区分出来了。其要点是：长沙窑瓷器胎薄质细，釉色黄中偏青绿，常施釉下褐彩及绿彩为装饰。而寿州窑瓷器胎较粗厚，釉色为鳝鱼黄或桔黄，极少施釉下彩。

晚唐时的肖窑、竦口窑、岩前窑，均曾极力模仿寿州窑烧制粗瓷大碗，尤以肖窑学的维妙维肖，简直到了不可区分的地步。而岩前、竦口二窑所烧者，则釉色偏青绿，胎料也不够粗。这样粗笨的东西，居然有人去热心仿效，真是咄咄怪事。

五代至北宋，是安徽省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皖南地区，是竦口窑、霞间窑、泾县诸窑及繁昌窑，都达到了盛烧期。尤以竦口、霞间、琴溪三窑在五代时所烧的青瓷器最佳。其釉色均匀纯正，不甚光亮，与越窑产品很相似。其器型主要有执壶、碗、盏等。执壶一般为喇叭口，腹部常有瓜棱，碗盏多为五瓣葵口式，腹部出筋，圈足外撇。这些都类似于越窑的风格。五代时，皖南地区为南唐国所辖，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因地近浙江，其瓷器产品受越窑的影响是很自然的。这些产品一般较之真正的越窑瓷器在质量上稍差一些，但也有例外：如竦口窑的青瓷器烧成温度高，胎薄、釉色光亮碧翠，击之锵然，颇可与越窑瓷器相比美。在泾县瑶头岭，还发现了烧造白瓷器的窑址。其产品主要为卷唇的碗、盏等，胎料因含铁量高而呈青灰色。其釉下施白色化妆土，釉水亦因铁元素排不干净而微闪青色，使得其白瓷呈现所谓“卵白”色，这与文献中所记载的宣州窑白瓷的釉色是一致的。在北宋时期，繁昌窑的影青瓷器已完全成熟。其器物胎薄，釉色莹润，烧成火候很高。有的器物烧造精美，完全可以与同时期的景德镇影青瓷器产品相抗衡。其产品种类主要为带温碗的执壶、带托茶盏、碗、杯、灯盏以及一些尚难命名的杯形或灯盏形器物。繁昌窑一直延烧到元代，是皖南诸窑中下限延伸最长的古瓷窑址。

在北宋中晚期，安徽省黑釉瓷器的生产大大发展起来。在皖南地区的霞间窑及瑶头岭、窑峰诸窑遗址的堆积中，均发现了大量的黑釉瓷器，器型主要为盏类器物。霞间窑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器型较大、胎体较厚重的黑釉筒状器物。因标本过于破碎无法复原，难于确定其器型。皖西地区的霍山下符桥窑、太湖刘平窑及皖中地区的庐江果树窑，则是典型的北宋中

晚期窑址。其共同点是专烧黑釉器。这些窑场的产品釉色不够匀净，胎土不够精细，器物成型也较马虎。从一些窑址堆积的剖面上看，上部与底部器物没有什么变化，应为较短时间内连续急剧地堆积而形成。这些窑场使用的窑具也很简单，匣钵很小，主要是使用托珠、垫柱之类以明火烧造，故废品率较高。这都反映了在北宋中晚期由于社会上斗茶风日炽，黑釉瓷器需要量激增的情况下，民间窑场仓促大量生产黑瓷的情形。在皖北肖窑的宋代遗址堆积中除白瓷器及白地黑花瓷器外，也有不少北方风格的黑釉盏存在，并延续到金代。当然，宋代肖窑的主要产品是仿定窑白瓷及仿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瓷器。这类产品一直延烧到元代。肖窑的窑炉系馒头窑型，燃料是煤炭。

安徽多数瓷窑在北宋晚期就衰败了，可能主要是战乱所致，但也不排除被周围名窑挤垮的可能性。只有少数窑延烧到元代，亦旋即衰落。到明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几乎挤垮了周围所有的对手。安徽与其为近邻，制瓷业基本上完全停止了。但有一点小小的例外：在当涂县太白乡，近年发现一处明初烧造琉璃建筑构件的窑场，其部分产品（如瓦类）是以瓷土为胎，然火候较低，似难称其为瓷器。

三　安徽古代瓷器的外销问题

安徽古代瓷窑众多，时代多属唐、宋，适值我国古代陶瓷对外贸易的繁盛期。又因地近沿海，产品向外运销是很自然的。其瓷器的出海港口主要有两个：一为江苏的扬州，一为浙江的杭州。瓷器由产地向出海港口输送，亦主要靠水运来实现。这种水路大致有四条，由北向南依次为：大运河、淮河、长江和新安江。近几年在对淮北地区的唐代古运河调查中，发现了大量唐代黄釉瓷器。许多同志往往认为是寿州窑产品，其实应该是肖窑之物。肖窑地近大运河，产品很容易由此条水路去扬州。而寿州窑则在淮河边上，所烧瓷器由淮河下行入运河去扬州也是很方便的。在扬州市的唐城遗址中，发现过大量寿州窑或肖窑的黄釉瓷器，它们与远道而来的长沙窑黄釉瓷器相比，显得粗犷有余而细腻不足，给人以质量较差的感觉。对于这两个窑的瓷器，过去国内外学者研究得较少，特别是国外学者，往往将其误认为长沙窑产品，并由此引起很多疑问。如日本的三上次男先生在《陶瓷之路》中写道："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人们互相往来，因此越窑瓷和黄褐釉瓷也输出到日本"。"在平和台发现的越窑瓷或黄褐釉瓷，**几乎都是没有任何花纹的相当粗糙的瓷器**，和遥远的福斯塔特出土的瓷器相比差别很大。可以由此感受到：两国之间的富足与否与进口规模大小的不同"①着重点是笔者加的，我想说明的是：三上先生看到的日本平和台出土的黄褐釉瓷器，应是安徽寿州窑或肖窑的典型产品，而他在埃及看到的福斯塔特遗址中出土的黄釉瓷则应是长沙窑之类的产品，二者不是一回事，并非是由于"两国之间的富足与否与进口规模大小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反证：安徽的唐代黄瓷产品确曾外销过。

由长江运瓷器去扬州的有皖南地区北端的泾县琴溪、瑶头岭、窑峰诸窑，还有烧制影青瓷器的繁昌窑。繁昌窑紧靠长江，可直接装船下运扬州；而泾县三窑均沿琴溪河，其产品由琴溪入青弋江，再入长江去扬州，总路程不超过300公里，也是十分便利的。

皖南地区南端的三窑址，即绩溪霞间窑、歙县竦口窑和休宁岩前窑的瓷器外销，是靠新安江进行的。霞间、竦口二窑均临扬之水。该水在歙县人练江再在屯溪市入新安江；而岩前窑则紧临练江。三窑瓷器由新安江穿天目山向东入富春江再入钱塘江，即可抵达杭州。宋王朝在立国之初的开宝年间（公元968——975年）即在杭州、明州（今宁波市）专门设立市舶司，董理对外贸易事宜。这与徽州三窑的盛烧期在时间上是较为相符的。

皖南诸窑的大宗出口产品是仿越窑的青瓷。其器物基本无纹饰，造型特点已在前面叙述过，不再赘述。总之，除竦口窑的部分精品可拟于越窑瓷器外，一般都略差或较差于越窑产品。前文所引的三上次男先生谈在日本平和台出土的几乎都是没有任何花纹的"越窑瓷"，应该就是皖南诸窑的产品。不仅在日本，这些青瓷还随着海上贸易的扩大远销到东南亚、西亚以及更远的东北非洲。这种情况，在三上次男先生的名著《陶瓷之路》一书中多处可见端倪。三上先生是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对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功力至深，尤其对越窑是很熟悉的。他曾多次明确提出很多地方出土越窑青瓷器，但独在该书中对一些唐末宋初的青瓷器却十分谨慎地用了"越窑系"三个字。如叙述在红海西岸的埃及旧库赛尔城遗址"探索古迹，我们在散乱的陶瓷片中拾到了许多中国的陶瓷片。其中有唐末、宋初的越窑系青瓷。"②在西亚伊朗境内的沙里、达卡奴斯"出土的可能是九至十世纪越窑系的陶瓷"。特别是他叙述1968年3月在菲律宾首都参加东洋陶瓷研究会议，看到菲律宾"搜集的中国陶瓷从九世纪的越窑、越窑系的陶瓷开始……"，在这里，他明确地把越窑瓷器与越窑系瓷器分开了。以上例子说明，三上次男先生所见到的这类"越窑系"青瓷器，虽然不是真正的越窑产品，却具有非常强烈的越窑风格。那么，无论从其时代考虑，还是从国内的地理位置着眼，我们都有理由认为：这些青瓷器应是皖南诸窑的产品。只是上述窑址过去一直未发现，三上次男先生才无法为它们找到"娘家"。

若上述推断能成立，那么沿着三上次男先生所追觅的踪迹，我们可以看到安徽古代的青瓷产品跨海越洋，从日本、菲律宾到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甚至直到北非的埃及和东非的坦桑尼亚，都有它们的芳踪倩影。再进而证之，上述许多地方与青瓷相伴的黄釉瓷、影青瓷、白瓷和黑瓷器，也可能来自安徽诸窑。

四　关于"天目"

"天目"一词语出日本，现在似乎成了古代黑釉瓷器的统称。追根寻源，最早的说法是：在宋代时，日本僧人来中国，从天目山的佛寺带黑釉盏回国，受到欢迎。日本僧人因不明产地，呼之为天目（てんむ），以后人们相沿成习，遂将一切黑釉器均称之为天目。然学术界也有人认为天目就是专指建盏。其理由是，在宋代闽北建窑所烧的黑釉建盏最负盛名，而天目山一带并未发现过宋代烧造黑釉瓷器的窑址。故论定天目即建盏。如日本专家小山富士夫先生就认为"天目这个词，最初可能是建盏的意思，继而吉州窑的茶碗也叫天目，后来变成只要是黑陶瓷都叫做天目"。③

众所周知：我国在北宋晚期由于斗茶风盛，流行使用黑釉茶盏。宋徽宗在宰相蔡襄的影响下，钟爱建窑所产的兔毫盏，并贵为贡御之物。上行下效，当时全国的制瓷业均纷纷仿效烧造黑釉盏。据统计，在全国发现的宋代窑址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烧造黑釉器。日本的茶风受中国影响，因此，日本僧人从中国带回黑釉茶盏，并备受崇拜是不足为怪的。但从中国天目山带黑茶盏回国的日本僧人是谁？带回去的茶盏实物现又何在？稽诸各种史籍材料，均全然找不到确定的答案。日本僧人带回的茶盏是什么样的，也仍是个谜。天目山在安徽与浙江二省交界处，其去建盏的产地——福建省建阳县有千里之遥，并且中间还横亘着一条武夷山脉。在古代，交通是极不方便的，一般寺庙的日用品无非是就近可取的普通之物。因此，当时天目山寺庙中使用贡御之物的建盏并让人随便带走，无论如何是难以想象的。再退一步说：假定真有作为珍贵礼品而向日本僧人赠建盏事，也决不会不告诉其为建盏（因这种名牌货人人视为珍品），乃至于让日本僧人糊里糊涂地叫出"天目"这个怪名称来，套在建盏的头上，不

是太令人费解了吗？反之，我们不妨做另一种推断：日本僧人知道所携之物是天目山一带所产的，故呼之为"天目"。这样似乎更顺理成章吧？如果说过去天目山周围未发现烧造黑釉瓷器的宋代窑址，那么近几年就已经发现了，即皖南的绩溪霞间窑。其距离天目山仅40公里，该窑瓷器外运，由新安江穿天目山是必经之路。且该窑瓷器内销，运往天目山也是最近的。故我认为：当时天目山佛寺中使用的大量黑釉茶盏，应是霞间窑产品，而日本僧人带回日本去的"天目"，也应是该窑的东西。这样，"天目"就真正还其本义了。当然，在宋代黑釉盏中，建盏处于领袖地位，霞间窑产品就质量而言，是不能与其比拟的。由于茶风的原因，宋代中国黑瓷器的外销主要是对日本。由于建盏名贵，当时在国内已供不应求，是很少出口的。奥田直荣先生在《天目》一书中写道："日本在中世纪似乎输入了大量非建窑的黑釉天目，建盏的出土出乎意料的少④。"这种黑釉天目与建盏比较，一般说来，制作显然不如，而且细部也有相当的差异，这多半可以看出是仿制的"⑤。这些论述，正好是为皖南窑址的黑釉器做了最恰如其分的注脚。

综上所述，天目既然是皖南瓷窑所烧造，而安徽在当时又有很多窑场在大量烧造这类黑釉瓷器，且交通均较方便，易于出口。因此在中国销往日本的宋代黑釉瓷器中，安徽窑场烧造的黑釉产品应杂陈乎其间，并占一定份量。

---

①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李锡经译。
② 同①。
③ 〔日〕奥田直荣《天目》，中国古代陶瓷研究学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学会编《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丁炯淳译。
④ 同③。
⑤ 同③。

试谈磁州窑在国外的影响及其传播

宗 毅

一 磁州窑在陶瓷史中的地位

我国是陶瓷的起源地，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发明了陶器，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就已烧制成美观的彩陶。瓷器也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主要发明。我国的原始瓷器，在商代就已产生，随着陶瓷业的发展，在制作技艺上有许多创造和发明，各个朝代都有新的贡献。如汉魏的釉陶，西晋的青瓷，唐代的三彩陶，宋代的白瓷、青瓷、黑瓷和彩绘瓷，明清的青花和五彩瓷等，在世界陶瓷工艺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磁州窑是我国宋代著名的釉下彩绘民窑，其窑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其中以河北省磁县的观台镇及邯郸彭城镇地区一带为中心，这里瓷窑遗址密集，烧造时间长、产品多、质量高，因其地古属磁州故名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或赭彩的釉下彩绘瓷而著称，广大北方地区生产的白釉黑花或赭花的瓷窑都属于"磁州窑"这一体系，故称之为"磁州窑系"。

磁州窑瓷器从质地上说是民用粗瓷，但经过工匠们多种工艺手段的装饰美化，充满了一种流行于民间的自由、奔放、舒展而又明朗的情趣。它的艺术魅力使磁州窑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

在我国瓷器发展的历史中，宋代是兴盛时期，窑址遍及大江南北。除文献记载中的五大名窑：官、哥、定、汝、钧外，还有龙泉、耀州、磁州、景德镇、建窑等等。这些窑除磁州外，其产品都是单色釉，装饰技法无非是刻、划、印、塑等，唯有磁州窑系产品独树一帜，它继承了唐代釉下彩绘工艺，以黑白对比强烈的彩绘艺术吸引着广大人民，成为民间最喜爱的日常用器，它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远销海外，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

磁州窑系装饰技法以黑白对比为主要特点。如铁锈花纹，就是以铁为颜料，在涂上化妆土的瓷胎上绘画，然后在外表施加一层透明釉，经高温焙烧后，便呈现出色泽鲜明、黑白对比强烈、耐腐蚀、不褪色、不易磨损的白地黑花或白地赭花。

磁州窑系的彩绘种类很多，除白地黑花、赭花外，还有白地绘划黑花、酱花、绿地黑花、褐色点彩、珍珠地划花、白釉绿斑、褐斑、黑釉剔花等十几种。

磁州窑系彩绘瓷题材广泛，图案丰富，多取材于当时人民喜闻乐见的生活小景，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其题材可装饰的器物主要有：山水人物见于枕、罐；花卉、鸟兽见于枕、瓶、罐、碗；虫、鱼见于盘；字、诗文见于碗、罐、枕。人物图案主要内容有：钓鱼图、婴戏图、士人图、人物故事图等；花卉图案有：牡丹、莲、菊、葵、兰、梅、竹等；鸟兽图案有：龙、凤、鹿、马、熊、虎、狮、芦雁、鸳鸯、雀鸟等。此外，还有水波、海浪、云彩等自然纹样。这些图案的绘制既活泼多样，又富有创造性；既写实又夸张，具有构图严谨、疏密得当、层次分明，主题突出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磁州窑系画工的艺术创作才干。

磁州窑瓷器装饰中的绘画艺术，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在民族工艺和绘画艺术的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

二　磁州窑对中国各地及周围各国陶瓷艺术的影响

宋代瓷业的数量及烧造技术，都有长足的进展。北宋时期，烧瓷窑场遍及全国。各个窑系都独具自己的特色。磁州窑瓷器以它特有的白釉黑花或赭花釉下彩绘瓷吸引着广大人民，使这一装饰手法不胫而走，一时间各地窑场竞相仿造。其中河南禹县扒村、修武当阳峪、鹤壁集及陕西耀州、山东淄博、山西介休等地窑址出土的产品与磁州窑器极其相似，质量也很高。由于战乱，宋室南迁，官窑改设南方，北方各窑场的制瓷名师相继南下，磁州窑的瓷工也流散到南方各地，因而南方的许多窑场也就有了类似磁州窑的制品。

江西吉州窑与磁州窑有着密切的关系。吉州窑烧造过白瓷上装饰和磁州窑很相仿的白釉黑花纹样制品。吉州窑划花、刻花、印花、彩绘、点彩等装饰手法和装饰题材中的缠枝纹、牡丹莲花瓣、水波、花蝶、芦雁、游鱼纹等与磁州窑多相近似。可以说，这是受南迁的磁州窑系瓷工影响的结果。

广东梅县瑶上宋代窑址出土有与磁州窑产品相似风格的器物；广州西村窑曾烧过与磁州窑相近似的青瓷釉下黑花牡丹纹样制品。这说明，磁州窑的影响也波及到广东一带。

白釉黑花或赭花的釉下彩绘瓷因它的特殊风格而得到民众的喜爱，它既是实用器又是装饰品，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故这一装饰技艺也流传到了国外。越南北方12—13世纪生产过一种白化妆土上绘黑花纹样的陶瓷制品，它和磁州窑制品极相似；泰国苏库泰陶器中有一些器型、纹样和磁州窑极相似的制品，据说是12—13世纪从中国聘请的陶瓷工人烧制出的产品。①

磁州窑产品对朝鲜也有一定影响。著名的朝鲜“绘高丽”瓷的某些纹样和器形都明显模仿了磁州窑的白釉黑花。

日本的桃山时代，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白釉黑花制品，它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磁州窑的影响。中日两国的贸易自唐以后从未断绝，各时期都有陶瓷产品远销日本，尤以宋元时期的产品更多，同时窑业技术也传到日本，仿制中国陶瓷，并揉合中国风格生产出别具风格的日本陶瓷器。

三　磁州窑瓷器向国外的传播

陶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作为一种重要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国，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陶瓷的对外输出，以及陶瓷技术的向外传播，对世界物质文化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在世界各国的古文化遗址和古城址废墟中，都保留着大量的中国陶瓷器。

近百年来，通过社会调查和考古发掘，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许多古代城址、村落、港口、宫殿、墓葬、海底采集和出土了数量极为庞大的中国古代陶瓷器（或残片）；此外在各地博物馆和个人手中还有大量传世品。这些陶瓷器，年代早的到唐（少量在唐以前），晚的到明清和近代。主要品种有越窑系青釉器，邢窑系白釉器、三彩和低温釉彩器，磁州窑系绘花、刻花器和各种陶器、釉陶器等。

磁州窑瓷器随着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展开，远销到了东南亚及东非等地。

在坦桑尼亚的一个叫做基尔瓦的岛屿上，出土了许多中国瓷器②，除个别完整外，余均为碎片。这些瓷器、瓷片以窑系分，有龙泉窑系的青瓷、景德镇窑系的青花瓷和青白瓷、磁

州窑系的白釉赭花瓷和德化窑的白瓷。其中有一块白釉赭花残片仅长7厘米，为磁州窑的产品，这种纹饰的器物多为盘、碗和罐。我国元大都遗址曾出土过一只白釉赭花罐③，腹壁绘菊花纹，其纹饰画法、着色与基尔瓦这片白釉赭花菊纹片相同。

磁州窑的制品也大量运往东南亚。在印尼的雅加达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中国陶瓷达两千件以上，其中就有磁州窑制品。④

日本的九州出土过大量的中国瓷器，⑤福冈修地下铁路时，考古工作者清理了一万五千平方米，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其中就有磁州窑的产品；从广岛福山市草户千轩遗址发现的宋、元青瓷及白瓷中，也掺混有不少磁州窑的瓷片。

朝鲜的高丽古坟中曾出土过大量的磁州窑制品。在高丽时代的青瓷白釉黑花制品中，受磁州窑影响这一点表现得很强烈。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沉船，它是驶往朝鲜、日本的。经过几次打捞，从沉船中共捞出一万五千余件遗物，其中90%以上为我国古代陶瓷器。这些瓷器中就有磁州窑系的产品。

我国陶瓷器在国外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陶瓷器作为一种重要商品对外输出和传播，最主要的是作为新型的炊事器具，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宋元以后，我国陶瓷器大量输入东南亚及至世界各地，改变了当地土著民族以植物叶为食具的炊事习惯。磁州窑瓷器得以在国外广泛传播，其原因之一是能适应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根据各国人民的爱好，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做到精益求精。韩槐准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中说："我国船舶，每利用土人之好尚，归国定制异型或异画之陶瓷，使适应其心理需要，以便交易。"⑥再者，磁州窑瓷器同我国其它著名窑口的瓷器一样，制作精良，物美价廉。因为是民窑，主要不是迎合上层统治阶级的需要，它的市场是面向民间，也是面向世界的。磁州窑瓷器以釉下彩绘白釉黑花或赭花为特色，绚丽多姿，有浓厚的民间色彩，除了色彩的诱惑力外，彩绘人物、动物、植物和自然景物，博采异章，吸引着各国人民。这些瓷器运载到国外，既多且美，价格便宜，很受各国人民的欢迎。

磁州窑瓷器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有南北两条道路：北方由陆路运往中亚、西亚以至欧洲；东南地区主要由海路输出，东面到达朝鲜和日本，南方则运往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地。

磁州窑系瓷器在外销的瓷器中，因其器型、纹样之独特，受到世界上陶瓷艺术爱好者的喜爱。磁州窑瓷器那种质朴、粗悍的美，尤其接近于人情而令人倍感亲切；那温暖的色调、实用而和谐的器形、白与黑的强烈对比，其吸引力是耐人寻味的，这也是磁州窑器广为传播的一个原因。

---

① 〔日〕长谷布乐尔著、刘志国译《磁州窑》。

② 马希桂、马文宽《基尔瓦出土的中国瓷器》，《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1辑。

③ 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第6期；《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

④ 同①。

⑤ 同①。

⑥ 转引自《略谈我国古代瓷器在国外畅销的原因》，《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1辑。

从景德镇和梁子湖青白瓷的生产谈青白瓷的外销和内销的关系

田海峰

中国陶瓷发展到宋代，著名瓷窑林立中国南北各地，各家瓷窑生产出的各具特色的瓷器，在中国大地上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使中国大地成为绚烂多彩的陶瓷百花园。在古陶瓷的百花园中，江西景德镇创烧的“青白瓷”，一出现就如江南出水的白芙蓉，婷婷玉立于群窑之中，分外引人注目，它的淡妆素雅的风彩，冰肌玉骨的质地，光致茂美的品貌，对人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自宋代至元代在内销市场上畅销不衰，供不应求，而在外销市场上更是求之者甚众。

青白瓷作为外销商品输往外域，无疑是从陆路和水路分道输出。陆路当是沿袭“丝绸之路”的运输路线，以西安作为出发点，从渭河流域，沿河西走廊经甘肃、青海、新疆，到克什米尔、伊斯兰堡、阿富汗、伊朗，抵达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乃至越过红海到埃及。鉴于瓷器具有负荷重、易破碎的特性，在这样长途的陆路运输中，困难重重，安全保证系数极差，故外销瓷器的运输路线主要还是靠从海上走水路。自汉唐以来，在东南沿海设立了许多著名的远洋港口，如浙江的明州（今宁波）、福建的泉州，以及广州等。东边出海可以将瓷器输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岛；东南出海可将中国的瓷器输往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南边出海可将瓷器输往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沙捞越、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自东海至南海，经过马六甲海峡，穿过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再经过阿曼湾，同样到达两河流域沿岸各国，与陆上的“丝绸之路”，殊途而会。这条海上外销瓷器运输线，被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誉为中国的“陶瓷之路”。

据冯先铭先生的考察，中国的青白瓷主要销往亚洲各国，最远的可达北非的埃及①。从考古发现看，与我国近邻的日本，在三十六个县、市、府的广阔范围内都发现了中国的青白瓷；在朝鲜半岛除在本土有数量可观的青白瓷出土之外，还于1977年在南朝鲜的新安海底打捞出一艘中国商业沉船，捞出大批中国瓷器，其中青白瓷即达二千二百八十余件；在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马来西亚、沙捞越；南亚的巴基斯坦，北非的埃及诸国和地区，都有大宗中国的青白瓷出土。可见无论是从陆地运输还是从海上运输，中国的青白瓷从东亚到西亚，直至南亚次大陆，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着广阔的外销市场。销售市场如此广阔，销售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仅一个景德镇生产青白瓷，显然供不应求，无法满足外销市场的需求。为了适应外销市场的需要，处于外销口岸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浙江、福建、广州等地，都相继建立制瓷窑场，竭力仿效景德镇的风格，烧制青白瓷外销，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有的还按照国外风情和生活习尚生产出适合不同民族风格的外销瓷远销国外，在外销市场上大受欢迎。

我国的青白瓷输送到亚洲各国，就如璀灿的明珠，在各地熠熠生辉，使各地闪耀着中华文化的文明之光，给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生活及文化增添了文明和进步的色彩。据南宋赵汝适所著《诸蕃志》记载，在我国陶瓷未输出之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生活，还处在一种不开化的状态，登流眉国（今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箸，掬而食之。”苏吉丹（今印尼爪哇）“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之”。渤泥国(今文莱)“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②] 自从输入了我国的陶瓷,饮食用上了陶瓷器皿,这些国家和地区那种原始的生活方式即逐步得以改变。到青白瓷的输入就更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文明趋于更高层次，显示出更加高雅的格调，使他们在装盛食物、菜肴和调料，储藏化妆品，还有陈设用品和卧具等，都有青白瓷制品提供的需要。仅在日本发现的中国青白瓷器就有碗、盘、钵、罐、瓶、壶、盒、经筒等多种类型。[③] 在南朝鲜打捞的沉船中，曾发现一具青白瓷卧女形枕。中国的青白瓷在亚洲诸多国家和地区，不仅改善了当地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还促进了当地人们的精神文明，显示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灿烂光辉和崇高地位。

景德镇的青白瓷，在外销市场上求之者甚众，加上能按照各国风情和民族习尚生产出对路产品，就更加畅销不衰。在内销市场上同样也是按不同地区的不同需要加工生产出对路产品运销各地。正如蒋祈在《陶记》中记载的那样，有的地方崇尚“黄黑”瓷，有的地方崇尚“青白瓷”。器物烧成之后，经过拣选，将成色好的瓷器分别销往各地，而拣选剩下的次等品，即蒋祈说的所谓“黄掉”则留给本地人使用。这种克己求利以优质产品占领市场的作法，是我们民族手工业产品经营者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不仅景德镇窑的产品在内销市场上是如此，景德镇窑和沿海烧制青白瓷的各窑在外销市场上也是如此，外销市场上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与此紧密相关。这样一来，内销市场上的青白瓷便显得紧俏短缺，尤其是自景德镇经昌江、鄱江、鄱阳湖，进长江而运抵“荆湖北路”（今湖北）的“假玉器”，在湖北地区被视为瓷器的上等品，在这里即被上层阶级所垄断，成为他们的高级使用品。而一般民众虽对景德镇的青白瓷仰慕不已，但可望而不可及。这是因为，其一满足了外销市场的需要，内销市场的销售数量就相应地减少了。从景德镇远道运到湖北来的青白瓷，数量就很有限了；其二，由于数量少，质量高，求购者众，贩运者奇货可居，便借机获取高利，从景德镇运到湖北的青白瓷其价格势必昂贵，这样，一般民众想用景德镇的青白瓷作为日用品就很难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民众日用瓷器的大量需要，湖北民间便起而仿制生产青白瓷。

在湖北境内有一个梁子湖，位于鄂东地区的长江南岸，与长江相通，梁子湖的东侧是鄂州市，西侧是武昌县（纸坊）。经初步调查，梁子湖的东岸和西岸，乃至处于梁子湖水中央的梁子岛上都分布着古代瓷窑遗址，共有一百余处。早在晚唐五代梁子湖就开始设窑烧制青瓷，到宋代，由于景德镇创烧出青白瓷运销到湖北境内，作为商品瓷，虽然只为少数人所得，但对广大民众却有极大的吸引力，由于民众对青白瓷的喜爱和需求，促使梁子湖瓷窑开始仿制青白瓷，并且很快就在梁子湖沿岸遍地设窑，大量烧制。梁子湖窑即成为“青白瓷系”行列中一支不容忽视的生产基地。所烧的青白瓷，其上乘产品，釉色晶莹，瓷质细腻，可与景德镇的青白瓷产品相媲美。但其产品的主流却是釉色灰白，玻光欠佳，与景德镇的青白瓷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正如冯先铭先生指出的：“‘青白瓷系’瓷窑分布在江南各省，各省瓷窑生产的‘青白瓷’质量与服务对象不同，流通区域也不一样，福建，广东两省‘青白瓷’

以外销为主，景德镇产品供应国内及海外双重需要，其余则以内销为主，解决瓷窑邻近地区的民间用瓷。”④梁子湖窑的服务对象当然是属于后者。

梁子湖的产品以碗、盘、碟、壶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并有枕、瓶之类的用品。碗之类早期产品多为高大圈足的圆腹卷唇大碗，亦有高圈足的曲腹撇口碗，这些产品的造型均具有景德镇产品的格调，但不见碗腹有莲瓣装饰；碟之类有印菊瓣装饰的花口碟，但多为平底深腹素面无纹的小碟；壶的样式很多，其中圆腹执壶和高颈长腹瓜棱形执壶的造型，则更是对景德镇壶形的依样模制。南宋时期的产品，以碗碟之类居多。在小圈足敞口小碗的内壁有刻株草纹和划梳篦水草纹装饰的作品，亦有小口碗外壁刻长菊瓣纹装饰的。这样一些装饰显然也是模仿景德镇产品之作。总之，梁子湖宋代瓷窑，无论是釉色的基调，造型的设计，还是纹饰的特点，均尽力追求和模仿景德镇青白瓷的风格，只是梁子湖的青白瓷产品由于受原材料所限和技术的差距，致使釉色灰暗，玻光呆滞，纹样简单，线条生硬，造型厚重，其模仿效果只能做到近乎形似，而不能做到神形具似，明显缺乏景德镇产品的釉色清丽素雅、纹样生动流畅、造型玲珑剔透的神韵，表现出地方瓷窑既有追随景德镇瓷窑的特征，又具有自身的地方特点的风格。相形之下，梁子湖的产品更适合民众使用，它朴实大方，经久耐用，价格低廉，又不失广大民众所仰羡的青白瓷的特征。

尽管梁子湖窑产的青白窑和景德镇产的青白瓷存在着差距，但从梁子湖瓷窑生产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足以说明该窑的创造和生产是既顺乎民情又合乎国情的。梁子湖窑的创烧和发展，满足了湖北地区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需要，同时减少了景德镇产品在内销市场上数量不足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景德镇青白瓷在内销市场上不能大量满足需要的缺憾，有力地支援了景德镇青白瓷的对外销售，使得景德镇的优质产品更多地去占领外销市场，从而加强了瓷器外销为桥梁的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了我国和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加深了我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世界上赢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

瓷器的外销表明，瓷器作为一种传统的物质文化，如果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就不仅只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起实用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

① 冯先铭《综论我国宋元时期“青白瓷”》，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古陶瓷论文集》。

② 转引自郑炳山《略谈我国古代瓷器在国外畅销的原因》，《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一辑。

③ 同①。

④ 同①。

晋江磁灶窑的发展及其外销

叶文程　苏垂昌　黄世春

一

我国著名的文化古城——泉州，自唐宋以降，就藉其优越的港口条件，丰富的手工业产品和发达的文化，逐渐成为中世纪“梯航万国”的世界著名贸易港。特别是宋元时期，泉州港已跃居我国四大贸易港（广州、明州和扬州）之首，成为我国对外交通、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

距今泉州市西南约16公里，地濒泉州湾的晋江磁灶乡的磁灶窑，是宋元时期福建和泉州地区的一个重要的陶瓷外销的窑口。磁灶乡历史上属泉州府晋江县，今属泉州市晋江县的一个下属镇，因历代烧制陶瓷，名闻遐迩。磁灶乡四周小山环抱，梅溪自其西北，经东折而注入泉州湾。由于地处晋江下游出海口，水陆交通便捷，陶瓷产品可借舟楫之便，运抵口岸，出洋外销。古代陶瓷窑址分布在梅溪两岸的小山丘上，保存较好的有土尾庵、蜘蛛山、曾竹山、童子山等。

解放前，沙善德氏访问磁灶乡时，就指出它是一处外销窑口，他把磁灶窑产品和南洋群岛一带出土的宋以后陶瓷产品作了比较，认为南洋群岛出土的某些陶瓷，如龙瓮，即是磁灶窑产品①。

1956年冬，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冯先铭和李辉柄对磁灶窑进行了调查，在许山、蜘蛛山、宫仔山和土尾庵等四处，采集到许多陶瓷及窑具的残片。其中有青釉碗（莲瓣、篦纹）、黑釉碗、炉形器、青釉碟等。从采集到的器物的特征判断，它是一处宋至明以“青釉为主，黑釉为辅”，清至今延续不断，历史悠久的窑口②。

1963年和1964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研究人员曾两次到晋江磁灶窑的蜘蛛山、土尾庵、许山和宫仔山等遗址进行调查。在上述遗址中，采集了不少标本，其中有一部分标本相当完整。标本中如军持、青釉碟、长颈瓶和长颈壶等，釉色有青、黄、绿、黑、酱等。经我们初步观察，这些器物主要是输往东南亚诸国。还有一些粗陶器，如早期烧造的“龙瓮”，宋元以来烧造的咸菜瓮，也都是销往国外的。

1978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对磁灶窑进行全面调查，并选择了溪口山、蜘蛛山、土尾庵和童子山一号窑，进行局部试掘，采集到近千件标本，首次发现了南朝晚期窑址——溪口山窑③。

1976年3月晋江县文化馆配合晋江地区文管会对磁灶进行普查，共查出古窑址19处，采集部分标本。1979年9月，晋江县文管会又对磁灶窑址进行复查，考证出南朝窑址1处、唐代窑址5处、唐宋混叠窑址1处，宋元窑址12处。1980年，在草庵出土“明教会”黑釉碗，后又对下灶、岭畔一带窑址进行考察，在大树威窑址堆积层中发现“明教会”碗残片二件，找到了烧制窑口，为研究晋江明教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据考古工作所得资料，磁灶窑烧制年代可早到南朝晚期，此后，历代延续不断。现将各窑址的时代、分布列述于下：

（1）南朝晚期窑址1处：位于下官路村，双溪口的溪口山（下层）。

（2）唐五代窑址6处：分布在下灶村的虎仔山、后山和老鼠石；下官路村的后壁山、狗仔山、溪口山（上层）；岭畔村的童子山（二号窑）。

（3）宋元窑址12处：分布在岭畔村的蜘蛛山、土尾庵、山坪和童子山（一号窑）；磁灶村的许山、宫仔山、顶山尾和大树威；前埔村的曾竹山、金交椅山、溪乾山；另一处属泉州市南安县官桥下洋村的斗温山。

（4）清代窑址7处：分布于下官路村的铜锣山；洋宅村的路山尾；下灶村的宫仔山、寨边山、窑尾草埔；磁灶村的下尾湖、瓮灶崎。

二

溪口山窑址，破坏过甚，其堆积仅0.8米，曾试掘12平方米，窑址可分为上、下二层。其上层出土器物有：盘口壶、壶、盘、钵、罐、瓮、灯座等；陶瓷生产工具和窑具有：陶垫拍、陶球、托座和垫饼（三角支钉）等。前述容器类器物大多器表上部施青釉（釉层易脱落），下部无釉。这些器物从造型、釉色、风格结合窑具和工艺等方面观察，溪口山窑址下层，可早到南朝晚期，它的发现使磁灶窑的烧造年代上限大大提前了，成为泉州地区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窑址。

唐五代窑址，保存较好的有狗仔山和虎仔山，其堆积层厚约0.6—1米。从调查采集到的标本看，其器形有四系罐、平底钵、罐瓮和釜等。器物质地大多粗松、灰白胎。器表仅上部施青釉、下部及底无釉。窑具方面有托座和支钉，不少器物留有支烧痕迹。从采集的器物标本分析，应是唐五代时期产品。溪口山上层也有大量的四系罐、平底钵，也应是这时期的产品。

宋元窑址有12处之多，堆积层的厚度，远胜南朝和唐五代窑址，如土尾庵堆积约1—5米左右。曾竹山有八条窑床暴露于地表，有些窑址出现窑床重叠现象。这一时期窑址作坊范围比前代有所扩大，如曾竹山窑址其范围达1600平方米。海交馆对蜘蛛山和童子山一号窑进行局部试掘，发现二处的窑炉均为龙窑。这时期烧制的器物品种相当丰富，计有：军持、瓶、带座小瓶、小口瓶、碗、钵、执壶、壶、煎壶、缸、瓮、盘、碟、注子、砚滴、炉、薰炉、盆、洗、器盖、托子、四系小盂、盖盒、漏斗、器座、蕊鼓，还有雕塑的力士（人物）等。生产工具方面有：模具、陶车套轴；窑具方面有托座、垫圈、垫钵、三足垫饼等。值得注意的是，除土尾庵和蜘蛛山等个别窑址外，不少窑址，只烧制单一产品。如金交椅山单烧执壶，溪乾烧碗，童子山一号窑烧盆，曾竹山烧小口瓶，斗温山烧小口罐。这时期的釉色，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已由前代的单色釉（青釉等），发展到同时兼烧各色低温铅釉，计有绿釉、黄釉、绛色釉和黑釉。器物的成型方面，一般已采用轮制，大型器物如罐、瓮则采用手工拉坯，也有不少器物采用分段模制，然后粘接成整器。从出土窑具看，这时期已采用匣钵装烧、套烧、对口烧、复烧（出有垫圈）等。还应特别提出的是，磁灶窑所使用的泥料，可能含铁量较高，故采用低温铅釉，以装饰器表，首先素烧，经上釉后再进行二次焙烧，不少器物如军持、执壶、瓶等等，均为未施釉的素胎，便可证明。装饰手法有划花、刻花、贴花和雕塑等。装饰花纹方面：有牡丹花纹、菊花纹、莲瓣纹、缠枝花纹、鱼藻纹、龙纹、古钱纹、水波纹、叶脉纹和圆环纹等等。童子山窑烧制的盆（或盘），颇具特色，它是在器内表

面，青釉下用酱黑色彩绘各种花纹，属于釉下彩，具有北方磁州窑风格；有的盆（或盘）器里表面用酱黑釉题写诗句，颇富诗情画意。

明清时期，磁灶窑仍继续烧造，但以转烧日用粗陶为主。窑址只发现7处，破坏严重，范围不大，堆积层厚度一般1.4—2.1米。主要器类有：缸、瓮、钵、壶等；窑具有：托座、垫钵、垫饼和陶垫拍等。釉色有青釉、酱釉、酱黄釉，也有未施釉的粗陶④。

民国期间，磁灶窑址处于没落阶段。从几次调查来看，仅发现窑址5处，堆积层厚度只有0.3—0.6米，主要器物均为民间生活用具，如瓮、钵、壶、拾骸罐、养鸡槽等，以瓮及各种缸类居多。单色酱色釉。大部分为肩挑小贩销售，价格低廉，群众俗语称为“磁灶挑瓷卖，十破去九也不赔。”

解放以后，磁灶陶瓷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兴建了国营陶瓷厂，除烧制各种大小缸瓮、碗钵外，还烧制建筑瓷。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开放、改革、搞活政策的贯彻和执行，磁灶陶瓷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品大量转为建材瓷。1984年，磁灶镇第二位跨入全省亿元乡、镇行列。目前全镇烟囱林立，厂房列布，以生产各类建材瓷、古建筑装饰瓷为主的陶瓷产品销售全国各地。

三

目前的考古资料证明，南朝晚期的磁灶窑，已初具规模。从当时的交通形势看，泉州港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通航线已经畅通，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就是从泉州乘大船回国的。文献还记载这时期海上航路出现了“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景象。但目前国外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磁灶窑产品。

唐五代时期，我国造船业和航海术有长足的进步，泉州港已成为当时我国对外的主要贸易港之一。据文献记载，五代时期泉州地区的“陶瓷铜铁，泛于蕃国”⑤。磁灶窑这一时期的窑址，已由南朝1处增至6处，说明生产规模比前扩大。今后随着国外考古的发展，必然会有磁灶窑陶瓷产品的出土。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已跃居我国四大贸易港之首，且被外国人誉为“世界第一大港”。由于泉州对外交通贸易的繁盛，泉州地区广大腹地的陶瓷、铜铁、丝绸、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亚洲各国。磁灶窑在这一时期正处在鼎盛时期，这从发现的（12处）窑址数目，可以说明。据目前所掌握的国外考古资料，它的外销地点，主要限于日本和东南亚诸国。

日本各地相当于宋元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磁灶窑七尾庵窑址的绿釉瓷器，特别是在横滨、长野、福冈和京都等地也出土有磁灶窑童子山所产的黄釉下铁绘花纹盆（或盘），而且很多是完整的；此外，日本各地也发现蜘蛛山窑址所生产的绿釉剔花器和绿釉上面黄釉斑点的器物，以及龟形砚滴等等⑥。上述这些磁灶窑的产品，应是通过贸易渠道输出到日本的。据日本文献《朝野群载》记载，北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即日本掘河天皇康和四年），泉州客商李充由泉州经明州到日本贸易，商品除丝绸外，还有“瓷碗贰百床，瓷碟壹百床”（床是闽南方言，用它作计算陶瓷数量的单位）。李充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回泉州，次年(崇宁四年)又去日本贸易，可见，头尾五年中间(公元1102—1105年)，他就两次到日本贸易，这充分说明泉州与日本之间的商业活动是十分频繁的⑦，因而距泉州港口岸最近的磁灶窑产品能输出到日本。前述日本各地出土的磁灶窑各类陶瓷，可与日本文献相印证。

南洋群岛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都发现了磁灶窑的产品，其数量相当的可观。

菲律宾曾发现磁灶窑蜘蛛山、土尾庵窑址所烧制的双龙抢球、缠枝牡丹花等纹饰的绿釉军持和黑釉（无纹）军持[8]。菲律宾各地的古墓中，也出土过不少磁灶窑烧制的宋元时期的瓮和肩部堆塑蛟龙的“龙瓮”。冯先铭先生在菲律宾考察外销瓷时，发现“福建泉州窑（磁灶）产品有低温绿铅釉印花盘、军持等器，军持应属定烧器；也有仿剔红剔黑工艺特征烧制的黑釉剔花瓶、罐、炉等器”。[9] 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博物馆收藏的陶瓷，属于磁灶窑产品的有绿釉盘、黑釉龙纹军持[10]；沙捞越首府古晋的尼亚大科的一个山洞遗址中，也出土有磁灶窑的产品[11]。磁灶窑烧制的传统产品——“龙瓮”，自宋明至今，沿袭不断。除了内销外还输出到东南亚各国，为当地人们所喜爱，它“为爪哇、渤泥及菲律宾的猎头部落所珍存，而且代代相传，尊之为神秘之法宝。”[12] 印尼雅加达博物馆收集了该国各地传世和出土的中国陶瓷，其中就有磁灶窑宋元时所烧制的军持等器物[13]。以上是宋元时期磁灶窑产品向国外输出的情况。

此外，在我国台湾省澎湖县所属各个岛屿，七十年代以来，不断发现了磁灶窑宋元时期所烧制的产品。1985年台湾省澎湖县立文化中心出版了《澎湖宋元陶瓷》一书。作者陈信雄曾于1979年参加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师生的“澎湖宋元陶瓷考古队”，在澎湖各岛进行宋元陶瓷遗址的调查。其后，又进行三次调查和发掘，所得宋元陶瓷标本在一万件以上，其中以福建、浙江窑口的陶瓷最多，也有磁灶窑宋元时期的产品。由于作者不能亲自到闽、浙实地考察，仅能据中国大陆出版的考古书刊核对澎湖出土的器物。即使如此，他还能指出比较明显属于磁灶窑宋元时期烧制的某些产品。我们根据该书所提供的彩色图版、插图和对器物的描述，也能看到不少器物，确实是属于磁灶窑的特有产品。这是近十多年来，磁灶窑考古资料的重要发现。

澎湖列岛出土宋元陶瓷，属于磁灶窑的产品有：曾竹山的陶瓶（共发现2015件，数量最多；斗温山的青釉细陶壶 374 件；童子山的青釉陶盆；蜘蛛山的青釉印花碗等等）。书中还有不少器物标明福建或泉州附近产品的，估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可能是磁灶窑的产品。陈氏还指出台湾本岛不曾发现中国宋元时期的陶瓷，因此认为，澎湖位于台湾海峡东南部，是中国东南沿海各地窑口陶瓷外销的一个转运站，由此再把它转运到南边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诸国，他得出结论：“经由泉州、澎湖到南洋的澎湖航线，乃宋元期间，中国陶瓷外销航路中的一环。”[14] 我们希望海峡两岸的陶瓷考古工作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互相来往，实地考察，进行学术交流。

四

明清时期，磁灶窑转以烧制日用粗陶为主，除供国内需求外，仍然输出到它的传统市场——东南亚诸国。如乾隆版《晋江县志》卷一记载：“瓷器出磁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罐、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晋江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明清时期，福建人民大批出国，我国制造陶瓷的技术，随着他们传播到各侨居地——东南亚各国。例如：磁灶乡吴姓工匠，于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前在菲律宾南怡罗戈省美岸社传授烧造一种叫做“文奈”的中国瓮。据说，现在“美岸制造的‘文奈’具有明代的磁器工艺的影响”。[15] 因此，我们可以说，磁灶乡的工匠，为中菲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总之，晋江磁灶窑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以烧造外销陶瓷为主的重要窑口，是具有浓厚

的地方特色和时代风格的民窑。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濒临泉州港口岸，使其外销条件优越。同时，它与泉州港的兴衰密切相关，当泉州港在宋元时期对外交通和贸易达到鼎盛的时候，也正是磁灶窑生产发展昌盛的时期。磁灶窑的某些产品是专门为外销而烧造的，如军持等可能是为适应东南亚各地宗教生活而接受的定烧器物。磁灶窑的产品器类丰富多彩，虽然比较粗放但却颇具特色。特别应指出的，磁灶窑出土一些瓷雕塑，深目高鼻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泉州港宋元时期"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

① 沙善德著、吴适聪译《福建——中国考古学之新富源》，《福建文化》第27期。
② 陈万里《调查闽南古代窑址小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
③ 陈鹏、黄天柱、黄宝玲《福建晋江磁灶古窑址》，《考古》1982年第五期；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晋江县磁灶陶瓷史调查》，《海交史研究》总第2期，1980年。
④ 叶文程《晋江泉州古外销陶瓷初探》，《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1期；冯先铭《我国古代外销瓷问题》总第2期，1980年；同注④。
⑤ 清源《留氏族谱·宋鄂国公传》，手抄本。
⑥ 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海交史研究》总第2期，1980年；《海交史研究动态》第8期，第7页；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特别展览》，1975年。
⑦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3页；《朝野群载》卷二十。
⑧ 艾迪斯《菲律宾发现的中国瓷器》，《东方陶瓷协会学报》第37卷，1967—1969年。
⑨ 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第71页。
⑩ 冯先铭《在东南亚国家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见闻》，《海交史研究动态》第9期。
⑪ 同⑩。
⑫ 同①。
⑬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第9页，图三，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1959年
⑭ 陈信雄《澎湖宋元陶瓷》，澎湖县立文化中心，1985年11月版。
⑮ Gregorio L·Azurin，菲律宾《华侨周刊》第26卷第1期，1963年。

试谈浙西宋元窑址及其产品的外销

季志耀

一

古代和现代对于“浙西”的概念有所不同，现代浙西指的就是地处浙江西部的衢州，辖衢县、龙游、江山、开化、常山五县及柯城区。而古代浙西的范围却大得多，自东汉顺帝时采纳山阴人殷重的建议，自钱塘江中分，向东为会稽郡，此为东西两浙之名所自起。会稽之治在浙，而浙西之地大部为吴之属县。按照《唐书·地理志》的说法：当时设浙江西道节度使，治润州，管润、苏、常、杭、湖等州；浙江东道节度使，治越州，管越、衢、婺、温、台、明等州。照此，衢州属浙东地带，与今大不相同。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据《浙江通志》所说：从秦代开始，会稽郡为本省的主体，应该说是浙之中心。唐李华的《衢州刺史厅壁记》中说：“自汉已还，州统郡，郡或连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郡如会稽、丹阳，镇领遐阔，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末一县（即今之龙游，但其地甚广）抵于建安。今此州（指衢州）即古会稽西部之地也。”按照此说，似乎又接近我们现在的概念。

具有突破性发现的陕西法门寺地宫秘色瓷，把秘瓷的产生上溯到唐代，其中一件金花鸳鸯纹饰的瓷盘有“浙西”款。在这批瑰宝尚未公诸于世之前，笔者不敢妄下这“浙西”款的定义。但令人惊讶的是，陆羽在其《茶经》中说当时名窑越、婺、瓯三处都属“浙东路”，而浙西所属润、苏、常、杭、湖等州均未见陆羽提到有何名窑。《茶经》成书于764年前后，距唐僖宗赠法门寺秘色瓷不到百年。

二

衢州在1982年开展文物普查之前，古窑址的概况尚属朦胧，亦鲜见于史籍之记载。经过几年的普查，发现了大量的古代窑址，时代从汉、唐直至宋、元、明、清延续不断，揭开了浙西一带长期湮没无闻的陶瓷历史的新篇章，说明了衢州陶瓷历史源远流长和沿传有绪。衢州一带多丘陵山地，林木葱郁，瓷土蕴藏丰富，交通便利，这给陶瓷生产和外销带来极有利的条件。生活在浙西的祖先们，发挥了地方优势，吸收了祖国各地陶瓷烧制的先进技术，使衢州历来的陶瓷生产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由于处于“四省通衢”这样的地理环境，衢州古窑址的窑口或归属的窑系问题也就比较复杂。自唐以来的产品，有些明显属于婺州窑系，有些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或其它名窑的特征。限于篇幅，本文只简要介绍与外销有关的宋、元窑址。

宋代窑址在衢州分布甚广，各县都有，而以衢县的全旺乡最为集中，数量达四、五十处，规模之大在当时可称得上是一座陶瓷小城，甚至还发现了专烧窑具的陶器窑址，这可能就是现代所谓的“生产流水线”。而其生产的瓷器不仅品种丰富，在质量上也可列为全市之首。比较突出的有沙后塘、八角凉棚、沈家山、冬瓜潭、梁公塘等窑址。全旺乡位于衢州市以东偏南，离市区十八公里，其东南部属山区，西北部属黄土丘陵，大量的窑址就分布在

黄土丘陵的山坡上，主要集中在尚论岗、官堂、楼山后、柴公岗诸村。有些窑址已遭开垦，有些保存尚好，龙窑的窑垄迹象明显，堆积面积各窑约在六百至二千平方米，厚度约五十至一百二十厘米。

全旺乡窑址都生产瓷器，多为青瓷，亦有褐瓷、天青、黄褐、翠绿、茶绿、酱色和黑如漆的乌金瓷等，一般都呈色较深且多复色，很难分出是青还是褐、绿。釉层厚而莹润，精致的器物施满釉，有的为"芒口"（如葵口碗），以便包镶金、银边饰；有少量器物釉中有泛蓝紫色块斑的"窑变"。器物品种繁多，有各类型执壶和碗、盘、小罐、盖罐、粉盒、盏、鸟盏、海棠形杯、葵口碗、香薰、水注、矮扁壶、茶托、水盂、八卦炉、盆、碟、罐、盘、春瓶、扑满、灯具、药碾、荷叶形口高足碗等等不下几十种。有日常的生活用品，也有供观赏的摆设、工艺品，都很注重造型的艺术美。器物上的纹饰精雅富于变化，采取拍印、模印、刻划、浅浮雕等多种装饰手法。有些器型较大，如尚论岗村沈家山窑址所出五管灯。器壁上刻重瓣莲花纹，口径达三十厘米。官堂村沙后塘窑址所出葵口碗，圆折部分较之我省其它名窑所出更为深凹，造型更为美观，从而烧制成形的难度更大。

在繁多的产品中，引人瞩目的是彩绘瓷，以尚论岗村冬瓜潭窑、官堂村梁公塘窑、塘头村柴胡垄窑产量最多。这种瓷就是在白色或略带青灰、青绿的底釉上用呈暗红、黑、褐（或带青）的色料绘上各种图案，有牡丹花、缠枝花草、菊花、兰草、鲤鱼、草虫、走兽、祥云、水波、折枝花卉等，笔调娴熟奔放，线条粗犷流利，宛如一幅幅写意水墨画，很讲究国画传统的笔意。这是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的先例。与北方磁州窑系精致的描绘明显不同。还有一种划花填彩，显得华丽雅致。标本经测试表明，瓷胎烧成温度很高，瓷化程度好，多为釉上彩，釉料含铁量较高，可能与早期青瓷点彩用料类似。在青瓷之乡的浙江，彩绘瓷的发现，显然是个新鲜事，而且全旺彩绘瓷的器物造型较为特殊，彩绘用料，胎质等都不同于磁州窑系，应该说是个很重要的新发现。

全旺乡窑址的时代经专家们鉴定从北宋早期一直延续到南宋晚期。有些早期产品明显带有五代特征，早期窑址产品质量较精，装烧比较讲究，大量使用匣钵等障火工具，多见一只匣钵内只烧一件器物。还有各种规格的垫圈、喇叭形支垫、烛台形支垫。窑具的制作较精，而后期产品就显得较粗糙，多数采用叠烧。据专家们鉴定，彩绘瓷属南宋时期，是否进入元代，尚待商榷。

元代窑址在衢州的分布虽不如宋代广泛，但在衢县、江山、龙游都有发现，特别是在衢县白坞口乡下窑口、小湖南乡山前峦一带，元代窑址规模十分宏大。下窑口一处窑址的废品堆积面可达万余平方米，厚二米余。由于建造水库，大部分窑址淹没于水中，还不能窥其全豹，其原有之规模可想而知。这一带窑址大都设在乌溪江沿岸，距龙泉县不远，此处山高林密，窑址所在地势甚高。因此，这些窑址产品的生产和外销可能与龙泉窑有某种联系，这些窑址产品又较南宋后期更粗糙，胎体厚重，釉薄不匀，多为明火叠烧。釉色有青、绿、黄褐、黑等。器型有罐、壶、钵、瓶、碗、高足杯、虎子、盘、碟等。碗、罐底部印有图章，多九叠文甚难识别，亦有正楷、小篆体。窑具只见喇叭形支垫一种．废品堆积层很厚，说明烧造延续时间较长。

衢县的大川乡管家塘窑址、广坞村窑址，规模虽不甚大，但产品质地甚佳，尤以管家塘窑址所出乳浊釉瓷最有特色。该窑位于衢州市区南二十公里，属丘陵山地，碎片散布面积东西宽五十米，南北长二十五米，最厚八十厘米，一般十至七十厘米。由于积年开荒和开挖渠

道，窑址受到破坏，在一处断层可见窑床的砖砌痕迹。管家塘窑址专烧瓷器，废品堆积中多见较完整器物。主要器形有折腹碗、直口碗、弧腹碗、碟、盘、执壶、瓶、罐，器物上少见花纹装饰。釉色有青、黄褐、黄绿、青绿、黑、褐等，乳浊釉产品占三分之一强，釉色呈鲜艳的天蓝色或蓝紫色。窑具中未见匣钵，多见喇叭形支垫，器物大都叠烧。

分布在我市衢县河东乡、龙游县上圩头乡及江山县砝河乡的唐代窑址中就已出现乳浊釉瓷，说明这种产品由来已久，发展到元代已趋成熟，达到优美的境界。在全旺乡一些宋代窑址中也可偶而见到一些"窑变"器物，但还不能达到元代如此有意识的程度和技术水平。因而有人怀疑元代这种类钧窑的瓷器并非来自唐代乳浊釉瓷的发展，而是外来影响所至。北宋末至南宋初，女真侵占中原地区，高宗南渡，千万流民亦随之南迁，其中就有不少制瓷业者，他们来到衢州安家落户并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是不无可能的事，因此认为我市乳浊釉瓷至元代方处繁盛，而此时北方钧窑渐趋衰落，是与北方钧窑可能南迁有关。当然，目前这只能是一种推测。

管家塘窑址所出的一件乳浊釉"豆"形灯的底足上有"至大二年"款，说明了该窑的确切年代。白坞口乡下窑口窑址、小湖南乡山前凿窑址、大川乡广坞村窑址所出碗、碟、盘、罐、壶的形制与管家塘窑址类似，都属同一时期。

三

宋人小说"碾玉观音"中有这样一段话："四更已后，各带着随身金银物件出门。离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迤逦来到衢州。崔宁道：这里是五路总头，是打那条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小说开头有绍兴年间之语，可知为南宋人所作。衢州历来是交通枢纽，四省通衢，史书称："控闽赣，通徽睦，襟山带水，俨然一大都会。"至迟在宋代，就有"五路总头"之称。据考证，这五路之称并不是形容词的虚数，而实有其事，是指两条水路三条旱路。水路一条是衢江航道，上联徽歙，下通杭州；另一条是乌溪江，上达遂昌、龙泉，下游在衢县樟树潭与衢江会合。古代这两条江上，船行如梭，两岸码头、埠岸星罗棋布，商行栈房鳞次栉比，是主要的交通运输线。龙泉县的青瓷器有可能由乌溪江经衢江运销内地或由杭州运往海外，亦可由衢州陆路转运福建出海。值得注意的是衢江或其支流沿岸设有多处天妃宫。天妃又称天后，在台湾和东南亚称妈祖，是船工、海员、客商、渔民祭祀的海神娘娘。设在衢州的天妃宫大都为福建人士的会馆，这说明了与福建海运关系的密切。可以认为，设在乌溪江沿岸的规模宏大的窑场，是以乌溪江为主要内销或外销运输线的，并且以这条航道与龙泉窑取得某种联系。

古代衢州的三条旱路一条是官道，一条是北山通道，另一条是南山通道。前两条路与窑址的关系不甚明显，而南山通道在宋元时代可以认为是陶瓷之路，亦是民间私盐之路。其东达遂昌可通明、温二州，往西达龙游溪口、灵山、全旺、大洲、石室、大川至江山可达福建。全旺乡宋代窑址、大川乡元代窑址都在这条陆路沿线。这条陆路的重要城镇大洲镇亦设有天妃宫，这说明虽是陆路却也与海运有关系。全旺和大川的窑址精美的瓷器完全可能由这条旱路运往明州、温州和福建出海。明清之际，天妃宫也成为内河航运祭神的场所，但仍旧是福建会馆的所在地。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马可·波罗曾到过衢州，时值枇杷成熟，市上摆满了金灿灿的果实。当时衢州的长官达鲁花赤用特产的桂花酒招待马可·波罗，临行还赠送两匹白马，但马可·波罗一反常态，不要骏马却要盛桂花酒的"彩陶瓶"。后来马可·波罗将这两

只“彩陶瓶”带回威尼斯。这种“彩陶瓶”很可能就是全旺乡生产的彩绘瓷，这种瓷器釉质并不如青瓷那样玻璃质感很强，胎质也稍粗，初看颇似陶器。

在衢县大川乡管家塘窑址以北十二公里的航埠镇万川村，有元代陈嗣宗墓，据《万川陈氏家谱》记载：陈庆甫，字嗣宗（1270—1338年）。始祖康诚偕子随宋主南迁，后居于衢州府信安县万川村。至四世孙陈庆甫已成巨富，府内商店货栈连城(可见主要是经商致富)。元至元年间陈庆甫捐银五万余修建衢州城垣，自说这是前助福建泉州洛阳桥的余资。从这些记载可知，陈庆甫作为巨商与泉州关系密切，泉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海交港城，陈庆甫到泉州做的应是海外生意，那么衢州盛产的精美的瓷器，很可能被陈庆甫列为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管家塘窑址距万川不远，陈庆甫是不会舍近求远的。

四

以上论述可以说明，衢州古瓷产地集中，产品质高量多，交通发达，是具备外销条件的。如1978年在宁波（即明州）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出一批婺州窑瓷器，其中折腹碗、盘、碟等无论形制、釉质都与衢县管家塘窑址所出颇为类似，有些与全旺乡瓦窑基等窑址同类器物相似。1980年南朝鲜新安海域打捞出中国元代类钧窑瓷器，专家们提出可能产在浙江的推测。浙江元代乳浊釉瓷窑目前发现的除金华县铁店窑之外，衢县管家塘也是重要的一处，而且该窑乳浊釉产品有确切的纪年。还有专家在日本见到一种彩绘鱼盆，不明何窑所出，认为颇似衢县全旺乡梁公塘窑址所出南宋彩绘鱼纹盆。由于以往大都注重名窑产品的外销，民间窑址外销资料缺乏，国外所藏中国古瓷不易见到，而衢州古窑址又是1982年以后才逐渐认识，故而只能作以上推测性之论述，以求教于广见博闻之士。

略谈景德镇宋元瓷器外销

李再华

宋代景德镇窑、龙泉窑的崛起，是南方瓷业发展的标志。与此同时，以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四大口岸为输出点的海外瓷器贸易获得扩展。产销两旺的工贸形势，表明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本文对景德镇宋、元瓷器外销的探讨，旨在剖析景德镇宋、元瓷器外销与生产的一些关系。

一　景德镇宋、元瓷器外销的条件

景德镇位于赣东北，处昌江与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星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附近绵亘起伏的怀玉山多产松柴，为烧窑提供丰富的燃料；景德镇水路交通方便，沿昌江到饶州（鄱阳），入鄱阳湖可分两路：一路北上至九江，沿长江，可达沿海口岸海港，再输送日本、朝鲜；一路溯赣江而上，至赣州，再分两路：一路入闽至泉州，一路入粤至广州，后输往南洋。优越的自然条件是景德镇瓷业生产及其外销赖于发展的重要条件。

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然五代以前仅见文献记载。《浮梁县志》说："新平治陶，始于汉世"（景德镇原称新平，因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景德镇陶录》有"陶窑"和"霍窑"两处唐窑的记载。但据现有考古资料，尚未发现唐代及唐以前的窑址。在现已发现的窑址中，属早期的有胜梅亭、石虎湾、黄泥头等窑，其年代均为五代时期。湖田窑是宋、元两代著名的窑址，对其历史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由于制瓷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景德镇制瓷业自宋始有了长足的发展，至元代确立了全国瓷业中心的地位。当然这一发展始终包括外部因素的影响。

宋代景德镇窑创烧的青白瓷，代表着当时最高的制瓷水平。其产品色泽温润如玉，胎薄质细，花纹光照色影，可以映现，故又称"影青"。景德镇从宋真宗景德年间，奉命制瓷进贡，以产品精美而著称海内。北宋中期始，景德镇受北方定窑的影响，采用覆烧技术。由于这一新技术的采用，充分利用烧造空间，每一窑瓷器的产量等于支窑的四倍，而却能节约燃料四分之三①。南宋至元中期，景德镇窑曾普遍采用覆烧技术，使得生产率空前的提高，从而为当时迅速扩展的内、外销市场提供充足货源。元代，因北方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瓷业发展的重心开始从北方转向南方，北方窑工也大批的迁入，景德镇瓷业技术力量更加雄厚。而1278年（至元15年）在此设置的全国唯一的管理瓷业生产的机构——浮梁瓷局，无疑也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由于覆烧芒口器直接违反了日用器"适用性"的基本要求，故而入元以后，加上烧制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者实用要求提高，芒口器已不受欢迎，渐被淘汰。元中期经过改进的仰烧法就在景德镇制瓷生产中大为风行，因而采用此法烧制的枢府器成为当时销行最广的一种产品②。元代是景德镇制瓷技术极富创新并取得成就的时期，其主要标志：一是由于使用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使烧成温度提高，减少器物变型，因

而提高产量，并能烧制大型器；二是青花、釉里红烧成，拓宽了釉下彩及颜色釉装饰的新途径，并成为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这些创新对当时外销瓷亦产生重要影响。前者，使之能烧制满足中亚、西亚、东南亚地区等国的民族风俗、饮食习用和自身文化习惯的大型器；后者影响更具深远，元中期景德镇开始烧造青花器，至元后期，其产品很大一部分用于外销（元青花在国外出土比国内多可证明这一点），到明代成为我国外销瓷的主流。

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是产品在市场竞争优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东南沿海诸窑瓷器外销的优势在于地理位置的优越，那么景德镇瓷器外销的优势就是制瓷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自宋始，海外贸易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瓷器的外销。北宋对中原和南方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社会动乱不安的局面，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方面的进步，使远航成为可能。北宋初，为加强对外贸易和管理，开始在广州、明州、泉州、杭州设立"市舶司"。当时上述海港十分繁荣。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说："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中国瓷器就是从上述港口运销国外。至元代，海外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蒙古建立了跨越欧亚的帝国，东西方交通，出现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元朝建立后，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虽然逐渐独立，但仍然与元朝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元朝与亚、非、欧三大洲的各国普遍建立了多种联系。同时，元政府为增加财政收人，提倡、重视海外贸易，并采取一系列鼓励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元代瓷器外销空前地扩展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输到全世界"。可见外销之广。

二　景德镇宋瓷的外销

关于宋瓷的外销，宋·赵汝适的《诸蕃志》是部重要参考文献。书中记载用瓷器进行贸易的有十五个地区和国家，大致属历史上南洋的地理范围，即今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非洲的坦桑尼亚等七个国家。反映了我国宋瓷外销的广泛性。书中提到用于贸易的青瓷、青白瓷，可见青白瓷是当时主要外销瓷种。但其它有关瓷器的贸易情况略而不详，对瓷器的产地、输出地与数量都未有记载，失之没漏。目前，亚非地区不少国家陆续发现了大量我国宋代瓷器及碎片标本，其中包括景德镇青白瓷，弥补了文献的不足，也为我们了解宋代景德镇外销瓷有关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

日本、朝鲜出土大量的宋代瓷器，证实了宋代瓷器大量销往东亚。据资料表明在日本四十余县均发现宋瓷，其中以镰仓、佐贺、福冈等地出土最多。以青瓷、青白瓷为主，出土瓷器中景德镇产品占有较大比例。朝鲜半岛出土宋瓷中，最多的是景德镇的青白瓷[③]。东亚出土器物以盘、碗为最多，瓶、壶、罐、盒子、盆子、水注、经筒也有一定的数量。而碗、盘多为芒口。芒口器，日本称之为"秃口"。据报告"是十三世纪以后输入的，在口部边缘做成无釉的露胎覆烧碗碟，从全国各地都有出土，有不带花纹，也有用印花浮做出花纹的，不管哪一种都未曾见到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以前的编写资料"。[④]我国各地宋墓亦有不少此类青白芒口器出土，多属景德镇产品。景德镇窑在南宋及元都曾大量烧造芒口器，有镶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日本学者佐佐木达夫先生认为，十二世纪后期至十三世纪输入的中国陶瓷主要是以青白镶边芒口碗为代表，是日本国内各地发现最多的陶瓷之一[⑤]。我们认为，佐佐木达夫先生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南宋曾有大量景德镇青白芒口器输往日本、朝鲜，这大致与景德镇烧造时间相符。

景德镇宋青白瓷出土较多的还有其它几种品类：

青白瓷水注　典型的有福冈县出土的南宋青白瓷水注，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⑥这件水注为小口，口部有凸起的线条，圆体，泛青色的透明釉。这些特点与江西省南昌市塘山宋无名氏墓出土的青白瓷水注相似，由于该墓中还出土了南宋绍兴（1131—1162年）通宝，所以这件青白瓷水注年代可定南宋早期。⑦另滋贺县大津市收集的制作精致的青白瓷水注，⑧其形态具有景德镇宋代中期的风格。我国古代水注是盛酒、温酒之物，盛行于五代至宋，国内各地宋墓出土三十余件⑨。日本将水注作为盛骨容器，具有宗教意图，⑩在实用上表现出与我国不同的特征。

青白瓷盒　日本出土的南宋青白瓷盒，多数出于经冢之中，散布广，计有一百余件。⑪这种小型青白瓷盒多数于经筒之中而埋葬地下。盒子有多种形式，纹饰较丰富，盒盖的表面有菊花纹、花草纹、鸟纹、双凤纹、牡丹纹；⑫盒的底部往往印有款字。日本德岛经冢出土一件底部印有"□家合子记"五字，惜第一字已模糊不清。⑬南朝鲜也有此种宋青白瓷盒出土，⑭我国宋墓也出土不少。南宋盛行瓷盒与海外贸易发展及香料的大量输入有关，先是作为盛装香料之用，后也用于盛药，或妇女化妆用品。日本将其作为宗教器物，⑮从使用方式与型制看，可能是我国为其专制的。景德镇湖田窑发现此类小盒，其特征、大小差不多，多有"段家合子记"、"吴家合子记"之类的戳记。⑯因此，可以推断南宋时景德镇已有专烧供外销的小件器皿的作坊。

青白瓷梅瓶　我国宋代南北瓷窑普遍烧制，又称"经瓶"，是盛酒的用具。据报告，景德镇青白瓷梅瓶在日本各地均有发现，其数量仅次于磁州窑的产品。大宰府遗址和镰仓市区有大量出土⑰。

大量的宋代瓷器行销日本、朝鲜，反映了日、朝两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我国瓷器输往日本自唐以来就没有间断过，至宋代，瓷器成为日本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宋熙宁四年（1071年）日本僧人成寻入宋，在谒见神宗时，表述了在日本最需要的东西是香料、绵缎，茶垸。茶垸是日本称中国陶瓷的名称，⑱可见陶瓷输入开始以碗、盏为主，因为瓷器的出口，首先与饮茶有关。景德镇宋青白瓷水注、小盒、梅瓶多出土于庙宇附近的遗址，作为宗教器物，则表现出与我国不同的特征。陶瓷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其使用价值往往受到审美观念的影响，而审美价值又取决于各种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例如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把青白瓷当作宗教器物，这大概是出于青白瓷洁白晶莹，似乎最能表达出虔诚的心意的缘故。

相对而言，东南亚地区出土器物中宋青白瓷数量不大，主要有壶、瓶、盒、洗和碗等物，多为福建德化、泉州、广东潮安及广州西村等窑的产品。很多用途较特殊，在国内很少出土，说明东南沿海诸窑在开始就具有以外销瓷生产为目的的特征。同时，这些出土器物具有仿景德镇产品的特征，表明宋景德镇窑对当时东南沿海诸窑的外销瓷产生过重要影响。东南亚地区出土器物中能确定为景德镇窑口的不多，据报告："在西马来亚的莫尔包河口南边的布告巴林登也出土有景德镇及福建德化窑青白瓷印花标本"，⑲在菲律宾内河省出土的"一批出色的小酒杯，具有景德镇类型白釉和器胎，模压成简单的半圆形而不带卷口缘，外部有极矮的足，底略凹，未加工。杯口的釉刮净。⑳"

景德镇宋青白瓷在东亚地区出土较多，而东南亚地区较少，反映了景德镇宋青白瓷的海外市场主要是日本、朝鲜。为什么销往东南亚地区的较少呢？这是因为当时东南沿海诸省为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建立了众多瓷窑，如泉州的德化瓷系，南宋至元代的窑址共发现131处，

以生产青白瓷、青瓷为主。㉑对于瓷器外销来讲，不言而喻，它们更具有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赣粤之间的梅关古驿道自宋嘉佑八年（1063年）后因长年失修，致使"往往人驴俱仆，靡虬踶触，货随复败，殴争讼辨，卒至求珉废玉，主客俱困，公移紊烦。"㉒当时景德镇瓷器通过梅关古驿道，入粤至广州，销往南洋可能较少，而多数是通过长江，出海至明州，然后跨越东海，输往日本、朝鲜。

三　景德镇元瓷的外销

景德镇元代瓷器的外销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外销品类增多，即从宋代单一的青白瓷增至为青白、青花、枢府瓷、釉里红等多品种；二、外销区域扩大，即从东亚、东南亚扩展至南亚、西亚、中东以至远达东非的广泛区域，而这种扩展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与青花瓷外销有关。同时，从时间的发展顺序来讲，又可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中统至泰定元年（1260—1324年），约为元前、中期，以青白瓷外销为主；第二时期是泰定二年至至正末年（1325—1368年），约为元中、后期，这一时期是多品种瓷器的外销。

入元以后，景德镇窑继续烧造传统产品青白芒口器，只是由于海外瓷器市场进一步扩展，为追求产量、利润，其产品烧造质量普遍逊于宋时，釉层乳浊，刻、划花较宋代简单；刻痕虽深，但远不如宋时的精致。这类瓷器，大量见于朝鲜新安海底的沉船㉓。在这艘元代沉船中，共打捞出中国陶瓷器达一万八千余件，有龙泉窑、景德镇、建窑、吉州窑、赣州窑、磁州窑系、定窑系、南宋官窑、钧釉系的产品及一些窑口不明的粗瓷㉔。在沉船中有部分较精致的瓶、壶、枕和水注，其中较典型的器物与国内出土的景德镇青白瓷比较，多相吻合，亦是元景德镇外销瓷的实物佐证。例如《南朝鲜海底中国沉船瓷器图录》150（以下简称《图录》）"白磁龙文梅瓶"与1972年万年县石镇公社元泰定元年(1324年)墓出土的两件景德镇窑影青狮纽盖瓶；《图录》168、169元景德镇窑青白磁小瓶与1978年万年县收集的1件影青堆青剔花梅瓶；《图录》159元景德镇窑青白瓷阴刻牡丹纹瓶与1978年万年县出土元影青刻花琵琶瓶等㉕。这艘沉船中的瓷器，就数量、品种、窑口之多来讲都是前所未有的；该船前往的贸易地，可能不限于一国，因而是我国元代瓷器外销的重要实例。发掘资料中表明景德镇窑产品的数量在众多窑口的瓷器中仅次于龙泉窑㉖，其产品质量精粗并存，同样与元代景德镇窑烧造状况相符。

这一时期景德镇青白瓷不仅在东亚地区有大量发现，而且在东南亚地区亦出土不少。据报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均发现元景德镇青白瓷。菲律宾在八打雁、内河博利脑等地出土青白釉带铁斑的种类多样的小件器皿壶、瓶，"还有许多质地不同的具有骑在或躺在水牛身的孩子形式的水注"。㉗国内这类瓷器甚少。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小件青白铁斑瓷器在南朝鲜新安海域的元代沉船中亦有发现，日本尚未发现。㉘据此，日本三上次男先生作出推断："沉没的这艘船不只是以日本为目标来销售瓷器，也到与日本相连的冲绳，随后回航到菲律宾。"㉙我们认为，三上次男先生的这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这说明元代陶瓷贸易的中、朝、日海上航路已有了延伸，以此形成了东亚与东南亚相连的贸易圈；同时也说明其外销瓷在种类、器型、釉色上也有了特定的贸易对象。

有理由可以说这一时期景德镇枢府瓷已开始外销。南朝鲜新安海域元代沉船中的瓷器有一定数量的枢府瓷。其中碗、盘之类的小件圆器，采用内印花装饰，施卵白釉；大件瓶、罐炉等琢器，采用器外划花方法，施青白釉㉚。"有一件青白瓷瓶在风格上同江苏省青浦县出

土的一件枢府窑瓶(1338—1351年)极为相似。然而朝鲜发现的这一件青白瓷比我国发现的那件要早”。[31] 在日本也发现与此相象的产品，表现手法同元代青白瓷的制品和在初期釉里红一部分制品可以见到的刻划的花纹有共同之处。[32] “在广岛县尾道市有非常漂亮的完整的器皿出土，确凿证实了，枢府白瓷曾海运到日本过”。[33] 菲律宾也发现了枢府器“其中有一批器壁断面深圆或折角型的碟子，内侧饰有缠枝荷花，背面有枢府两字”。[34] 元代中后期景德镇湖田窑曾大量烧造枢府器，在其遗址的“南岸刘家坞的折腰碗和小足盘，足多外撇，内壁多印有‘枢府’二字，高足杯内壁的印花龙纹有五爪的。这类器物应为当时的官用瓷；北岸的造型上虽较相近，但是壁多垂直，内壁无款识，龙只为三爪、四爪，当为民用商品，在时间上晚于前者”[35]。枢府器首先是为元代军事上层机关人员烧造（枢府即枢密院），其浑厚、凝重的风格，符合蒙古民族的慓悍气质及审美情趣，后遂成为时代风尚，并伴随元朝政治影响的扩展，渐被周围国家、地区的民族所接受。因此，我们认为用于外销的枢府器的质量应当逊于官用瓷，而枢府瓷开始外销的时间也应在国内民用瓷销行近于饱和以后，即元代中晚期，约十四世纪初。

景德镇烧造青花瓷，是我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日本三上次男先生说：“是在美丽的白瓷釉下用钴釉描绘了有趣的故事、写实性的花草，以及复杂的蔓花纹等”。这是生动而贴切的描述。自元代景德镇窑创烧青花瓷后，青花瓷便为世人所瞩目，其产品远销国内外。青花瓷外销可以作为元代景德镇瓷器外销的第二时期的开端。这一时期景德镇青白、枢府瓷继续行销海外，然而由于青花器自身美观实用的特点，外销区域已扩大不少，表明它实际较之其它瓷的外销已渐居优势。

从国外出土情况，可以了解到元青花外销区域、数量的大致状况。

日本发现元青花是从1965年在冲绳连城调查时采集到大量的元青花的破片为开端，后在福井市郊区一乘谷的朝仓氏邸宅遗址也出土了元青花的碎片，这些碎片基本上都是壶、钵、大盘等大型的容器类。”[36] 较完整的有冲绳县读谷村的中世纪墓出土的“几乎是接近于完整的龙纹兽耳，”[37] 歌山县的根来等出土的“画有莲花池花纹小巧精致的嘴罐”。[38] 冲绳群岛出土大量元代瓷器包括青瓷、青白瓷、青花瓷。[39]

东南亚各地，尤其是菲律宾有大量的元青花出土。出土地点是在菲律宾群岛的苏禄群岛和宿务岛、棉兰岛。[40] 1968年在内湖遗址发现许多早期青花瓷，多为小件器，有小圆壶、罐、瓶、碗、碟类，其中碗碟类质地较为粗糙，“皂底完全按枢府款式或切割削”[41]；有一种画折枝菊花纹的双系小罐，造型与纹饰与湖田窑发掘品完全相同。[42] 此外，在贝湖出土三十六件左右的元青花、釉里红，均为小壶、方瓶和圆形盒。[43]

西亚、中东地区也发现了元青花。埃及首都开罗郊区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瓷器自七、八世纪至十六、十七世纪的标本一万二千件，其中“极其优美的元代青花陶瓷，在福斯塔特也发现数百片。”[44] 在伊朗的内沙布尔遗址的调查中，也发现有元代青花瓷；在波斯湾的巴林岛也发现元青花，其花纹以卷草纹、莲花纹为主。[45]

东非沿岸的一些国家，如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这些国家的沿岸港口城市和岛屿出土的中国瓷器确实惊人。坦桑尼亚基尔瓦岛的调查发现有中国的陶瓷，其中有十四世纪前、中期（元代）的凤凰卷草纹的青花瓷器。在肯尼亚的哥迪也出土了大量中国陶瓷，其中最精美的是用釉里红彩绘花纹的大瓶和龙纹的青花瓷器，这可能是十四世纪的制品。[46]

元代后期，随着海外陶瓷贸易市场迅速扩大，进一步促进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从湖田

窑址所发现的大量元青花器及碎片中，可以发现两类不同的青花瓷，一种在遗址南岸出土"以大盘为主，约占青花残器的70％，其盘的器底较厚，纹饰繁缛华丽，其中多有蓝地白花，和伊朗、土耳其的传世品一致，唯盘的口沿画蓝线的较少"。而另一种在遗址的北岸出土"则以高足杯、折腰碗、小酒杯为多，……，纹饰则简洁、疏朗、草率，和菲律宾出土的完全相同。经初步比较，南北两岸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都属于湖田窑元代后期的产品，但南岸的略早于北岸的"。⑨ 前者是烧造满足中、西亚贵族崇尚的饮食习用的大型器，可能为宫庭用瓷。这些精致无比、价格昂贵的大型青花可谓弥足珍贵的人间瑰宝。而后者为东南亚地区诸国民间用瓷。从当时景德镇烧造销往不同区域、适应于不同民族习俗、文化层次需要的青花器的状况，并结合青花瓷在国外出土的广泛性，我们认为元后期景德镇青花器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外销。

有关元代瓷器外销，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是一部重要参考文献。汪大渊在1330年到1339年，两次随商船出游诸岛和印度洋岸数十国，还可能到过东非，他随手记下见闻，回国后编写《岛夷志略》，于至正九年（1349年）成书。⑩ 书中记载我国瓷器输出五十几个地区，分别属于今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伊朗等国，并记载用于贸易的瓷器及贸易地。它们是：青白花瓷16处、青瓷15处、青白瓷3处、处州瓷5处，从以上可以看出青白花瓷贸易地分布最多。青白花瓷是否就是指青花瓷，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外出土的元青花瓷年代大多未能确立，因而难以说明在汪大渊考察之前元青花曾大量外销。但从时间上看这一时间正是青花器成长与发展时期，景德镇青花已开始外销是可信的。结合国外不少国家都出土元青花器或碎片这一事实更可印证《岛夷志略》记载的青白花瓷应包括青花瓷。那么元青花何时输出国外？从考古资料看，南朝鲜新安海域元代沉船中打捞出的一万余件中国瓷器，有青瓷、青白瓷、白瓷、黑釉瓷等，独未发现一件青花瓷。据考证该沉船年代大约1310年至1325年之间，也许更接近后者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艘沉船中发现枢府器，而枢府器在其产地景德镇湖田窑是和元青花器为同一时期出现的，只是产量极少。对遗址中的一个废品堆积清理，统计结果表明，青花残片仅占总废品的0.45％。⑩ 当然，在元代景德镇生产青花瓷并不只是湖田窑，何况目前对湖田窑址仅限于调查、试掘，尚未进行正式发掘，对遗址全貌并不完全清楚，这一材料仅能参考。但就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至少元泰定年前景德镇已开始生产青花瓷，当时尚属新产品，可能产量还少，不能提供大量外销。而成书于至正年间的《岛夷志略》却已有记载。综合上述，景德镇青花瓷的外销大约始于元泰定二年至至顺元年间，即公元一三二五年至一三三〇年之间。

---

① 《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复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74年第6期。
② 《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文物》，1980年第11期。
③ 参见《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④ 〔日〕矢部良明《中国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资料》第三辑。
⑤ 〔日〕佐佐木达夫《日本海的陶瓷贸易》，《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
⑥ 同④。
⑦ 江西省博物馆《文物工作资料》，1959年。
⑧ 同④。

⑨ 《中国陶瓷史》.
⑩ 同④.
⑪ 同⑨.
⑫ 同④.
⑬ 同⑨.
⑭ 《中国古代瓷器外销》，《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⑮ 同④.
⑯ 《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文物》1980年11期.
⑰ 同④.
⑱ 同④.
⑲ 同⑨.
⑳ 〔英〕艾迪斯《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
㉑ 《泉州的海外贸易和陶瓷输出》，《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一辑.
㉒ 《大余县志》，民国版.
㉓ 同⑯.
㉔ 〔南朝鲜〕郑良谟《新安海底的陶器及其问题所在》，"新安海底打捞文物"国际讨论会讲演稿.
㉕ 《宋元明时期江西古外销瓷初探》，《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3期.
㉖ 同㉔.
㉗ 同⑳.
㉘ 〔日〕三上次男《元代陶瓷器和南朝鲜新安底发现的新资料》，《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资料》第三辑.
㉙ 同㉘.
㉚ 同⑨.
㉛ 〔南朝鲜〕郑良谟《新安海域中国瓷器编年考察》，《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资料》第一辑.
㉜ 〔日〕长谷部乐尔《日本出七元明陶瓷》，《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资料》第三辑.
㉝ 同㉜.
㉞ 同㉘.
㉟ 同⑯.
㊱ 同㉜.
㊲ 同㉜.
㊳ 同㉜.
㊴ 同㉘.
㊵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
㊶ 同⑳.
㊷ 同⑨.
㊸ 同㉘.
㊹ 同㊵.
㊺ 同㊵.
㊻ 同㊵.
㊼ 同⑮.
㊽ 《中国通史》第七册，人民出版社.
㊾ 〔英〕约翰·艾尔斯《新安海域发现的中国元代沉船》，《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资料》第一辑.
㊿ 同⑯.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

张浦生　胡雅蓓

随着我国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景德镇瓷器从宋代开始就作为重要出口商品运销国外，而名闻遐迩的青花瓷器，则自元代后期起跻身于外销行列，它历经明、清两代，直至今天，久盛不衰。

景德镇元青花是我国民族陶瓷工艺品的优秀代表，不但品种众多，造型别致，而且艺术构思独特，它的装饰纹样尤其引人注目，从整体布局到绘画题材都独具风采，因此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特别是在亚非一带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更把它视同珍宝。

本文将就景德镇元青花发展的社会条件、艺术成就、外销情况及其影响谈些粗浅认识，乞望大家指正。

一　社会条件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崛起，至1279年忽必烈覆灭了汉族在南方的赵宋政权，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土地。元朝历史虽短暂但在景德镇陶瓷史上，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特别是异军突起的青花瓷在元代中期烧制成功，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元代，景德镇瓷业受到朝廷大力重视，这不仅因为景德镇地处皖赣边区，战争侵扰甚少，社会经济相对比较安定；更由于其"水土宜陶"，特别在制瓷技艺上能博采众长，产品自宋以来即以制作精美、品种齐全而名扬天下。因此，在1278年（至元15年），元代统治者把全国唯一的一所管理瓷业生产的机构一浮梁瓷局，设置在景德镇，这在当时中国的许多瓷区中是绝无仅有的。《元史》卷八十八记载："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瓷器。"浮梁瓷局的设置，和当时国内外对瓷器需求量的激增，从客观上刺激、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当时景德镇瓷窑已有三百多座，产销盛况空前。蒋祁在《陶纪略》中谈到"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拣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川凭商筹，谓之非子"，可见当时运销状况之一斑。

为了发展瓷业，元代统治者对具有一定技术的工匠及特种手艺者很重视，规定免除官匠一切差科，特别是对他们的技术实行"世袭制"，这样既可使生产专一化，又可为制作技术的发展和特种工艺后继有人提供有利条件。但统治阶级实行的是"工奴制"，工匠们大多被迫在官办工场工作，无人身保障，更无"去""留"的自由。

与此同时，元政府意识到：大力发展瓷业，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对元朝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良好途径。因此，元政府从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但提倡、重视对外贸易，并采取相应措施，如建立港口外销管理机构等。《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六载："帝既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至元十四年，1277年）始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孟古岱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司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

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与此同时，政府还派遣使团（或使者）到海外去劝诱外商。他们曾到达东南亚一带，邀请各国商人前来贸易，并采取一系列奖励办法，如执行23条的“市舶法规”等，以鼓励外商。在政府大力提倡下，整个元朝的海外贸易（包括民间贸易）都十分发达，瓷器外销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较之宋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和提高，国家经济呈现繁荣兴旺的局面。为开辟货源和适应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的需要，作为景德镇新兴产品之一的青花瓷器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成为外销的主要品种。

二　元青花的艺术成就

景德镇元青花上使用的青花（钴）料，有进口与国产料两种。进口料发色鲜蓝、艳丽，采用影青作罩釉，纹饰精致、奇特，构图严谨，讲究层次，笔法工整。这类产品看来当系浮梁瓷局烧造的高档产品。他们的体积一般较大，如大盘、梅瓶、玉壶春瓶、各类罐（直口、洗口）等。浓重的青料、豪放的纹样、莹澈的釉色同硕大的器型相得益彰，构成了气势磅礴的所谓元“至正型”青花瓷的特色。这类作品外销的地区有中东、西亚以及东非一带，日本、印度次之，其中尤以土耳其和伊朗的收藏最为量多而质精。

国产料发色灰淡，一般施以乳浊的卵白釉。所绘的纹样构图疏朗，笔法淳朴、粗犷，不事雕琢，以小件器（如小罐、小碟、高足杯）等为多，当为普通民窑生产的日常用品。这类作品保存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和印度也较多。

浮梁瓷局烧造高档产品的青花料，当时是从西亚进口的。因为元代的将作院和所属浮梁瓷局里，曾有大量的西亚工匠（他们均是蒙古在征服伊朗、阿富汗和中亚阿姆河西南等地区时获得的“浮匠”），① 通过他们以及当时和西亚等国的贸易，我国瓷器上进口、使用西域青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关于元代进口、使用青花料的情况，在日本学者久志卓真《明代中国瓷器》一书中曾谈到过“……钴土的输入不是在元末，而是早在唐代就有输入，用于唐代蓝彩及唐三彩。至唐末五代，因连年战争，交通阻塞，来源逐告断绝，到了元代，钴土输入又恢复，曾被用于其他用途，到元末才又被用于陶瓷的釉下彩绘”。

青花瓷器作为景德镇的新型产品之一出现在国际贸易市场时，特别引人瞩目。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新兴产品，以崭新的姿态跨入国际市场，更可能是被它那“华然落尉，辉于釉下”的艺术魅力所吸引。时至今日，世人只要一提中国瓷器，便会想到青花。美国旧金山文化中心负责人吴定一来景德镇考察时，谈到了青花瓷器在国外倍受垂青和重视时说:人们把青花誉定为中国瓷器的“国花”。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美食不如美器。”青花瓷器的艺术效果，令人神往，它那色白花青，无含铅之虞的实用价值更为世人推崇，“若肴馔，则素瓷、青花白质瓷为佳。”② 青花瓷自大量出现以来，能在这么广阔的世界上，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赢得众多的崇拜者，说明艺术的魅力，只有艺术效果和实用价值相统一，才能产生、才能升华，才能拥有不为时间和空间所限的生命力。

三　外销情况及其影响

我国青花瓷器的大量输出是在元代，不仅在东南亚各国，如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近东地区如：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即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埃及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而且在东非和欧洲各处都有发现和收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萨莱（Saray）博物馆和伊朗的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元青花瓷器最丰富的两个博物

馆。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的一个海滨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扼黑海出入门户，不但是欧、亚、非三大洲交往的会合点，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站。因此，古代不少欧洲商人来到这里进行商品贸易，购买中国的瓷器、丝绸等物。土耳其王国的宫殿里同样搜集了许多中国的各类珍品，特别是瓷器，一直流传至今，致使伊斯坦布尔的萨莱博物馆，成为世界收藏完整元青花器最多的一个博物馆。"当你走进陈列室，展现在眼前的是十三世纪后期的南宋至元、明时代的各种类型的漂亮青瓷，也有让你不由得瞪目惊视的色泽及造型美观的十四世纪的元代、明代初期的青花瓷大碟和钵。完整无缺的元代青花瓷在世界上是为数不多的……。"[③]据日本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先生说，元青花在海外，大约只有两百件左右，而萨莱博物馆里就陈列着八十件元青花大盘和钵等。其上以极工整而又悠然的笔触画着牡丹、菊花、松、竹、芭蕉、瓜果、池塘游鱼、山水、人物，以及象征权势而又寓意吉祥、幸福的麒麟、凤凰、龙等动物纹样。这类作品即是如前所述的采用影青作底釉、以进口青料绘画、发色鲜蓝、纹饰精致、价格昂贵、畅销海外的"人间瑰宝"。这类作品在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里也陈列着二十七件，一统是质精器大的，"同伊斯坦布尔托卡普沙莱博物馆性质相似。"[④]这些元代青花瓷，器型有梅瓶、钵、大盘等等。"形状大方，姿态优美，色彩和图案都很精致，给人以庄重之感。……在花纹方面，有中东外的其他地方所不能见到的……"。[⑤]在景德镇元青花中，很多大件的器型和纹饰都是为了适应外销需要而生产的。如常见的菱花口、圆口折沿大盘，就是当时输出的主要品种之一，现留存在土耳其、伊朗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为数颇多。它的作用正如明代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中所谈及的："国人……用盘满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皆以大盆盛姜黄色而富于香味之饭肴，置于敷在地上之席中……以手撮而食之。"[⑥]由此可见，这类大盘是适应了当地人民吃"抓饭"风俗的需要，专为外销而烧制的。它的出现和使用，改变了至此以前当地人民用粗糙的竹木、树叶等作餐具的陋习，取而代之的是美观、耐用又漂亮的瓷质大盘。因此，青花瓷器的外销，不但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为中外交流作出了贡献，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它对推动和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亦起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在与非洲东海岸相隔两里的基尔瓦岛都市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十四世纪前、中期描绘着凤凰、蔓草花的青花瓷（多为残片）。完整器有：云龙荷叶纹梅瓶，凤、麒麟纹玉壶春瓶，麒麟花卉纹碗，凤穿花纹执壶[⑦]。在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中曾发掘出土约六、七十万片瓷片，其中中国陶瓷片约达一万二千片，不但量大，而且质精。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元代青花瓷。"在整洁纯白的瓷器面上，用鲜艳的钴蓝色画上花纹和鸟兽纹或风景、人物等图案的景德镇青花瓷……在福斯塔特也发现有数百片。"[⑧]在埃及发现元青花瓷碎片的地方还有阿伊扎布遗址、开罗东端的提勒盖特埃勒马拉遗址、巴布达尔布埃勒马哈尔科遗址、库赛尔城的奥尔德库赛尔遗址等。

景德镇元代生产的青花瓷器，除了如上所述的纹样工整、器型硕大、采用进口料绘画的一类以外，还有采用国产料绘画、纹饰简单、布局疏朗的一类作品。后者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遗存较多，其次是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纹饰有："外部画缠枝菊，内部是绕边的任意的螺旋形、古式卷纹，碗心折枝菊花等"，"装饰都是很迅速地一笔勾成，最普通的主题是菊花叶侧向左轻描两三笔，令人有'风拂'之感，花瓣则经常勾轮廓，花心呈螺旋形式或偶尔划成井字形……器型有荷叶形盖小罐和有环的立壶、方壶、小壶、葫芦形壶"[⑨]等一些小件器

皿。菲律宾出土的青花瓷器在湖田窑中均有发现，特别是其中一种画折枝花纹的双系小罐，其造型和纹饰同景德镇湖田窑发掘品完全相同⑩。可见，这类青花器系湖田窑烧造，时代为元代后期。

三上次男先生在《陶瓷之路》中，谈到他1967年8月偕同美国华盛顿弗里亚美术馆馆长约翰·波普先生，参观菲律宾阿南巴明冈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时的情形时这样写道"一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装饰在入口前廊那漂亮的元、明时代的青花瓷。相当多的壶、钵、碟之类，随便地装在好几个柜子里，其中既有优美的附绘和发色的陶瓷，也有带盖陈列着用有力的线条描绘双龙图案的大青花四耳壶，……我被这些收集品给迷住了。"

除菲律宾外，在东非的格帝城，发现有十四世纪非常漂亮的元代绘龙青花瓷；在东非的沿海地带有十四世纪元代青花瓷器，纹样相当独特，可能是特意为其定向加工的；在东非肯尼亚的大港一蒙巴萨，也出土了元代绘龙的青花玉壶春瓶（残）；在阿拉伯半岛，接近沙特阿拉伯国境的扎哈兰、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的巴尔贝克遗址、叙利亚的哈马、印度东部阿萨姆邦的城市高拉蒂，都发现了元代（主要是元代后期）的青花瓷残片，那上面都描绘着流畅的花草图案等。另外在伊朗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博物馆里也有元末明初青花瓷的大碟、梅瓶及钵等。在邻近中国的日本，自镰仓海岸发现元青花瓷片以来，最近几年又陆续在冲绳胜连城址、冲绳岛内、越前朝仓氏的乘谷遗址中发现了比较完整的元青花瓷器和传世的青花瓷器。

阿曼是古代阿拉伯地区向中国出口香料的主要国家，在它那里也保存有元代洗口青花大罐。

由此可见，元代是中国瓷器外销最活跃的时期，青花瓷器的大量输出，对一些国家的宫廷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文化艺术、经济贸易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人们把它收藏和陈列着，让后人永远追忆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在东非的伊斯兰教地区，景德镇的青花瓷和龙泉青瓷一起，被用镶嵌于宫殿、寺庙的墙壁、天花板以及柱形墓标上，视同镶嵌珠、玉、宝石，成为永久、不朽的纪念物。

瓷器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数千年来，它不但满足了国内人民的需要，而且通过大量外销，同世界各国开展了友好往来。景德镇的青花瓷器，青肌玉骨、沉静典雅，带有东方民族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世人在以高价（古代瓷器和黄金等价）购买的同时，还千方百计进行仿制，其中仿制的最早、最多的是日本，还有越南、德国、法国、丹麦和意大利等国家。但由于原料成份、配方以及艺术手法、烧成条件等一系列因素有所不同，虽然有不少仿品花纹雷同，但终"貌似神异，"缺乏东方民族的风格，远达不到景德镇青花瓷那古朴大方而又幽靓雅致的艺术效果。但在此过程中，仿制品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它们和景德镇的青花瓷一起，成为各国人民普遍使用的日常器具和观赏用品，它丰富了世界人民的文化生活和艺术修养，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仍然十分显著并举世公认。

四　文献记载的景德镇元青花外销

我国最早记载元青花外销的史籍，是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它是继宋·赵汝适《诸蕃志》之后又一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与我国瓷器输出的重要文献。

汪大渊，江西南昌人，他不但是位旅行家，还是个了不起的航海家和博物学家。他两度"附返东西洋"——1330年（即至顺元年）前后，第一次出海，大概到1334年秋间才回国，历时五年之久；三年后，（1337年，即至元三年），他二十八岁时再次出海，至1339年返回。

所到之处，东起澎湖、文老古，西至阿拉伯与东非海岸。《岛夷志略》是他1349年（即至正九年），在福建泉州写成的，记述的均是其亲身经历的史实，真实可信。书中明确提到青花瓷交易的地方有：青白花碗(三岛、丹马令、戎、东冲各刺、爪哇、加里那)；青白花(磁)器（苏洛鬲、丁家卢、喃啞哩、小唄喃、朋加剌、天堂、天竺、甘埋里、乌爹）等，总共十五处之多，与今天考古发现亦比较吻合，故它对我们研究景德镇元青花外销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结束语

中国的青花瓷器，自古以来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特别是元代的青花瓷，作为国内外人们喜爱的外销品种，自元代始大量输往海外，当时虽然处在初创阶段，但从中国古陶瓷外销史来看，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是我国瓷器对外输出和影响的一个巨大变化，尤其是它为景德镇明、清时期青花瓷器的对外传播，特别是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下西洋开辟横渡印度洋、通往非洲东海岸的航线后，所进行的规模更为宏大的对外贸易和交往奠定了基础，起到了有益的先驱作用。

从世界各地珍藏至今的元青花瓷中，我们看到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缩影，它们是中华民族古文化中的一份珍贵遗产，不但可以弥补某些史料的不足，开扩人们的眼界，而且为研究十三世纪中叶——十四世纪初，中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贸易往来等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元代青花瓷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产生的影响，辉映着祖国文化的昨天和今天，多少年来，依然熠熠生辉，这颗祖国古文化宝库中的灿烂明珠，定将永久放射其耀眼的光芒！

---

①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②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
③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访东西文明的接点》。
④ 同③。
⑤ 同③。
⑥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
⑦ 马希桂等《基尔瓦出土的中国瓷器》。
⑧ 同①。
⑨ 英国J·m·艾迪斯《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
⑩ 刘新园、白焜《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

大都城的青花瓷及元青花瓷外销

刘树林

青花瓷是我国绚丽多姿的古代陶瓷品种之一。青花瓷以它实用价值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结束了我国瓷器以单色釉为主的历史阶段，把人们使用的瓷器推进到白瓷彩绘的时代。青花瓷是用氧化钴为着色剂，在瓷器胎体上直接描绘后，再罩以明澈釉汁，经高温还原焰烧成白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由于它具有色调明净、纹饰素雅、色彩经久不变等特点及纹饰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风韵，成为我国最有民族特色的瓷器，并闻名于世。

中国青花瓷器，远在唐、宋即已萌芽，从出土的元代青花瓷看，其制造工艺已相当成熟。由于元、明、清以来有关瓷器著作中，对元代青花瓷的记载多语焉不详，因此，研究者只能从史籍中的片言只语中，获取点滴朦胧而空泛的认识。大都城内青花瓷不断发现，补充了史料的不足。元代青花瓷在整个青花瓷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日益显露出来。本文试对馆藏的大都城出土及传世的元代青花瓷略作介绍，就其特色及其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谈些粗浅看法，并对元青花瓷的外销一并略作论述。

一

大都城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有：

青花觚　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窖藏出土。瓷觚为元代人民插花之用。这件青花觚高15.2、口径7.6、底径6厘米。侈口、腹部出四戟，白胎砂底，釉色白中闪青，器身分别绘有卷草纹、蕉叶纹、菊花和莲瓣纹，制作精致。该器与1962年北京市新街口以北明代城墙下出土的元代青花觚图案、造型均相似，只是大小有别③。

青花梨形壶　北京安定门外煤厂遗址出土。高10.6、口径2.8、底径4.8厘米。壶身为梨形，下腹圆鼓、平底、无盖。壶的下腹安一管状流，流的口沿大致与壶的口沿相平。另一端为曲柄，柄上端有系绳的纽一个。胎骨坚硬洁白，釉质细润，釉下用青花绘莲花图案。流和曲柄也用青花作装饰。青花颜色浓重，釉色白中闪青，这种造型在元代青花瓷中很少见。

青花龙纹残盘　北京旧鼓楼大街豁口东窖藏出土，四件。一件高3.7、口径13.4、底径7.8厘米；一件高3.6、口径13.4、底径8.1厘米。以上两件均已复原。另两件：一件底径7.9厘米；另一件高3.9、底径8.1厘米。盘外部饰以缠枝番莲，器内壁画缠枝牡丹，盘心为三爪戏珠团龙图案。中间以三道线纹相隔，青花颜色具有典型的苏泥勃青料特点，浓处成堆，抚摸之有凹陷不平之感。圈足，胎质细腻、釉色光亮。这四件青花盘，造型、纹饰相同。虽已残破，但仍不失元代制瓷工艺之水平。

青花大盖罐　1961年北京德胜门外出土。通高66.5、口径25.7、腹径47厘米。盖作荷叶形，盖沿的荷叶边曲线起伏平缓，盖上加宝顶。侈口，圆唇，肩腹较鼓，下腹瘦，底足外撇。通体以十七层不同花纹做装饰，胎体洁白坚硬，青花烧的不够成熟，但花纹生动活泼，反映出元代制瓷工艺水平④。

青花大碗　1970年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窖藏出土。碗高9、口径18厘米。深腹、圈足、白、胎胎壁绘缠枝番莲、莲瓣纹和三爪戏珠团龙。青花颜色浓处成堆，似铁锈斑，为典型苏泥勃青料③。

青花凤首扁壶　1970年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窖藏出土。高18.5厘米，小口短颈，腹身为扁圆型，浅圈足呈喇叭状。以凤头作流，凤尾卷起作柄。颈部饰青花回纹，在壶的上部用青花勾画凤身，下部绘缠枝花卉，青花颜色浓艳，造型奇特，制作精巧④。

青花盏托　1970年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窖藏出土。盏的口径为10厘米，盏里分别绘有卷枝花纹、缠枝石榴花和海棠花；托盘径12厘米，高圈足，盘里绘缠枝石榴花，外部绘宝相莲花瓣，充分表现绘画的技法⑤。

青花葵花盘　1970年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高1.7、口径16.4、底径13.4、盘深1.5厘米。盘沿作成葵花形。浅腹、平底、胎体洁白、质薄坚硬，白釉泛蛋清色。盘心用青料绘松、竹、梅配成的图案。花纹精美，给人以轻巧活泼之感⑥。

此外，传世的元代青花瓷有：

青花瓷莲纹匜　1984年中国文物总店拨交。匜是元代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之一。这件器物高4.4、口径13、底径8、流3.5、流宽2.2厘米。平唇、口微敛，腹部稍鼓，口沿一侧安有长方槽状流，流下装饰一小圆系。平底，口沿和底部露胎处，均见有"火石红"。器底部有黄土浸蚀痕迹，当为出土文物。胎质细腻坚实，釉色白中闪青，光润透亮。器内底用青料描绘莲花一束，在器内壁饰卷草纹一周，器外壁绘有变形莲瓣纹，瓣内再绘云头纹，青花色浓处有深色斑点。这种匜与1974年4月北京昌平县元墓出土的元代影青瓷匜大小式样均极类似，只是釉色有别⑦。此器造型别致精美，纹饰工细大方，为元代青花瓷中的精品。

青花玉壶春瓶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54年入藏。高29、口径8厘米。侈口圆唇，长颈斜肩，下腹圆鼓，圈足，胎质细腻，白釉泛青。颈部饰缠枝花卉，颈下饰锦纹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鸳鸯游戏在莲花水塘里，器身下部绘有卷草纹和变形莲瓣，足部饰重叠覆莲，花纹图案布局严谨，给人以生动爽利之感⑧。

以上介绍的几件元代青花瓷器，笔者认为均似江西景德镇所造。元代景德镇所以能烧制成色调优美的青花瓷，一方面是景德镇制瓷工匠在长期的陶瓷生产中创造了在瓷石中加进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新技艺，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减少变形，因而能烧制出质量很高的大型器物。如青花大盖罐，造型雄伟，体重达51.5斤，反映了元代制瓷技术的新水平；另一方面亦与当时的客观条件有关。元代，国内市场的统一、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元政府对于有一技之长的工匠特别重视，将其登记入户，并免除其一切差科。文献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春，宋降。……籍江南民工为工匠凡三十万户，惠选有艺业者仅十万户，余悉奏还为民"⑨。"国家初定中原，制作有程，乃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⑩。"系官诸色正匠，并改色人匠，见（现）入局造作者，依旧充匠，除差"⑪。这些"工匠"、"人匠"，包括制瓷工匠。至元十五年，又在景德镇设立了官办的制瓷机构——"浮梁瓷局。"⑫这些都为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造型来看，大都城元代青花瓷，器形丰富新颖，既保留了元代以前的风格，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器型归纳起来有罐、瓶、盘、碗、壶、觚和盏托等各种式样。其造型之优美，反映出元代青花瓷器的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1970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青花凤首

扁壶，它的造型既吸收了晋唐天鸡壶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马蹬壶的扁体造形，极巧妙地将二者结为一体，使之在扁圆的腹体上，以壶的流塑成凤鸟头，用壶的柄构成凤尾，配上用青花勾画的凤身，绘成展翅飞翔的凤，造型奇特精致。又如1970年北京旧鼓楼大街元代窖藏中出土的青花瓷觚的造型，在保留青铜觚那种小腹、长身、细腰、侈口及口和底部都呈喇叭形的造型风格外，对传统的式样做了大胆改进，创造了四边出戟花觚这一新品种，且为后代所继承。再如1954年北京文管处入藏的元代青花玉壶春瓶，虽然具有宋代颈部瘦长的特点，但口沿外翻，圈足微外撇，以变化的弧线构成柔和、匀称的瓶体，使造型更臻精美。此外象青花梨壶这一元代瓷器新品种和具有元代青花瓷典型特征的葵花口薄胎浅沿平底盘，为明清两代瓷器造型风格奠定基础。从这些器物看，元代青花瓷造型并不是单纯向人们所说的那样粗大、厚重。实际上，随着青花釉下彩的出现，其造型已是相当考究了。

从花纹图案来看，大都城发现的这些青花瓷的纹饰，都具有元代青花瓷新颖、繁密的特征。如：牡丹、莲花、松、竹、梅、菊花、番莲、龙凤、鸳鸯、回纹、云头、卷草、蕉叶、莲瓣、云肩、变形莲瓣、缠枝花卉等，都是元青花中常见的纹样。其装饰特色是画面复杂，纹饰层层相接，并有主、次纹饰之分。德胜门出土的青花花卉纹荷叶形大盖罐，器身主题纹饰为十二种花卉组成的图案，其上下绘有十六层不同纹饰用以衬托。由于纹饰主次协调，处理得当，并不给人以琐碎和堆砌之感。再如北京文物管理处入藏的青花鸳鸯玉壶春瓶，腹部绘饰在莲花盛开的水塘中游戏的鸳鸯，形象生动，画面直中有曲、静中有动，显得颇有生气和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元青花纹饰题材丰富，取材校广，较之前代的装饰图案有了新的发展。这样的纹饰经常在明清陶瓷上出现。

从青花料来看，元代青花瓷器所用的青料分进口和国产两种，形成烧制后的青花瓷器呈色的差别。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景德镇湖田窑青花瓷残片所作的化学成份分析表明，进口青花料含锰量极低（MnO/CoO为0.01—0.06之间），含铁量较高（Fe_2O_3/CoO为2.21—3.02之间），且含有砷，与国产青料含锰量高（MnO/CoO为3.74—16.19之间），含铁量低（Fe_2O_3/CoO为0.11—3.74之间）的测定数据截然不同⑬。明王世懋《窥天外乘》：“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明《遵生八笺》也有“宣窑之青乃苏渤泥青也，后俱用尽，至成窑时皆平等青矣”的记述，说明宣德时期青花瓷原料为进口的苏麻离青。上海硅酸盐所又对元、明宣德年间的青花瓷片标本测定（见附表）⑭，结果是氧化钴的含量与氧化锰的含量相近，而氧化铁的含量则很高。这说明元代景德镇青花瓷与明宣德的青花瓷器所采用的青花料为同一种进口料——苏麻离青。这种进口料绘画的青花色泽浓艳，釉面有铁锈斑式的黑色斑点，形成了元青花瓷独特的风格。如元大都出土的青花扁壶和青花大碗，青花色彩艳丽具有晕散现象，色浓处用手摸有凸凹不平之感，就是这种进口青花料的呈色。国产青料的青花则色调淡雅悦目，没有黑色斑疵，纹饰比较简单草率，多用于民间或小型器物。从大都城的元代青花瓷和上海硅酸盐所对元、明青花瓷片标本测定也说明，使用苏泥勃青料，并不是从明宣德年间才开始。所谓“苏泥勃青料为明初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引进”的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在元代这种青花料已作为青花的着色剂而问世。

元代青花瓷烧制成功，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结束了元代以前我国传统瓷器以青、白、黑釉为主的局面，开创了明清两代釉下彩瓷及颜色釉的先河。此后烧成的色调别致的“五彩”、“斗彩”瓷器，造瓷技艺达到了辉煌的境界。所谓“五彩”，是在烧成

的白釉瓷上，以青花构成整个画面中的一种颜色，然后绘以红、黄、褐、绿、紫等彩色花纹图案。在“彩炉”中二次焙烧而成，给人以浓翠红肥之感。1964年北京出土的明万历五彩人物洗⑬，反映了明代制瓷彩绘的表现能力。“斗彩”，据《南窑笔记》载是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的一种装饰品种。先在胎上画好图案的青花部分，罩上白釉，入窑经高温焙烧，用红、绿、黄、褐等彩料在青花轮廓线内填绘，再经烘烧而成。1962年北京德胜门外出土的成化斗彩葡萄杯⑭，杯外壁釉上用彩色绘葡萄赖瓜纹，釉下青花勾线。其装饰既柔和清雅，又娇艳秀丽，是明代彩瓷中的精品。明代青花瓷在元代青花瓷基础上，颜色釉、图案花纹、造型等方面都已非常完美。此时青花瓷在配料上采用国产青料与进口青料相结合绘制在同一器物上，使其更为出色。馆藏的一件宣德青花双龙淡海水暗龙高足碗，由中国文物总店拨交。高10.5、口径15.8厘米；撇口，高足；瓷胎洁白，杯身外部用进口青料绘以浓艳凶猛的龙纹，龙身雄健有力，配以国产料绘成淡青波涛纹，使构图更加生动紧凑；器足绘有山峰和海涛地纹，碗内壁有暗龙两条；碗心用青花写成“大明宣德年制”双行竖列六字楷书，围以双圈；器型线条流畅，造型优美。青花浓淡自然的色调，显示出宣德时期青花瓷特有的艺术效果。这些成就都是在元青花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没有元代青花瓷的成就，也就没有明清时期彩瓷的高度发展。

附表：

编　号	时 代 和 品 名	青花的MnO/CoO	青花的Fe_2O_3/CoO
Y—1	元青花大盘碎片	0.01	2.45
Y—2	元青花碎片	0.05	2.70
Y—5	元大都青花碎片	0.02	2.21
M—6	明宣德青花碎片	0.68	2.50

二

元代青花瓷具有上述的精湛工艺水平及优美造型，不仅受到国内人们的喜爱，还随着元代中、晚期海外贸易的发达，远销海外诸国，受到国外人们的欢迎。

元代海运发达，同东南亚地区商业交往开始增加，青花瓷随之输出。首当其冲的是东南亚地区。“三岛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此处的三岛，据考为今菲律宾；“丹马令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丁家卢货用青白花磁器……”、“戎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东冲各剌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苏洛鬲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龙牙犀角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之属。”据考，丹马令、丁家卢、戎、东冲各剌、苏洛鬲、龙牙犀角等，均在今马来西亚境内。“爪哇，货用……青白花碗……”、“喃哑哩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之属”。此处之爪哇、喃哑哩，均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朋加剌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朋加剌为今之孟加拉国之地。“小呗喃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天竺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乌爹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此处的小呗喃、天竺、乌爹，均在今印度境内。这些材料说明：元中、末叶外销的“青白花瓷器”在东南海中达到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各国之

地，并且沿海西航直到孟加拉、印度的一些地方。

元青白花瓷器也通过陆路向西远销。“天堂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加里那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甘埋里去货……青白花器、瓷瓶……”。据考证，天堂为今沙特阿拉伯之地，加里那、甘埋里，在今伊朗境内。（以上所引材料均据《岛夷志略》）

上述元代海、陆路远销各国的“青白花器”，是否即为“青花瓷”，一向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一、浙江省杭州出土的1276年的三件观音像、江西省九江元延祐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塔式盖罐及后来发现的四件公元1338年所制的青花釉里红瓷器⑩已说明此时元代已有青花瓷器的生产；二、《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在他二次出游南洋诸国时，远涉今之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均有“青白花瓷”的记载。且其《岛夷志略》中所记，也认为“青白花瓷器”与“青白瓷”不是一者而是二者，故其“青白花器”似即为青花瓷器；三、近些年东南亚考古发掘的出土材料中证实，菲律宾曾出土过元代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其时代为元朝后期，这也可印证汪大渊所记的“青白花器”即为青花瓷器；四、近年日本的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元代青花瓷器及瓷片（如冲绳胜连成遗址及日本本土的越前朝仓氏乘谷遗址），说明元青花瓷不仅远销东南亚，也东航到日本、琉球群岛各地。这些都较充分地说明了汪大渊所记元末青花瓷外销是可信的。同时，他所记“青白花器”当为青花瓷器。

元代外销的青花瓷，其窑口以江西景德镇为主，也包括东南沿海地区瓷窑。其外销是经西北陆道和东南沿海的泉州、庆元、广州三市舶司远销日本，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伊朗等国家。

元末外销青花瓷的海上路线及所至国家：

日本　元末与日本贸易，主要由庆元（今浙江宁波）港进行。中国赴日贸易货船从庆元出港东航，可抵达日本平户岛；日本货船来中国亦在庆元港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进行贸易。赴日货船及前来贸易的日本货船都可运载青花瓷到日本、琉球群岛等地。

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这三个国家位于东南亚海中，是南洋岛国。远在宋时，南洋各国就与中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到了元代，这种来往仍不间断。“三岛国（菲律宾）近琉球，人民时有至泉州为商贾者”⑪。说明泉州为对南洋贸易的港口。《梦粱录》也说：“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海。”此处“外国”，应不仅指菲律宾，也应当包括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诸岛。航线为自泉州南行转东，至菲律宾再转南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各地。

印度、孟加拉　元前及元代，中国与印度及孟加拉等地的交往，一为陆路，自中国西南部通向孟加拉（印度东北方）及印度；二为海路，亦是从泉州等口岸出发，向南航行再西转，到达印度及孟加拉地区。但元代与印度及孟加拉的贸易，多走海路，因印度半岛南部马八儿、俱兰两国是波斯湾通往中国必经之地。据记载，当时中印间的交通，多由中国海船承担运输，大船可至十二帆，每船可载千人。其航海路线为：自泉州（或广元、广州）出港向南航行，经越南、泰国海面至新加坡南面转再北航至孟加拉湾达印、孟地区。

元代外销青花瓷内陆路线及所至国家：

沙特阿拉伯　元朝与沙特阿拉伯的贸易是通过陆路进行的。“天堂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又名为西域。风景融合，四时之春也；田沃稻饶，居民乐业。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名为天堂”⑫。此处“天堂”即为今之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前

往的路线是从云南出发西行，当是经由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沿喜马拉雅山南部西行，经巴基斯坦、伊朗等地进入沙特阿拉伯境内。

伊朗　元朝同伊朗地区的贸易交往，主要是陆路交通通道。这条通道是沿古代的"丝绸之路"西行，从西安经河西走廊、南疆，西经阿富汗至伊朗，以至地中海东岸。

元朝版图辽阔，随着地域扩大，海路、陆路交通也大为发展，对外联系及商业交往也比其前代更加频繁，随着对外贸易的日益兴盛，元青花瓷也远销各国。

综上所述，大都城的元代青花瓷反映出元代时期制瓷工艺，具有许多重要的特点，无论在造型、图案装饰方面都在前代的传统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在我国制瓷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元代青花瓷的成就，不仅把我国青花瓷发展为较为成熟的瓷器品种，也为明清两代制瓷技术的高度发展创造了前提，在中外文化、经济交流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

① 赵光林《介绍几件元代青花瓷器》，《文物》1972年8期。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1期。
⑤ 同④。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6期。
⑦ 马希桂《北京昌平县出土元代影青瓷》，《文物》1980年1期。
⑧ 同注①。
⑨ 《元史》卷十七《张惠传》。
⑩ 《元文类》卷四十二《经世大典序录工典总序》诸匠条。
⑪ 《元典章》卷十七《诸色人匠》。
⑫ 《元史·百官志》。
⑬ 陈尧成、郭演仪、张克刚《历代青花瓷器和青花色料的研究》，《中国古陶瓷论文集》50—54页。
⑭ 汪庆正《青花料考》，《文物》1982年8期。
⑮ 赵光林、王春城《介绍几件宋元明时代的瓷器》，《首都博物馆丛刊》2期。
⑯ 刘长工《成化斗彩葡萄杯》，《首都博物馆丛刊》2期。
⑰ 《中国陶瓷史》第八章第一节《元代的主要窑场和著名瓷器》。
⑱ 《元史·四夷传》。
⑲ 汪大渊《岛夷志略》。

广东明代仿龙泉青瓷及其外销初探

曾广亿

龙泉窑属南方青瓷系统，在宋代民窑诸系中兴起虽然较晚，但由于产品釉色青翠晶莹似玉，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销路极广，以至江西、福建、湖南、云南、广东等地均有仿制。元代广东瓷业比较衰落，到明代又有了空前的发展，大量烧制民用青白瓷、黑瓷、青花瓷、仿龙泉青瓷及仿制南北各地名窑产品等。据初步调查所知，以仿龙泉青瓷范围最广，窑址分布在大埔、兴宁、五华、龙川、河源、澄海、惠来、平远、陆丰、惠州、惠阳、惠东、博罗、中山、番禺、高州、化州、遂溪等十八个县市，约计50多处，遗物堆积很厚。

1960年广东省文管会与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联合组成文物普查发掘工作队，到惠阳新庵发掘了四处仿龙泉窑址（其中有两座完整的窑灶），笔者主持了发掘工作，出土遗物4，900多件①。本文主要是根据上述调查、发掘材料，综述广东仿龙泉青瓷特点（包括瓷器的器形与装饰、瓷器的胎质与釉色）和窑址年代的讨论，联系有关文献记载对产品的外销进行初步探讨。由于有些窑址尚未复查，掌握的资料不够全面，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仿龙泉青瓷特点综述

（一）瓷器的器形与装饰

各窑采集的瓷器，归纳起来有碗、碟、盘、罐、瓶、杯、盏、炉、盆、钵、器盖等。此外还有捏塑的瓷牛。

碗　大致可分三式。

Ⅰ式，青釉、灰釉、白釉、白陶衣均有，器形大小不一，青釉碗数量最多，约占87%以上，均敞口圈足，器内外均施釉，底部露胎。灰釉、白釉和白陶衣碗器外壁一般均素面，但也有只刻划一、二种弦纹、直线条纹或菊花瓣纹的。青釉碗纹饰比较复杂，其中有弦纹水波组合纹、菊瓣纹、直线条纹、水波纹、卷草纹、斜线条纹、弦纹水波直线条纹组合等，细分有三十五种之多。有不少碗内中心刻印“福”、“禄”、“寿”、“富”、“仰”、“青”、“宁”、“诚”、“信”、“金”、“用”、“积”、“溪”、“晴”、“籍”等文字，并有梵文中的“卐”字纹。这种“卐”字纹常见于佛像和元明龙泉窑瓷器，它是古代的一种符咒和宗教标志，一般人通常均称它为太阳和水的象征。在梵文中“卐”字即吉祥云集之意，瓷器上装饰这类纹饰，亦仍取此意。“卐”字纹历史久远，早在北宋廉江窑瓷器上，甚至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上就出现过，早期可能纯属宗派或宗教标志。

Ⅱ式，青釉撇口高足，器内外均施釉，足底露胎，其特点是器身与器足的高度基本相同。这类碗仅见龙川、澄海、惠州、惠东和惠阳窑烧制。器外壁刻划弦纹、菊瓣组合纹，也有素面无纹的，完整器不易采得。

Ⅲ式，青釉、深腹直口圈足，器内外壁施釉，外壁饰弦纹三道。

盘　以青釉为主，灰釉、白釉、白陶衣均有。可分敞口圈足、撇口圈足、瓣口圈足、

敛口圈足、姜口圈足和敞口平底六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矮身，器内外均施釉，圈足或底部露胎，纹饰一般均刻划在器内壁或内底，常见的有直线条纹、弦纹、长条菊瓣纹、谷粒纹与弦纹组合、卷草与条纹组合等。有些盘内中心刻印有"福"、"寿"等吉祥文字或简单的团花。但大多数盘均素面无纹。

碟　敞口圈足，外形与盘相似，碟身较浅，器形较小，一般均素面，但也有个别碟内刻印"福"字或印简单的折枝团花纹。

盏　是盛豆油的灯盏，青釉、灰釉均有，用时一般置于灯座上，敞口平底，器内外均施釉，底部露胎，口径一般约在10厘米左右。

罐　青釉、白釉均有，直口鼓腹，短颈，矮身圈足，器腹刻划弦纹卷草菊花瓣组合纹，或刻划弦纹与直线条纹组合，也有素面无纹的，器盖鼓起，剖面作半月形，盖顶有圆锥形钮，盖内榫口凸起如环状。这类罐仅见澄海、惠东、大埔等窑口有烧制，但大埔产品一般均无纹饰。

瓶　青釉，小口长颈双耳，斜肩，瓶身修长，喇叭足，素面无纹。这类产品，数量不多，均系残品，仅见大埔窑和惠阳窑烧制。

杯　青釉，可分二式。

Ⅰ式，敞口平底。

Ⅱ式，撇口圈足，均无纹饰。

钵　青釉，撇口斜腹平底或敛口直身矮圈足，器形较大，一般器外施釉，器内壁刻划很深的斜线或长条篦梳纹，凸线锋利，其用途是擂薯类之用，亦可配杵研磨米酱。这类钵也称"擂盆"，广东自宋代始烧，以后屡见不鲜。

盆　青釉、灰釉均有，敛口直身平底，无纹饰，均为碎片。

瓷牛　牛背有一牧童盘足而坐。这类产品极少，仅见惠阳白马山窑烧制。

香炉　青釉，可分二式。

Ⅰ式，撇口深腹矮圈足，器外壁刻划直线条纹和莲花瓣纹。这类纹饰装饰的陶瓷始于汉代，广东唐代陶坛和宋代香炉也有这种纹饰，刻划、浮雕或堆贴，立体感很强，到了明代一般只用刻划。

Ⅱ式，敛口直身，深腹平底，三兽足或三蹄足的均有。器内外均施釉，足底露胎。器外壁刻印弦纹、篦纹与八卦组合纹，或只刻印弦纹与八卦纹等。八卦纹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是用"—"和"— —"符号组成，以"—"为阳，以"— —"为阴。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有人认为八卦纹"是我国明代嘉靖皇帝好黄老之道，而相应反映到瓷器上的，在嘉靖以后才流行"，并据此作为断代的依据②。我认为，八卦纹在元、明、清时期的瓷器特别是香炉和鼎类中常见的一种纹饰。元代龙泉窑也曾经生产八卦纹瓷器，并大量外销，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域打捞的中国沉船中，其中就有元代龙泉窑产八卦纹三足香炉。同类产品过去在日本鸟取县也有出土③。最近在广东省图书馆基建工地亦出土有宋代青釉三足龙泉八卦纹香炉。可见八卦纹瓷器并非嘉靖以后才流行的。

上述碗、盘、碟、杯、罐、炉、瓶等瓷器，从其器形厚薄曲度观察，均属辘轳拉坯轮制。盖钮、瓶耳和炉足是贴附的。瓷器入窑烧制方法有正烧、叠烧、覆烧三种。以正烧为主，其产品约占总数95%以上，叠烧和覆烧的产品数量极少。

（二）瓷器的胎质与釉色

瓷器的胎质，按烧后的呈色，大致可以分为白色、灰色、砖红色三种。白色是用白色瓷土，即"高岭土"与瓷石捣炼配制而成。白瓷胎器壁一般施粉青釉，也施豆青釉和白釉，或白陶衣，但数量较少。施豆青釉的胎骨一般均掺有少量紫金土，这样，胎色白中带灰，或作淡灰色，所以豆青颜色显得更加深沉。施粉青釉的白瓷胎一般不掺紫金土，釉色显得柔和淡雅。

白瓷土是制作瓷器的基本原料，广东蕴藏量极为丰富，分布广，质地优良，原矿中氧化铁的含量一般仅占0.75%左右，有些含铁量更低，比景德镇和德化白瓷土的铁含量还要低，是烧制青瓷和白瓷最理想的瓷土。土中的铁含量是决定胎釉色调的主要因素之一。龙泉窑有些瓷器的"朱砂底"和"紫口铁足"，都是由于胎骨的铁质较多所致，据化验，胎内氧化铁含量在1.5—2.2%时成"朱砂底"，在3.5—5%时则成"紫口铁足"④，广东仿烧的龙泉青瓷，均较少见到这类"朱砂底"或"紫口铁足"的现象，它为本省各地仿龙泉瓷的大量生产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灰胎器表一般施灰釉，或青黄釉。砖红胎施无光泽的白陶衣或白釉。灰胎和砖红胎是在氧化焰中烧成的，火候约在800℃至1000℃左右，尚未成瓷。上述三种胎质以白胎居多，约占80%，灰胎次之，砖红胎数量最少。

釉色大致可分青釉、灰釉、白釉三类，此外还有一种白陶衣。这里所指的青釉系明代仿龙泉窑的青釉，与广东早期的青釉有所不同，早期青釉一般属石灰釉，特点是粘度较小，即在高温下易于流釉，因此广东早期的青釉釉层一般显得较薄，有些施釉较厚者，因釉汁的垂流，使器物口沿、颈部或肩部显得淡薄，下部浓重，显得上薄下厚或有泪痕就是这个原因。此外，早期的青釉与仿龙泉青釉在色泽上也有所不同。这是由于以氧化铁为主的着色元素配方的不同所致。仿龙泉青釉始见于宋代及元明浙江龙泉窑，广东则仅见于元明两代之仿烧，其特点是粘度比较大，施于器表后在高温下不易流釉，所以釉色显得浑厚饱满。釉面玻璃质强，开片和不开片的均有，釉层中有些有小气泡。从采集到的标本来看，青釉可分粉青、豆青、青黄、青灰等色。粉青釉是以铁的氧化物为主要着色剂，还含有少量的锰或钛，特点是生坯挂釉，入窑后经过高温还原焰烧成。这种釉一般施于白胎上，整个器表柔和淡雅有如青玉一般。其中惠阳、惠东、大埔等窑口的仿制品可与龙泉窑同类产品相比。豆青釉和粉青釉均首创于南宋龙泉窑，南宋官窑及以后的景德镇窑都有仿制，有不少成功之作。豆青釉也是以氧化铁为主要着色剂，亦含有少量的锰和钛，但氧化铁含量较多，故其釉色较粉青稍深，釉层均匀，釉色深作青翠色，浅作豆青色。广东明代仿龙泉釉以仿粉青和豆青两种釉色为主。青黄釉不是本窑的正色釉，青中泛黄，这种釉色引起泛黄的原因很多，如烧成温度过高或过低，或匣钵装烧不严产生射火，或还原焰结束过早或过迟，或釉料配方不当等，都会使瓷器釉面泛黄。从标本来看，本窑产生泛黄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入窑锻烧时窑温过低，器物是在氧化焰中烧成，未能充分还原。另一种，虽经过还原焰烧成，但釉料配方不当，可能是含氧化钛过高所引起。青灰釉，青中呈现灰黑色（器物局部或全部灰黑的均有），是烧窑过程中曾经使用过多的湿柴草焙烧，火焰升温不好，窑内大量烟气中的色素沉积在坯釉之中引起的，《陶雅》说："良釉经火，变为它色，浓烟熏翳，乃如泼墨，则谓之串烟"。灰黑釉主要呈色剂也是氧化铁。当釉料中的氧化铁达到8%左右时，施于器坯上烧成的颜色呈酱褐色，如果把釉层加厚则颜色转浓，厚度积累到1毫米左右，釉色就呈灰黑色，厚度积

累到1.4毫米左右，釉色就是纯黑色。所以一般灰黑釉或黑釉的釉层较厚。这类釉色仅见惠州下角窑和惠阳新庵窑等有烧制。白釉系瓷器的本色釉，要求釉料中的铁元素含量控制在0.75%以下，施于白色器坯上，经过还原焰的焙烧就是白釉。这种釉色仅见惠阳新庵窑和白马山窑烧制，白中微泛浅黄，釉色晶莹、有开片。总的来说，上述釉色以青釉为最多，约占75%以上，灰釉次之，白釉最少，白陶衣则仅见于惠阳、惠东和惠州窑。

二 窑址年代及产品外销问题探讨

（一）窑址年代的讨论

关于上述广东仿龙泉窑的年代问题，在文博界中曾有几种推论。一是认为"南宋以后"⑤，一是认为"或许是宋代"，另一种认为"不出宋明"⑥，澳门贾梅士博物院也将这类产品定为宋代⑦，二十五年前笔者对这类仿龙泉窑制品的年代也作过推论，认为属于"明代或稍早一些⑧"，现在看法仍未改变。理由是：1、这批产品没有宋代风格。2、从器形风格上看，碗外壁刻划弦纹、菊花瓣纹和直线条纹等，装饰简单，胎体厚重，器物足底露胎，圈足较深，釉色以仿龙泉青釉为主，均属石灰碱釉，釉层深厚饱满，晶莹似玉。碗内普遍刻印文字或"卐"字纹，这些特点与元明时期龙泉窑产品有不少相似之处。3、再从造型看，青釉三足八卦纹香炉、平底刻花敞口盘、撇唇敛口圈足盘和菱花口盘诸器，虽具有元代风格，但明初或明代中晚期尚有生产，值得注意的是生产最多的Ⅰ式碗没有元代遗风，却有广东地方特色，应属明代产品；出土的高足碗类器形元明两代极为流行，当时浙江龙泉、福建德化、河南钧州、河北磁州及江西景德镇等窑口均有生产，造型大致相似，但工艺上有所不同。元代高足碗的碗身与足部一般是粘压上去的，接口挤出的瓷泥刮平后常有裂痕。而明代高足碗的碗身足部是用釉药粘贴的，接口平整光滑，而本窑产品亦系平整光滑，看不出驳口裂痕，属明代产品无疑。4、1961年在东莞附城基建工地明代永乐二年墓填土中，曾经发现过惠阳仿龙泉窑青瓷碎片，1980年在海南岛琼山明代万历三十三年大地震陆陷沉海的遗址中也发现有这类青釉刻花瓷片⑨，1982年在大埔百侯中学明代嘉靖庚子年墓中亦出土有大埔仿龙泉釉碗、碟、杯等器物⑩，此外，近年来日本界环壕都市遗址出土的遗物中亦有广东地区仿龙泉青釉划花碗，伴随出土的还有明代青花瓷和日本"天正十三年"（1585年）木简铭记⑪，天正十三年相当于明代万历十三年。在日本马场屋敷遗址上层出土的大量明代青瓷、白瓷和青花瓷，其中亦有广东仿龙泉窑青瓷，伴随出土的还有日本"宽永通宝"（1636年铸）铜钱⑫。1636年相当于中国明代崇祯九年，这些发现极为重要，它可以印证广东仿龙泉青瓷窑址的年代上限是明代早期，下限可到明代崇祯间。但其中大埔、龙川、澄海窑出土青釉八卦纹三足香炉、刻花大碟和青釉卷草组合纹盖罐，其上限则可能会更早一些，或许会到元代晚期。惠阳窑有些碗内中心刻印有"清"字，说明个别窑址的下限或许会到清初。至于更准确更具体的分期，则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发掘来论证。

（二）广东仿龙泉青瓷与外销有密切关系

从广东明代仿龙泉窑分布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烧窑时间之长及其产品之多来看，与当时外销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虽然我们手中掌握的国外陶瓷考古材料极其有限，在研究工作中存在很多困难，但从文献记载也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广东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明史·食货志》卷四载"太祖洪武初年，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寻罢。后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可知广东海外交通路线仍以南洋诸国为主。《粤海关志》、《防务辑

要》、《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中国南洋古代交通丛考》、《西洋番国志》等，均有明代海外交通路线及陶瓷外销的记载。其航线大致与《明史·食货志》所载相同。永乐年间，明朝政府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对外贸易，诏谕海上蕃商，并设怀远驿于广州，以安顿大批外商。据《广东通志》载："永乐四年置怀远驿于广州城蚬子步，建房一百二十间以居蕃人，隶市舶提举司"（按：蚬子步即今广州市西关十八甫，现十八甫仍有怀驿街，足资考证）。瓷器是广州港口的主要外销商品之一，深受外商欢迎。当时广东瓷器亦通过潮州和海南港口输出海外。据《琼州府志》载，到明代，南海诸国商舶前来海南贸易者，已络绎不绝，当时万州（今万宁县）莲塘港附近，建筑有"蕃神庙"，香火极旺，来往蕃舶、蕃商必上岸诚虔祭祀。是时海南岛和日本也已有了贸易关系[⑬]，1980年5月广东考古与地质工作者在海南岛琼州海峡铺前湾和新溪角古代贸易港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外销瓷器碎片，其中有宋代福建同安窑、建窑、元代德化窑、宋代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宋代和元代浙江龙泉窑、宋代广东潮州窑、廉江窑、遂溪窑、佛山石湾窑，此外亦有明代惠阳仿龙泉窑青瓷。据日本《贸易陶瓷研究》介绍，广东仿龙泉窑青瓷近年来在日本界环壕都市遗址和马场屋敷遗址均有出土。1984年7月日本学者铃木重治、桥本久和、吉村正亲来华访问后编写了《潮州笔架山·长沙铜官窑见学记》一文，其中提到广东惠阳新庵白马山的绿釉碗（即仿龙泉青瓷碗）日本各地十六世纪遗址中均有出土。并说明代中期之后广东有大量青瓷碗输入日本[⑭]，可见仿龙泉青瓷系当时外销的一种产品。

《明会典》卷一百一十三，记载了南洋的番货和我国瓷器的价格。其中提到"豆青瓷盘，每个一百五十贯，碗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价格相当昂贵，当时广东各地窑口烧制的仿龙泉青瓷，其中有不少碗、盘均属"豆青"类瓷器。过去在印尼的巴东和西爪哇曾经出土过不少外壁刻划有细长菊花瓣纹或弦纹之下再刻菊花瓣纹的广东仿龙泉青瓷碗[⑮]，在马来西亚也有这类产品出土，[⑯]可见当时瓷器的外销中仿龙泉青瓷数量亦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三宝太监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的既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是为了加强和发展同亚非国家之间的海外贸易。郑和率领的船队拥有大"宝船"四十至六十多艘，连中、小"宝船"在内，有一百至二百艘。最大的宝船张十二帆，载重量约一千吨，随船官兵及水手等人，共计27670名[⑰]。当时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途经东南沿海各大港口，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明代瓷器，成了船队大量输出的一种重要商品，当时马欢编著的《瀛涯胜览》一书，在"祖法儿国条"上说："中国船队到彼……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贮丝、瓷器等物[⑱]。费信编著的《星槎胜览》一书，在每个国家的条目后面，都记载了当时"使船"与各国开展贸易或购买瓷器的情况。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一书的"柯枝国条"上也说，"当地有一些被称为"哲地"的商人，"专收买宝石、珍珠、香货，以待中国宝船同中国船队交换瓷器、绫罗绸缎等产品"[⑲]明代瓷器的大量输出，是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当时政府虽曾一度进行"海禁"，但未能彻底，民间商船仍不时往返于东南亚各国间，广东瓷器的外销也还在继续进行。此外，葡萄牙人1517年开始与广东进行贸易，并于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占据了我国澳门，大量收购广东各类瓷器，通过海运转手贩销西方各国，从中渔利。据贾敬颜《明代瓷器的海外贸易》载："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由中国启程，中途为荷兰军舰截获的一艘葡萄牙商船卡特里那号，船中载满着无数各式各样的瓷器"；"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10月，一艘从爪哇巴达姆港启程返回的荷兰商船克尔德兰号，内

装碗、碟、杯、盘等大大小小的瓷器，共计69057件……这是从广州一带开往欧洲去的”㉑。可见其装运数量之多。总的来说，明代外销瓷的输出，主要以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等名窑瓷器为主，但广东民窑瓷器，包括仿龙泉青瓷数量也不少。

1979年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与香港市政局在香港艺术馆联合举办“东南亚瓷与中国古代出口瓷展览”，展品中有东南亚国家出土的宋元时期德化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和广东西村窑、潮州窑等产品，同时还有十二件惠阳新庵白马山窑和惠州下角窑明代仿龙泉青瓷碗㉑，这类碗近年来在阿曼境内也有出土㉒。过去香港有些博物馆亦在东南亚国家购买过不少完整的出土的广东宋瓷及明代仿龙泉青瓷进行陈列。此外，1985年香港考古学会在香港大屿山竹篙湾发掘出二千多件明代青花和五彩、青瓷等碎片，其中亦有仿龙泉青瓷㉓。该地是否昔日贸易港口或商船临时停泊之地，有待进一步的研究。1975年广东省文管会与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组成的文物普查团，在海南岛海口、琼山、文昌、万宁、陵水、三亚、临高、通什、澄迈等地均采集到不少以惠阳窑为代表的广东明代仿龙泉青瓷碎片。在广州、英德、深圳、东莞、博罗等地亦有发现。说明这类仿龙泉青瓷既内销本省及海南和港、澳地区，同时也远销东南亚各国，甚至远达阿曼和日本。

---

①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广东惠阳新庵三村古瓷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4期。

② 杨少祥《广东大埔古瓷器生产初探》，《广东文博》1986年1、2期。

③ 中日新闻社编《国际シンポジウム新安海底引杨レナ文物报告书》日本昭和五十九年发行。

④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北京。

⑤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5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⑥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佛山专区的九处古窑址调查简报》，《文物》1956年12期。

⑦ 1985年12月笔者应邀访问澳门时，曾经到澳门贾梅士博物院参观，该院陈列柜中有10多件惠阳仿龙泉青釉划花碗，标明是“宋代”。

⑧ 曾广亿《广东惠阳白马山古瓷窑调查记》，《考古》1962年8期。

⑨ 曾广亿、古运泉《海南岛明代地震遗址调查记要》1981年（未刊稿）。

⑩ 同②。

⑪ 森村建一《界环壕都市遗迹出土の陶瓷器の组成と机能分担》《贸易陶磁研究》1984年4期，日本贸易磁研究会出版。

⑫ 川上贞雄《新泻县马场屋敷遗迹出土の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4年4期，日本贸易磁研究会出版。

⑬ 《琼州府志》卷十九上。

⑭ 铃木重治等《潮州笔架山・长沙铜官窑见学记》，《贸易陶磁研究》1984年4期，日本贸易陶磁研究会出版。

⑮ 此是1987年10月印尼雅加达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Naniek Haykantiningsih（兰妮）女士到广州访问时，在相互交谈中告诉笔者的。

⑯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1960年。

⑰ 陈占元《郑和下西洋与中非友谊》《海交史研究》1981年3期。

⑱ 马欢《瀛涯胜览・校注》53页，中华书局版。

⑲ 巩珍《西洋番国志》27页，中华书局版。

⑳ 转引自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中国的瓷器》85页。

㉑ 《Southern Chinese Kilns》（南中国窑器）IPYEE《SOUTHEA STASIAN AND — CHINESE TRADE POTTERY》（东南亚瓷与中国出口瓷）1979年。

㉒ 曾广亿《阿曼出土一批中国古代外销瓷》《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2页，1982年。

㉓ 此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馆长林业强先生向笔者提供的材料（实物现存香港考古学会）。

从《阿迪比尔寺中的中国瓷器》

漫谈明代外销瓷

叶佩兰

外销瓷是我国古代瓷业生产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对外贸易使国外市场兴旺，国内经济繁荣，同时增进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在明代我国的瓷器曾经畅销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景德镇则成为重要的外销瓷生产基地，所产瓷器得到各国人民的酷爱，中国瓷器不仅是他们喜爱的餐具，同时又做房间的装饰，中国瓷盘不仅挂在墙上，甚至陈列在皇家公园里。有的外国国王还将中国瓷器做为高尚的礼品。15世纪意大利的上层社会已经广泛地流行中国瓷器，视为珍宝。1487年（成化廿三年）埃及国王送给意大利国王几件中国的青瓷花瓶，使对方爱不释手。欧洲的首饰艺术家们，将中国瓷器镶上金边银边，形式新颖，从而具有欧洲艺术风格。

在西亚有两个世界闻名的博物馆，伊朗的阿迪比尔神庙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博物馆，这两个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瓷器不仅丰富，而且精美非常。本文就伊朗的阿迪比尔神庙收藏华瓷状况，结合故宫博物院藏品，漫谈明代外销瓷。

阿迪比尔神庙在伊朗古都大不里士以东的阿迪比尔镇，是萨法维王朝祖先谢克、伊萨克萨菲丁的诞生地。16世纪末，17世纪初阿巴斯王在神庙里专辟一室收藏中国瓷器，有1600多件。其中就有阿巴斯王特向中国定制的瓷器（于1612年献给了这座祖庙）。现多数归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收藏。元、明时代瓷器有618件。从已发表的分析，我国外销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造型和纹饰与国内收藏传世品完全一致；另一种是为外国的特殊需要而专门生产或定烧的。

先谈第一种，在《阿迪比尔庙所藏中国瓷器》书中，明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有18种与我院藏品在造型、纹饰等方面完全一致。如青花把莲纹敞口盘、青花把莲纹折沿盘、缠枝牡丹纹折沿盘、缠枝花菱花式折沿盘、葡萄纹菱花式折沿盘、松竹梅纹敞口盘、里外缠枝花纹碗、里外缠枝花墩式大碗、青花松竹梅纹侈口碗、外青花缠枝花里暗花碗、青花缠枝花纹梅瓶、折枝花果纹罐等。

成化至正德时期的，有青花夔龙纹碗、青花影梅折枝花纹盘、弘治青花麒麟杂宝纹盘，另有永乐、宣德、成化时期的白釉瓷器。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品中，这些瓷器绝大部分都能找到相同者，有的还遗存多件，甚至数十件。从造型、纹饰方面分析，应是景德镇御窑厂的产品。说明景德镇御窑厂在明代不仅为皇室生产御用品，同时由于也有大量瓷器销往国外，并为外国皇室服务。在《阿迪比尔庙所藏中国瓷器》中，还有嘉靖至晚明时期的我国景德镇民窑生产的青花瓷多件，以盘碗数量最多。其纹饰粗犷，内容多是山水人物、花鸟禽兽等。明代中晚期时景德镇的外销任务已转移到民窑，御窑厂产品已供不应求。御窑厂每年要

为宫廷烧造数十万件瓷器，朝廷还派宦官到景德镇督陶，尤其嘉靖后瓷器的烧造数量激增，给景德镇瓷业带来巨大负担。这种情况下，促使民窑生产逐渐兴旺。加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发达，民窑瓷器的输出必然扩大起来。

在《阿迪比尔庙藏中国瓷器》中，与我院瓷器相同者均无款识，联想到其他外销瓷款识问题，证明正德以前御窑厂生产的外销瓷均不写中国的朝代款识。有一件正德青花缠枝莲花纹碗非常有趣，外口边为淡描青花云头纹饰，腹部六朵缠枝花，近底部一周青花双勾线描变形如意头纹，足内中心有一块圆形黑色珐琅质，直径2吋，珐琅质下面为釉。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碗在造型、纹饰、尺寸完全一样，但碗足中心青花双圈内书“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楷款。因此联想到阿迪比尔庙中的一件，可能是由于外贸或其它原因，将款识用黑色的珐琅质盖上。阿迪比尔庙中的少数器物有中国朝代款识，如弘治款的五彩花鸟纹盘，在国内目前未见过与此盘相同的。正德款孔雀绿釉鱼藻纹盘，此物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胎薄体轻，色彩鲜艳，纹饰新颖别致，是我院的一级藏品。还有嘉靖款青花云龙纹大罐、万历款青花人物纹大梅瓶两件，应是中国皇宫的御用品，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少许相同者。这几件带中国朝代款识的瓷器，从造型、纹饰、款识分析，应不属外销瓷，只能是赏赐品，或外国使节来中国后，回国途中所购，或因其它原因散失在国外的。

因此，国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不一定都是外销瓷。

收藏在阿迪比尔庙中的中国外销瓷，在器物的近底处，还有一特殊的戳记，长方形，刻阿拉伯文字，然后描上一层红彩，经请教专家，认为可能是伊朗国王的年号。除此种戳记外，还有在器物近底处书写阿拉伯文字，或在底部钻数个小圆形坑眼，组成阿拉伯字样，传说这是一种表示物主的标记。这几种标记表明了伊朗人对中国瓷器的珍爱。中国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一件成化绿彩龙纹盘，盘外壁龙爪处，钻有几个小圆形坑眼。故宫收藏的明代黄釉瓷器中有的器底部也钻有坑眼。都是后人表示物主记号的痕迹。

阿迪比尔神庙中所藏的第二种中国外销瓷器，是在造型、纹饰上具有独特风格的。如宣德青花折枝花卉方流执壶、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青花缠枝花卉纹折沿盆等，造型与14世纪早期西亚的金银器相似。明初花卉纹大盘、万历青花花瓣口大盘及各式军持。还有浙江龙泉窑生产的青釉刻花大盘、大碗及用阿拉伯文装饰的瓷器，如宣德青花阿拉伯文碗、正德青花阿拉伯文大盘等，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生活习俗特制的。从中不难看出我国明代的外贸商品广泛注意世界各地特殊需要，达到适应扩大外销的目的。元、明初外销瓷中明显带有伊斯兰教特殊风格的器物较多，与郑和七下西洋有关。郑和是回族，他的祖父、父亲都曾到伊斯兰的圣地“麦加”朝拜过。随郑和下西洋的侍臣，担任翻译的哈三、马欢也是回教徒，与他们进行贸易的人，大多数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所以明初外销瓷中带有阿拉伯文或适应伊斯兰教国家人民生活习惯的器物较多，且备受当地人民欢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正德时期红彩阿拉伯文盘，就是某阿拉伯国家定烧后遗留下来的。

从明代景德镇瓷业史上看，带有阿拉伯文的瓷器，除少数为永乐时期外，以正德时期最为突出，现在国内外遗存的实物也较多，这反映了我国明初及正德时期与阿拉伯国家贸易较为频繁。朱培初先生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一书中，介绍明代不少中国回教商人来到阿拉伯国家后，势力强大，且拥有一定的权力，可以在宫殿里自由出入，受国王的委托在中国购买瓷器。

中国回教徒商人们和阿拉伯国家的人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宗教。14世纪时我国回人宦官又

兴起当政、督陶，也必然会影响到瓷器的制作上，因此在出口瓷器上书写阿拉伯文输往到阿拉伯国家，是符合外贸需要的。在阿迪比尔神庙中收藏的明代万历时期的青花花口大盘、青花花卉纹军持等，可能是伊朗向中国定制的，1983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现的沉船里，有许多万历时期的青花盘及军持等，说明当时曾大批销往欧洲。此种青花瓷器在南洋马来亚等国遗存实物也较多，这些美丽的青花瓷器，由富贵人家保存，备庶民当宗教性宴会时借用。军持更具外销特色，器身有一乳房状的流，便于航海或旅行家吸饮，也是回教徒家庭必备品，用于朝觐时由天方携归蔷薇水，或净手，或洗涤，此种器物直到17世纪仍大量烧制，成为重要的外销品种。

以上具有独特风格的外销瓷，可谓十五世纪初时景德镇的新产品，对我国宫廷生活及我国古代匠师们借鉴外国文化艺术特色，发展和繁荣本国的造型语言产生过极大影响。如阿迪比尔庙中宣德青花花卉纹方流执壶、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明初青花花卉纹大盘、正德时期带阿拉伯文的器物、万历青花花瓣式花口大盘、军持，还有元末明初浙江龙泉窑生产的青釉大盘、大碗等，本不是中国的传统瓷器式样，但在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有的品种藏量还较多。另有一些在清代各朝的产品中继续仿制的，如绶带耳葫芦扁瓶即是其中一例，此种瓶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台北故宫等均有收藏，在清代康、雍、乾各朝也都有仿制，与永乐、宣德时期的产品极为相似，乾隆时期还将此瓶式样称为“抱月瓶”。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方流执壶在北京故宫、台北故宫都有收藏，在北京故宫收藏的清代乾隆时期青花瓷器中也有仿制，只是壶的肩部稍有变化。

再如饰有阿拉伯文字的瓷器，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数十万件明代瓷器中，有永乐时期仿14世纪早期叙利亚铜器造型的盘座，纹饰以中国传统的缠枝花为主，饰以阿拉伯文，清代康、雍、乾三朝的青花瓷器中均有其仿制品，但此种器物在中国皇宫内已改变了原来用途，在器内插放裹着黄缎的铜胎带孔花形筒芯，用作供器，俗称“无档尊”。此物天津艺术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各收藏一件。

其次是正德时期阿拉伯文瓷器，从我院藏品来看，在造型上比阿迪比尔神庙的藏品要丰富得多，有盘、碗、蜡阡、圆盒、出戟瓶；台湾故宫收藏有球形香插、大尊、笔山等，均为皇室旧藏。

据明代文献记载，武宗朱厚照宠信回人心腹，后宫宠嬖中回人甚伙，所以宫内遗存至今的阿拉伯文瓷器与武宗尊崇伊斯兰教义和回人习俗是有关的。总之明代外销瓷中出现的新型产品得到了明清两代统治者的欣赏，成为宫廷的重要陈设品或实用品，这也反映出中国与西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

更值得提出的是口径80厘米左右的大盘。就目前已见到的资料来看，除故宫博物院收藏一部分外，国外数量较多，阿迪比尔庙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收藏了元、明两代的各式大盘，不仅数量多，且造型、纹样都非常精致。明初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盘，盘心绘多种纹饰，有缠枝花、折枝荔枝、松竹梅、花卉山石等，盘外壁多绘折枝花六组，细砂底。浙江龙泉窑生产的青釉大盘、胎体厚重，釉色青绿，釉面光亮，有刻花。这种大盘我初见时感到很惊奇，在我国，瓷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轻巧的餐具，不过30厘米左右，口径达80厘米的瓷盘，并不适用于中国的传统生活习惯，参阅有关资料并结合实物研究，才知道大型瓷盘是伊斯兰教国家的主要餐具，符合“国人坐卧无床凳”“用盘满盛其饭，浇酥油奶汁，以手撮口中而食”的习俗。据刘新圆同志的考证，元代将作院的磁局曾有大量的西亚工匠，他们对波

斯人的习俗与审美爱好都有深刻的理解，大型瓷盘就是根据波斯人的饮食习惯设计的。1985年9月我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到在“丝绸之路遗宝展览”中有一件9—10世纪伊朗的印花大铜盘，口径约80厘米，盘体硕大、敞口，盘心是团花及折枝花组成的四层纹饰，每层用连珠纹相隔，经介绍，这件铜盘是伊朗一个王宫（音译：伊斯拉母王宫）里使用的。也有富豪家庭用来放水果等。说明由于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给西亚人民带来物美价廉的青花瓷器，洁净又雅致，波斯人逐渐用瓷器代替了铜器。

故宫博物院收藏明清两代的各朝大型瓷盘多件，有元末明初的，有嘉靖万历的，还有清代各朝，多达80厘米左右，下面略述一下。

1.元末明初的大型瓷盘多件　景德镇和龙泉窑两地制做，形体非常规整，纹饰清晰，反映出高超的制作水平。据英国艾迪思先生的意见，大盘的生产最初是为居住在中国国内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生产的，后来这样大的青花瓷器，有可能不是按照正常的贸易渠道到那些国家去的，而是作为礼品赠送给那些国家的皇宫或皇族。《明史·外国传》记载明太祖为了诏谕诸国曾多次遣使出访，瓷器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赏赐品。占城条记载“洪武十六年，贡象牙二百枝及方物。遣官赐以勘合，文册及织金文绮三十一，磁器万九千”可见磁器是明初重要的外交礼品。大盘有可能是其中一项。清宫遗存可能是御窑厂向皇帝进贡，专为皇帝赏赐之用。1982年景德镇市有关单位在珠山路人行道，破路铺设管道时，发现了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残瓷窑及官窑废品堆积处，出土了大量的明初残破瓷器，其中就有口径65至74厘米的大瓷盘，纹饰有折枝花果、缠枝灵芝海兽、松竹梅等，大部分是落选品。由此可知外销产品或贡品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品。

2.万历青花花口大盘　故宫博物院藏量较少，国外收藏较多，在马来西亚地区大量发现，葡萄牙的山度士皇宫遗留下来的也较多，大部分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出口瓷。这种瓷盘口径约40—50厘米，胎体较薄，盘壁较高，花口，盘心纹饰构图方法相似。盘心盘壁二层纹饰布满全器的里壁，盘心多绘中国传统的花鸟松鹿纹，洞石花卉纹，边壁分别为六组，八组或十组莲瓣形开光，光内绘牡丹、莲花、菊花、灵芝等多种折枝花卉，花卉上还绘象征吉祥如意的宝物，光间用锦纹或缨络等隔开，整个画面繁而不乱，构图严谨，具有东方文化的典型风格。这种瓷盘又称“克拉克瓷”，荷兰语中意为“葡萄牙战船”。中国瓷器就是用这种船运往葡萄牙的，当时人们不知如何称呼青花瓷器，就以“克拉克瓷”为名，一直传到今天。近年来在江西的南城，广昌和会昌等县，发现几处有明代纪年的墓葬中有此种青花盘，这样的瓷器能在封建的藩王墓葬中出现，可见它被视为景德镇青花瓷中的珍品。不仅畅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西德、葡萄牙、荷兰等国也有过仿制。

3.嘉靖时大盘　故宫博物院收藏数十件，有青花和孔雀蓝两种釉色。口径约75—80厘米。是一种特殊的遗物。胎体厚重，制做水平不如明初大盘精细，主要纹饰有云鹤、团寿字、寿星老、灵芝、松竹梅、花鸟，还有极少数绘“十二章”等。纹饰内容反映出道教思想。

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他后期置国家大政不顾，二十多年不见大臣，一心致力于黄老之术，炼丹修玄专意斋醮，祈求长生不老。经常举行佛事，摆道场，祭祖、祭神，要杀猪宰羊。祭祀时将祭品放在大盘上还是很适宜的。因此嘉靖时期大盘，可能是为皇帝的特殊用途制做的。此时外销瓷中不见大型瓷盘，已成为宫廷专用品。

4.清代康、雍、乾三朝大瓷盘也较多　口径都在50厘米左右。品种多样，纹饰内容丰

富，多为民窑生产。以青花、五彩最多见，其次有粉彩和斗彩的。绘画有山水人物、花鸟草虫、人物故事、缠枝八宝等，多数为宫廷用品。《陶雅》记载“康窑大盘，直径二尺，强彩画左传五霸战争之事，两阵有多至二百余人者……”可见是名品。故宫收藏的还有雍正粉彩过枝花卉大盘、乾隆斗彩缠枝花八宝大盘多种。纹饰均绘画精细，多为陈设品或做果盘使用。

5.同治大婚时用品　黄地粉彩百子图大盘。口径64厘米。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对。通体以黄色为地，多种彩绘纹饰。外壁为红彩绘一龙一凤，龙凤间为金彩绘双喜字及朵云火珠。盘里为百子图画面，由一百个孩子穿着斑斓的衣服，做各种喜庆游戏。盘心为婴孩组成的麒麟送子图，除一婴儿骑麒麟外，余者有的玩耍乐器做吹吹打打状，有的放花炮，有的杠着“长春同庆”“龙凤呈祥”字样的“执事”牌，有的扛旗，打灯笼。陪衬纹样有栏杆、竹石及云月。盘心周围又有婴孩嬉戏，如耍灯笼、跑旱船、拉象车、放花炮、赏花，还有的手持吉祥之物，还有多种富有吉祥含意的游戏。纹饰有蝙蝠、果树、山石及花卉，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喜庆热闹的气氛，是典型的宫廷御用品。

6.为慈禧五十寿辰而特制的几种大盘　有青花云龙纹、黄地青花缠枝花纹、青花地绿彩龙纹、仿康熙白地素三彩花果暗云龙纹、白地红彩龙纹等五个品种，口径均在80厘米以上。盘外底均青花书写“储秀宫”三字，可见是紫禁城内储秀宫专用品。储秀宫为慈禧的寝宫，光绪十年慈禧五十整寿，就在这里大办庆寿活动，所以储秀宫款大型瓷盘，应是为慈禧庆寿而特制的。

略述故宫博物院所藏大盘状况，可看出外销瓷中大盘对我国宫廷生活影响之深。盘的形体大而壮观，被明清两代皇室喜用。烧制水平很高，不仅纹饰清晰，而且造型规整，这样大器的烧制成功，不能不使人们感到是我国制瓷匠师们在制做工艺上的一项伟大创举，也是陶瓷发展史上的特殊产物。

参考书目：

① 伊朗《阿迪比尔神庙藏中国瓷器》英文版。
② 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
③ 朱培初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
④ 韩槐准著《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
⑤ 《南洋学报》5卷2辑。
⑥ 1980年景德镇陶瓷馆《陶瓷资料》。
⑦ 冷琁《青花西渐》，《中国文物世界》1987年6月号。
⑧ 李毅华《两件正德朝阿拉伯文、波斯文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3期。

从中国瓷器的大量出土看中肯两国久远的贸易交往

马希桂

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的肯尼亚，很早就与中国有着友好往来与贸易关系，这为近几年来在肯尼亚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大量精美中国瓷器和钱币所证实。

一　有意义的考古发掘

当我们追溯中肯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史实时，除了史书上的有关记述外，通过考古发掘从古代遗址和墓葬中挖出的文物，也是我们今天论述这个问题的很好的实物资料。九世纪以来，肯尼亚就进口有中国的瓷器，但数量很少。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肯尼亚进口了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这些中国瓷器深受肯尼亚人民的喜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用。随着历史的变革和推移，当时肯尼亚一些繁荣的城市，逐渐衰落而沦为废墟，中国瓷器也随着被废弃的建筑埋入地下。

从一九四八年以来，一些著名考古学家，象刻尔克曼、奇蒂克和塞苏恩等，相续对肯尼亚的曼达岛·安哥瓦那给地、基尔朴瓦、基那尼、蒙巴萨和杰萨斯堡等10多处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〇年，美国海洋考古研究所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又联合对一六九七年沉没在杰萨斯堡附近的一艘葡萄牙沉船进行了四次水下发掘。① 在这些重要的考古发掘中，都出土了大量中国瓷器。另外在调查中，证实在肯尼亚沿岸的四十多个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中国的瓷器。所以有人说："在肯尼亚沿海及岛屿上的居民点附近，到处散布着中国瓷器片"。刻尔克曼通过在肯尼亚多年的考古发掘以后也说："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肯尼亚从中国进口陶瓷的数量等于或往往超过所有从其它国家进口陶瓷的总和"。② 刻尔克曼这段简短叙述，充分表明在近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肯尼亚从中国进口瓷器的数量是何等的惊人。今天这些被重新从各个遗址中挖掘出来的中国瓷器（或瓷片）和钱币，却成了中肯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的十分珍贵的历史见证。

二　精美丰富的中国瓷器

在肯尼亚海岸及附近岛屿有四十多个地点发现中国瓷器（或瓷片），其中烧造最早的要算曼达岛一座早期伊斯兰遗址中出土的九至十世纪的浙江越窑青瓷和白瓷。在此以后，从九至十九世纪中叶，由于中国制瓷工艺不断发展和新产品不断出现，在肯尼亚古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中国瓷器，无论是品种和花样都更加丰富和多样了。这一阶段出土的瓷器有浙江龙泉青瓷、江西景德镇和乐平的青花瓷、青白瓷和釉里红瓷，还有广东佛山青瓷、福建德化白瓷以及各式彩瓷等，内中以青瓷和青花瓷居多，瓷器的品种主要是碗、盘、罐和瓶等日用生活器皿。青瓷和青白瓷多用竹木工具刻划出或模印出各种精美流畅的花纹，常见的纹饰有莲瓣、荷菊、双鱼、牡丹和沟纹，花纹细致明快精巧别致。青花瓷是用青料在器物上绘出团

龙、狮子、秋雁、螃蟹、牡丹、莲花、菊花、梅花、瑞草、楼台塔石、花鸟山石、婴儿嬉戏、老翁钓鱼和妇婴出游等各式各样精巧生动的纹饰，像曼布鲁伊出土的一件青花楼塔亭石纹碗，马林迪出土的青花缠枝花卉碗、杰萨斯堡出土的顽婴踢球纹碗和妇婴戏游纹碗等，无论造型，胎釉、色泽和纹饰，都可说已达到较高的工艺制作水平。尤其是在不少青花瓷器上，用青料书写出“长命富贵”“富贵满堂”“长春佳器”“玉堂佳器”“福”“寿”和“昌江美玉”等吉祥或赞美瓷器的款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青花瓷器上的纹饰可称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繁简适当，线条流畅，色彩鲜艳，是我国古代民间艺术的佳作。③难怪肯尼亚人民是那样喜爱中国的瓷器，既使是破碎的瓷器也要把器底精心修整成各种形式的“盘托”予以保存，其珍视程度由此可见。

三　别具风格的装饰品

中国的瓷器不仅是肯尼亚人民日常生活中所喜欢使用的器皿，而且还作为一种高贵的装饰品被镶嵌在一些庄严的建筑物上，赋予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在肯尼亚各中世纪遗址中均发现有清真寺建筑，清真寺在伊斯兰教徒梨礼的地方，因为伊斯兰教徒不崇拜偶像，所以在礼拜殿上不用人物壁画来装饰。在帕塔岛、给地和安哥瓦那等地，在阿訇带领教徒做礼拜的密哈拉布（或称神龛）上，嵌有中国瓷器，其数量之多有些足以令人吃惊。像在帕塔岛的吞德瓦发现一座十九世纪的清真寺，在大殿内的密哈拉布上，就镶着不少于50件中国瓷器。给地大清真寺内，在为伊斯兰教徒作礼拜沐浴而设置的储水池底部两头和中间，各镶嵌一个中国青瓷器。不仅如此，在肯尼亚还用中国瓷器来装饰室内天花板和建筑物的拱腹上。在安哥瓦那旧清真寺侧室的顶棚上，镶嵌有许多精致的青瓷器。给地清真寺门道上的三角形拱腹上镶嵌着一种明代葡萄缠枝青花碗。中世纪肯尼亚人民用陶器来装饰建筑，说明他们把中国瓷器作为艺术品来对待，从瓷器的花纹和釉色上得到艺术上的享受。尤其别致的是在一些柱墓上也镶嵌中国瓷器。在肯尼亚的中世纪遗址中保留许多柱墓，这是东非伊斯兰教建筑的显著特点之一。墓柱建在墓的东面，用石砌成，高3—9米，柱身有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十角形、圆锥形及表面有沟槽的圆锥形等。有的在柱的上部眉腰处镶嵌有中国瓷碗和盘，在顶部安放瓷罐。有的每面还砌有几个壁龛，在龛的拱眉上也往往嵌有中国瓷器。特别引起人们兴趣的是在给地和刻尔朴瓦柱墓旁边，还曾分别发现一件元代釉里红瓶和元代青花龙纹瓶，④这是两件较为珍贵和精美的瓷器，它们大都是14世纪左右中国烧造的佳品，可却用来装饰16世纪时的墓葬，两者相距一百多年。这是因为伊斯兰教葬俗是不允许用器物来殉葬的，中世纪肯尼亚有些富有的人，就用收藏多年较为珍贵的中国瓷器来装饰坟墓外表和墓前大柱。肯尼亚人民用中国陶器装饰建筑、坟墓以至清真寺大殿内庄严的密哈拉布，说明了中国瓷器在肯尼亚人们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中国瓷器受到肯尼亚人民的称赞，在1815年写的一首斯瓦西里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诗人哀叹帕塔城邦消失了的荣誉曾这样写到：“从前镶嵌有瓷器的壁龛，现在成了野鸟眷恋幼雏之所。”⑤很显然，这里诗人用镶嵌有中国瓷器的壁龛来象征帕塔城邦的繁荣。

四　瓷器到达肯尼亚的路线

肯尼亚与中国相距两万余里，这些中国古代瓷器又是经过什么路线到达东非呢？这就需要我们追溯一下中国与东非沿岸的海上交通与贸易往来的历史。

唐代贾耽记载了中国—波斯湾以西的海上交通路线。⑥这条路线的终点是非洲东海岸的“三兰”，⑦目前对“三兰”究系何地尚无定论，但“三兰”在非洲东海岸则是肯定的。

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麻素迪曾到过桑给巴尔、印度和中国，他说桑给巴尔象牙是通过阿曼运到印度和中国的。⑧说明唐末五代时，我国与东非已有了间接的贸易关系。

到了宋代，我国商船已把一些出口商品运到苏门答腊的巨港、印度的奎隆和古吉拉特、阿拉伯半岛的苏哈尔等地，然后由外国商人转运到东非。《诸蕃志》层拔国条记载："每岁胡茶辣（即古吉拉特）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贸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⑨。

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中国瓷器是如何经印度和阿拉伯商人转运到东非的。波尔斯早在1920年时就指出，约在1270年的确有证据证明一个中国船队曾访问过东非海岸⑩。这些简单记述，说明宋元以来，中国瓷器是由海上通过印度、阿拉伯等国商人转运和中国人直接贩运这两种途径到达东非沿岸国家的。

明初震动世界的三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七下西洋的壮举，开创了大规模船队经印度洋东西两岸直达非洲东海岸的航行。据文献记载，郑和曾到达过东非肯尼亚麻林地、曼巴撒（蒙巴萨）、索马里木骨都束、卜剌哇和竹布等地。郑和下西洋发生在15世纪上半叶，这时正是非洲东海岸各伊斯兰城邦的黄金时代，各城邦都有着发达的海外贸易，都想向外扩大影响。由此，麻林地（马林迪）、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和竹布（朱巴河口附近）等城邦都派使访问我国。郑和远航东非亦有回访的性质。在频繁的使节互访过程中，贸易和物质交流也在同时进行。肯尼亚古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明代初期的瓷器，有些应是这些往返于两地之间的使者带去的。当然，除此之外也还会有其它商人由海路运往东非沿岸各国的。

郑和下西洋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明政府虽然实行了"海禁"，严禁民间船只出海贸易，但是这种禁令并没有能限制住民间海外贸易的活动。到了隆庆时期，"海禁"政策被迫取消，我国又有大量的商船往返于东南亚及东部印度洋各地，甚至远至亚丁。肯尼亚古代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大量的嘉万及以后时期的瓷器，可能就是由我国船只运到一些中途港，然后由外国商人转运出去的。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16世纪50年代，又窃据了我国的领土澳门。此后一百年内，澳门至果阿是中国至印度西海岸的一条主要航线，通过这条航线，我国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印度，再转运到东非肯尼亚的马林迪和蒙巴萨等地（马林迪和蒙巴萨这两个城市先后是葡萄牙殖民者在东非的"首府"）。肯尼亚古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晚明时期的大量中国瓷器，有些就是通过这条航线由葡萄牙等国商人贩运去的。葡萄牙人贩运中国瓷器数量是很大的，如1604年葡萄牙船只加达里纳号被劫往阿姆斯特丹，估计该船仅装有万历彩瓷即达10万件⑪。

1600年、1602年，英国、荷兰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在葡萄牙衰落之后，他们极力插手亚洲各国贸易，将我国货物贩运至印度等地，然后经转手贸易运至东非。在简单地回顾了这段历史以后，我们对肯尼亚出土如此众多的中国古代瓷器是如何飘洋过海东渡到肯尼亚是否可以说得到了答案。

---

① R.C.M皮尔西《蒙巴萨沉船发掘简报》1977年、《蒙巴萨沉船发掘二次简报》1978、《蒙巴萨沉船发掘三次简报》1978年、《蒙巴萨沉船发掘四次简报》1980年，见《海上考古学杂志》1977年、1978年、1979年第四期，1980年第二期。

② J·刻尔克曼《1948—1966年肯尼亚考古发掘的某些结论》，《东非和东方》1975年，纽约。

③ 马希桂、马文宽《蒙巴萨杰斯堡博物馆保存肯尼亚出土的有款识的中国瓷器》；马文宽《肯尼亚

出土的中国瓷器》，《景德镇陶瓷》1983年1期

④ 马文宽《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景德镇陶瓷》1983年1期。
⑤ G·马休《东非和南阿拉伯海岸的中国瓷器》，《东方艺术》1956年2期。
⑥ 《新唐书》卷四十三，中华书局版。
⑦ 张政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指出"三兰国在东非洲沿岸"。
⑧ 转引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联书店，1965年。
⑨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
⑩ 斯沃滋（E·H·L Schwnvz）《中国人与非洲的接触》，J. R A S. B 1983年。
⑪ 吉田光邦著、白英译《景德镇陶瓷生产与贸易情况》，南京博物院集刊4，1982年。

“汝窑”及宝丰清凉寺窑址

邓城宝

汝窑，位于汝州而得名，和定窑、官窑、钧窑、哥窑合称宋代“五大名窑”。我国宋代瓷器，在唐、五代基础上已有了较大发展，其造型和装饰均达到了很高水平，制出了别开生面的一代绚丽多彩的瓷器艺术之精品，史称“宋瓷”。汝窑瓷器又称宋瓷之首，它胎质细洁呈香灰色。器体薄而均匀，釉汁用玛瑙入釉，烧制出纯正的天青色，并首创了极为美观的人工开片纹，在中国陶瓷史和世界工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据宋人记载，汝窑是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创建专为皇宫进贡的御用窑。汝窑瓷器在宋瓷中制作最精良，也最为珍贵。宋人记载中即有“汝窑为魁”之说法。目前，存于世能见诸图录者仅60余件，从而可知它的名贵程度。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一书中写道“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为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个瓷窑。

汝窑瓷器因是北宋徽宗钦定烧制的御用器，故制作十分讲究。其特征为：胎质细腻、色灰而偏白，俗称“香灰胎”，由于瓷土中含有微量铜，因此，迎日光观其器表，釉下略闪微红，这也是汝窑不同于它瓷的一个重要标志。汝窑的烧造方法，主要采用满釉支烧（或叫裹足支烧），器皿底部多见细小的挣针痕，三或五枚两种奇数支钉，也叫芝麻支烧。关于汝窑色釉，文献所记众说纷云，各不相一。但就国内所藏汝窑器而论，独有特殊风格。色调比较稳定，呈淡天青色，有稍深、稍淡之分。器面一般均无刻、印花纹装饰，色釉乳润无刺眼光泽，瓷釉多有蟹爪隐纹，棕眼稀少，气泡无几，叶喆民先生曾形容为“寥若晨星”。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陶瓷专家十分关注的“汝窑”之谜，一直悬而未决。近几年来，笔者带着这个问题，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因宋时宝丰隶汝州，制瓷又属“汝窑”瓷系，故对宝丰县辖区内诸窑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从调查中发现清凉寺窑内有相当数量的瓷片酷似“汝窑”器，对此曾连续于1985年和1986年郑州、西安年会发表《清凉寺汝窑初探》、《河南青瓷探源》论文，阐述“汝窑”在宝丰清凉寺的可能性。现就清凉寺窑之我见，再谈一些个人看法，并求教于专家、教授、学者。

清凉寺窑群（《中国陶瓷史》命名为“宝丰窑”）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南。面积南北长2.5公里、东西宽1公里，窑址内涵甚丰，东南部韩庄村东有晚唐及五代时期的窑址，其余绝大部分为宋代民窑（即所谓“临汝窑”），以印花青瓷及黑、白瓷为主，含窑址20余处。西部为金、元时期窑址。“汝窑”址紧临村南，东西长31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93000平方米。窑址地势平坦，四面山岭环抱，有小溪绕其西、南两面，制瓷原料极丰，煤炭、木料、高岭土、釉药等就地可取。据史料、资源、遗存等分析，这里定为“汝窑”的根据主要有四：

一、宝丰唐、宋两代皆为汝州辖县，州之近辅。《太平环宇记》及《宝丰县志》均记载有：宋时“废临汝入龙兴（宝丰旧名）”条，而“汝窑”是以“命汝州造青瓷器”得名，时

青岭镇界烧窑业极为昌盛。据《宋史》及《宝丰县志》载，哲宗元祐间这里置青岭镇设巡检司（与龙兴县名并存、在今大营镇）专管坑冶，寻因青岭镇界产玛瑙，宝货兴发，政和初蒙朝廷赐名"兴宝镇"，宣和二年因县有冶铸场改名宝丰。这些都说明赵宋王朝对这里坑冶技术的发展及昌盛极为重视，并设置有"专管坑冶"的官办机构，其时间均与史载"命汝州造青瓷器"相符，故"汝窑"在清凉寺决非推理，而是理所当然。

二、汝窑"内以玛瑙为釉"与《宋史·食货志》："提点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岭镇界产玛瑙"之记载正相吻合，其时当在政和初年，亦在钦命"汝窑"之后。除此之外，在清凉寺附近，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瓷土遍布，且出产含硅量达90%以上的石英，并有玛瑙，这些正是汝窑制釉的主要成分，可以说清凉寺制瓷的燃料、高岭土、釉药等原料俱全，也是宋时这里窑业能够昌盛发展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三、从瓷片拣选和窑址试掘所得器物标本，证明宝丰清凉寺窑址为"汝官窑"之论断无疑，部分出土器物尚属稀世珍品。对于清凉寺窑址的发现，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前辈瓷器专家陈万里先生曾亲临调查，发表《汝窑的我见》重要文章，后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叶喆民教授先后多次到宝丰窑址考察，他们并在清凉寺窑址内拣到了"汝窑"瓷片，经上海硅研所郭演仪同志化验与周仁先生化验故宫汝窑洗盘的成分基本一致，且外观非常相似，说明国内瓷界专家、学者为清凉寺"汝窑"的发现是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近年来，笔者为证实汝官窑在清凉寺的准确位置，多次赴窑址调查，并拣选了大量汝窑瓷片，特别是其中所见淡天青釉外裹足微挣针痕支烧器底，被认为是"汝官窑"之拣弃物。据此，在1986年西安年会曾发表论文考证，引为重视。1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金槐、赵青云先生到窑址调查后，已开始在清凉寺进行试掘，从试掘200平方米的较小面积内，收获了重要之"汝窑"资料，探到了作坊、窑炉及瓷片堆积层。并在探方中发现一处汝瓷窖藏，经清理共得器物二十四件，大部分为裹足支烧，计有高颈鼓腹瓶一件，造型为翻唇、高颈、鼓腹似橄榄，圈足外曲，内有三枚细小的支钉痕，胎灰偏白、壁质密薄且匀，施纯正的淡天青釉，釉下闪微红，满釉裹足；高颈折肩瓶一件，翻唇、高颈硕长、肩与底均直折，腹略鼓、曲足外卷，满釉裹足，胎灰偏白、壁薄1.5毫米，统体施纯正淡天青釉，釉下略闪微红，圈足内有三枚支烧痕，是宋器中少见的一种造型；另有外裹足支烧盘三件及其它器皿均属小型。从这次试掘中，虽为管窥一斑，但已获振奋人心之重要实证，特别是这批坑藏，更有力说明了"汝官窑"的确切位置。

四、清凉寺窑群的面积相当庞大，总约250万平方米。其窑口林立，瓷片、窑具堆积如丘，文化层遍布，叠压厚度0.5—3米不等，山崖断壁处测量最多可达12米左右，足以想见当时烧窑业之盛况。当地至今在民间仍流传着"清凉寺到段店（鲁山窑），一天进万贯"的民谣，是记载汝窑昌盛景象的口碑。从上所述，可见清凉寺窑址之壮观场面，实为各地窑址罕见。特别是窑群内所含之"汝官窑址"更是以沟、河划界，互不相杂，与民窑区隔，说明当时为宫廷烧造"汝瓷"贡品的窑口控制甚严，无怪汝窑产品竟然如此名贵。

关于"汝窑"外销：

我国陶瓷自唐代已有相当数量输出国外，由于瓷器是中国独有的商品，入宋以来，对国外销售有增无减，反映了宋代制瓷业的发达昌盛。半个世纪以来，在亚非不少国家陆续发现了很多我国宋代瓷器及碎片标本。但由于直接看到发掘资料较少，且汝州窑位居中原，汝瓷又为宫廷所据，故外销者多属民窑青瓷，数量也受直接限制。就《中国陶瓷史》所列瓷器出

口国所见青瓷、白瓷等数量之巨，可知亚太地区青瓷是有较高之声誉，特别是青釉装饰瓷的刻、印工艺更受欢迎。如朝鲜的龙媒岛、开城及春川邑均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临汝窑（即汝州民窑）瓷器，可见汝州青瓷给高丽王朝以较大影响。北宋宣和年间出使高丽的徐竞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谈及当时高丽所用瓷器时即有“……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瓷器大概相类”。此“汝州新瓷器”很可能就是指的“汝官窑”之产品。日本是出土中国宋瓷较多的国家，据《中国陶瓷史》所举“以青白、青瓷为主”器物中“盘碗器皿最多”装饰以莲瓣纹等印花纹饰，并有低温三彩瓷之特点，此亦与宝丰清凉寺窑群内所见瓷器相吻合。另据叶喆民先生提供照片资料，日本现藏之汝瓷中，尚有制作极精良的碗、樽等器，从另一侧面可知，北宋“汝窑”的存在虽为时短暂，产量较少，但由于名冠宋瓷之首，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福建漳浦宋、元窑址

王文径

1985年和1986年秋冬，我们先后在漳浦县境内已知的15处古窑址进行多次调查，现将其中五处宋元时期窑址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　竹树山窑址

位于漳浦县赤岭乡石坑林场竹树自然村的窑场分布在东西走向的公路北面六座山头上，约长1000米，宽200米，遗物堆积约2米厚，三公里长的小公路面上遍布碎瓷片、窑具，公路旁的断面可见六个窑床横截面，其方向东南或正南。竹树山窑的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罐、壶，以碗、壶为多，釉色为淡梅子青、古灰或古绿，釉层较薄，可见出筋或小开片，器体内外满釉，不流釉，足底露胎，胎色灰白、质密，所见纹饰较少，主要有刻花、印花。该窑均采取匣钵仰烧的方式。

碗　可分为四式。

Ⅰ式，唇口浅腹，壁略直，圈足矮宽，均素面，口径16.5，底径6.5，高6.5厘米。

Ⅱ式，口直薄沿，弧腹，高圈足，素面或外壁划直线纹八组，胎色古灰，口径15.5，底径6.5，高7.5厘米。

Ⅲ式，敞口薄沿，腹壁斜直，小圈足、素面，口径10.5，底径3.5，高4.7厘米。

Ⅳ式，折唇，腹壁深弧，圈足，外划直线纹，内壁临沿处及外壁临圈处各有一至二道弦纹、内划卷草纹。其中有一件碗底印卧鹿、云纹和水纹。口径19.0，底径7.2，高8.2厘米。

盘　可分为三式。

Ⅰ式，沿宽略平，足底矮，内腹中多划一弧纹，口径13.2，底径4.6，高3.5厘米。

Ⅱ式，折唇，腹壁略弧，圈足，内划花，口径12.5，底径1.5，高4.0厘米。

Ⅲ式，厚沿，敞口，斜直腹，无圈平底，均素面，口径11.0，底径4.0，高3.3厘米。

高脚杯　唇口微敞、厚胎，临底处尤丰厚，外壁弧如球状，浅底，足中段有三道弦纹，足下外撇，足底中挖空一段，器体厚重，施淡梅子青釉，口径12.5，足径5.5，足高11.0厘米。

豆形杯　通体如豆形，口沿略外敞，胎体薄，口径13.0、足径2.5、底径5.2、高10.2厘米。

葵口杯　沿薄，呈六棱葵口，略外敞，莲苞状腹，豆形圈足，釉色米黄、胎质松、烧成温度较低，口径8.0、底径3.5、高4.2厘米。

壶　器形可分为二式。

Ⅰ式，喇叭口瓜棱壶，此式器物发现甚多，壶口呈喇叭状，丰肩鼓腹、圈足，器身上下均各凸起一道，腹划六瓣瓜棱，或在瓜棱瓣中划满鱼鳞状纹，肩一侧有弯曲的长流，另一侧贴附曲柄，柄由二至三道圆瓷条组成。壶口9.0，口颈高10.0，腹径14.0，底径8.0，流长

9.0，通高24.5厘米。

Ⅱ式，均残，腹扁，平底，无圈足，划满粗直纹至底，纹多重叠，底径8.5厘米。

瓶　均仅存口沿，可分数式，大致为直口，折唇，颈下外撇，颈部有数道弦纹，丰肩，有耳。

罐　均存口沿，唇圆、肩部常有弦纹。

器盖　均残。

瓷砚　仅一式，砚面平薄，下摆作云状曲线，等距离卵形镂空，径12.5，高1.8厘米。

匣钵　漏斗形，直口弧底，夹砂陶质。

二　南山窑。

在漳浦南山华侨农场碗匣山。窑均分布于佛县至赤岭公路两侧的三座小山坡上，长约300米，宽200米，堆积厚达3米。地貌可辨窑床的位置，因公路施工，窑头已遭破坏，残长可达30米，坡度30度，方向东南。南山窑主要产品为碗、钵、少量盘盏。胎质多因含砂量偏多显得粗糙，胎色灰白，少量青灰，质软。釉色为黄绿、淡褐、黄色，釉面温润如镜、大开片、常有流釉，碗底釉层甚厚，常呈玻璃质，器体内外满釉，露底足。纹饰为刻划卷草纹和篦点纹，属“珠光青瓷”。

碗　可分七式。常见四式。

Ⅰ式，敞口，上壁斜直，下急收、低圈足。内壁上部有五至七道弦纹，外壁划粗直纹。口径19.0，底径6.0，高8.0厘米。

Ⅱ式，大敞口，腹壁弧，低圈足，外划肥莲瓣纹。口径16.5，底径6.2，高5.5厘米。

Ⅲ式，折沿，厚唇。上壁弧，下壁急收，内腹深，小圈足。口径13.0，底径4.8，高5.5厘米。

Ⅳ，唇薄，腹直略弧，内底中圈凹陷，圈足，外划斜直纹六至七组，内划卷草篦点纹，口径17.0，底径5.8，高6.5厘米。

盘　可见三式。

Ⅰ式，大敞口，双折腰，圈足，口径19.0，底径6.5，高6厘米。

Ⅱ式，类Ⅰ式，较小较矮。口径13.0，底径5.5，高3.5厘米。

Ⅲ式，敞口折腰，腰以下略平，无圈。八平底。口径10.0，底径2.5，高2.5厘米。

钵　可见二式。

Ⅰ式，口沿残，壁弧。无圈足，底中凸起，内划细密的云纹篦点，外划垂莲纹，足底打十字叉，施透明占绿釉，釉层厚，有大开片。口径16.0，底径5.5，残高5.5厘米。

Ⅱ式，圆唇、敛口、弧壁。器底中圈凹陷，无圈卧足，施透明青绿釉，外壁等距离划数道涩直纹。口径14.5，底径5.0，高5.5厘米。

盏　仅一式，唇薄直口，鼓腹，器体下部厚重，假圈足，平底。口径6.0，底径2.5，高3.0厘米。

三　罗宛井窑

在漳浦县城西南的金刚山南麓，为沙西乡北旗村罗宛井自然村。面临漳江入海口的下寨外贸码头，窑场分布在漳浦至云宵县的公路西北面，部分窑头与村庄、公路连在一起。窑址分布为西北走向，长约800米，宽300米，窑床顺山势呈正南倾斜35—40度，堆积层厚约3米。其主要产品为碗、盘、杯、壶，以碗为主。釉色白或青白，少量淡梅青、米黄，釉层薄，多

有小开片，满釉露底，胎骨白，质轻、松，纹饰主要为刻划卷草、莲瓣、篦点，线条流畅，刀法细腻娴熟、构图简洁。

碗 种类繁多，大致可分四式。

Ⅰ式，口沿微敞、上壁斜直、下壁弧线内收，深宽腹，圈足高且直，内壁上临沿处常划一道弦纹，外壁划莲瓣纹，线条细，其大小规格有五种，常见为口径15.5，底径7.0，高8.2厘米。

Ⅱ式，折沿、腹深宽、足圈直、薄，口径11.5、底径4.8、高4.8厘米。

Ⅲ式，口沿直薄，下腹急收、矮圈足，底中圈凹陷，口沿刻葵瓣形五缺口。口径16.0，底径6.8，高6.8厘米。

Ⅳ式，敞口，腹壁斜收，内底中圈凹陷。口径16.0，底径6.8，高6.8厘米。

盏 分二式。

Ⅰ式，口沿外翻，壁斜直至内底中心呈漏斗状。圈足低小，口径10.2，底径3.3，高3.8厘米。

Ⅱ式，上壁斜直，下壁弧收，深宽腹，无圈，小卧足，胎轻薄。口径12.4，底径4.5，高4.8厘米。

盘 可分七式，常见四式。

Ⅰ式，口斜直、折腰，无圈平底，内划卷草篦点纹，口径11.0，底径3.5，高2.5厘米。

Ⅱ式，六瓣葵口，内壁葵口下各有一竖凸纹，平底无圈。口径11.4，底径4.0，高2.5厘米。

Ⅲ式，口沿厚平，内折腰，外壁弧，无圈小平底。口径10.0，底径2.0，高2.5厘米。

Ⅳ式，敞口直壁，内底上凸，卧足。口径10.0，底径4.0，高1.8厘米。

座式杯 唇口直壁，内底平，杯足作座式，中空，素面。口径6.8，底径3.4，足高2.0，通高5.5厘米。

杯口瓜棱壶 可分二式。

Ⅰ式，口颈作圆筒形微敞，丰肩，器腹鼓，划六瓣，圈足，肩部一侧有曲流，另一侧贴曲柄至口沿，柄由二条圆瓷条组成，外施淡青釉。口径7.0，颈高4.8，腹径14.0，底径8.5，通高15.5厘米。

Ⅱ式，（残）圈足、腹扁、划六瓣瓜棱，底径8.8厘米。

窑具 有漏斗形、筒形匣钵、筒形垫具。

四 南门坑窑

位于城关乡英山村南门坑自然村北侧的碗匣山，窑场分布在二座并立的小山头东南侧，以靠南的山头为主，东北面的小山正东坡上仅见一座龙窑，外貌清楚，为东偏南方向（此窑的产品仅见小盘）。南门坑窑的主要产品为碗、盘及少量瓶、罐，造型大致都是上薄下厚、底足粗糙、胎骨质硬，釉色有青灰、灰白、青黄、淡褐黄多种，其中青绿色釉层较薄、无开片。青黄、淡青色釉釉层较厚，内外流釉、釉色呈透明玻璃质状，外壁不到底。主要纹饰为刻、划的卷草篦点、花卉，线条粗糙、豪放，并有见划“福”“礼”字于内底者。

碗 应为“珠光青瓷”器，可分三式。

Ⅰ式，敞口，壁微弧，内底平，下体胎厚，内划花。口径14.8，底径5.2，高6.5厘米。

Ⅱ式，大敞口，沿外翻，弧壁，低圈足，口径13.6，底径4.5，高4.5厘米。

Ⅲ式，唇厚圆，下壁斜直，下壁弧收，低圈足，内底下凹。口径10.6，底径4.0，高4.5厘米。

盘　可分七式，常见三式。

Ⅰ式，平口直壁，厚胎，小圈平底。口径9.5，底径4.2，高2.5厘米。

Ⅱ式，直壁无圈平底。口径10.5，底径4.8，高2.8厘米。

Ⅲ式，（口残）直壁，折腰，内底宽平，下部胎骨厚重，大圈足。口径约14.0，底径6.2，高4.0厘米。

器口　均残，仅可辨瓶、罐四种。

窑具　可见匣钵、垫环、垫饼。

五　仙洞窑

位于中西林场仙洞工区碗窑坑，窑址分布在鹿溪上游溪边两座小山头。因修桥筑路破坏严重，实际范围不详。采集标本以窑具为多，瓷片甚少，仅见碗二式。

Ⅰ式，（残）腹壁斜直、圈足、胎骨厚重，施青黄釉不及底，外划八组直纹，内划卷草篦点纹。底径5.0厘米。

Ⅱ式，（残）碗腹宽平，矮圈足，胎骨厚重，粗糙。施青灰色釉不及底，釉层厚、流釉、底径6.4厘米。

窑具匣钵截面呈“M”形。

六　几点认识

漳浦县宋、元时期窑址的分布甚广，也具有较大的规模，从各方面材料看来，烧造时期也逾百年以上。明嘉靖二十七年修，万历、康熙等多次重修的《漳浦县志》，对以上几处窑址均无一字记载，可见明代时这些窑场停烧已久了。

现根据器物的特征分析：竹树山的Ⅱ式碗，罗宛井窑的Ⅰ、Ⅱ、Ⅲ式碗，均有薄胎、圈足高、直、挖足或半挖足，腹内深宽等特点。与江西湖田窑的北宋中晚期产品及南丰窑，南丰纪年宋墓出土的同类器造型很接近；竹树山窑的喇叭口瓜棱壶是宋代景德镇窑的常见作品，罗宛井窑的杯口壶也是宋代的典型新创产品；大量出现的罗宛井窑六瓣葵口碗则具有五代至北宋的作风；罗宛井窑的Ⅰ式盏、Ⅱ式碗、南门坑窑的Ⅰ式碗的造型与同安窑南宋的同类产品相似。

划花篦点纹始创于宋，这种形式很适合用于表现卷草的叶片、飘动的云纹、肥硕的莲瓣，在适当的空间配上篦点，或以篦片划出成组的细线条，用以增强纹饰的层次，在构图上注意了空间，其线条较为纤细，有特定的主题，与北宋中晚期，南宋早期的审美情趣很接近，这类作品大量地出现于罗宛井窑的青白、白瓷器上。南门坑窑，南山窑及罗宛井窑的小部分作品，较多采用的是外壁划粗莲瓣和数组直条纹，内壁的划花篦点纹不再注重主题，似为工匠以娴熟的刀（篦）法在胎体上任意勾划，仅限于使其集中在器体的某一区域里，或者说仅仅表现线和点本身的情趣。这种作风与青黄、淡褐黄釉共存，与同安窑以至福建沿海的南安、安溪、莆田，浙江的金华、丽水地区发现的“珠光青瓷”是同类型的，造成这种风格的原因大致是工匠在充分掌握了刻划技巧后，因大量的操作过程不可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构思时间，必然也不会产生创作的欲望，尤其是面对着千篇一律的生活用瓷，其次，从与这类作风并存的瓷器胎质均较为粗糙，可认为与消费者的需求有直接关系，这类作品应晚于上述的罗宛井窑。对比以上四个窑口，竹树山窑的纹饰较少，但也可以看出，该窑已大量采用刻花与印花，故构图比较规范、线条粗细均等、布局讲究对称、图案性较强，可以在不同的器物

上找到基本相似的纹饰（其中一种内底印蜷曲前肢的小鹿，形态与同安窑一例极为相似），这是因为竹树山窑的主要产品多为壶、瓶、杯等极高层次的器物，更主要的是，竹树山窑的销售渠道是经南溪、九龙江运销外地，而其他四窑是通过鹿溪、赤湖溪等运往旧镇港、下寨港销出。

罗宛井窑的大部分产品采用北宋流行的青白或白色釉，竹树山及罗宛井的小部分作品（主要是壶、瓶、杯）的釉色则以淡梅子青为主，釉色较龙泉窑薄且浅，但已可以看出受到龙泉窑的很大影响了。此外三窑釉色多为青绿、青黄、淡褐黄色，釉层较厚，玻璃质强，近底露胎，基本上与同安窑的“珠光青瓷”同出一炉。“珠光青瓷”创烧于北宋，但大量烧造在南宋时期。

五个窑口均采用唐宋流行的漏斗形匣钵、器底安垫饼仰烧的方式。罗宛井有发现专供烧造壶类的桶形匣钵，这种匣钵流行于宋中期。南门坑窑的匣钵形制多样，仙洞窑有“M”形匣钵，应为工匠在后期根据烧造器形的特点，在漏斗形匣钵的基础上略作改造，南门坑窑所见垫环，虽宋元时期有流行，但该窑发现不多，且没有发现用该种窑具烧造出来的芒口标本，可见未被普遍采用。

综上所述，罗宛井窑的烧造年代应从北宋中晚期到南宋初；南山窑的年代应在南宋；竹树山窑、南门坑窑、仙洞窑可能始烧于南宋，终于元。其中竹树山窑应延续到元代中晚期。也就是说北宋时主要生产白瓷和影青瓷，南宋主要生产青瓷。

漳浦县境内已知的这五座宋、元窑场，主要产品为日用瓷，其生产能力显然远远大于当时当地人民的需求量，所以产品的主要出路为外销。

南宋以后，北方的经济文化迅速南移，福建沿海地区的瓷业不断发展，但由于与北方地区的交通不便，尤其是江西、浙江等地的瓷业已处领先地位，使福建的产品几乎不为中原所知。而丰富的河流资源，漫长的海岸线诸多天然良港，特别是泉州港的兴起，支撑了福建瓷业的生存和发展，也注定了其产品必须走向世界。

漳浦位于福建东南沿海，海岸线长达210公里，有多处天然深水港口，有的可容纳十万吨级海轮进出。据《宋会要·食货》载。“漳浦有敦照务”，《元丰九域志》也载：“敦照一镇，董敦一盐团”。宋亡之日，皇裔赵若和就带领逃出的船队，在佛昙港北面登岸，此后定居漳浦。可见在宋代时，漳浦海上交通就很发达，旧镇港已设立了办理收税发给商船执照的机构。明清时期，漳浦人利用这些港口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建立发达的海上交通，更多见诸于史籍。目前，与台、港通商贸易的还有鹿溪入海口的旧镇港，罗宛井附近的下寨港。可供海轮进入的还有六鳌，赤湖，古雷等处。本文所述的五个窑场，均分布在河流或海岸边，可通过水运直接以合法的、非法的手段运销外地。六十年代下寨港清港时发现了大量宋代瓷片，就是很好的证明。

日本镰仓时期（相当于我国南宋时期），大量地使用“珠光青瓷”等中国瓷器，在同时代的遗址中出土中国瓷,种类有青白瓷，“珠光瓷”龙泉青瓷等，其产地为南方沿海各省，可见日本人当时对中国瓷进口的种类、窑口、港口的选择都不会是单一的。漳浦出产的瓷器显然可认为已装上货船，运出港口，但绝不是运往泉州一带，去与德化瓷、磁灶瓷争夺市场，也不可能运往广东与广州、潮州一带的产品比高低，更不会运往北面到越瓷、龙泉瓷、景德镇瓷的产地，那么，其销售地极有可能是日本或东南亚诸国。当然，这还有待于更多更直接的材料来证实。

福建南平茶洋宋元窑址再考察

林蔚起　张文崟

一　前言

一九八〇年三月，省博物馆与南平市文化馆文物干部在福建南平太平乡茶洋村调查，发现了一处宋元窑址遗址①。遗址位于茶洋村后山，分布于连成片的五座山头上，地表暴露大量的匣钵、支圈和瓷器堆积物，总面积达七万平方米。

茶洋村濒临南平至福州的闽江上段，西距南平二十七华里，窑址背山面水，周围瓷土矿藏丰富，水源、燃料充足，交通亦十分便利。

南平市博物馆于一九八七年四月文物普查时对茶洋窑址再作调查，这是继一九八〇年省市联合调查之后的又一次调查。在调查采集的标本中有不少是新发现的品种，由于窑址未进行发掘，只局限于地面调查和采集，现将一些新收获整理如下，以就教于各位方家学者。

二　新标本的整理与分类

青釉类标本分碗、碟、杯、盏托、盂、洗等。

碗有敞口和撇口两种。

敞口碗　五式。

Ⅰ式（残），口部微敛、斜壁微弧，实足小而浅挖。浅灰胎，腹底部以下露胎。施浅灰釉或淡青釉，釉水润滑。内壁阴刻双线五叶状花及花蕊。口径13.6、足径4、高6.2厘米。

Ⅱ式（残），斜弧腹，圈足底厚且平。灰胎，胎体厚重，施灰绿釉，腹底部以下露胎，芒口，光素无纹。口径15.8、底径5.6、高6.2厘米。

Ⅲ式（残），斜弧腹，矮圈足，灰胎施青灰釉，釉层玻璃质感强，腹底部以下露胎，碗底壁有压印凹圈。口径16、底径5、高5.6厘米。

Ⅳ式（残），圆弧形腹，腹部较深，矮实足，灰胎施青灰釉，釉质及施釉方法同上。口径16.8、底径6.4、高6.6厘米。

Ⅴ式（残），口部微敛，斜弧形腹，小圈足，灰白胎，黄绿带灰色釉，釉水莹润，外壁竖刻五条平行组线纹，内壁饰以卷草叶篦点纹。口径17.2、底径5.2、高7.8厘米。

撇口碗　四式

Ⅰ式（残），口稍向外折撇，圆弧形腹，圈足，底有乳突痕，灰胎施青灰釉，腹底部以下露胎。口径12、底径4.4、高4厘米。

Ⅱ式（残），深腹，圈足，底有乳突，灰白胎施黄绿釉，腹底露胎，外壁饰平行复线刻划纹。口径11.6、底径4、高5.2厘米。

Ⅲ式（残），斜壁深腹，小圈足，灰白胎青黄釉，腹底露胎。口径9.8、底径4、高4.4厘米。

Ⅳ式，完整，斜弧形腹，厚底，圈足，灰白胎，黄釉，内底涩圈，外腹壁以下露胎。口

径11、底径4.6、高5厘米。

碟　三式

Ⅰ式，撇口，折腹，小平底微内凹，浅灰胎施灰青釉，腹底露胎，釉质莹润细致，有少许冰裂，器体光素无纹。口径12.8、底径3.8、高3.2厘米。

Ⅱ式，撇口，折腹，小平底，胎釉同上。口径10.8、底径2.8、高3厘米。

Ⅲ式，完整，直口微撇，折腹微弧，实足，灰胎施粉青釉，除底部外，内外满釉，釉面晶莹光洁。口径12.6、底径4.8、高4.2厘米。

杯　三式

Ⅰ式（残），直口弧腹，喇叭状外撇高足，足内底挖圆锥状空心，灰白胎，黄釉，除足外内外满釉，釉水厚聚，有小冰裂纹。口径12、足径3.2、足高3、通高8厘米。

Ⅱ式（残），撇口圆弧腹，高圈足，暗灰胎淡青釉，足下部露胎，釉层较厚，釉面莹润，有少许猪毛孔。口径9.2、足径3.6、足高3.6、通高7.6厘米。

Ⅲ式（残），撇口折腹，高圈足，灰白胎，施深青灰釉，开小冰裂纹，釉面莹润光洁，足下部露胎。口径10.8、足径3.2、足高3、通高6.8厘米。

洗　1件，直口浅弧腹，平底内凹，灰白胎，施灰青釉，腹底露胎，芒口，口径12、底径8.6、高3.6厘米。

盂　1件，敛口弧形腹，平底内凹，灰胎黄釉，环肩部堆贴七只乳钉。口径12.4、底径6.4、高5.4厘米。

盏托　1件，敛口，弧形腹，外撇高圈足，灰白胎施淡青灰釉，足部露胎，釉面有乳浊状小气泡。口径10.8、底径3.2、足高3、通高6.8厘米。

青白釉类器型有碗、杯、洗、盘、盒等。

碗有唇口、葵口、撇口三种形式。

唇口碗　分五式：

Ⅰ式（残），斜弧腹壁，圈足，切削工整，灰白胎，除圈足内外施白釉，釉水乳浊，釉面润泽。口径14.6、底径6.4、高7.6厘米。

Ⅱ式，完整，斜腹壁，浅圈足，灰白胎体较厚重，除底足内外满釉，釉色灰白闪青，釉水呈玻璃质，十分莹润光洁。口径14.6、底径6.4、高6厘米。

Ⅲ式（残），斜弧腹，圈足、灰白胎，釉色白闪青灰，釉质同上。口径15.4、底径6.4、高6.1厘米。

Ⅳ式，完整，斜腹，浅圈足，碗内底有饼状凹痕，灰白胎，施卵白釉，釉质同上，口径13.4、底径5.8、高4.6厘米。

Ⅴ式（残），弧形腹，圈足高且小，切削规整，胎釉同上。口径10.6、底径3.1、高4.4厘米。

葵口碗　有三式

Ⅰ式（残），葵口外撇，高圈足，足内壁外撇，底沿薄，切削规整，灰白胎，釉色白闪青灰。口径12.2、底径5、高7.4厘米。

Ⅱ式（残），葵口外撇，斜壁微折，高圈足，胎釉同上。口径11.6、底径5、高6.4厘米。

Ⅲ式（残），葵口外撇，斜腹，大圈足，较矮，胎釉同上，碗内底涩圈，涩圈上一圈凹

弦纹，外壁浅刻四道弦纹。口径12.6、底径5.6、高4厘米。

撇口碗 有八式

Ⅰ式（残），弧形腹，圈足，切削工整，灰胎施白釉，釉色闪灰，有猪毛孔。口径14.8、底径5.6、高6.2厘米。

Ⅱ式（残），弧形浅腹，小圈足，浅灰胎，卵白釉，釉色闪灰，内壁有平行曲线纹。口径15.2、底径4、高4.4厘米。

Ⅲ式（残），弧形腹，高圈足，切削工整，灰白胎，施白釉，釉色白中闪灰青。口径11.2、底径4.8、高6厘米。

Ⅳ式，腹以上残，斜壁如斗笠式，灰白胎、釉色白中泛灰青，碗内浅刻莲草纹。

Ⅴ式，斜弧腹，小圈足，白胎，釉质同上。莹润光洁，除足外内外满釉，器内外浅刻单线曲卷纹。口径11.4、底径3.4、高4.4厘米。

Ⅵ式（残），圈足，灰白胎，釉色灰白闪青，碗内底刻划单鱼纹。底足径5.6厘米。

Ⅶ式，撇口碗残片，芒口，白胎施玻璃质影青釉，内壁印把莲阳纹，十分光润精美。口径6.3厘米。

Ⅷ式（残），弧形腹，高圈足，切削规整，造型美观，灰白胎，白泛青灰釉，器内底有一圈凹印。口径7.3、底径2.2、高3.4厘米。

盖碗（残），直口弧形深腹，圈足，碗盖为弧面出檐式，顶部有短圆管状纽，灰白胎，白泛灰青釉，芒口，腹底以下露胎，碗壁浅刻长棱状交叉竖线纹，盖面刻棱尖状重菊瓣纹。口径12.4、底径6.8、高7.3、通高11厘米。

洗 二式

Ⅰ式，敞口斜弧浅腹，圆饼状实足，灰白胎，灰白釉，光素无纹。口径10.6、底径5、高3.2厘米。

Ⅱ式，敞口斜弧浅腹，平底内凹，胎釉同上，口径5.4、底径4.2、高3厘米。

高足盘 1件，腹以上残，高圈足稍外撇，浅灰胎，影青釉，盘底有四个方形支钉痕。底径11、足高5.3厘米。

粉盒 1件(残)，子母口，盘状，斜壁浅腹平底，内缀三只盅形容器，白胎，白闪浅水绿玻璃釉，纯白莹洁，底部无釉，刻有“吕皿”字样，口外径11.6、底径5.6、高2.8厘米。

盏 二式

Ⅰ式（残），敞口斜腹，圈足稍大，灰白胎，白泛灰青釉。口径10.6、底径5.1、高5.1厘米。

Ⅱ式（残），敞口斜弧腹，圈足，足壁稍外撇，足底有乳突状，白胎影青釉，盏中心刻划一朵五瓣花，花蕊突起，花外沿一周弦纹。口径13、底径4、高4.2厘米。

杯 二式

Ⅰ式（残），敛口，球形腹，喇叭状圈足，灰白胎，影青釉，釉及足外壁。口径5.6、底径3.2、高5.2厘米。

Ⅱ式（残），直口，弧形腹，实足浅挖，灰白胎、釉色同上。口径7.2、底径3.2、高4.6厘米。

黑釉类四件。

小壶 直口短颈溜肩，鼓腹平底，执手位于口肩部，流作圆管状，流高近壶口，流与肩

交接处有一个小圈，灰色胎，酱褐釉，腹底以下露胎。口径4.3、底径4、高 3.3厘米。

盘　敞口斜壁浅腹，圈足，灰胎褐釉，盘内涩圈，靠口沿处釉色渐浅变灰白，腹底以下露胎。口径12、底径4.8、高3.1厘米。

洗　直口斜弧壁，宽平底，底下三种垫泥，黑褐釉，灰胎，近底部露胎，近口沿外壁一道凹弦纹。口径24、底径19.8、高6.5厘米。

碟　敛口，弧形浅腹，圆饼状实足，黑褐釉，口沿和内壁无釉。

窑具类：

圆筒形匣钵，口径10、高 7.6 厘米。

托座，底呈喇叭状，托面平，束腰，用粗沙粘土烧制而成。口径10、高10厘米。

圆饼垫，粘于碗圈足之内，形小稍高于圈足。

三　茶洋窑的工艺特征及年代问题

从两次调查采集的茶洋宋元窑址标本来看，釉色可分为青釉、黑釉、青白釉三大类。瓷器品种有：碗、盘、杯、洗、碟、壶、盒、罐、瓶等。这些产品的胎骨有白、灰白、浅灰和褐灰数种，质地有细有粗，都十分坚硬。从釉色特点看，黑釉器有的纯黑如漆，有的呈褐色，胎外涂有粉红色化妆土，受建窑黑瓷系统影响。青釉器有的呈青色，有的黄绿色，受龙泉窑系影响。青白器大都施玻璃质影青釉，釉色灰白，白中泛青，显然又受景德镇窑的影响。除小件器物施满釉外，大部份都是腹部底下露胎，这是该窑的显著特点。黑釉器的仿“建盏”作品，无论造型、釉色、胎骨及窑变纹饰同建窑的产品完全一样，而壶、盏托、小碟、高足杯、洗、盘等又是建窑中所未见的新品种。在青釉和青白釉产品中，一部份光素无纹，一部份则饰以刻划花纹或模印阴纹、阳纹。刻划工艺精湛，有不少类似景德镇“半刀泥”的刻花法，线条流畅，形象生动。纹饰题材有：荷花、卷草、团菊、单鱼、双鱼、花叶篦点等图案。同时还有由成组线条或单线条构成的组合纹饰。其中，黄绿釉划花纹碗、以及青绿釉荷花纹碟、青白釉划花碗等同龙泉窑、景德镇窑的同类器物相比较，也毫不逊色。这次我们还发现了被称作“珠光青瓷碗”的黄绿釉卷草篦纹碗，也相当精美。

从出土窑具推测烧制方法，有匣钵单烧、支圈覆烧、托座叠烧等，形式的多样化，反映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瓷业发达盛况。同时以青釉、黑釉、青白釉器共存，集三大系统的瓷业作风于一处，此种情况尚属少见。

关于茶洋窑的烧制年问题，由于该窑未发掘，地层关系尚不明确，无法定得很具体。但是，从这次采集的新标本看，对年代的认识比第一次调查进了一步。一九八〇年的调查报告认为该窑年代在宋元之际，那么据这次调查我们可以推测，该窑创烧年代上限应为北宋中期之前，下限应至元末。理由有以下三点：

1.从青白釉器看，这次发现的唇口碗、葵口碗及高圈足碗都与景德镇湖田窑北宋同期器物相近②，唇口碗和葵口碗是五代常见碗型③，因为当时碗胎的铝氧含量较低，高温下易变形，为避免变形和修饰变形，所以把碗口做成唇口和葵口。茶洋窑的唇口碗形成了一个从厚大唇口演变到薄小唇口，从矮大圈足演变成高小圈足的系列，只是均未发现五代叠烧法所形成的支钉痕迹，所以这些唇口碗应当是北宋早中期的产品。茶洋窑高足碗的圈足切削十分规整，足内壁呈外撇状，足底外沿上斜，这种造型都是为了便于放入和取出垫饼，并避免粘釉，有的圈足内尚留有垫饼，这种垫具也是宋代中期流行的。

2.南平郊区的王台、土堡等乡的北宋墓葬中曾经出土过茶洋瓷器，如在一九八〇年，土

堡仓上宋墓中就出过六块完整的茶洋盖碗和一件影青釉瓜棱小执壶。

3.从黑釉器看，茶洋的仿“建盏”与建窑产品毫无二致，因为茶洋位于交通要道，与建阳相距仅74公里，受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更由于建盏的造型乃当时人们饮茶风尚所致，并非一地独有，所以，建窑黑釉既然烧于北宋中期，则茶洋黑釉盏的烧制时间亦当在其后不久。

四 外销初探

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隋唐时期，我国瓷器就通过陆路和海道运销阿拉伯和亚洲不少国家。五代，王审知入闽，在福州连江县定海镇开拓了“甘棠港”④，促进了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北宋王朝又在泉州设置了市舶司专管外贸货船，由于“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在封建朝廷的鼓励下，大量瓷器经由泉州和福州⑤外运至亚非各国。为适应瓷器外销的需要，福建的制瓷业蓬勃发展，兴建了许多瓷窑，这些瓷窑一般都处于港口附近或交通较便利的地方，南平茶洋窑应当属于这一类瓷窑中的一座。

茶洋面临闽江航道，东距福州口岸120公里，古时，这一带江面上礁盘林立，水急滩险，过往的客商船都得在此停靠，是闽江水运的重要站关之一，《南平县志》记载，宋代这里设有金砂驿，元代改名茶洋驿，明、清沿用。元朝萨都剌写有《茶洋驿》诗：“白云飞出山，努劈苍峡裂，幽谷湿晴云，绝壁洒飞雪，万折入沧海，龙宫水晶阙，簸扬弄珠人，冰帘挂寒月。”此诗说明，茶洋驿是闽北进入海道的必经之处。县志中还刊载有明朝查慎行写的《茶洋滩》一诗和都御史席书撰写的《茶洋驿洗襟泉记》等文章。

既然茶洋处于闽江水运之孔道，山上有丰富的瓷土矿，有清冽的泉流和茂密的林木，来往商旅中亦不乏能工巧匠，那么，三大瓷业系统的匠师居留于此处，建起窑场，就近烧造各自风格的外销和民用瓷器，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出的中国宋元瓷器中有景德镇窑系的青白器、有龙泉窑系的青釉器、有建窑系的黑釉器，器物种类繁多⑥，其中也有茶洋窑的产品，因限于手头资料，无法一一比较。现仅举若干例子，作个简单的对照：

1.黑釉仿建盏，直口微敛，斜腹内收，实足浅挖，釉色漆黑，釉水厚聚垂流，腹底露褐灰胎，有的呈兔毫斑，与建窑产品完全一样⑦。在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中晚期的沉船，从沉船打捞起的中国瓷器中发现有这种碗。

2.Ⅰ式撇口青白瓷碗，斜弧形腹，圈足较大，施卵白釉，碗内壁近口沿处浅刻一圈弦纹，有的内底有涩圈。这种碗与日本博多湾出土的器物相同⑧。

3.Ⅰ式青瓷碟，敞口微撇，折腹急收，小平底微内凹，胎骨上薄下厚，内外施灰青釉，底部露胎，釉层较厚，呈失透状，有少许冰裂纹。这种碟在日本博多湾有出土。

4.Ⅱ式白釉唇口碗，唇口厚大，斜壁内收，圈足宽矮，胎体较厚。这种碗与日本博多湾出土的同类器物一模一样。

5.莲瓣纹白瓷碗残片，其外壁花纹与菲律宾内湖出土的模印莲瓣纹白碗相类似⑨

6.芒口青白瓷洗，日本有出土同类器物。

7.灰青釉高足杯，其造型釉色与在菲律宾班隆出土的同类器物都非常接近。

8.青白瓷芒口盖碗，其造型、刻划纹饰与日本博多湾出土的同类器物也非常相似。

我们认为，茶洋窑瓷器的外销路线可能是：沿闽江东下，抵达福州，而后从福州运往朝鲜、日本或菲律宾等地。福州口岸作为瓷器外销的出口之一，是值得注意的，台湾陈庆光先

生在研究木浦沉船的中国瓷器时，发现这些瓷器可能来自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和江西。由于船中数千件中国瓷器中没有泉州港附近的同安窑产品，又因为元代的税局设在泉州，商船为了逃税，往往从福州开航，因此他认为木浦沉船的出发港当是福州⑩。那么，从南平茶洋窑依托着闽江水域的流向，汇集的浙南、赣南和闽北诸窑的作风，又有瓷器外销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陈庆光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以上是我们的一些粗浅认识，提供的资料仅作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

① 林忠干、芦保康、梅华全《福建南平宋元窑址调查简报》，《福建文博》1983年第1期。
② 刘新园《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文物》1980年第11期。
③ 同②。
④ 曾宜丹《定海的海底奥秘》，《文物天地》。
⑤ 陈庆光《木浦沉船发现的中国瓷器——福州输出的早期元瓷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1981、6第一辑。
⑥ 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6期。
⑦ 林忠干、王治平《建阳古瓷窑考察》，《福建文博》1983年第1期。
⑧ 日本出版《博多湾出土的中国瓷器》线图资料。
⑨ 参照徐本章、叶文程《再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器》文图、《古陶瓷研究》1982第一辑。
⑩ 同⑤。

云南罗川窑和白龙窑调查记要

葛季芳

七十年代初，在云南禄丰县城附近，及其城西北二十五公里的黑井石龙镇后山，先后发现几十座和七百座火葬墓，出土近百件青花瓷器，以器形高大的青花盆罐为葬具，玉壶春瓶、高足杯、盘碗陪葬①。青花色黑稳定，绘画技巧熟练，层次清楚，纹饰颇具景德镇元代青花之时代风格；但胎土偏灰、釉青或黄、青花黑灰、器壁厚，又与景德镇青花不同。而富有玉溪窑出土青釉、青花瓷片之特征②。从而引起陶瓷界的关注，寄希望能寻找到窑址。

这些年，禄丰县文化馆在文物普查中，特别注意窑址的发现。1986年史岳林、李颖康同志到昆明报告窑址找到了，并带来青釉青花、月白、天青、花釉瓷片来鉴定时代。其中月白、天青、花釉瓷片是在罗川与青釉青花一块收集的，令人怀疑是否将地面上的混淆进去，但是他们相当肯定，并希望一块下去进行调查核实，由于其他工作直到1987年才得到去禄丰的机会，在李康颖同志的协助下，到罗川和白龙村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和采集的材料整理简介如下：

一　罗川窑

罗川窑位于禄丰县城西南五十余公里的瓦窑村，窑址在村对面山坡的秧头箐。因修水库从山坡挖沟而发现，窑已遭破坏，余下堆积层不多，落在山下水沟里的瓷片、窑具还在。罗川窑是依山坡修建，而临水沟。主烧青釉印花，兼烧青花，月白、天青、花釉次之。

（一）青釉，青釉器胎土疏松有孔、色灰白、制作粗糙，施灰釉厚簿不均，釉青或泛黄，有开片。以生产中、小件杯碟盘碗为主，器形矮，杯碟实足，盘多折腰。计有青釉圆口实足小杯（盅）（高4、口径6、底3厘米）；青釉实足小碟（高3、口径9、底径4厘米）；青釉侈口折腰矮圈足盘、折沿折腰矮圈足盘（高3、口径12、足径5厘米），青釉圆口矮圈足碗（高5、口径12、足径5厘米）。这类青釉器小件尚有完整者。

（二）印花，青釉印花以盘为多，制作工艺较青釉素瓷好。折沿折腰矮圈足盘心印有朵莲、鲤鱼、白兔含草纹，折沿宽边上划连弧纹、器壁划直线纹排列。朵莲印花盘有的加绘青花，与玉溪、建水窑所出完全相同，也许是时代风格的关系。盘心印鲤鱼、白兔含草纹刻印工细，鲤鱼的鳞片、白兔的动态逼真，颇有民间年画的韵味，另有印"喜"字盘（残高3、口径12—15、足径6厘米）。

（三）青花，以碗为主，青花盘次之。青花色灰黑不够稳定，缺乏光泽，向外晕散，纹饰草率。有的仅在碗盘口沿点上几点青花；有的在碗盘心草绘海水、花卉、十字、三环纹；有的在碗内外壁绘四组开光，开光内为花卉、竹叶梅；有的在碗心书写"福"字。碗分侈口和圆口，弧壁矮圈足（高7、口径12、足径4厘米），另有青花壶柄、罐盖莲花纽的出现，施以青花点纹。

（四）月白、天青，花釉，在罗川窑的堆积层中采集，与青釉印花瓷片共存，为盘的残

片。窥其造型，盘口微敛、弧壁、圈点宽矮（高7、口径20、足径8.5厘米），圈足无釉，高0.5—0.8足厚0.8—1厘米。胎土坚实厚重，盘腹厚达1厘米。胎灰比青釉青花器为深，可能是胎厚含铁量高的关系。釉乳浊无光泽，以月白色为多，天青次之，红蓝交织呈火焰色斑点的花釉更少。釉层肥厚，往下垂积处凸起如鼻涕，釉半挂，釉面呈桔皮眼和开片，无釉的胎骨和圈足处为酱色。从盘的造型和釉色看，颇有河南钧窑元瓷之韵。罗川以氧化铜为瓷器的呈色剂，在云南还是首次发现。

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铜红釉，其技术要求尚难掌握。因为铜红釉的呈色与着色剂的加入量，基础釉的化学组成、窑室修建的密封程度、烧成中温度的掌握都有着重要关系，稍微偏离任何要求和条件，就不能得到正常的红色。而罗川窑是一个乡村里的民窑，在物质条件和工艺上不是十分完备，敢于使用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烧制瓷器，是了不起的贡献。由于罗川窑的窑室封闭，着色剂的配方、烧成温度等全凭经验，所以烧出的瓷器釉色浓淡深浅不一，变形者多而停止了生产，今见遗物即是明证。但是在云南古代陶瓷史上的大胆的尝试是不容忽视的。

二　白龙窑

白龙窑位于禄丰县城东北六十五公里的白龙村，村庄靠大山山脚，当地农民利用其缓坡和土堆建窑烧制陶瓷，至今还在继续。昔日的窑址集中在村南的土堆上，当地农民称为“大窑包”。大窑包东西长，南北短，高约十余米，面积五十余平方米，形状椭圆。大窑包范围内遗有昔时烧窑的痕迹，遍布瓷片、窑具、窑砖。窑室有的残破暴露于野，有的还埋藏在地层中。大窑包的东面有二窑，一称“李家窑”，由于农民在此辟山建房，窑的前端已被挖去，断面中残窑砖瓷片支钉堆积清晰可见；大窑包的正中至北面斜卧一条龙窑，长二十余米、窑室券顶偶露于地表；大窑包南侧为“马家窑”，遍地堆积青花大碗大盘；大窑包北面有二条龙窑沉睡于地层。

由大窑包东北方向步行五十米，见一土堆，上堆砌着烧过的土砖、瓷片。据土堆旁烤烟房的农民说，这里叫“刘家窑”，是过去烧窑的地方，他们在建烤烟房时已挖掉了一大半，土堆上的砖、瓷片、支钉是挖时倾倒的。从剖面看下面还有原来的窑址和瓷片堆积。

埋在大窑包西北面的三条龙窑，鉴于未遭破坏，便于今后发掘，未动。大窑包南侧马家窑视其青花大碗大盘和窑的砖块是民国时期的。唯李家窑和刘家窑已被破坏，我们顺其剖面挖掘，了解深度和采集标本。李家窑高4米、刘家窑高约3米，产品风格接近，时代相当，统称为白龙窑。

白龙窑以烧制青花为主，青釉次之，并出现白灰釉，以烧盘碗杯碟及瓶壶罐为主。折腰盘碗减少，圈足制作简朴，在厚平底上端（距底0.3厘米）的圆周旋出一圈凹槽，平底浅挖足心，内圈斜倾短浅，形成假圈足。

（一）青花，碗盘最多，造型大中小齐备。青花灰黑暗淡，纹饰简单草率。计有青花侈口折沿大盘、圆口宽唇大盘，盘心草绘花卉，折沿或边上绘点纹、水波纹（高6、口径28、足径11厘米），青花大碗，碗心花朵、菊花、海水，内外壁为缠枝叶纹（高11、口径25、足径12厘米），青花折沿折腰盘、器型稍小，折沿宽边上点纹，盘心有花卉、十字、海水纹（高2—3、口径8—12、足径4—6厘米）。

青花碗有二型。

Ⅰ型，内外壁四组蕉叶纹，龟背绵，有的仅在碗心画月华绵、五角、七角、米字纹；

Ⅱ型，碗心青花书写行楷“元”、“好”、“寿”字（高3—4、口径10—12、足径5—6厘米）。其他是青花侈口直颈平底瓶、单耳小罐、酱色釉盘碗的瓷片。

（二）青釉和灰白釉。青釉数量不及青花多，造型为青釉实足小杯小碟，特点风格与罗川窑相似。莲瓣口折沿盘和侈口盘有青釉和灰白釉，素器，无印花。灰白釉的胎釉比青白釉做工稍细，认真观察乃是胎上加了一层白色化妆土，罩上青釉后其色介于青白之间，釉薄处显现白粉底。盘与青釉同（高3—4、口径16—12、足径6—10厘米）、灰白釉碗器形大（口径16、高11厘米）。

三　浅析

禄丰罗川窑和白龙窑烧制的青釉、印花、青花、青花印花器，所用原料与其他窑和元明墓所出土的无异，而造型花纹颇有差距，也就是说在瓷工艺上显得粗糙朴厚，青花纹饰简单潦草，造型以实用的碗盘为大宗，尚未发现器型硕大，纹饰精致多层次的青花盖罐，说明禄丰黑井石龙后山元墓所出青花器并不是该窑所烧造。但是由于在生产上已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可作为云南青釉青花体系的一个类型。

罗川窑和白龙窑地处半山区，交通不便，生产陶瓷主要是解决当地的需要，不像玉溪窑、建水窑在县城附近，生产用瓷除自给外还运销其他地区，所以窑址多、堆积高、历史长；罗川窑和白龙窑则规模小、堆积少、时间短。

罗川窑以生产青釉为主，印纹精细，造型以莲瓣口折沿折腰盘为代表，青花数量不多，相当玉溪窑的第二层，时代在元末明初。白龙窑以青花为主，青釉减少，无印花。青花碗盘器型增大，相当玉溪窑的第三层。另外，青花出现了龟背锦、月华锦、有字碗，这是明代内地采用织锦花纹用于瓷器上的装饰。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统帅，蓝玉、沐英为副，调军三十万平定云南后，兵士就地屯田，军队中不乏工匠，带来了内地文化和技术使得白龙窑在制瓷工艺上受到一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罗川窑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烧制铜红釉、白龙窑使用化妆土，揭示了云南民间窑在元末至明已不满足单调的青釉青花生产，开始吸取其他地区的工艺经验试创新品种，由于技术条件所限，质量不够理想以至停产，但它的出现为云南陶瓷增添了新的一页。铜红釉和灰白釉都是在青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应是青釉体系类型。

总的说，禄丰罗川窑和白龙窑的产品不及玉溪窑和建水窑的精细和丰富，但它们的发现为研究云南瓷工艺的生产，增加了新的材料和范围。

---

① 《云南禄丰火葬墓及其青花瓷器》，《文物》1984年第8期。

② 《云南玉溪古窑址调查》，《考古》1980年第3期。

③ 《云南建水窑的调查和分析》，《考古》1987年第1期。

我国"南蕃古道"陶瓷外销初探

唐 昌 朴

一　陆路"南蕃古道"的提出

我国陶瓷的外销自隋唐以来，是通过各国来华的信使和商人，中国各朝外出的使节和商人的频繁交往而实现的。然其陶瓷的制品和技术向四面八方广泛的传播途径，是通过海路的传输。大多数研究者，皆据以宋人朱彧著《萍洲可谈》、赵汝适著《诸蕃志》、元人汪大渊著《岛夷志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游记》、明人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与近人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等专书以及隋唐宋元明各朝的文献史料，以阐明我国陶瓷经由"海上丝绸器之路"外销的。

唐代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器，主要是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运输国外。宋代各名窑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瓷等，主要是通过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贸易港口外销①。中国商人"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广隙地也"②。其楼船满载以陶瓷为主的国内土特产品运销南洋各港，再由外国商人转输西方各国。元朝继其海路，更为发展，或可直航远海，到达印度、波斯及东非一带。除此之外，陆道陶瓷外销当为"丝绸之路"，经由新疆、中亚、西亚远到波斯，抵达叙利亚、地中海东岸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坦等）。③就目前所了解的我国陶瓷外销道路，除前述水陆"丝绸瓷之路"外，陆路似乎还未有谈到其他道路的。这在研究外销经济史和交通史上可能局限于文献和前人既定格局的约束。我国陆地边疆辽阔，难道就只西出长安，徒步河西走廊，经新疆而出国门的一条"丝绸之路"吗？近期于读史和田野考查过程中，回想起古汉籍所记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见邛竹、蜀布'"，问大夏人，告诉说："吾贾人往之身毒（古印度）"。④这个"蜀布、邛杖"给我极大启发，四川邛山的竹杖和丝麻织物，有可能是通过盆地的商人外销到印度的。考查四川的边区交通，古代的陆道，从成都出发，过雅安，西北行康定，经昌都至拉萨西出蕃道进入中亚；西南行经西昌入云南再西，过缅甸可抵印度和南亚地区。这一条自古已通西方的中外交道商路，或可称为"南蕃古道"，即中国陆上第三或第四条"丝绸瓷器之路"。汉时既通"蜀布、邛杖"，汉以后自然更会输出川滇盛产的土特产，盐、茶、铁、铜、糖、蜀锦、山货及药材等物，隋唐迄宋元明清以后。当然更可以增加深受西方人民喜爱的陶瓷精品，随着经济的发达，积极利用畅通的蕃道商路加紧交往，繁荣边区各民族的贸易。汉族与边区兄弟族人，特别是云南边区的少数民族和盆地的藏族组结骡马牦牛群帮，穿越重山峻岭，与北路驼队南北呼应。西通中亚和南亚，远及西亚，在"南蕃古道"上满载西行。

这条连结中西的陆路"南蕃古道"，自秦汉时起，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它与北地"丝绸之路"同时并存，当具同等的历史功绩，或许在作用上次于北道，但为什么没有被记入史

籍？或因西南边陲地势险恶，所谓"蜀道难"的诗文影响；亦或传统史学观念的偏见，落后地区不可能有发达的对外贸易经济，致使沟通中西文明的"南蕃古道"，今天仍处于无闻的境地。本文为"南蕃古道"的历史功绩作初步的探索，供研究者们参考。

二　西方遗存中国陶瓷与"南蕃古道"的关系

谈到中国陶瓷在西方的遗存，首先要感谢诸多的国外考古学家，他们在陶瓷外销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这里仅据三上次男先生的《陶瓷之路》的论述⑤，说明中国陶瓷通过水陆交通，自隋唐以后沟通西方和东方的问题。

《陶瓷之路》说，东非诸国和北非的埃及，地中海东岸西亚的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国与中亚的阿富汗、苏联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及其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等考古遗存的中国陶瓷资料，充分阐明了东西文明交流的关系。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藏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仓库内的陶瓷片中，中国陶瓷片约达一万二千片。有唐代的三彩、邢州的白瓷、越州窑瓷、黄褐釉瓷、长沙窑瓷"。⑥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高原古都巴勒贝克"也有中国中世纪的陶瓷"。⑦行程向东往美索不达米亚的"（中世纪）最重要的萨马腊遗址，它的名字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以前撒拉逊帝国（即阿拉伯帝国）与中国有过各种各样的贸易，（出土陶瓷）就是确切的证据。"⑧在伊拉克"发现了九至十世纪制作的褐色越州窑瓷和华南白瓷碎片"，"（这时）中国陶瓷象流水一样不断渗入而扩展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都市"。⑨伊朗的"内沙布尔是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地方"。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至塔塔公路中部往南的曼波尔都市遗址，发现中国陶瓷，最早的是晚唐越州窑的水注，事实告诉了我们，九世纪的时候，或许更早一些中国的陶瓷就被带到这里来了。……发现了同一时期湖南省长沙制作的有黄褐釉上用绿色描画了花纹的碎片……从曼波尔这里出土，成了连结印度与西亚和伊朗之间九世纪时代难行的陶瓷之路，这是非常宝贵的"。⑩

以上所列西方各地的遗存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唐三彩、邢白瓷的产地是在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与河北，按当时唐代的航运情况来看，河南、河北通过运河输抵扬州，再转海港明州、泉州或广州较便；然产在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三彩瓷、从长安出发，通过北"丝绸之路"和"南蕃古道"，用骆驼队和马牛帮运载西行，似比水运更为捷便，直往中亚或南亚，进而远到西亚。前述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发现的唐三彩、邢白瓷、越青瓷和长沙窑黄褐釉瓷；伊拉克阿比尔塔遗址发现有褐色越州窑瓷；巴基斯坦曼波尔遗址出有黄褐釉上用绿色描画花纹的碎瓷片；特别是黄褐釉瓷和黄褐釉上用绿彩的器片，是否都归属于长沙窑这个类型呢？据我国陶瓷考古近年的资料表明，对于黄褐色釉器和黄褐釉兼施绿彩瓷，值得进一步思考。

笔者认为，西方今存的黄褐彩或兼绿彩的器物中，没有见到近年发现的江西丰城罗湖窑或称谓唐洪州窑的黄褐釉瓷⑪与四川邛窑的黄褐釉兼绿彩的瓷品。⑫故将这类瓷品归入长沙窑是可以理解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有邢州窑的白瓷，同样在没有新的相类白瓷，也只能认为是邢窑外销到埃及的。近期在四川江油县九岭乡发现"南朝古窑址及白瓷、黑瓷窑"的新资料，发现者认为"残碗均为内满釉，外施釉不及底的白釉器四件，其中有一偏黄白釉呈极细冰裂纹"。⑬据近期发现的江西洪州窑黄褐釉瓷、四川邛窑产黄褐釉兼施绿彩器和江油九岭乡的白釉瓷，与流传在西方的黄褐釉器和白釉瓷对照，对出产的地区和唐代有限能力的海运外销贸易情况可以分析出：北地出产的的三彩、邢白和南部滨海的越青和洪州、长沙的黄褐器，通过"海上丝绸瓷器之路"，或西出长安的"陆上丝绸瓷器之路"远输西方是无疑的。⑭值得探讨的是，四川邛窑的黄褐釉兼绿彩瓷和江油白釉精品，从成都出发经由西藏和

云南通过“南蕃古道”输往西方，亦有很大的可能。

《陶瓷之路》中关于宋元明清各代的记述及我国文献资料表明，宋以后因航海技术的发展、提高，既然外销的路线主要是“海上丝绸瓷器之路”，那么陆路交通的陶瓷外销运输将会受到影响，可能萧条一些。北部“丝绸之路”是这样。从近期盆地出土唐宋元明的瓷器资料，对照西方遗存实物分析，由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和西藏古道通往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外销陶瓷，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能超过北“丝绸之路”的运载功能。

《陶瓷之路》记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普卡普沙莱博物馆，这里曾是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的宫殿，在这个博物馆里，展现在眼前的是十三世纪后期的南宋末至元明时代的各类型的漂亮青瓷、青花瓷、白瓷等。总数约达一万件以上，这里是惊人的中国陶瓷大集藏”。[14]“伊朗西北草原、山地、溪谷、湖泊交错，悠然舒展的高原地带。在靠近苏联国境的阿尔德比勒灵庙收藏了许多中国陶瓷的名品”。[15]“连接伊朗边界的”苏联阿塞拜疆地方的诸遗址，即从巴拉、阿兰、卡拉、古洛养希城、巴库等也出了精美的中国陶瓷”。[16]在中亚和南亚，“从中国或者印度往西方的伊朗和地中海岸去的游客，大多数先进入阿富汗，然后再向西。阿富汗昔日是来往于连接东西贸易路上的商队辐辏之地，物资的流通也十分频繁，中国到印度去的人，也都是通过阿富汗而进入天竺（印度）的”。[17]“据大英博物馆东洋部长巴西尔·格雷氏的报告，收藏了六百余件十四世纪前后至十七世纪的中国陶瓷，其多数是住奥乌德（印度北方）离任太守（加拿大人威利阿姆·卡民斯）的收藏品”。[18]

这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伊朗阿尔德比勒沙义克萨菲灵庙，苏联阿塞拜疆巴库等遗址和出在印度北方奥乌德的中国瓷器遗存，绝大部份是通过“海上丝绸瓷器之路”运输出去的。土耳其、伊朗和印度等远海内陆高原地区，多是与我国西北和西南的边区邻近，不能排除一定数量的瓷器是通过我国“南蕃古道”输往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转送到西方的。历史事实说明这时的北路，已处于停滞状态，“南蕃古道”承北陆道和海运之不济可能取得优胜地位，肩负起部份陶瓷外销运载。近期四川地区所出土大量陶瓷遗物通过前述资料分析可以得到证明。

三　近年四川出土陶瓷是“南蕃古道”外销的物证

近年来在盆地的江河码头和古今要镇，先后发现数处陶瓷窖藏和废墟出土遗物，有唐宋元明各代的青瓷、白瓷、黄褐釉瓷、黑瓷、青白瓷和青花瓷等多种。对于探索内地陶瓷通过“南蕃古道”外销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实物。

（一）一九八七年四月，江油县青莲镇九岭乡发现白瓷和黑瓷。[19]九岭地近涪江仅一公里，又与嘉陵江相通，产品可由水路输往各地，也可经安县、绵竹陆路达成都，再转输外地。

唐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白碗》中有“君家白碗胜霜雪”的诗句，用以形容广传锦城、风靡蜀中的大邑细瓷优良，今大邑虽未有窑址发现，九岭产器传销大邑，则为杜氏所见而视为大邑的精品了。这样轻薄细腻如霜似雪的蜀中佳器，这种与《茶经》所记“似雪类银”的邢窑器不相上下的陶瓷，完全有可能作为外销品通过“南蕃古道”输往中亚西亚以至埃及。

（二）重庆到成都的主旱道上的荣昌，曾发现一处瓷器窖藏，据鉴定，有吉州窑玳瑁、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等精品瓷各数十件。荣昌是蜀地产夏布著名的地方。前述汉张骞使大夏时看到的“蜀布，或“蜀锦”、或精细的夏布等，都是适宜于印度气候条件的衣料。如若有更确切的资料说明“蜀布”中有荣昌的夏布的话，它在内外的商品上，具有吸引外货的魅

力，引入邻省瓷品的交换。按当时蜀人贫富悬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出土较珍贵的瓷品，不可能为当地人普遍享用的，或可能有相当的部份转外销，通过“南蕃古道”流输西方，与“蜀布，邛杖”为伴而出国门。荣昌窖藏遗物，或可能系瓷商尚未销售转运，遭遇突然事变而保存至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三）雅安市旧城废墟发现瓷品残器和碎片堆积。经管者介绍说：“这是一处临江的残瓷堆积点”。有“成化”、“嘉靖”铭款的青花碗、碟、杯等及盘、壶、罐等明瓷残器。根据堆积遗存所反映的情况分析，它与瓷器内外销有明显的关系。雅安城地处青衣江岸，其地理位置与交通特殊，成都西南陆行进入山区，或由长江转岷江抵乐山，再由大渡河乘船溯青衣江而到达市镇。“南蕃古道”西北经康定、昌都过西藏；西南经西昌入云南过缅甸都可直到中亚、南亚以至西亚。雅安废墟残碎瓷片堆积极明显地告诉我们，它是内销瓷与外销瓷运输中转枢纽，是汉族商人与少数民族商人，特别是与藏族商人的交易市场。故宋政府“曾在“蜀之黎（今汉源县）、雅州皆置博易场（土特产交易集市）”。“博易场”实际上是宋政府征收交易税的管理场所，因为边区复杂繁荣的贸易必须严格的管理，又有税利可图。大量明代瓷片的堆积，说明自江西输入的瓷品，经水路人伕肩扛和舟船运载到达雅安改换包装交由骡马、牦牛运输外销时所抛弃的废碎残片。这正是“南蕃古道”外销陶瓷有力的物证。

四　“南蕃古道”陶瓷外销繁荣

前述江油九岭窑、荣昌窖藏、雅安废墟瓷片堆积资料都表明，自宋代以后，江西瓷器贸易在四川地区的繁荣，特别是明以后更加兴旺。近年文物普查中了解到古建筑“万寿宫”在四川普遍存在，“万寿宫”是江西人活动集聚的场所，明清时期被称为“江西会馆”，与瓷业有密切的联系。“万寿宫”在四川到处都有，说明江西人足迹遍及蜀地，其目的是以自产瓷器换取盆地的土特产药材山货等，江西瓷品大量销往四川，瓷器由川藏商人转销的可能也必然存在。促使了“南蕃古道”商队穿流不息的繁荣景况与大规模到来。

（一）“江西会馆”与瓷业的关系

在四川境内经普遍的考古调查，了解到盆地中大小城镇，都有江西人聚集活动的“万寿宫”，其普遍程度，仅次于奉李冰为主神的“川主庙”。为什么“凡江西人活动之处，必有万寿宫”。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万寿宫”敬奉的主神名许逊，是西晋时的江西人，道号许真君；太康年间（280—298年）在四川德阳作官，兴修水利、为民治洪，赈救灾民得到人民的爱戴，辞官离开德阳之后，德阳人为他建祠敬礼；返回南昌，仍倡修水利，更得江西人尊敬，大为建祠修庙，后来历朝嘉封，尊奉为“降龙真君”之神人，祠庙也扩建为“宫”，被尊称为“万寿宫”，② 意即经年累月，受民香火。江西人兴建或扩建“万寿宫”，无外是藉神权以取得一个聚居联络、堆存货物、扩大商务的合法地盘在四川发展瓷器贸易。这个初为神庙，后为“会销”的“万寿宫”，实际就是江西陶瓷公司的分公司，用今天通俗的说法，就是专事瓷业的“江西办事处”。

从“万寿宫”（或“江西会馆”）发展的历史和存在的遗迹，可以看到江西瓷业在四川贸易中的商业经济活动。“万寿宫”的兴旺，正是江西瓷业在四川的发达与繁荣。精致美观的瓷器换来蜀地的土产山货和各样药材，运回江西加工，再销行全国或海外。“万寿宫”在川境的遗址就是江西人过去在四川从事瓷业贸易活动的历史佐证。

（二）四川药材引进江西瓷器转外销

巴蜀地处西南边区，虽为山区，然资源富饶，物产丰富。盐、铁、铜、糖、丝、竹、木、

茶、布、粮等皆不仰求外地，或有余而外销邻省。更具有多品种而丰富的土产和特产，木耳、花椒、黄花和各种翎毛兽皮等山货；麝香、熊胆、虫草、天麻、当归、党参、黄连、杜仲……等珍贵的独具地方特色的药材，它强烈的魅力，吸引着江西人特产的瓷器。这正是以其所有而求其所无，以促进双方贸易关系的形成。前述四川近年多处要镇出土大量的窖藏瓷器和瓷碎片堆积遗址以及古建筑"万寿宫"的普遍存在，从侧面已明显的反映了两相依求的贸易关系。江西人需求四川药材，如饥似渴。四川人需要美的享受，爱慕景德镇和其他地方名窑所产的瓷器。

宋、元、明、清以后，江西景德镇瓷业迅速发展，独居天下第一。特别是元明清时期，"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临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⑥]因为四川与江西贸易的紧密关系，景德镇特产的瓷器就有可能"西被蜀"，以大量的瓷品换取蜀地多种的药材。自唐、宋以后，江南经济兴旺发达，远超过北方，特别是南宋后，更比北方优越。就江西来说，已出现经济繁荣的四大名镇；除全国著名的四大名镇的景德镇之外；有造纸发达的铅山河口镇；竹木出省外销转运中心的永修吴城镇；更具特殊地位的是药材加工中心的樟树镇。就以瓷业与药材相关的樟树镇来说，其名声仅次于景德镇，亦闻名全国。《地名大辞典》说：樟树镇"地滨赣江之东，各省药材之总市场也"。故有民谚说的，"药不过樟树不灵"。所谓"灵"，即指中药须要经过樟树泡制加工，治病才有良好的效果。因为镇是"药材之总市场"，自然迫切需要换取四川多种丰富的药材在这里加工，再运销全国各地，或远销海外。这样，江西瓷器"西被蜀"，充满了四川的各个角落，远到边区黎、雅州的的"博易场"以交换药材了。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江西瓷业商人，他们不能运到一船瓷货就直接进入"博易场"或其他的集市立即换取一车或数车药材返航江西，商务发展的要求，迫使他们在四川要有长居立足之地。前述的"万寿宫"，正是他们可以借的庙宇，聚资兴建或扩建，用宗教神权合法的地位，获得社会习俗和政治势力的支持，"万寿宫"为基地，这就可以稳固瓷业与药材商务贸易的发展了。

前述"万寿宫"或"江西会馆"与瓷业生产内销四川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丰富的药材，特别是边山区，汉族与藏、彝、羌等少数民族邻界的地区，通过"博易场"交易得来的瓷品，从当时社会的经济和习俗状况表明，汉族人大多数是贫穷者，农民和手工业及其市民，是不可能享用景德镇精美的青白瓷、白瓷和青花与彩绘瓷的，彝族习用竹木器，藏族喜爱铜、银金属器和少量的瓷器，一般是少数的贵族，其他族人也只是少数的上层人物使用瓷器。但从近年四川各地，除前述江油、荣昌和雅安之外，还有巴县木铜镇、青木关、大邑、荥经等县镇出土大量的瓷器，结合江西人兴建"万寿宫"的普遍存在资料表明，江西瓷商源源不断输入四川内销的瓷器，大多数又不为地方人所享用，其器将存放到何处呢？这是个实际问题。但为解答这个问题，将据前述中国瓷器遗存在中亚、西亚和南亚的资料和遗存四川雅安废墟堆积和各地窖藏出土遗存残完碎片综合分析，清楚的回答是，这个大量内销的瓷器的最后出路，当为汉族和藏彝族和其他族的商人，经营药材换取瓷器，除部份留存内销之外，可能有相当数量的瓷品转变为外销了。使用骡马帮、牛群队，沿着"南蕃古道"，翻山越岭，运送出国门而输往西方。

综前所述，近年考古发现四川地区江油九岭乡出土的白瓷、荣昌出土的黑瓷、青瓷、雅安出土的大量青花瓷和白瓷残碎器片以及邛窑的产品等资料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出土遗存的中国白瓷、黄褐釉、青瓷、青白瓷和青花瓷等实物，结合文献资料分析，充分说明，我国自

唐、宋迄至元、明时期，四川所产的高档白瓷、黄褐釉瓷与邻省内销、特别是江西大量的白瓷、青花器的内销，经由四川的汉族、藏、彝族或其他族的商人换取得来，除存部份内销而大量的转为外销，组结马帮牛队运载，穿越丛山峻岭，通过艰险崎岖的"南蕃古道"转输西方。这就是本文所探研得知的，从四川成都、雅安出发一经康定，昌都过西藏；一经西昌过云南出国门，自汉代而畅通西方的文明之路，南陆线"南蕃古道丝绸瓷器之路"。

---

① 《我国古代外销瓷器》，中国古陶瓷、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简讯》1987年31期。
② 宋·朱彧《萍洲可谈》。
③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青瓷的对外输出》。
④ 司马迁《史记·张骞传》。
⑤ 〔日本〕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访东西文明的接点》，《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
⑥ 同⑤《东非与东洋陶瓷》。
⑦ 同⑤《从东地中海沿岸到美索不达米亚》。
⑧ 同⑦。
⑨ 同⑦。
⑩ 同⑥《在印度河口良港》。
⑪ 《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⑫ 《四川古陶瓷研究》、《邛崃县古瓷窑调查记》198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拙著《论邛窑彩釉的兴起与继承问题》1986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⑬ 1987年6月18日四川江油县文化局编《文化工作》第九期。
⑭ 同⑤"波斯沙法维朝（公元1502—1736年）的先祖赛义克·丁斯哈克·萨非埃典的诞生圣地"。
⑮ 同⑤《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沙莱博物馆》。
⑯ 同⑤《流向波斯的东方陶器》。
⑰ 同⑬。
⑱ 同⑩。
⑲ 同⑤。
⑳ 同⑬。
㉑ 《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
㉒ 许真君事迹，详见拙著《谈德阳县志一兼论神人许真君》，《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
㉓ 王宗沐《江西大志》。

试谈澎湖航线与中菲陶瓷贸易

徐本章

一

台湾海峡中的澎湖列岛，西距福建厦门港八十海里，东距台湾台南安平港五十四海里，历史上一直是大陆连接台湾本岛的桥梁，也曾是我国陶瓷外销的一条重要航线。

澎湖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份。很早以前，我国的先民就到此开发，台湾汉代称“东鳀”，三国时称“夷洲”，隋代称“流求”，说明当时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澎湖航线已经沟通。唐代元和间（806～820年）进士施肩吾率领施氏族人渡海到澎湖定居开发，写下过《题澎湖屿》一诗，提到“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生动地描写了大陆去的汉族人与当地高山族一起生活劳动的情景。他在另一首《赠友人归武林诗》中写道：“去去程何远，悠悠思不穷；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施肩吾是浙江滨海的分水县人，出分水关就是福建省境，这首诗说明唐代闽浙两地到澎湖的知识分子是不少的。南宋，澎湖已隶属福建晋江县。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政府出兵日本，遇飓风舰船覆没，残兵也是漂到台湾、澎湖歇足。

至正二十年（1360年）澎湖设“巡检司”，辖澎、台庶政，隶属福建省泉州同安县（即今厦门）。宋、元两代在台湾、澎湖设官建治，台、澎已正式列入中国版图，澎湖航线无疑地已相当活跃，联系宋、元时代泉州港的鼎盛和一些史料记载，可以推测，当时澎湖与大陆至少有三条航线：即浙江分水—澎湖，泉州—澎湖，同安（今厦门）—澎湖。

明代，我国滨海人民与台、澎交通往来不绝，永乐年间（1403——1420年）郑和出使南洋，路经福建长乐、泉州，曾泊台湾；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明政府鉴于澎湖“盖清漳、温陵二郡之门户”在澎湖“设兵戍险”。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将台湾改名为“东都”，设承天府，在台湾设安抚司。1683年，清政府取得台湾后，设澎湖厅，兼辖厦门地方，属福建布政使。纵观历史，澎海航线不仅早已存在，既是一条重要的贸易航线，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国防航线。

二

中国与菲律宾是一水之隔的邻邦，两国人民很早就有了友好的往来。根据考古发现，早在公元七至九世纪时，中菲两国已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陶瓷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输出品。在黎刹省和宿务岛发现中国唐代的瓷器；巴布延岛、依罗戈省、卡加延苏禄岛、苏禄群岛等地中国晚唐瓷器的出土就是唐代中国陶瓷销往菲律宾的实物见证。宋代，中国商船定期开往菲律宾，到麻逸、三屿等地贸易，出售瓷器、纺织品、金属器皿等日用品，赵汝适的《诸蕃志》就提到与菲律宾“博易用瓷器者”有三屿、蒲哩噜、麻逸等地，“舶舟至则出而贸易……投以瓷碗，则俯拾，忻然跳呼而去……如议之价未决，必贾豪自至说谕，馈以绢伞、藤笼，仍留一二辈为质，然后登岸互市。”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记载了“福建市

舶司常到诸国舶船……麻逸、三屿、蒲哩噜、白蒲迩……”。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亦提到：三岛“贸易之类，用铜珠、青白花碗”，“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经纪”，“麻里噜（今菲律宾的马尼拉一带）贸易之货，用足锭、青布、瓷器盘、处州瓷、水坛、大瓮、铁鼎之属”，“苏禄（今苏禄群岛）贸易之货……处器”，“里枝拔（约在菲律宾婆罗洲之间）货用青白处州瓷器”，这些记载的货用处州瓷、处州瓷器，系指浙江省处州府各窑之瓷器，包括龙泉各窑产品。宋濂《元史》卷二一〇《三屿》也提到该地“时有泉州为商贾者”，柯劭忞《新元史》卷二五三《岛夷诸国》亦记载：“三岛……其人常附舶至泉州贸易”。这里所指的“三屿”和“三岛”均系菲律宾古国名，故地在今卡拉绵、巴拉望、布桑加诸岛；麻逸，故地在今菲律宾民都洛岛，或兼指吕宋岛；蒲哩噜，故地在今菲律宾波利略；白蒲迩，故地在今菲律宾巴布延。赵彦卫所指的福建市舶司当时设在泉州。从上述记载，可见宋、元时代，菲律宾已有好多个地方与泉州港有直接的通商往来，并进行陶瓷贸易。这与台湾学者陈信雄博士从澎湖出土的大批宋元陶瓷及其所著的《澎湖宋元陶瓷》一书所断言的，“澎湖宋元陶瓷数量繁多，其品类常见于亚非各地外销瓷，它们不是澎湖本地使用之物，而是宋元期间风行亚非各国的外销陶瓷。它运销于南方的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一带”、“充分显示，经由泉州、澎湖到南洋的澎湖航线，乃宋元期间，中国陶瓷外销航路中的一环”是互相印证的。德化窑宋、元时期出土的盒、小瓶、小口瓶、飞凤碗、壶、钵等器物与艾迪思所著《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一书提供的图片完全吻合，应是当时德化窑运销菲律宾的遗物①。

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1368～1424年)，中菲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吕宋、合猫里、冯嘉施兰、古麻剌朗、苏禄等地先后十五次派遣使节到我国访问，有多次是由国王或首领率使团来访的。其中永乐十五年（1417年）由苏禄东王、西王、峒王率领，共三百四十多人，从泉州古渡登岸，受到明政府的热情接待。《明会典》卷一〇六《吕宋国》和罗日褧《咸宾录》卷六《吕宋》都记载“贡道自福建”、“贡道自福建入”。《万国地理全图集》亦记载：“泉州人年年驾船，至吕宋港”，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也记载“其地去漳为近，故贾舶多往”。明代后期，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菲律宾中部和北部地区，中国官方与这些地区关系虽然中断，但满载着丝绸、瓷器、日用品的中国商船仍沿着澎湖航线经台湾省南部不断地开往菲律宾，1571～1580的十年间，开往菲律宾的中国商船由每年三、四艘增为每年三、四十艘。明代，中国陶瓷仍大批销往菲律宾，《明史》载：“沙瑶（今棉兰老岛北部的锡布盖地区）与呐哔啴（今棉兰老岛北部的达比丹）……物产甚薄，华人商其地，所携仅瓷器、锅釜之类”。费信《星槎胜览》亦记载：三岛“货用金银、瓷器、铁块之属”。《泉州府志》载，万历（1573～1619年）间泉州商于吕宋的达数万人，“按吕宋夷船，每次载番银十四五万来厦贸易，所购布匹之外，如瓷器、石条、石砖亦不甚贵重，非特有利于厦门，闽省通得其益。”根据明万历三十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1602～1682）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所载，荷兰占据澎湖及台湾后，变成为中国贾舶航运瓷器与公司贸易之中心，由台湾转运之瓷器往巴达维亚是用荷兰舶或东印度公司舶。由巴达维亚转运瓷器往马来群岛以外之公司营业处，是用荷兰舶。如转运往荷兰本国，是用回归之舰队，如转运往马来群岛本土各商埠者，系利用本地各种船只。然大部份瓷器，如特别供应荷兰本国市场者，是应用荷兰舶，东印度公司舶或中国舶，直接由台湾运到巴达维亚或万淡保留。当时经营主要之商业，多属陶瓷器。该书在明天启九年(1624年)的一段记载，初期之事业终结后，即断然

以巴达维亚为荷兰活动之中央总汇，而经营远东及澎湖、台湾瓷器商业。清初，荷兰尚占据台湾。我国贾舶亦以走私方法将出口货物载往台湾与荷兰交易。据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引台湾每日杂志的记录：“1646年（顺治三年）三月十一日，有四只中国贾舶由中国沿海航来台湾，载四百桶及九十捆细瓷器，惟因遭遇惊涛骇浪，不得已须投五十箱于海中。四月十一日，有贾舶三只运来粗瓷器1500捆及400个敷地地砖。四月十二日，九只贾舶仅载来24大坛。四月廿七日，三只贾舶亦仅载来30大坛。四月廿八日，又有三只舶到，运来549个瓷碗。六月五日，有五只贾舶载来40大篮细瓷器。七月八日，四只贾舶运来34桶瓷器，计有3540个大盘及7000个小盘。七月二十日，一贾舶载来20捆粗瓷。八月廿一日，二贾舶载来332捆粗瓷。八月廿七日，一只贾舶载有2000件粗瓷。九月十六日，有一贾舶载来400捆大瓷盘及40捆小瓷盘。十月四日，有18只贾舶到，载来瓷器10捆及1470个细瓷杯，并1700个大瓮。十月五日，有三贾舶载来7700个大盘及2400个小杯。最后总共此年有20万件瓷器载来。”同书又记：“1650年（顺治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一只中国贾舶由台湾航往巴达维亚，载粗瓷大碗750值五R（西班牙银币，其价均以一百个计算）、中碗400个值四R，小碗3000值二R、粗瓷盘1200个值二R，及七篮小饭碗值21R，此货是中国舶主许倬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约载到巴达维亚，款货两交者。”② 周凯等《厦门志》卷五《洋船》载：“厦门准内地之民往南洋贸易，其地为……宿务、苏禄、吕宋诸国，其出洋货物则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吕宋夷商万梨落及郎吗叮先后来厦……各带番银一十四万余元，在厦购买布匹、瓷器、桂皮、石条各物。”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澎湖航线当时运载陶瓷的频繁。台湾是当时我国外销瓷的重要集散地，它在沟通中国与南洋一带的陶瓷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陶瓷畅销南洋一带国家的同时，菲律宾也是一个重要的陶瓷外销市场。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菲律宾的北吕宋、怡老戈、锋牙丝兰、描沓安、邦邦牙、黎刹、民都洛、描实描地、怡朗、武六干和苏禄等省，几乎遍及菲律宾全境，都先后大批出土了中国的外销陶瓷。1930年7月间，英国前驻华大使约翰·曼斯菲尔德·艾迪思来德化进行古陶瓷参观考察时指出：“菲律宾发现德化窑的器物至少在上万件以上。”李辉柄在《关于德化屈斗宫窑的我见》③也指出：“1964年以来，在菲律宾遗址与墓葬中发现了数千件较完整或能够复原的德化窑瓷器。其中以马尼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离马尼拉约50英里）、民都洛的加莱港等遗址最为集中。出土的器物有壶、军持、罐、瓶、盖盒、碗、碟、高足杯等。”在菲律宾宿务岛和圣安娜等地还发现有晋江磁灶窑元代烧制的龙瓮和军持④。据日本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⑤一书所提供的材料，菲律宾密执安大学博物馆藏有中国“元、明、清时代的青瓷和青花瓷和白瓷、黑瓷、五彩等器皿”“青花类的花纹有花鸟、鸟兽、龙、花草、缠枝花等”，在卑拿姑巴亚南县的比拉村，“就有一百座以上的中世纪墓葬，在人骨的头边有出土的菲律宾制的陶器，在脚下有陪葬的十一世纪至十四、十五世纪（宋、元、明初）的中国陶瓷，有的还有泰国，越南的陶瓷。这些都不只是一件，有大罐、小罐、碟子、碗等成套的随葬品，至少是五、六件。其中的中国陶瓷也是青瓷、白瓷、青白瓷、黑瓷、青花瓷等多种多样。”“仅在这个卑拿姑巴亚南村，就有不少象这样陪葬的中国陶瓷的墓地，现在已知的合计起来就有8.5公顷。广阔的地域，埋藏着大量的中国陶瓷。象这样的墓地，已经在菲律宾群岛各岛的海岸地带发现了一百处以上。在马尼拉市建筑圣阿拿教会时，曾从202座墓中出土了1513件十世纪至十四、十五世纪之间的中国陶瓷。”“在吕宋岛西南部的加拉他干

半岛的505座墓葬中得到了十四、十五世纪（元末明初）的中国陶瓷411件。"三上次男还提到，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人以及政界要人、富豪等也争相收藏中国古陶瓷，其中建筑家罗库信一人就搜集有7000件以上，如果把各个收藏家的藏品汇集到一起，马上就会达到四、五万件以上。

"从中国运入菲岛的陶器对菲人早年的社会及农村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菲人拥有陶器成为估量个人财富及声望的主要准绳。"⑥菲律宾的学者及瓷器收藏家对我国宋代的青瓷器"为之陶醉及爱不释手"⑦，因而，古代中国陶瓷不仅作为日用器皿畅销菲律宾，满足当地人民的广泛需求，同时，中国陶瓷也和玉器珍品一样作为馈赠上层的高贵礼物。H·B·Moyse之《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就记载，雍正年间，广南、暹罗及苏禄等国，屡行奉贡，世宗常以瓷器赏赐之。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卷二六九，苏禄国条，也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国王苏老丹嘛喊味安柔律噒遣贡使独万喇等复修事贡，钦赐王于赐外加赐玉碗……兰红东黄瓷盘、青龙红龙葵青鹤各瓷碗……二十七年（1762年）复遣工万礁唠来贡，赐赏……瓷器……。"

如果说，澎湖航线是中菲友谊的重要通道。那末，中国陶瓷则是架设中菲友谊桥梁的重要砖石，它将以历史的见证永垂于世。

三

从中国沿海经澎湖如何通往菲律宾和南洋一带，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台湾陈信雄博士在他的《澎湖宋元陶瓷》一书中曾提到："经澎湖，运销于南方的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一带。"《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中亦提到：中国"出口货物载往台湾与荷兰交易""由台湾转运之瓷器往巴达维亚，由巴达维亚转运到马来群岛……"这两种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是由中国沿海港口，经澎湖至台湾，然后由台湾转往菲律宾和南洋一带。这条航线在张燮《东西洋考》中谈得更为具体。该书卷九《舟师考·东洋针路》⑧记载道：从厦门南面对岸的镇海角之太武山（今属龙海县）——澎湖屿——虎头山（指台湾的高雄港）——沙马头澳（即沙马岐头，在台湾南端的猫鼻角）——笔架山——大港（即今阿帕里港）——哪哦山（指菲律宾吕宋岛北岸的布尔戈）白土山（布尔戈以西的巴达）——密雁港（今维甘港）。又从密雁港——六藐山（指今拉允良省圣费尔南多港）——郎梅屿（指托马斯港）——麻里老屿（今仁牙因港西北面的博利瑙）——表安山指仁牙因港附近的苏阿尔）——玳瑁港（今仁牙因港）。再从玳瑁港之东的傍佳施兰（指今之班丝兰省）——表山（指博利瑙角）——里银中邦——头巾礁——吕宋国。

吕宋猪未山（指甲米地港）——磨荖央港（指今八打雁省西部的巴拉央港）

龙隐大山（指民都洛岛的阿尔孔山）——以宁港

以宁港——里摆翰（指帕马里坎岛）——高药港——海泽山——屋党港口

海泽山——海山（指内格罗斯岛东南方的锡利诸岛）——交溢（指卡维特，在三宝颜港附近）

交溢——逐奇马山（指三宝颜东面的萨卡尔岛）魍根礁老港（指哥达巴都港）——绍山（指萨兰加尼岛）——千子智港（今属印度尼西亚鲁古群岛的德那第港）

犀角屿（指桑格贝岛）——苏禄国

又从吕蓬（指卢邦岛）——芒烟山（指民都洛岛南部的曼加林）磨叶洋（指民都洛海）——小烟山（指布桑加岛）——七峰山（指巴拉望岛东北角的杜马兰岛）——巴荖园（指巴

拉望岛的普林塞萨港）——罗葡山（指巴拉望岛南面的巴拉巴克岛）——圣山（指今马来西亚沙巴州东北部的森潘曼吉尤角）——昆仑山（指沙巴州的哥打贝卢）——长腰屿（指今亚庇港）——鲤鱼塘（指文莱湾外的纳闽岛）——文莱。

在《顺风相送》一书⑨对太武往吕宋，浯屿（金门）往麻里吕（菲律宾马尼拉北面的马里拉奥），泉州往彭家施阑（菲律宾的班丝兰省），泉州往杉木（菲律宾苏禄群岛的和乐港），杉木回吾屿（金门）的航线亦有具体的记载。

从厦门南面对岸的镇海角太武山往吕宋的航线是：太武——澎湖——虎仔山（台湾高雄港）——沙马岐头（台湾南端猫鼻角）——笔架山——大港（即今阿帕里港）——红头屿（大港外的达卢皮里岛——射崑美山（指吕宋岛北部的桑切斯米拉）——月投门（在圣费尔南多港港口）——麻里荖表山——里银大山（在三描礼士省的马辛洛克港附近）——头巾礁——吕宋港。

从浯屿（金门）往菲律宾麻里吕的航线是：太武——浯屿洋（厦门港外海面）——射崑美山——白土山并万安旦港口（指吕宋西北的班加尔）——玳瑁山——苏安——麻里荖断屿——里银大山——陈公大山（指马辛洛港外的圣萨尔瓦多岛）——里安大山（在三描礼士省南端，疑即头巾礁）——吕宋港口——麻里吕。

从泉州往菲律宾彭家施阑的航线是：泉州港——澎湖——虎尾山（即虎头山）——沙马头（即沙马岐头）——鸡笼屿（在沙马岐头附近）——毛架（即笔架山，指巴布延岛）——五屿（指巴布延群岛）——大港（阿帕里港）——射崑美——哪哦山尾——三屿密雁港口——十六儿山（即六藐山）——郎梅屿——麻里荖断屿——苏安港——彭家施阑港。

从泉州往菲律宾杉木的航线是：泉州港——澎湖——三屿（指密雁港）——表山——里银大山——吕宋——芒烟大山——里沙大山（指班乃岛西面的马拉利珊岛）——双里山（指内格罗斯岛西南部的巴亚万）——苏禄——麻里犇山（指巴西兰岛东北角的莫拉玛莫尔岛）——笔架山——杉木。

以上各条航线可以看出都必须经过澎湖，因而，澎湖航线的开辟，大大缩短了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海上交通距离，对促进中菲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有着深远的意义。

重温过去祖先开辟澎湖航线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海峡两岸人民应当紧密地携起手来，为发展中菲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再谱新的篇章。

---

① 徐本章、苏光耀、叶文程《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器》，《考古》1979年第二期。
② 韩槐准著《南洋遗留之中国古外销陶器》新加坡青年书局发行，1960年。
③ 《文物》1979年第五期。
④ 徐本章、叶文程《谈谈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厦门大学学报》史学专号增刊1981年。
⑤ 该书为李锡经、高喜美译、蔡伯英校，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9月。
⑥ 菲律宾国立博物馆富斯著、许其田译《菲律宾发掘的中国陶器》（转自中华民国五十一年《新闻日报年鉴》）。
⑦ 同⑥。
⑧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⑨ 同⑧。

从《鄂多立克东游录》看我国元明时期的陶瓷外销路线

胡　亮

元代来华的旅行家中，意大利人鄂多立克是很知名的一个，其影响仅次于马可波罗。

据鄂多立克的《东游录》载，他于1318年（元仁宗延祐五年）开始东游，其旅行路线大致如下：从意大利著名港口威尼斯出发，渡过黑海，经特列比松（在今黑海南土耳其境内）、额尔哲龙（即埃尔祖鲁姆）、讨来思（即王城，为波斯的蒙古汗阿鲁浑所建，作为驻地，并由其子完者都于1305年完成，后废）。再从孙丹尼亚，经柯伤（今卡香）、耶兹德来到科莫隆（从鄂多立克的行程和叙述看，可能为波斯古都百世玻里）。然后再由科隆改道，经设拉子或库尔德斯坦的部分地区抵迦勒底（巴格达城）。他再从迦勒底行抵波斯湾，由忽里模子（元代译作忽里模子，明代译作忽鲁谟斯，即今伊朗格什姆岛东的霍木兹岛）乘船赴印度西海岸的塔纳。再从塔纳经无离拔（在今印度西海岸，即《元史·亦黑迷失传》中之八罗索）、古里（在今印度科泽科德）、科枝（在今印度科钦）、小葛兰（即古故临国，《元史》译作呗兰、俱兰；《明史》译作小葛兰，在今印度奎隆）、马八儿（在今奎隆东南）等国抵锡兰。又从锡兰乘船航行至南巫里国（在今苏门答腊西北亚齐河下游哥打拉夜一带），遍访南洋诸岛经爪哇、加里曼丹、占婆（今越南中南部）而抵辛迦兰（指我国广州）。由此东行至刺桐（我国泉州）、福州。再北上经闽、浙、赣三省交界之仙霞岭，至杭州和金陵（今南京市）。复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最后到达元朝的都城汗八里（指大都，即今北京市）。他在北京居留三年后，西行经天德、山西，抵西藏首府拉萨。然后经中亚、波斯返回意大利。

《鄂多立克东游录》只字未提中国陶瓷，更不涉及中国陶瓷的外销路线问题。但他的东游路线实际上就是我国元明时期陶瓷的外销路线。正如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所说："古代中世纪的时候，通过海路进入波斯湾的路线倒有二条。其一是印度洋横断航路。从南印度的马纳尔海岸出发，穿过阿拉伯海，首先抵达阿拉伯半岛南岸的亚丁。由这里沿南岸上东北，经阿曼入波斯湾，巡航海岸诸港。

其二是沿岸航路。从印度西南马勒尔海岸出发的船舶，北上印度的西海岸，然后到达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口。由此地出发的船只，亦即顺沿岸进入波斯湾。从这里，到波斯湾北岸的各港口卸货，同时运进内地。"① 鄂多立克东游走的大体上是三上次男所说的第二条路线。明朝永乐三年六月至永乐五年九月（1405—1407年）三保太监郑和率领的以六十二艘大舰为主力，装载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的庞大舰队，自苏州刘家河出发，航行至福建，然后自福建五虎门扬帆，经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然后经由印度西海岸的柯钦到达当时与中东进行贸易的中心——卡里卡特的第一次"下西洋"，以及永乐十一年春至十三年七月（1413—

1415年），从印度东海岸进入波斯湾，直抵霍尔木兹的第四次“下西洋”，也基本上走的这条路线。事实上，郑和率领的其余五次“下西洋”大体上还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只是有时走得远些，有时走得近些，有时又兵分几路前进罢了！②

现在让我们看看，鄂多立克东游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在元明两代是否有过政治的或贸易的关系？是否有过中国陶瓷销售的痕迹？

为了行文方便，让我们首先从威尼斯谈起吧！威尼斯为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地中海的贸易中心之一。意大利（《明史》译作意大利亚），很早以前就和我国有过商务往来，但典籍失载。该国马可波罗从其父游历中亚细亚、印度，更入中国，仕于元世祖凡二十余年。其后不少意大利耶稣教徒陆续前来中国传教。明万历初，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为万国全图，神宗嘉其远来，给赐优厚。从此以后，意大利人来中国从事贸易活动、传教活动，甚至定居的就更多了。意大利人对中国陶瓷很喜爱，也很熟悉。“1470年左右，意大利威尼斯人学会了中国造瓷方法，造出青花软瓷器，当时称为阿拉伯的蓝色瓷器。1671年，富尔汉地方免特也仿造中国瓷器，当时称为波斯瓷器，也很有名，但还不能用高岭土烧造真正瓷器。他们所用的上等瓷器，主要来自中国。”③

下面我们再看看特列比松。特列比松位于黑海土耳其境内，十三世纪以前为东罗马属地。中国古代称罗马为秦国。《明史》说：“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入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④和中国交往由来已久。土耳其保存的中国古代陶瓷，为数甚多，仅土耳其博物馆收藏的元明两代青瓷即达1300件之多。

鄂多立克东游经过的额尔哲龙、讨来思、孙丹尼亚、柯伤、耶兹德、科莫隆、设拉子、迦勒底及忽里模子，均在今伊朗境内。伊朗即古波斯国，公元前3331年灭于马其顿，其后迭属于条支、安息及波斯之萨珊王朝、阿拉伯之大食、蒙古之伊儿。早在汉代即与中国有频繁往来。其境内之忽里模子古国，《明史》译作“忽鲁谟斯”，“永乐五年，遣其臣将麒麟等物齐备金叶表文跟随回洋宝船进贡。”⑤伊朗境内之古国失刺思，明永乐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诸部贡狮子、文豹、名马，辞还。复命安等送之，赐其酋织锦、文绮、纱罗、玉系腰、瓷器诸物。时车驾频岁北征，乏马，遣官多赍彩币、瓷器，市之失利思及撒马儿罕诸国。⑥因此伊朗境内保存的中国古代瓷器亦复不少，仅伊朗西北部阿尔德比勒收藏的中国古代瓷器即超过1000件，其中大部分是元明两代的。“设拉子郊外有个波斯利斯遗迹，是个历史上的古老市镇，在其中心部分的赞德博物馆里有大约八千件中国瓷器，其中有十六世纪晚期芙蓉类青花大盘。”⑦

鄂多立克东游经过的印度西海岸古国柯枝、古里、无离拔、小葛兰、马八尔等国，和中国的往来关系很密切。史籍均有记载。据《元史·外夷三》载：“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兰足以纲领诸国，而俱兰又为马八儿后障……二十年，马八儿国遣僧撮及斑入朝。五月将至上京，帝即遣使迓诸途。”

总之，自古以来，我国和印度的内地及沿海区域的交往就是频繁的。我国陶瓷通过各种形式销售到印度的数量，无疑也是非常之大的。“在马德拉斯邦南端的捉湼别里等处出土大批宋、元陶瓷片”，⑧“在印度当铁路工程司的加拿大人威利阿姆·卡民斯氏，从一九六四年到八三年，收集了六百余件十四世纪前后至十七世纪的中国陶瓷(主要是青瓷和青花瓷)。另外，在加尔各答做辩护士的威利阿姆斯，在印度收集了一百数十件的中国陶瓷。”⑨在印度流散在人们手中的中国古陶瓷尚有如此之多，埋藏在地下的中国陶瓷，可说是难以数计

了！

现在我们再看看鄂多立克东游经过的锡兰吧。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古称锡兰山。据《明史》载：“锡兰山，或云即古狼牙修。梁时曾通中国。自苏门答剌顺风十二昼夜可达。”“永乐中，郑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亚烈苦奈儿欲害和，和觉，去之他国。王又不睦邻境，屡邀劫往来使臣，诸蕃皆苦之。及和归，复经其地，乃诱和至国中，发兵五万劫和，塞归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间道乘虚攻拔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妻子、头目，献俘于朝。廷臣请行戮，帝悯其无知，并妻子皆释，且给以衣食。命择其属之贤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诸俘囚咸称其贤，乃遣使赍印诰，封为王。其旧王亦遣归。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王遂入贡。”⑩由此可知，我国和锡兰早有交往。民间的交往，事实上远远早于文献上的记载。所以我国古代陶瓷器，通过各种途径销售到锡兰去的自当不少。“马霍城塞出土有龙泉窑青瓷碗，还有青白瓷碗二只。”⑪“德化屈斗宫等窑址中发现的莲瓣碗、敦子式碗，在斯里兰卡曾经出土过。”⑫“斯里兰卡是我国经印度洋，沿波斯湾往阿拉伯、东非和欧洲的中间站。斯里兰卡中部的高原地带入口处的科加拉古面的底帝加马遗址，发现了大量宋代陶瓷片，最早的是十世纪前后的越州窑系统的（青瓷器）碎片。”⑬

我们再看看鄂多立克东游经过的南洋诸岛吧。南洋群岛元明时期包括爪哇、三佛齐、阿鲁国、苏门答剌及南巫里等国家。这些古国均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他们很早很早以前就和中国有贸易往还或其他交往。如：“苏门答剌，汉之条支，唐之波斯、大食皆其地也。昔张骞通西域还，为武帝言：‘条支在安息西海，暑湿，耕田种稻，有大鸟卵如瓮。’以后汉使往来路，至乌戈而止，莫有至条支者。唐永徽初，大食王敢密莫末腻复遣使者朝贡。”⑭又如“三佛齐，古名干陀利。刘宋孝武帝时，常遣使奉贡。梁武帝时数至。宋名三佛齐，修贡不绝。”⑮再如“爪哇，唐贞观中，诃陵王遣使者贡金花等物。大历中，诃陵使者三至。元和中，献五色鹦鹉、频伽鸟。咸通中，献女乐，又献金花帐、温凉床、龙鳞席、凤毛褥、玉髓香、琼脂乳。宋淳化初，国王穆罗茶遣使贡方物甚伙。明洪武时，凡两遣使来贡。永乐三年，东王索令达哈遣使请印、与之。”⑯由于这个缘故，我国元、明两代的外销瓷器，南洋群岛是销售得最多的地区之一。“文郎、马神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尤好瓷瓮，画其外，死则贮瓮中以葬。”⑰“最能集中反映中国陶瓷外销印尼的是雅加达博物馆的大量藏品，在1000多件藏品中，除少数属泰国、越南、日本的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从汉代到明代的产品。其中有明代的斗彩、三彩、五彩、白地青花瓷器。”⑱

最后我们再看鄂多立克东游经过的占婆国。占婆国，地在今越南中南部。“秦为林邑，汉为象林县。后汉末，区连据其地，始称林邑王。自晋至隋仍之。唐时或称占不劳，或称占婆，其王所居曰占城。迄周、宋遂以占城为号，朝贡不替。”“洪武二年，太祖遣官以即位诏谕其国。其王阿答阿者先已遣使奉表来朝，贡象虎方物。帝喜，即遣官赍书、大统历、文绮、纱罗，偕其使者往赐，其王复遣使来贡。自后或比岁贡，或间岁，或一岁再贡。……十六年，贡象牙二百枝及方物。遣官赐以勘合、文册及织金文绮三十二、瓷器万九千。”⑲一次赏赐的瓷器就有一万九千件，平时贸易输入的中国瓷器那就更多了。所以越南是我国古代陶瓷外销最多地区之一。日本古陶瓷学者三杉隆敏指出：“西贡博物馆收藏的以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为多。尤其在青瓷方面，有十四世纪的瓶、盘等器物。从整体看，以商品瓷类型为多。这些地区可以说，确实是位于这条陶瓷贸易路上的。”⑳

历史资料表明，元明两代，外销陶瓷商船，无论从东海或南海起航，都是经广州、占

城，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以至地中海各国。鄂多立克东游正是走的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无疑是我国元明时期重要的海上陶瓷之路！

---

①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访东西方文明的接点》。
② 《明史·宦官一》卷三〇四。
③ 傅振伦《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
④ 《明史·外国七》卷三二六。
⑤ 〔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下。
⑥ 《明史·西域》卷三三二。
⑦ 〔日〕三杉隆敏《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
⑧ 〔日〕三杉隆敏著《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
⑨ 同①。
⑩ 《明史·外国七》卷三二六。
⑪ 〔日〕三杉隆敏《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
⑫ 林德明《宋元时期德化窑陶瓷外销琐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84年论文）。
⑬ 转引自苏垂昌、唐杏煌《隋唐五代中国古陶瓷的输出》，载《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一辑。
⑭ 〔明〕罗曰褧《咸宾录·西夷志》卷四。
⑮ 《明史·外国五》卷三二四。
⑯ 〔明〕罗曰褧《咸宾录·南夷志》卷六。
⑰ 《明史·外国四》卷三二三。
⑱ 叶文程、丁炯淳《明代我国瓷器外销东南亚的考察》（中国古陶瓷和中国古外销瓷学术讨论会论文）。
⑲ 《明史·外国五》卷三一二。
⑳ 〔日〕三杉隆敏《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

外销瓷的几个相关问题

陈振裕

中国陶瓷具有悠久的历史。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距今约八千余年），先民们就已发明了陶器①。从二里头文化开始（距今近四千年），就出现了"原始瓷器"②。经过长期的发展，大约在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也就是真正的瓷器③。从隋唐至明清，一千七百多年中我国外销的瓷器，经久不衰。这些外销瓷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也因此被誉为"瓷的国家"。

纵观我国一千多年的外销瓷历史，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名窑、烧制工艺、品种、造型、瓷釉、瓷彩、纹饰、款识以及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不相同，这正是现在许多学者探讨的重要课题，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建国三十多年来，全国许多省市对瓷窑的考古调查发掘，获得了大批珍贵的新资料，对于研究我国外销瓷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从我国外销瓷与对外交通贸易的关系，瓷器生产与外销瓷的关系，以及各国需求外销瓷的变化等三个相关问题，作些粗浅的、不成熟的探讨，错误之处请与会学者指正。

一 陶瓷外销与对外交通贸易的关系

目前在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地，非洲的苏丹、埃及、麦加等地，以及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等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我国的古外销瓷器。而这些国家发现的外销瓷，绝大多数是我国通过对外贸易运往各国的。因而它是随着各个历史时期对外交通的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增加，不断扩大外销瓷的销售范围与数量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通过外国商人来我国收购、订购与订制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各国的。还有少量的外销瓷，是通过各个王朝对外国使节、元首等的赏赐和馈赠而输出的。

我国人民很早就与毗邻国家人民友好往来，以及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有的同志推测，战国时期楚国已通过四川、云南，经印度支那，开辟了通往南亚和西亚的道路，进行对外贸易④。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见到四川生产的竹杖和蜀布等产品，说明这种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统一的局面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汉武帝开发西域与西南地区之后，对外交通贸易，更得到进一步发展。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对沟通与中亚、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此后，中国商人到中亚、西亚各国进行贸易，而且中亚、西亚各国也经常派人到长安（今陕西西安）访问和贸易。为了适应与西域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西汉王朝修筑了令居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当时从都城长安出玉门关、越葱岭，往西到中亚、西亚的商路有两条，是当时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当时输出品以丝绸为主，以及铁器等等，因而被称为"丝绸之路"。由于瓷器生产较少，目前尚未见外销瓷器。

隋唐时期与中亚、西亚的经济文化交往更为密切，并且有三条商路：北路，经今蒙古地区到叶尼塞、鄂毕河上游，再西经额尔齐斯河流域西去；中路，即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南路，即海路，经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海到西亚的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港口，再经红海在苏丹东北登陆，然后到埃及开罗抵地中海南岸。在这三条交通线上，不仅出土了我国隋唐时期丝织物等大批文物，也发现了不少这个时期的外销陶瓷器。例如北路出土了中国著名的唐三彩器；中路的苏联撒马尔罕同样也出土了唐三彩器；在伊朗的德黑兰累依遗址发现了珍贵的邢窑白瓷盆和菱花盘，越窑的刻花碗和青瓷片；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发现大批唐三彩和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在约旦和叙利亚也发现唐三彩器等等；南路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印度的马德拉斯、伊朗的夏里特奇、苏丹的哈拉伊卜等地，都发现了越窑青瓷，在巴基斯坦的班鲁废港、埃及开罗等地，还发现了越窑青瓷、北方白瓷、长沙铜官窑的黄釉绿彩瓷和唐三彩等[5]。

日本和朝鲜，从很早就与我国有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关系，隋唐时这种关系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往朝鲜有海、陆两条路线，曾发现唐三彩器与长沙窑的青釉褐彩瓷等。到日本有先从陆路经朝鲜再抵达日本、还有从明州到日本的海路两条路线。日本的奈良县、福冈县、平城京等地，发现唐三彩器与越窑和长沙窑的青瓷等外销产品[6]。

"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骆驼。它运输量小，且陶瓷器易碎，所以这个时期运往中亚、西亚的外销瓷，很少经"丝绸之路"输出。北宋时期，广东、福建地区已能制造载重二千斛的民用海船，船上有抛泊、驾驶、起碇、转帆、测探等设备，以及定航向的指南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帆船。宋元时期还奖励对外贸易，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而且大批外销瓷从这些港口起运，沿隋唐时期开辟的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各国。目前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我国的外销瓷。菲律宾考古发现外销瓷竟达四万余件；马来西亚的出土数量更加惊人，仅沙捞越博物馆十多年发掘的瓷片达一百余万片之多；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巴博遗址，出土了越窑青瓷与刻花"青白瓷"；埃及开罗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了耀州窑刻花青瓷、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等等[7]。

这个时期与日本、朝鲜的交通贸易，仍然是沿着隋唐时期开辟的路线，但也有了新的发展。迄今为止，在日本的大阪、长崎、东京都、福冈、冲绳等三十多个府县的考古发掘中，都出土了我国宋元时期外销的青白瓷与青花瓷等瓷器，而且数量是相当多的。朝鲜半岛的莞岛、开城、春川邑等地出土的我国宋元时期越州窑、耀州窑、临汝窑、龙泉窑、景德镇青白瓷窑等窑的许多瓷器[8]。1977年在木浦附近海底打捞的我国元代一艘沉船，仅宋元瓷器竟达一万多件[9]。

自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八次远航之后，我国民间海外贸易比较发达，外销瓷器不仅大量输出到亚洲、非洲各国，而且自明代晚期始大量销售到欧洲各国，尤其是青花瓷特别受到欢迎。明中叶以后，还有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收购、订货与定制中国瓷器，而且数量都非常巨大。据不精确的统计，运到荷兰的瓷器，最多的一年（1639年）竟达三十六万六千件[10]。清代在鸦片战争以前，外销瓷的主要市场有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特别是欧洲市场。十八世纪前期，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许多国家都被允许在广州设立贸易机构，因而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售也达到高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记载的统计数字，仅该地每年运往欧洲的瓷器就达三百万件之多[11]；如果再加上其它国家及中国商人运往欧洲的瓷器，其数量之巨是可想而知的。

从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我国自隋唐至清代鸦片战争之间的外销瓷，是随着各个时期的交通贸易的发展不断扩大销售范围与数量的。在隋唐时期，由于“丝绸之路”对瓷器运输不便，输出的陶瓷数量亦有限；宋元时期，造船业的发达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外销瓷远销到亚、非、欧各国，且数量剧增；明清时期，中国远航贸易的发展及欧洲各国在广洲设置商办机构，扩大了欧洲市场，数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第二，隋唐时期，外销瓷的瓷窑都不在对外交通线上，如邢窑在河北，越窑在浙江，铜官窑在长沙等等；它们是将瓷器运到长安或明州和广州等地，然后再输出到中亚、西亚、东南亚和埃及等国家。而宋元明清的外销瓷的瓷窑，虽然有些仍不在对外交通线上，但在输出港口附近的窑口得到迅速的发展，广东石湾窑⑫，福建德化窑⑬和泉州窑⑭等等，都因此而成为主要的外销瓷窑。第三，隋唐至宋元，外销瓷的销售，主要由中国商人负责贩运到各国，而明清时期，外国商人，尤其是欧洲商人设置机构转售中国外销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二　瓷器生产与外销瓷的关系

具有悠久历史的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伟大创造，是世界文化史的一个光辉篇章。自隋唐以降，我国的瓷器开始向外销售，这些制作精美的瓷器，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因而外销的范围和数量，与日俱增。我国的古外销瓷器，是历代瓷器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随着外销瓷的剧增，又进一步促进了各个历史时期瓷器生产的发展。

从“原始瓷器”开始出现至青瓷的烧制，在我国大约经历了二千余年时间。唐代是陶瓷史上的大发展时期，不仅制瓷工艺有许多创造和进步，而且瓷窑的分布扩展到十二个省五十个县⑮，比隋代瓷窑扩大了5倍。正是在陶瓷器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向外输出开始了。

陶瓷器是作为我国当时的一种特产随丝绸输出到日本、朝鲜、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地区和国家；其中三彩陶器占有相当多的数量，瓷器只有邢窑、越窑和铜官窑等极少数瓷窑的产品。

宋代是我国制瓷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官窑与民窑都有很大发展，当时的古瓷窑址分布于各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三十个县⑯，为唐代瓷窑址的2.6倍，占解放以来考古发现古瓷窑址总数的76.5%。并采用了覆烧工艺和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等制瓷的新工艺，提高了产量与降低成本。这个时期瓷器销售市场的竞争十分剧烈，各地瓷窑在品种、造型、瓷釉、瓷彩和纹饰等方面，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而且某种产品畅销后，其它瓷窑即进行仿制，因此形成了当时南北的六大瓷系。这个时期不仅各地瓷窑的瓷器产量大大地增加了，而且还出现了福建省的德化窑和泉州窑等等一些专门烧制外销瓷器的瓷窑，为外销瓷的大量输出提供了充足的货源。随着国外瓷器市场的开辟，大批外销瓷输出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等许多国家。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有一部分制瓷业也进入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尤以民营瓷业的迅速发展最为突出，制瓷工艺也采用了许多新技术。福建、广东等地的外销瓷生产，不仅规模相当大，而且还有些瓷器的造型、花纹图案等，是依照外国的来样进行加工烧制的。所以，这个时期的瓷器生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无论在品种与数量方面，还是在质量与外销方面，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综上所述，我国古外销瓷与各个历史时期的瓷器生产发展水手的关系，十分密切。第一，瓷器生产经历了兴起、发展、繁荣的漫长发展时期，历代的瓷窑由少变多，品种数量都迅

速增多，质量也不断提高。瓷器生产的不断发展过程，恰与外销瓷的发展相吻合。第二，外销陶瓷器，是各个历史时期陶瓷器质量最好和最新的产品之一。例如，唐代的三彩器、越窑青瓷和邢窑的白瓷，宋代的青白瓷和龙泉青瓷等，明清的青花瓷等等。第三，外销瓷促进了制瓷业生产的发展。它不仅表现在对外瓷器市场的开拓，瓷器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刺激了瓷器生产的发展；而且还表现在宋代开始出现专供外销的瓷窑，至明清时期更为普遍。第四，隋唐以后制瓷手工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不断发展的外销瓷，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之一。

三　各国需求外销瓷的变化

我国的古瓷外销，是随着各国的需求量的增加而不断发展的。同时，各国对陶瓷的需求，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我们将这种变化情况，大致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隋唐时期。这个时期我国输出到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地区和国家的外销瓷，无论是瓷窑还是数量都较少。而且这些外销瓷，并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够使用的；只是王公贵族与富商大贾才有能力购买，并珍藏的。

第二阶段，宋元时期。随着瓷器产地的扩大和窑口的增加，生产数量大为增长，外销瓷的数量也随之剧增。而在众多的外销瓷中，凡是与各国人们的生活习俗和审美观点一致或相近的瓷器，就成为畅销品。如景德镇的青白瓷与德化窑的白瓷，深受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喜爱；还有吉水窑的产品，也在日本受到欢迎。因此，这个时期出现了专门烧制外销瓷器的窑口，尤其是民营的瓷窑迅速地发展起来。

第三阶段，明清时期。是我国古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外销瓷的最高峰。这个时期不仅我国传统外销瓷器的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还根据各国人民的生活习俗，专门生产适应各国市场所需的瓷器，如供应欧洲市场的西餐瓷具与咖啡瓷具等；而且依据各国人民的审美观点，依照定货所附的木样品、陶样品、画样，以及品种和大小尺寸，进行加工烧制[⑭]；同时，还制作一些日常生活用的粗胎瓷器。因此，各国对瓷器的需求与我国供应的品种、造型与纹样达到一致，是这个时期外销瓷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销售量达到空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自唐代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一千多年，我国输出到各国的外销瓷器，不仅品种繁，数量多，而且造型千姿百态，花纹优美、瓷釉晶莹。为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好与文化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

① 迄今在我们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出土了大批陶器。其中河北磁山与河南裴李岗的年代大约距今八千多年；而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广西桂林甑皮岩等洞穴遗址，有些测定数据为距今九千余年，但从总体分析，其年代距今七千余年较为合适。

② 沈汇《中国古陶瓷发展鸟瞰》，《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

③、⑩、⑪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④ 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⑨ 冯先铭《我国宋元时期的青白瓷》，《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

⑫ 邹华《古代广东石湾窑的外销瓷》，《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年第1辑。

⑬ 曾凡《关于德化窑的几个问题》，《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⑭ 李知宴、陈鹏《泉州的海外贸易和陶瓷输出》，《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1983年第1辑。

⑮ 同③.
⑯ 同③.
⑰ 同③.

略述我国陶瓷的外销及其影响

王文强

瓷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其后又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世界各地，从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所以在世界上博得了“瓷国”的称誉。我国的瓷器的输出主要是海陆两路。一条陆路即唐以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唐宋以后东到朝鲜、日本，南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非洲，后人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陶瓷主要是通过这条海路向外输出的。走海路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自唐代中叶起，由于中亚细亚地区被土耳其等民族占领，唐朝势力退出，以及土蕃兴起并向北扩张占据了河西和陇右，陆上“丝绸之路”因之受阻中断而衰落；其次，我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东南沿海很早就开辟了通向国外的航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迟在西汉时期，我国的外交使节就已从面临北部湾的徐闻、合浦等地出发乘船到达斯里兰卡等地。其后，随着造船工艺、航海技术和科学知识的不断提高，到唐宋时期，这条海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另外，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已成为商业、贸易中心，此地又多名窑，海路比陆路运输瓷器更为便捷安全。所以，“海上陶瓷之路”便应运而生。本文拟根据国外陶瓷考古的发现及有关的史籍记载，就我国陶瓷的外销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一 唐、五代的外销瓷

唐代，陶瓷手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北方出现了唐三彩，色彩斑斓，富丽堂皇，是唐代陶瓷手工业的优秀代表；邢窑生产的白瓷，品类丰富，釉色洁白，胎质坚细，很受民间欢迎，正如唐·李肇《国史补》所言“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南方越窑所产的青瓷“如玉如冰”，产品十分精美；特别是长沙窑，不但是生产釉下彩最多的地方，而且在装饰艺术上还吸收了西亚风格。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这些富有魅力、各具特色的中国陶瓷便成为当时主要的贸易瓷而行销亚非各国。

朝鲜发现我国唐代的陶瓷，有庆州出土的一件出色而完整的三彩三足鍑，海州龙媒岛出土的三件长沙窑贴花人物褐斑壶[①]。

日本发现唐代陶瓷的地方相当广泛，出土最多的是越窑系青瓷和长沙窑褐釉贴花器，其次是河南巩县窑或陕西耀州窑系的三彩器，以及邢窑系的白瓷，还有一些带晚唐五代特色、火候较高的黄釉陶、绿釉陶等[②]。

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古陶瓷数量为东南亚地区之冠。从巴武耶——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剎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沿海航路所经地区，大约有15处发现唐瓷[③]，有邢窑系白瓷钵，越窑系青瓷钵、壶、水注，长沙窑彩绘钵和贴印纹水注，还有福建、广东窑生产的青瓷[④]。

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都发现了唐以后邢窑系的白瓷钵，河南套山窑的黑釉白斑瓷壶、水注，河南巩县窑的三彩钵、水注，越窑系的青瓷

钵、壶、水注，长沙窑的釉下彩绘钵和黄釉贴花印纹水注，广东诸窑的青釉瓷、白瓷碗、钵、水注、壶以及内部星状无釉的青釉钵等⑤。

东马来西亚的沙捞越河口各遗址，出土过九——十世纪越窑青瓷，以及十一世纪以后的中国各色瓷器。西马来西亚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瓷尊⑥。

泰国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附近地区的文化遗址中，发现过九——十世纪数百片近似长沙窑的釉下彩绘钵残片，越窑钵、水注、壶，华北窑白瓷钵、唾壶，还有广东某窑的内部大星状无釉的褐绿釉钵等⑦。

斯里兰卡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出土有八——九世纪的河南白地绿彩瓷，九至十世纪的华北诸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瓷，以及广东窑系的壶、内部大星状无釉的青绿釉瓷等⑧。

印度科罗曼德海岸的阿里卡曼陀古址，曾出土有九——十世纪越窑瓷器、龙泉青瓷、青白瓷残片⑨。

巴基斯坦的巴博古港遗址，曾出土过九世纪越窑水注、长沙窑黄褐釉贴塑绿花罐残片和青黄釉褐绿彩绘碗。在布拉明拉巴，发现有九世纪越窑青瓷、长沙窑褐釉残片和邢窑白瓷。在俾路支莫克兰几个遗址中也出土有十世纪时的中国青白瓷碎片⑩。

伊朗东部古城内沙布尔遗址，曾出土有邢窑白瓷、长沙窑壶残器、越窑瓷罐，以及德化窑、广东窑白瓷钵、碗残片及青白瓷、青瓷碎片。中部赖伊遗址出土有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邢窑蝴蝶纹贴花白瓷匜、白瓷鱼杯。在古代著名的海港西拉夫，出土有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以及大量的长沙窑瓷器⑪。

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曾出土有唐三彩三足盘，长沙窑褐绿釉、黄釉壶、碗残片和白瓷、越窑青瓷等⑫。

阿拉伯半岛的巴林，也发现过越窑青瓷残片⑬。

非洲北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曾发掘出中国陶瓷10106片，计有唐三彩、越窑白瓷、越窑青瓷、黄褐釉瓷，其中越窑瓷达673片⑭。

在东非临印度洋的海岸，顺着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南下，便会发现这一带海岸和岛屿出土中国瓷器的地点是相当惊人的，仅在坦桑尼亚就有46处，出土的瓷器中有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⑮。

唐、五代时期，波斯、阿拉伯商人纷纷来我国经商，多到广州泊舟登岸，有的长期住在广州；当时“商贾如织”的扬州，又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因此成为胡商云集之地；明州紧连越窑诸窑址，又是天然的良港，日本的遣唐史及商船多是从这里登岸；泉州也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我国的陶瓷，就是经这些港口，东输朝鲜、日本，或由波斯、阿拉伯商人贩运到南海诸国，尔后转运到世界各地的。

二　宋元时期瓷器的外销

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朱彧在《萍洲可谈》卷二里详细记载了商船贩运中国瓷器的情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1976年，在南朝鲜新安海域沉船中所出的一万八千多件中国瓷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自从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外销货，广州便是最大的瓷器输出港，自唐至元，历久不衰。宋代著名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瓷器多是从这里输出的。宋代广州

的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元至正二年（1342年）来中国的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贝图称赞广州瓷业的繁盛。"秦克兰（广州）是世界闻名的大城，市场繁荣，最大的是陶瓷器行业，商人从这里将瓷器运到中国各地，又行销印度、也门"（《亚非游记》70页）。

泉州当时也是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港内经常"风樯鳞集""大舶百艘，小船则不可胜数。"码头上瓷器更是堆积如山，"涨海声中万国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瓷器外销的盛况。从这里输出的景德镇的青白瓷和青花瓷，浙江、福建沿海地区的龙泉青瓷、泉州青瓷以及美丽别致的建筑，都在国外享有盛名。而瓷器的大量外销也促进了泉州制瓷业的发展，泉州附近瓷窑密布，仅德化就有48处。马可·波罗称赞泉州"制碗和各种瓷器，既多又美，价格便宜。除这个港口外，其他港口都不出这种东西"⑯，于是各国纷纷贩运。据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列泉州输出的瓷器远销二十四个地方，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涉及瓷器外销多达四十四个地方，分属今天的亚非各地。

再根据国外陶瓷考古情况来看，亚洲的如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非洲的如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甚至远到津巴布韦和南非联邦，都出土有数量不等的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发现的最多，沙捞越、伊朗和埃及出土的数量也很可观。

根据日本学者提供的资料⑰，日本的大津南滋贺町、久留米市御町二本木遗址以及福井市一乘谷朝仓氏遗址，发现有北宋景德镇青白瓷水注、磁州窑白釉碗以及定窑划花白瓷钵片等。在长崎县至北陆、关东等地的经冢里出土福建浦城县大口窑的白瓷最多。元代瓷器不但出土的地点广泛，而且数量也很可观，出土最多的是龙泉窑系的青瓷，其次是白瓷以及景德镇的枢府和青花瓷，此外还有磁州窑、吉州窑白釉黑花器。

菲律宾通过对八打雁的卡拉塔甘地区、马尼拉的圣安娜、马尼拉东南雷库那湖西侧内湖遗址所进行的几次发掘，出土了大约四万件瓷器，其中宋瓷有越窑系刻花青瓷，龙泉窑刻花五管瓶、梅瓶，福建泉州、德化窑的刻花青白瓷、青白褐斑瓷，以及建窑黑瓷。元代瓷器出土数量最多，主要是景德镇的青白、青花、釉里红等品种。另外还有龙泉窑青瓷、德化窑印花瓷等等⑱。

马来西亚的沙捞越河三角洲的圣土邦及其附近的桑吉布亚、桑吉加昂和尼亚大窟周围，发掘出很多福建德化、泉州、广东潮安、广州西村窑的青白瓷。还有福建、浙江沿海瓷窑所产的青瓷、建窑的黑瓷，以及磁州窑系刻花瓷器。元代以德化窑瓷器最多⑲。

根据日本陶瓷学者提供的资料⑳，在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出土有很多中国瓷器，其中宋代的青瓷以龙泉窑系为主，还有元青花碗残片。在北部，德黑兰的考古博物馆里陈列着在霍腊散发现的南宋、元、明各个时代的龙泉窑青瓷碗、碟等器。在南部的赖伊遗址出土的中国瓷片，其中有元代龙泉青瓷。波斯湾北岸的加斯里阿布纳斯尔和菲鲁兹阿巴德遗址，也出土有宋元时期的青瓷和青白瓷。

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是一处陶瓷地下博物馆，出土有大量的中国瓷片，其中宋代的有龙泉窑青瓷，福建、广东窑的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定窑系白瓷，以及元代龙泉青瓷、青花瓷等㉑。

在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出土的大量的中国瓷器中，有龙泉窑系的青瓷、景德镇的青白瓷

和青花瓷，以及磁州窑系的白釉赭花瓷等[20]。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龙泉窑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制造的青白瓷、白瓷，元代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泉州窑和德化窑产品运销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广泛。可以说，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风靡印度洋。

三　明清时期瓷器的外销

明清时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盛举，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起，到宣德八年（1433年）止，前后七次，总计二十八年，郑和的船队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的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郑和出使前，都准备了大量的瓷器（青花尤受欢迎）、丝绸和其他物品，在到达海外诸国时，或作为礼品赠送，或作为商品交易，使中国瓷器广泛地流传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地。

另外，福建、广东的商船也经常航行在驶往南亚和印度的航线上，如明·张燮著的《东西洋考》记载，商人李锦、潘秀、郭震等人经常往返于大泥（今泰国南部）和我国之间，专门和荷兰进行贸易，在这些私人贸易活动中，瓷器自然也是主要的商品。

中国和欧洲直接的瓷器贸易，始于明代。

十六世纪，热衷于海外扩张的葡萄牙是第一个闯入我国直接和我国进行瓷器贸易的欧洲国家[21]。此后，中国瓷器大量流入里斯本，致使里斯本很快代替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街道上出现了专门经营中国瓷器的商店。

西班牙在海洋冒险上也是名列前茅的国家。十六世纪初，西班牙的一千艘商船，几乎垄断了美洲、欧洲、北非和亚洲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在亚洲，西班牙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著名的马尼拉港在1571年（隆庆五年）开放，每年约有三、四十艘中国大帆船来到此地出售瓷器。西班牙的商船再把购买来的中国瓷器转运，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的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再由西班牙商船运回欧洲[22]。

荷兰从十七世纪开始代替了葡萄牙，垄断了欧洲国家和中国瓷器的贸易。欧洲学者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往来的信件统计，估计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至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八十年中，有一千零一十万件中国瓷器被荷兰商船运载到荷兰和世界各地。将数量如此庞大的中国瓷器，飘洋过海，从广州运载到阿姆斯特丹和欧洲其他的商港，在历史上真是奇迹[23]！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经营中国瓷器的首位开始由法国、英国所取代。据记载，法国商船"安非托里脱"于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到达广州，回国时，船上装满了以景德镇为主的瓷器一百六十箱，估计有数万件之多。回国后，这些瓷器被抢购一空，商人因此获得巨额利润。该船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再度来到广州，返航时又运载了瓷器一百四十箱[24]。

英国1685（康熙二十四年）年派遣了"中国商人"号船到厦门，首次运载了大批的福建瓷器和茶叶。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英国商船"马克利斯菲尔"号来到广州，运载五十三箱瓷器和大量的茶叶，并在广州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一说1715年）。此后，英国商船不断来华，估计约有二千五百万件到三千万件中国瓷器运到了伦敦等港口[22]。1735年（雍正十三

年）英国商船“格拉富图”号和“哈雷孙”号，分别从广州和厦门返航，运载了二十四万件中国瓷器㉘。1866年5月29日，英国商船“燃烧的十字架”号从福州启航回国，运载了大量的瓷器和乌龙茶㉙。

此外，德国、俄国、丹麦、奥地利、瑞典、美国也被中国瓷器所吸引接踵而来。

明清时期，我国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釉上红绿黑三彩瓷，另外还有许多纹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绘瓷工人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瓷、人物图画（诸如神话、宗教故事和风俗画）、船舶图画以及码头风景画、花卉图四种㉚。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权的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使我国瓷业生产逐渐衰落，瓷器的外销也就每况愈下了。

四　中国外销瓷在国外的影响

中国瓷器对各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精神领域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东南亚一些古代民族，把中国瓷器作为崇拜物，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被作为宗教仪式上祭祀食品的器具；㉛在菲律宾，大量的中国大瓷瓮被作为葬具使用㉜。在非洲东海岸九——十九世纪的宫殿、墓柱和清真寺遗址，中国的青瓷和青花瓷被用来装饰墓柱、宫殿、寺院的天花板以及祈祷用的壁龛，以此来增加建筑的美观和显示阔气㉝。瓷器还被作为财富的象征，几乎每个欧洲的国王、王后都搜集、收藏中国瓷器的精品；在帝王派遣使节出国访问或者是公主出嫁时，中国瓷器也是最珍贵的礼物和嫁妆。在日本，中国瓷器的精品被天皇命为国宝，并把它赏赐给有功之臣，作为至高无上的嘉奖㉞。

其次，中国瓷器在生活中改变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风俗。在我国瓷器输入之前，东南亚一些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饮食不用器皿”，后来由于我国瓷器的输入，才有了新型的饮食器具。如《明史·外国传》载：“文郎马神（今印尼加里曼丹）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对于广大的欧洲市民们来说，自明以后，使他们在厨房里和餐桌上抛弃了昂贵的金银餐具和粗笨的陶制餐具。

此外，中国瓷器也是打开昔日东非大门的钥匙。由于中国瓷器的出土，致使那些早已湮没无闻的沿海地区的历史，得以重新认识。如中国瓷器的出土，使拉木群岛（今肯尼亚东海岸附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八世纪；在坦噶尼喀56处遗址中出土的许多中国瓷片，特别是其中30处废墟中发现的400件中国瓷器，使得英国考古学家莫歇·韦勒欣喜十世纪以来坦噶尼喀久埋地下的往昔，可以凭藉中国瓷器连缀成篇㉟。

最后，着重谈一下我国陶瓷对外国制瓷手工业的影响。

光彩夺目的中国陶瓷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使我国的陶瓷得以自唐以来千余年间对外盛销不衰。然而，运输中国陶瓷需要远涉重洋，多有不便，再者仅靠输入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各国便纷纷仿制中国瓷器。

我国陶瓷传入朝鲜后，给当时的高丽陶瓷以相当的影响。大约在十一世纪末，在高丽陶瓷工人的努力下，仿照中国越窑青瓷所烧成的青釉瓷器——“高丽秘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当时人评“高丽秘色”与“定窑”（即河北定窑所产的白瓷）同称“天下第一”（《太平老人袖中锦》）。

日本在我国古代陶瓷艺术影响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陶瓷艺术。当唐三彩传入后，日本的陶瓷工人便积极仿制出“奈良三彩”。日本人十分喜爱中国的龙泉青瓷，1223年（嘉定十六年），日本陶瓷艺术家加藤四郎左卫门到中国学习制瓷技术达五、六年之

久，回国后在山田郡濑户村试烧青瓷成功，在其陶瓷史上开辟了新纪元[28]。明代中国的青花在日本被誉为“青肌玉骨”，日本陶瓷艺术家藤五郎太夫来中国学习后，回国开设伊万里窑和鹿背山窑，产品在造型、纹饰、釉色都明显接受明代青花瓷的影响[29]。

1974年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越南、泰国、柬埔寨的古外销瓷展览会，其中越南陶瓷陈列品大致分为八类：即乳色、绿色和棕色釉的单色瓷器、二色（乳和棕）瓷器、青瓷、加釉铁色瓷器、钴蓝器、红和绿描瓷器、珐琅蓝瓷器。其中单色瓷器强烈反映出受我国宋瓷的影响，而众多的著名的釉内蓝器，和我国元代青花十分相似。

在西亚各国中，接受中国陶瓷艺术影响最深刻的是今天的伊朗（古称波斯）。晚唐以后，中国的三彩器和邢窑白瓷输入后，很快出现了仿制品——波斯三彩和白釉蓝彩陶器。入宋以后，输入伊朗的中国陶瓷变成以青瓷为主，这时，伊朗又掀起了模仿中国青瓷的热潮。元明时期的青花瓷，更为伊朗人所喜爱。据《中国陶瓷史》记载：“中国的制瓷技师，于十六世纪初已在波斯的伊斯伯罕造瓷器了”[30]。直接聘请中国陶瓷工人到伊朗烧瓷，无疑促进了伊朗瓷业的发展。

非洲的埃及在唐末五代输入中国三彩器后，便积极仿制出了“埃及三彩”（即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纹陶器），白瓷输入后，又仿制了白釉陶器。自十一世纪后，青瓷输入，又生产出了具有中国样式的埃及青釉陶器[31]。元明两代输入的大量青花瓷又深深吸引了埃及的陶工，很快仿制了青花瓷器。

中国瓷器对欧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制瓷技术经阿拉伯，渡过地中海，首先传到了意大利，随后开始了模仿中国瓷器的生产。在1470年（成化六年），意大利的炼金士安东尼奥，经过努力，成功地制造了模仿中国的软质瓷器；到1735年（雍正十三年），艺术鉴赏家古诺雷创办的多西工厂，又生产出了模仿中国青花瓷器的釉下蓝彩瓷器。接着，模仿中国瓷器的荷兰匠师在1584年直接从我国进口白色釉料和青花颜料，模仿中国青花瓷的陶器试制成功。1644年，法国在荷兰的影响下也开始了陶器生产，并在德国、奥地利匠师的协助下，生产出了优秀的瓷器。然而生产出真正硬质瓷器的是十八世纪的德国，柏林一名叫柏特格的炼丹士与学者特斯蔡霍斯合作，发现可以用高岭土、石英和长石生产硬瓷，于是在迈森开办了欧洲第一家瓷器工厂，生产出无数精美的产品，使柏特格成为世界陶瓷史上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迈森所生产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瓷器，一时成为十八世纪欧洲最时髦的畅销品[32]。从十八世纪中叶起，随着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瓷器生产随之在欧洲普遍发展起来。

---

① 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1期。

② 〔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长谷部乐尔《日本出土的元明陶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版。

③ 富斯《菲律宾发掘的中国陶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版。

④ 〔日〕三上次男《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创刊号，紫禁城出版社。

⑤ 同④。

⑥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分别为第207、208、209、210页。

⑦ 同⑤。

⑧ 同⑤。

⑨ 同⑤。

⑩ 同⑤。
⑪ 同⑤。
⑫ 同⑤。
⑬ 同⑤。
⑭ 同⑤。
⑮ 〔日〕三杉隆敏等《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版。
⑯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分别为262、263、265、266页。
⑰ 同②。
⑱ 同⑯。
⑲ 同⑤。
⑳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99—10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9月版；〔日〕三杉隆敏《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版。
㉑ 同⑮。
㉒ 同⑯。
㉓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8月版，分别为第35、43、51、52、60、75、80、199、200、141、144、137页。
㉔ 同㉓。
㉕ 同㉓。
㉖ 同㉓。
㉗ 同㉓。
㉘ 同㉓。
㉙ 同㉓。
㉚ 江苏省文化厅文物处编印《我国古代外销瓷》《中国古代陶瓷基础知识》，1984年12月印。
㉛ 叶文程《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景德镇陶瓷》1983年第1辑。
㉜ 叶文程、丁炯淳《明代我国瓷器销行东南亚的考察》，《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景德镇陶瓷》1983年第1辑。
㉝ 马文宽《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景德镇陶瓷》1983年第1辑。
㉞ 同㉓。
㉟ 莫歇·韦勒《东非考古》，《坦噶尼喀汇刊》(Tanganvika Notes and Records) 1955年第40期43页。
㊱ 同㉓。
㊲ 同㉓。
㊳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412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㊴ 主要参考〔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9月版。
㊵ 主要参考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社。

贡 窑 概 论

童兆良

一九七七年，慈溪县上林湖农民在吴家溪平整土地时发现唐代越窑青瓷墓志罐一件，罐体刻："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一九八一年省市文物部门会同慈溪县文管会进行古窑址调查，又在上林湖后司岙发现内外刻莲瓣纹、器底刻有"官样"二字的残青瓷小碗标本一件。这些前所未见的重要发现，在越窑青瓷的研究中又掀起了一阵涟漪。许多专家学者均发表了新见解，以往著录中时有贡窑、御窑、官窑、前官窑、御窑器之类对越窑和越窑器物的赞誉之辞。

越窑的确是一处名闻中外的古代窑场，早在唐朝陆羽《茶经》中已名列各大窑系之榜首，然而考其究竟，能否名实相副，看来还得全面分析。笔者几年来一直参予上林湖越窑遗址的调查和标本整理，逐步领略了有关青瓷器的知识，谈谈这方面的一些认识，恳切希望得到诸位行家的帮助和指教。

一

要了解贡窑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贡窑，同时要搞清楚贡窑与御窑、官窑之间的一系列概念性认识，才能更好地研究在唐宋时兴盛的越窑青瓷发展史。"贡"，《辞海》云："古常指属国或官吏把物品进献给天子"。陆德明释文："下之所求于上"为贡。顾名思义这种地方烧制上贡越器的窑场就是贡窑。唐昭宗乾宁进士徐寅《贡余秘色茶盏诗》曰："捩翠融青瑞色清，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正是对唐代贡窑及贡窑秘色瓷的极好写照。但贡窑不能当成御窑，"御"：指直接对皇帝有关的，御窑是专门为供应宫廷所需瓷器而设立的机构，所以贡与御之间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将贡窑产品或"官样"之类的器皿说成御窑器，看来还是称贡御越器为妥。

近年来随着野外调查和考古事业的深入，越器中刻带"官"字款的器物时有发现，有的专家认为上林湖曾设有官窑；或者将生产秘色瓷的窑场即视为官窑；也有把贡窑说成是上林湖的最早官窑。凡此种种，看来似乎有依据，但细加推敲还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至少到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论据。

文献史料中关于越窑带官字的条目记载有：光绪版《余姚县志》卷六，转引嘉靖志《物产》秘色瓷条："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又《六研斋笔记》云："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以上条目可知，秘色瓷出上林湖是无须异议的，而"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这里的唐是指出现贡窑之后的唐？还是五代的后唐，姑且不论。但据宋代周密《志雅堂杂抄》所云："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望日、殿前承旨赵仁济监越州瓷器"的这一记载，说明当时的越窑确实已设置官员。他们的职责显然是监窑，这里势必包括数量、质量、品种以及漕运等方面的监督管理，促使窑民及时完成上贡越器，当然也不否认在贸易瓷方面的管理。据此推理，"置官监窑"应该是唐

宋时朝廷派驻的一个管理机构，不能明确说明它就是官窑的性质。

关于《六研斋笔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笔者认为，其含义只能说明它不是官窑的反证，如属官窑，那何必要讲"今人率以官窑目之"呢？看来秘色瓷也不是官窑产品，只是到唐宋时越窑产品质量之精美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峰，时人才常以"官窑目之"。

再从近年来出土的实物来看：浙江临安县板桥五代墓，曾出土肩部划有"官"字款越窑青瓷双系瓶一件①。如果将它作为官窑范畴的出土实物来分析，不难看出，器物在入烧之前、在显眼之处划个"官"字的标记，目的是为了防止与民间贸易瓷相混淆，惟此说明它的烧制应该是非官营窑场。观其器物，在上林湖众多的晚唐五代窑场中，时可发现此类相同器残骸。据南宋人庄季裕《鸡肋篇》一书中提到："宣和中禁廷制样须索，制作益加工巧。"按此一说，官字款器物很有可能同"禁廷制样须索"或者"置官监窑"一类记载有关。

刻有"官样"标志的青瓷小碗同样也说明，"官样"是对非官样而言。从字义上讲："官"应该指官方，"样"是形状，样品之意。据此，这内外饰莲瓣纹，底部刻"官样"二字的青瓷小碗是官方指定监烧的一种碗的样品，这正同《鸡肋篇》"禁廷制样须索，制作益加工巧"一语相吻合。

再则笔者通过多次古窑址调查获悉，这内外饰莲瓣纹，形制与"官样"器一点无差异的青瓷小碗在上林湖皮刀山、后司岙、扒脚山、下滩头等窑场均有发现，唯其器底未划"官样"二字而已。一九八七年春，笔者又对出有"官样"器形制相同的窑场作一次专题调查，在皮刀山发现了一件青瓷卧足残盘，该盘胎质细腻，釉色青绿，盘内划花，盘外刻字，惜铭文残缺，仅存："上林窑〔自〕……年之内一窑之民〔值〕于　监……〔交〕代窑民……"器底刻有："其灶□……"如对这件青瓷残盘铭文作推理分析：那么"上林窑自"什么情况下要完成何项烧贡任务，什么"年之内一窑之民值于"，"监"理窑务的还要交待（代）窑民什么事情。底部的"其灶□……"视其字数排列不为很多，可能指窑户而言。如这种推理没有错的话，说明该窑属"置官监窑"范围，其性质不为属于官营。烧造时间笔者与邻近的前岙窑址（即"太平戊寅"铭文窑场）相比较，其下层产品几乎与前岙窑址中层产品如出一辙。据此说明"官样"器皿的生产时间，大致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殿前承旨赵仁济监越州瓷器的这一阶段。

这件青瓷铭文残盘和内外饰莲瓣纹的"官样"类同青瓷小碗在同一窑场出土，进一步佐证了史书中对"唐宋时置官监窑"的记载是正确的。也说明"官样"的青瓷碗并非产于官窑，而是"禁廷制样须索"的一个实物典例。同时也证明了上林湖窑随着越器贡奉数额的增长，当时已不复存贡窑，而是实行"置官监窑"，也就是说越窑中相当一部分产品是在政府的监烧支配下进行的。

另外，关于光绪版《上虞县志》转引《万历志》广教寺条记载："广教寺在县西南三十里，昔置官窑三十六所，有官院故址。"对于这一明确的官窑记载，笔者认为：在引经与补史过程中，是应该通过仔细的研究和谨慎的思考及正确的选择。至少可以说，唐宋时越窑的中心产区上林湖至今还没有发现设立官窑的确切依据。

二

上林湖在唐代设有贡窑是毋庸置疑的，吴家溪出土的唐光启三年青瓷墓志罐的记载已得到充分证实。究竟贡窑产品如何？这在史书中还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但从唐乾宁进士徐寅

《贡余秘色茶盏诗》可以肯定一点，贡窑中生产的最好产品就是秘色瓷。

秘色瓷是什么？过去人们把它当成一个谜，主要是受到秘色瓷这个称谓和后人对秘色瓷过分夸奖的影响所致。从青瓷器的发展情况或者史书上对秘色瓷的描述，以及近年来浙江临安县发掘的吴越国王钱镠父母亲钱宽墓②与水邱氏墓③，杭州发掘的吴越国王钱元瓘墓及妃子吴汉月墓等④，均有一批精美的青瓷器出土，这些都初步显示了唐末五代期间秘色瓷的真面目。

一九八七年四月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又发现了物帐明确记载的秘色瓷，计有碗、盘、碟、瓶、托等十六种，其中一个镶嵌着金银团花和仙鹤的平托秘色瓷碗，碗里釉色以黄为主，滋润而有光泽，碗沿镶银边，碗外壁有纯黑色漆，精雅庄重、光可鉴人，是瓷器中罕见的精品⑤。这批秘色瓷在未确定窑口的情况下，当然不能贸然说它就是越窑秘色瓷，但至少可以肯定它是贡品。

那么这些产品能否说就是贡窑中生产的呢？上林湖贡窑产品又是怎样呢？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从唐光启三年青瓷墓志罐"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一语窥探，可以看出贡窑应该与其它窑场有所区别，否则这件墓志是不为依贡窑作座标的，也可断定当时的贡窑数量不会很多。

唐中晚期中原遭安史之乱，而后各地又出现藩镇割据局面，因此地方上对朝廷的青瓷进贡数额估计不会太大。据《吴越备史》卷四："王自国初供奉之数量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惟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这里所述的"王自国初"应该指吴越国王钱镠，说明吴越立国初贡奉秘色瓷还未列国事文案，而后为了钱氏小朝廷立国需要，贡奉数额才逐步增加，产品也愈趋精巧。

晚唐五代具有代表性的窑场如施家斗、黄鳝山，茭白湾、高岭墩等，其烧制的产品在同时代中属佼佼者。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腻，制作精工、式样优美、釉色青黄，施釉滋润而光滑。所发现的纹饰多用团花，宝相花之类，也有刻仙鹤和各式龙纹。如果它就是贡窑的话，与晚唐五代出土的秘色瓷相比较，无论在胎质、釉色、款式等方面都极相似。如上窑场的产品多用单件罩烧，尤其是所使用的匣钵大多采用胎泥制作。至于碗沿镶嵌金银，瓷碗外壁有纯黑色漆，至今还未能找到依据。有人认为，金釦银棱，金银陶器，都应该是瓷器烧制后，再装镶金银的，这个工作可能由另一个工场来担负，金银材料即使制坏了，也绝对不会任意抛弃，所以在一般窑址里找不到它的遗骸⑥。我认为这个推论是合乎逻辑的，因为秘色瓷窑址虽然未经正式发掘，历年来我们所采集和经手的标本，至少已上万片但始终没有发现镶嵌金银的瓷器残片。

总之，秘色瓷是瓷器中经过挑选的最佳产品和进行过再加工的最佳产品。它展示了贡窑为了完成入贡需要。对贡品质量极为注意，对非贡窑产品为了适应国内外贸易的需要，则更注重实际效益。但其款式、釉色、胎质等方面并无多大差异，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唐末五代时期江南地区的相对稳定，贡窑与非贡窑之间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并非因为是贡品，所以在釉色、配方、器型、工艺等方面秘不示人，称秘色。

三

贡窑始于何时？国内外古陶瓷专家对此项研究还没有谈及，或很少涉及。笼统地说：越窑历史悠久，技术力量雄厚，在民间窑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产生了贡窑。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规律。但秘色瓷的名称由来已久，贡窑的名称也随着出土文物的发现而产生，如上的答案无论如何是不能使人满意的。

我们通过多次对贡窑遗址调查分析，认为上林湖的施家斗和黄鳝山窑址就是唐代贡窑的范例。笔者曾对此二窑的产品就烧造时间与宁波河义路出土的唐大中二年（848年）产品作仔细的对比，形制完全相同，可能贡窑生产时已开始。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杯"。这是一首唐代陆龟蒙《秘色越器诗》，可能在现有所知的资料中也是最早提到秘色瓷的记载。陆龟蒙卒于881年，如果贡窑就是生产秘色瓷的话，据此推算，贡窑的产生时间大致在唐宣宗大中初，至迟不会晚于唐懿宗咸通末。

精美的秘色瓷作为贡品在《十国春秋》《宋会要》《吴越备史》《宋史》等均记载详备，可以说上林湖自唐至宋一直在烧造进贡的秘色瓷。那末能否说，随着越窑进贡秘色瓷的存在，贡窑也应该自唐而宋继续存在呢？我们又调查了比施家斗、黄鳝山稍迟的茭白湾窑场，以及曾出土过与水邱氏墓相同香薰虎头足的高岭墩窑场。这些窑场的明显特点是：下层产品也完全采用胎泥制作的匣钵烧置，其胎质、釉色、款式等方面与施家斗、黄鳝山二窑场相比较差异不大。上层产品已全部采用夹沙粗质匣钵烧置，纹饰已由下层的单调和素面居多逐步转向精细繁褥。发现的纹样有：蛟龙、凤凰、双飞的蝴蝶、对称的鹦鹉，还有荷叶伏龟，花丛飞鸟等，刻划之精美可谓巧夺天工。上层产品与"太平戊寅"窑下层产品一模一样，可见该二窑生产时间当为唐末至北宋初。

从时代背景上分析，当时两浙曾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战争，如唐光启三年（887年）钱镠攻取越州，杀越州节度使刘汉宏。唐乾宁二年（995年）钱镠攻取余姚，平定董昌叛乱[⑦]。但对瓷业生产没有带来很大的威胁，器型仍袭唐代风格。产品质量仍独步一时。钱镠立国后，奉行了一套"保境安民"的国策，不但自己终生不渝，直至临死还要告诫继承人钱元瓘，要好好事奉中国（指北方朝廷）；不要搞独立，"勿以易姓废大之礼"。说明钱镠忠效臣顺，以事贡奉，因此，贡窑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五代中晚期割据两浙的钱氏地方政权，为了结纳中原的统治者，贡奉次数逐渐增多，态度之虔诚超过了历来地方政权称臣供奉的程度。著名的越窑青瓷器正是出于政治上的特殊需要。随着贡奉次数和数额的增加，原有的数座贡窑在数量上已无法满足人贡瓷器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垄断起来，实行"置官监窑"。产品也逐步转向精雕细刻，达到了穷工侈靡的程度，而且生产这种秘色瓷的窑场，在上林湖一带又有了明显的增加。

五代末北宋初，吴越小朝廷已是朝不保夕，惴惴不安，所以对中原君主贡奉更加殷勤，不惜"倾其国事贡献……器服珍奇为献，不可胜数"。单是卸金瓷器一项，动辄万事，鉴于上林湖一带的产品已供不应求、转而又向宁波东钱湖和上虞的曹娥江两岸发展。因此贡窑这一名称也随着"置官监窑"的实施而告终。贡窑秘色瓷也应该自五代中晚期开始．逐步转向"置官监窑"的秘色瓷。从中进一步证实"唐宋时置官监窑"这个唐显然是指五代时的后唐。

越窑青瓷的发展历史始终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相互适应的。贡窑如此，秘色瓷的演变过程也如此。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部分的解剖和缩影。

四

唐宋时鼎盛的越窑青瓷，以细腻的胎质，青莹的釉色，优美的造型，艺术性与实用价值紧密相结合，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作为新兴的商品加入国际市场而远销世界各国，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喜爱。宁波唐代海运码头遗址的发掘，和当今世界各地青瓷器的出土，都说明

了这一点。国内外的古陶瓷专家和学者对此已经作过不少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末，唐代贡窑产品能否也列入外销瓷之列呢？这是一个新课题，还需要共同探讨。

宋人曾慥《高斋漫录》赵德麟《侯鲭录》等书记载“吴越秘色瓷，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但对贡窑中的产品不能同等看待。《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宋两朝贡奉录》等书曾反复提到：“扣金瓷器”、“金银饰陶器”和“金棱秘色瓷器”等，其实这种秘色瓷才是上文所说的“臣庶不得用”的秘色瓷。从杭州吴越国王钱元瓘墓出土的涂金青瓷龙瓶，苏州七子山广陵王钱元璙墓出土的金釦大碗[⑧]。法门寺镶嵌银边的平托秘色瓷碗等，便是“臣庶不得用”的最有力的实物佐证。这样秘色瓷在世界各地至今还未发现过，如果以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偶有出现，也只是作为唐宋王朝对各国的一种馈赠礼品，而绝非作为商品外销的。

瓷器在其生产环节中产生一定数量的残次废品确属难免，贡窑当然也不例外。严格地说，贡品要求高，对瓷器的淘汰率也就高，那末留下来的一般产品和低劣产品势必要作为贸易瓷来处理。另外，贡窑中也有极少部分产品与其它窑场一样采用多件罩烧，这些产品除上面一件无支烧泥点外，余下几件多少总要留下一点痕迹，看来这作为贡品的秘色瓷也是不可能的，是贡窑中部分产品成为贸易窑的又一证据。

日本研究古陶瓷的专家曾指出：“在我国发现的越州窑青瓷的碗、碟、水注、盒子、壶、唾壶、托子等等，其中碗和碟的出土量在整体中所占比例最大。总数超过三千片的越州窑青瓷大致可分精细产品和粗制产品”[⑨]。虽然这里没有明确指出其中有贡窑产品，但在贡窑中此类产品几乎应有尽有。

再从宁波海运码头出土的七百多件产品中，如敞口、直壁、玉璧底或敞口、弧腹、矮圈足碗（内有松子状支烧印痕）或翻沿、四缺、弧腹、敞口圈足碗和各式壶、盘等成组器物，与国外出土物相吻合。考古工作者还根据这些出土器物，对越窑系统的各个窑口作逐一的对照调查，特别是上林湖马溪滩、施家斗、下滩头、荷花心等等窑群中生产的执壶、碗、海棠杯、各类盒、盘、罐、钵、托具等成组的青瓷器物，其造型、纹饰都与之基本相同[⑩]。可见贡窑生产的产品在贡余有部分产品作为外销瓷是符合情理的，而且在国内外都可找到大量的实物依据。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和创造，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贡窑存在的时间虽然不十分长，在古代外销瓷数量上也远远不及其它贸易瓷窑场多，但其历史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对世界各国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是要充分肯定的。

---

① 《浙江临安县板桥五代墓》，《文物》1975年第8期.
② 《浙江临安县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第12期.
③ 《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④ 《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第8期.
⑤ 《陕西省法门寺地宫秘色瓷》，《人民日报》1987年6月7日第三版.
⑥ 王士伦　《余姚秘色瓷窑探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8期.
⑦ 倪士毅《浙江古代史》第九章.
⑧ 《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二期.
⑨ 〔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
⑩ 林士民《试论明州港的历代青瓷外销》，《海交史研究》第五期.

秘色瓷考辨兼论蜀窑秘色瓷

董其祥

何谓秘色瓷和秘色窑瓷，言者人人殊义，聚讼纷纭，为陶瓷史中未了的悬案。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所接触到的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发现，就此问题，略陈所见如下：

一　何谓秘色瓷

历来对秘色瓷的得名，大约有几种意见。

（一）宋人多谓秘色瓷为宫廷御用，臣庶不得使用，故名“秘色”，与御窑、官窑同义。“秘”为“中秘”、“秘密”之意。

宋人曾慥《高斋漫录》云：“今人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近人邓之诚《骨董续记》引此文说：“据此知秘者‘中秘’之谓，与御窑、官窑同义。”

又周辉《清波杂志》云：“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周辉，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居钱塘，当时越州尚秘色瓷器。

又赵令畤《侯鲭录》也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越器诗云……，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令畤元祐年间与苏轼友善，后随高宗南渡，南宋初年尚在。

又顾文荐《负暄杂录》①、叶寘《坦斋笔衡》②等书也有类似记载，文字大同小异，不用一一征引。按此说以钱氏上贡宫廷之物，解释秘色是不可信的。赵令畤、顾文荐、叶寘等都已提出怀疑；唐陆龟蒙已有《秘色越器》诗，“秘色”之名当然不自钱氏始。

（二）“秘色”为唐宋时瓷器特定釉色的称号，一般系专指越窑青瓷器，现举唐宋人诗文为证。

陆龟蒙《甫里文集》十二有《秘色越器》诗：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陆龟蒙唐昭宗光化间人。诗中咏诵的“秘色瓷器”就是越窑烧造的“千峰翠色”青瓷器。

徐寅《钓矶文集》中有《贡余秘色茶盏》诗：

“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
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溃。
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

徐寅，昭宗乾宁间进士，先后投朱温、王审知。所咏《贡余秘色茶盏》诗，当作于五代初年。吴越钱氏以秘色瓷器作为贡品，进奉中原王朝。诗中对秘色茶盏的工艺特点作了细致

的描述，说它釉色青翠如绿云、嫩荷，胎质坚薄如明月、春水，形制规整如古镜薄冰，这些都是越窑瓷器的特点。

又叶寘《坦斋笔衡》云："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陆龟蒙诗：……乃知唐世已有，不始于钱氏。"叶寘引陆龟蒙诗说明"秘色越器"即是越州烧造的青瓷器，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秘色瓷。

（三）"秘色瓷"为泛指一切青瓷器。

宋人庄季裕《鸡肋篇》云："龙泉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邓之诚《骨董琐记》引此文并加按语云："是越窑、秘色窑、龙泉窑实皆青瓷也。"推而广之，似乎凡青翠坚薄的瓷器，都可命名为"秘色瓷器"，这是秘色瓷的广义。

又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而用之。"是知浙江余姚、陕西耀州青瓷，也可作为秘色也。

还有清人《爱日堂抄》云："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器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③清唐秉衡《唐氏肆考》所载相同，无用再引。这里所说的"秘色始绝"，揣其文意，系指青色瓷已退出了工艺瓷的地位，而让位于彩瓷了，可知所指的"秘色瓷"系泛指一切青瓷。

近人陈浏，号寂园叟，在其所著的《陶雅》中，对秘色瓷亦有论述。他说："一切官窑，诸秘色，上方珍品，宝贵甚至。""均窑，秘色葱青，雍正仿之。""吴越秘色，当属青色瓷器，仍柴遗风也。"可知在作者看来，凡青色瓷器都可以"秘色"称之。这是取"秘色"的广义。

（四），"秘色"为"翡色"，"翡"与"秘"一音之转，日本学者有此说。恕我囿于见闻，未读日文原著，不能确知其论据何在。近读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云："高丽陶器，色青者，国人谓之翡色"。又说："高丽燕饮器皿多涂金或银，而以青陶器为贵。有狻猊香炉，亦翡色也。上蹲兽，下为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此说谓青瓷为"翡色"，是否就是日本学者立论根据，不得而知，但其说是值得商榷的。现申论如下：

1、"翡"的原义，应是红色的羽毛。传鸟名有"翡翠"，指雄者赤羽曰翡，雌者绿羽曰翠。宝石中借用"翡翠"二字，指赤绿相间的宝石。红者为翡，纯绿者为翠。绯为红色丝绸，俗称绯红色。故训翡色为青色，在汉字训诂上无根据。

2、高丽人称青色为翡色，与中国唐宋时代称青色为"秘色"无一定联系。当年中国人以天朝臣民自居，不会因高丽人称青色为翡色，就称越州青瓷为翡色瓷，或"秘色瓷"。

3、《高丽图经》的作者系宣和年间奉使高丽，记述所闻，称青色为翡色。不能以此就说中国人在二百多年前的晚唐时代称"秘色瓷"是来源于"翡色"的称呼。尚且翡和秘古音是否相通，还无证可据。因此用翡色释秘色，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五）据作者研究，"秘色瓷"的本义，既不是中密之"秘"，宫廷御用之件，称为"秘色"，也不全是越州青瓷的特称。其原始意义，别有所在。我意"秘色"原为"碧色"即碧玉之色。引而申之，用以称青色瓷为"碧色瓷"。后因吴越用越州烧造的碧色瓷进贡朝廷，臣庶不得使用，故讹"碧色"为"秘色"。南宋以后，泛指一切青瓷为秘色瓷，其烧造地

点也不限于越州一地。这些论点，请再申论如下。

1、唐宋时多用玉器形容陶瓷器精品。如陆羽《茶经》云："越瓷类玉"；杜甫称大邑瓷"声如哀玉"；顾况《茶赋》："越泥似玉之瓯"；孟郊诗："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李清照词："玉枕纱橱"花等。这些诗词的作者都是以玉器来形容精美的瓷器。这时烧造的美术瓷，确有似玉的感觉。据《景德镇陶录》引《邑志》称：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又说：景德镇瓷器销售他地，称为"光玉"。

又唐宋时代有斗茶的习俗，青瓷茶盏，增加了茶的色感，故"越瓷青而茶色绿"，故崇尚青瓷。称青窑为缥瓷④，为"千峰翠色"，为"拨翠融青"，为"雨过天青"，为"嫩荷绿云"，直到宋代的汝、官、哥、均等名窑，仍以青色为上。

2、青绿色的玉石称为翠玉、碧玉、是玉石中的珍宝；青绿色的碧色瓷，同样是瓷器中的精品。用碧玉的碧色来形容碧色的瓷器，故名碧色瓷。唐末五代吴越以之供奉朝廷，臣庶不得使用，故讹"碧色"为"秘色"，"秘色瓷"遂为唐宋越窑青瓷的特称。南宋以后，泛指一切青瓷，这又是另一种意义。

陶瓷工艺在我国古代属于百工之事，士大夫不屑一顾，更缺少专籍记述。故其名辞术语，多为匠师口耳相传，直到形诸文字，多有讹变差参。如称"油"为"釉"、为"铀"，称"级"为"圾"，称"笄"为"䈳"，称"坯"为"丕"等，约定俗成，无从详考。故知讹"碧色"为"秘色"，亦属事理之常。

3、"碧"与"秘"，在古代为双声字，碧为兵役切，帮纽；秘，兵媚切，亦属帮纽。古代同音相假，因此"碧色"可以假借为"秘色"。秘色瓷可以泛指一切青瓷。相反，"翡"为扶第切，与"秘"古音并不相通。

至于历史上越窑与秘色窑的关系，我同意陈万里先生的意见："唐代越器除了为民间一般需要烧造外，曾经置官监窑，烧造一种为统治者应用（进御）的物品，这是最早的御窑厂。而此种御窑厂所出的物品，就不单称越窑，另外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秘色，或是秘色越器。……秘色瓷产生于唐代。钱氏利用唐代已经烧造过此种秘色瓷器的窑厂，来烧造用以贡唐、贡晋、贡宋的瓷器，所以因袭秘色瓷这一旧名称。钱氏烧造秘色瓷……比之一般的越器要来得格外精亮。也可以说，秘色名称虽不始于钱氏，而钱氏烧造的，其精美却有过之。"⑤这些结论，无疑是正确的，我不过作了一些补充解释而已。

二　秘色瓷烧造的年代和地域范围

秘色瓷和仿秘色瓷烧造的年代长久，烧造的地域也十分宽广，在陶瓷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现按年代顺序列次如下：

1、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里出土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所藏佛宝诸物，发现金银饰的秘色瓷多件，与其同出的银器上刻有"浙西"的铭文，证明这批物品是越州烧造的⑥。

2、晚唐诗人陆龟蒙有《秘色越器》诗说："九秋风露越窑开"。时间在九世纪末。

3、前蜀王建谢朱梁赐信物书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事在前蜀永平二年（912年）。从陈万里说：这批秘色瓷应是越州烧造的物品。⑦

4、五代徐寅有《贡余秘色茶盏》诗，据傅振伦先生考证，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年），闽王审知遣使徐寅贡秘色瓷于中原王朝。⑧

5、宝大元年（924年），王遣使贡唐方物……秘色瓷器。⑨

6、清泰二年（935年），王贡唐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⑩

7、天福元年（942年），王遣使贡晋……秘色瓷器。⑪

8、开宝二年（969年）秋八月……王贡秘色瓷于宋。⑫

9、开宝六年（973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濬进金棱秘色瓷器百六十事。⑬

10、熙宁元年（1068年）十二月，诸道贡物，……秘色瓷器五十事。⑭

11、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赵令畤《侯鲭录》、曾慥《高斋漫录》等都说秘色瓷为吴越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并未旁及其他地区。

12、又庄季裕《鸡肋编》卷上云："龙泉……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庄氏福建惠安人，活动于北宋、南宋之际，以博物洽闻著称。他说：龙泉出秘色瓷，并云"钱氏所贡取给于此"，当有所据。

13、赵彦卫《云麓漫钞》云："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指唐朝），号秘色；又云出钱王（指吴越）。今处之龙溪（今龙泉），出者粉青，越乃艾色（青黄色）。唐陆龟蒙有进越器诗（略），则知始自江南钱王，皆非也。近临安（今杭州市）亦自烧之，殊胜于二处。"赵彦卫绍兴年间出宰乌程，所著《云麓漫钞》以博洽称。所云南宋初年的龙泉、临安两处皆烧造秘色瓷器，是可信的。

14、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云："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而用之。"陆游似乎以耀州青瓷类似余姚秘色，可知南宋时余姚也在烧造秘色瓷称。又明人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也说："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窑，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是其质地釉色约与官窑相似。

15、《余姚县志·物产》云："秘色瓷……上林湖出者颇佳，宋时置官监窑焉，寻废。今各邑亦俱有民窑，然所烧大率沙罐瓦壶之类。不出境，亦粗拙，不为佳器。"又引《嘉靖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寻废。"可知余姚上林湖在唐宋时就置官监烧秘色瓷器，而不是始于南宋的，大约在明代就衰落了。

16、清人谈孺木《枣林杂俎》云："崇祯壬午（1642年），南京大内失秘色瓷器五百事。"这类秘色瓷当然不会是唐宋时代越州烧造，济谊连代的秘色瓷器，可能是明代龙泉或景德镇仿烧的产品。

17、蓝浦《景德镇陶录》引《爱日堂抄》云："自古陶重青品，……至明而秘色始绝。"清乾隆年间唐秉衡作《唐氏肆考》也有类似论述，可知"秘色瓷至明始绝"是可信的。但清代仍然有人还在继续仿造。

18、李斗《扬州画舫录》记有"吴麐，字栗园，歙人……有景德镇土窑，产秘色器，与唐、熊年三窑齐名，世称吴窑。"这是清仿秘色瓷器。景德镇仿烧秘色瓷，据近年对古窑址清理，发现仿秘色瓷片甚多，论者谓起于宋代，其仿制品的特点是："青色，近缥碧，与越窑同。"⑮

从以上所引材料，说明秘色瓷器从唐末五代，中经宋、元、明、清，直到乾隆年间都在烧造和仿制，其烧造年代之长是其他窑器难与相比的。其烧造地域是以浙江绍兴（唐代越州治所）为中心，旁及余姚、萧山、杭州、龙泉等地。南宋以后，陕西耀县、河南禹县、临汝、江西景德镇等地都曾仿烧，真可算是源远流长，分布地域宽广，在我国瓷业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此外，还要论及一事。即柴窑与秘色窑的关系。据《玉芝堂谈荟》记载"柴窑秘色"条引王弇州《宛委余编》云："秘色瓷至吴越有国日，愈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所谓柴

窑也。”弇州山人，为王世贞别号，嘉靖进士，学术以博洽闻名。王氏以秘色释柴窑，是他的创见。世称柴窑因周世宗柴荣而得名，论者以为烧造地点在郑州或洛阳，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柴窑产品的工艺特色十分精湛，所谓青如天（釉色清亮），明如镜（光洁明净），薄如纸（胎质轻薄），声如磬（火候适度），历来有“片瓦千金”之说，这些特点与传世的越窑秘色瓷器相同。相传臣僚请示瓷器状。柴荣手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据陈万里先生考证：吴越贡唐、贡晋都有秘色瓷，贡周亦当有之。那末，所谓柴窑雨过天青正是在钱氏称霸东南，在越州烧造的一种看法，显然是有可能的⑩。如是聚讼千年的柴窑之谜，可能有了一个解决的线索。

三　所谓“蜀窑秘色瓷”

世所谓蜀窑秘色瓷，其论据一是文献记载；二是考古资料，现分别讨论于后。

（一）　关于文献记载。据朱琰《陶说·古窑考》按语云：“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朱氏引文含糊其辞，没有说明这些秘色瓷是何地何人烧造；揣其文意，似为王建报朱梁的信物中有金棱秘色瓷器？后人以此为据，推想五代时四川可能烧造秘色瓷器，用来供奉中原王朝。笔者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现征引如下：

“永平二年春正月，丁巳，梁遣光禄卿卢玭，阁门副使少府少监李元来聘。推帝为兄。书曰（略）。别幅云：‘……金棱琉璃碗十只，艮棱秘色（原文有脱误），沙锣二面。愧非缛礼，粗达深衷，特希检留，幸甚。’

六月，遣梁使卢玭等还汴。帝答梁王书：‘大蜀皇帝致书大梁皇帝阁下：……又蒙厚加赐贶，别降珍奇……宝带异方之贡，名香远国之珍，奇锋利逾于霜雪，雅器价齐于金玉。人用多惭于未识，捧持方喜于初观……敬以专使卢卿等面，略陈所志。’

又谢信物等曰：‘右件鞍马腰带、甲胄、枪剑、麝脐、琥珀、玳瑁、金棱碗、越器皿并诸名药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赐贶。雕鞍搂玉，竖甲镕金，十围希世之珍，六辔绝尘之用。枪森蛇斧，剑耀龙锋。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上药非蜀都所记，名香以外国称奇。远有珍华，并由惠好。顾翻谢而增愧，仰渥泽以难胜，捧阅品名，实惭祇受。’”⑪

从整段文字记载来看，说明在前蜀永平二年朱温遣使卢玭等赍送王建信物，结同盟之好。六月，王建遣梁使回汴，复函致谢梁皇帝朱温的馈赠。梁赠物中有宝带、鞍马、甲胄、枪剑、麝香、琥珀、玳瑁、金棱碗、越瓷器等物。朱温这批金棱秘色越器从何而来，当然是吴向朱梁进贡的物品。朱温用来转送王建，以结同盟之好。故王建在回信中说：“人用多惭于未识，捧持方喜于初观。”王建这个土包子，人称“贼王八”的地方军阀，哪里见过这些东西，当时蜀中也未生产过这类产品，故感到特别惊奇，赞叹不已。可惜朱琰等人在征引原文时，粗心大意，把谢信物书改作报信物书，以致宾主倒置二百多年，竟无人指正其错误，其使人百思不得其解。陈万里先生独具慧眼，在《越瓷之史的研究》一文中，提出怀疑，认为这批“秘色瓷”是“吴越钱氏贡于朱梁的”但未深入探讨，这可能也是智者之一失吧。

（二）　再就考古资料而论。首先要说明秘色瓷具有什么样的工艺特点。据《景德镇陶录》云：“秘色窑……其式似越窑，而清亮过之。”这说明越窑瓷器的一般特点，如釉色青翠，造形规整，胎质坚薄，音响清脆等都是秘色窑的特点。如果我们说：柴窑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等特点来形容越窑秘色瓷是比较适合的话，那末，我们就可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对比唐宋蜀窑的产品，是否具有类似的特点，是否真有“蜀窑秘色瓷”呢？根据近

年考古工作者对余存文物进行普查所得的结果，成都附近生产青瓷的窑址只有邛崃窑系，青羊宫窑、琉璃厂窑。但这些窑址烧造的产品，大都胎质厚重，色多青灰或带紫褐色，质地不纯。釉厚如堆脂，浑浊而不清亮。音响暗哑低沉，与越窑秘色瓷相比，工艺精粗有显著的区别，两址产品很难混为一谈的。

再说秘色瓷器既为宫廷御用之物，封建帝王视为珍宝重器；那末，在帝王身死之后，就会以它来殉葬，以供生后之用。现在前蜀王建墓出土的陶瓷器五件，均为琉璃厂窑烧造：灯台两件，系邛窑产品，粗重厚实[18]，都不具秘色瓷特点。后蜀孟知祥墓未出土陶瓷器。不仅帝王墓无秘色瓷殉葬，就是四川五代墓的随葬物中也未发现过秘色瓷器。说明当年蜀中各窑都不烧造这类瓷器。因此，所谓"蜀窑秘色瓷"，不过是陶瓷考古中的"天方夜谭"说得热闹，并无确实证据。

---

① 宋·顾文荐《负暄杂录·窑器》，《说郛》十八卷。有人误为宋·陈槱《负暄野录》，非是。
② 宋·叶寘《坦斋笔衡》。《说郛》卷十八无此文。此文见于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作《坦斋笔衡》。不知孰是。姑从《说郛》。
③ 蓝浦《景德镇陶录》引文。
④ 《说文》："缥帛，青白色。"潘岳：《笙赋》"倾缥瓷以酌酃"，晋人瓷尚青白。
⑤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11页、18页。
⑥ 《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出土大批稀世珍宝》，《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
⑦ 陈万里《越瓷之史的研究》，《瓷器与浙江》。
⑧ 徐寅《钓矶文集》卷十，又见《全唐诗》卷七一〇。傅振伦说，见《陶说》译注。
⑨ 吴任臣《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下。
⑩ 吴任臣《十国春秋·吴越文穆王世家》。
⑪ 吴任臣《十国春秋·吴越忠献王世家》
⑫ 吴任臣《十国春秋·吴越忠懿王世家》下。
⑬ 《宋会要·番夷·历代朝贡》。
⑭ 《宋会要·诸郡朝贡》。
⑮ 《景德镇陶瓷史稿》64页。
⑯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20页。
⑰ 吴任臣《十国春秋·前蜀高祖本纪》。
⑱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

《岛夷志略》中的“青白花瓷器”考

彭适凡　詹开逊

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青白花瓷器”，究竟指的何种瓷器，至今说法不一。但历史考古学界一般认为是釉下彩的青花，似遂成定论。但笔者认为，搞清“青白花瓷器”所指的品种，断定其是否为青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对中国陶瓷史、海外贸易史，还是青花瓷发展史，都有重要意义。依据近年来海内外的考古发现材料，笔者拟对此问题略述管窥之见，以求教于诸同仁。

汪大渊，江西南昌人①，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至顺元年（1330年）由泉州港出发第一次出洋，历时五年左右，主要游历了印度洋一带；至元三年（1337年）冬，又由泉州港出发第二次浮海，游历了南洋一带，于至元六年（1340年）归国后，根据自己的“亲历手记”写下《岛夷志略》，于至元九年（1349年）冬成书。

《岛夷志略》中记述当时有中国贸易瓷的地方达五十余处。惟其称呼颇多，有“青白花碗”、“青白花器”、“青白瓷器”、“青白碗”、“青碗”、“青白花瓷器”、“青瓷器”、“青器”、“青盘花碗”等等。陶瓷学界现在一般习惯将其分为四类：青瓷、青白花瓷、青白瓷和处州瓷。按交易的地区国别而言，青瓷十五处，青白花瓷十六处，青白瓷三处，处州瓷五处。青白花瓷器的分布面积居于首位。按现在的国别，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几乎遍及东自吕宋岛、西至麦加的主要港口。毫无疑问，“青白花瓷器”应属当时外贸瓷中之大宗。

既然是当时外销品中的大宗，势必工艺技术成熟，产品质量稳定，而且必然是大批量生产。就是说“青白花瓷器”如指青花瓷的话，那么十四世纪四十年代以前，青花瓷器的生产一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进行着大量烧造。然而实际情况怎样呢？

首先，从国内出土资料看。

建国以来，在北京、河北、浙江、湖南、江西以及江苏等地的元代遗址、窖藏和墓葬中，出土了一些青花瓷器。其中属于1340年以前纪年墓出土的有三例。其一，浙江省杭州市的前至元十三年（1276年）墓出土三件观音坐像。施青白釉，釉下用青花、褐彩描绘发、眼、眉及服饰的突出部位；其二，江西省九江市收集的延祐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牡丹塔式罐，亦施青白釉，在塔身突起及转折处用青花加绘线条。青花色泽不艳，蓝中略显灰；其三，景德镇市郊出土后至元四年（1338年）的四件青花釉里红瓷器。均以青料和釉里红作点缀装饰。青花呈色，笔法轻处为灰蓝色，重处为褐色。上述三例出土物的共同特点是：胎质较粗糙，表面施青白釉，青花色泽偏灰，深浅不一，纹饰简单、疏朗，且都似非实用器。这些特点，说明此时的青花瓷尚处于趋向成熟的阶段，和元代晚期胎质细洁、釉层透明、青花色泽深蓝、纹饰繁复的成熟期制品（即所谓至正型产品）相比，大相径庭。很难设想，这种产品能成批地投入海外市场。

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若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上的遗物。八次打捞，共得到中国陶瓷器达一万八千余件。这些瓷器，按窑口有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赣州窑，磁州窑系、定窑系，南宋官窑式、钧釉系的制品，以及一些窑口不明的粗瓷；按釉色有青瓷、白瓷、青白瓷、黑瓷、枢府瓷、乳白釉瓷、白釉褐彩瓷及白釉黑彩瓷等②。试想，一艘满载华南、华北名窑口、多品种瓷器出洋贸易的巨舶中，竟未发现一件青花制品，这不正说明当时还不可能烧制出可供成批出口的青花瓷吗？！此船出洋的至治三年（1323年），距汪大渊最后从海外归来只有十六年，距汪氏自印度洋归来更只有十二年。

如果说上例的情况仅为偶然的话，那么，泉州府后山遗址的出土物反映的则是必然。泉州港是元代对外贸易的最主要港口，汪大渊就是从这里两次附舶出洋的。府后山，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的，是宋元时期官府所在地的遗址。这里出土的瓷片，当反映宋元时期泉州港输出瓷器之盛况。据对出土标本的统计，泉州地区的青瓷、青白瓷占第一位，浙江的龙泉青瓷占第二位，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白瓷占第三位，建阳窑和吉州窑的黑釉瓷占第四位，还有少量的磁州窑、耀州窑产品③，就是未见有青花瓷。又给了我们一个信息：不仅元中期以前青花瓷出口量甚微，就是终元之世也未曾成为外销瓷器的大宗。

西沙群岛的发现同样是一有力证明。自三国以后，此地即处于通往东南亚的重要航道上。遗留在岛上、沙滩上、礁盘上的瓷器，是历代瓷器外销情况的写照。广东省的考古人员曾两次到此考察，获得元代陶瓷器（片）标本一百五十七件④，其中青花制品仅在北礁采集到一件，为景德镇窑生产的荷叶形小罐盖，这种罐盖在菲律宾连同小罐一起被发现过，造型和纹饰与湖田窑南河南岸的产品相似，时代约当元代后期偏晚。这也是西沙群岛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花瓷标本。

其次，从国内已发现的窑址资料看。

随着地下资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对何处为青花瓷创烧地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成熟的青花瓷是由景德镇的窑场首先烧出来的。那么，成熟的产品是什么时候出现于景德镇的呢？

湖田窑是元代景德镇的一处重要窑场，当时的官府用瓷——枢府瓷就在这里烧造。1972年以后，曾有人对该处窑址进行过初步的调查和试掘，出土的青花制品数量极少，在所得同期残器中，仅占0.4%～0.5%，且均为元代后期的遗物⑤。这一点，从湖田窑产品烧造工艺的变化中亦可看出。南宋时代的湖田窑，大量采用覆烧法，故芒口器风行一时。到元代中期则演变为仰烧法占主导地位，芒口器逐渐少见⑥。湖田窑址中发现的元青花和仰烧的卵白釉小足碗盘一道出土，未见一件芒口折腰碗伴出，而后者正是覆烧法盛行时的典型器物。可见，成熟的元青花瓷器基本是在覆烧法被淘汰之后，即元中期以后出现的。

又如，景德镇新华印刷厂内窑址中出土的青花荷莲纹大碗、缠枝菊纹小罐和小杯的残片，詹家上弄口窑址出土的元青花菱口平底盘、缠枝菊纹杯残片等，都是瓷胎质白，器壁较薄，釉色泛青，料色青翠，纹样生动，均属元末明初产品⑦。诚然，我们不能说外销的元青花都是景德镇窑的产品，但确切地得知，在伊朗、土耳其、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日本，许多出土和传世的元青花，正是这类产品。国内遗址和窖藏中出土的元青花，也大多出于此。

近年在浙江的江山县和云南的玉溪县，也发现了元、明时期青花瓷器窑址。但从这些青花瓷的造型、纹饰等特征看，都是在景德镇窑青花瓷影响下产生的，是元代晚期甚或明代的

作品。例如，景德镇元青花上常见的蕉叶、海水、鱼藻和莲瓣等纹，在玉溪窑的产品上均可见到，只是后者的画法显得草率，正好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⑧。而泉州地区的瓷窑，迟到明朝才开始烧制青花瓷⑨。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十四世纪中期还没有出现可供成批外销的青花瓷器。其实，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元末陶宗仪的《辍耕录》和孔齐的《至正直纪》都提到了当时的瓷器，但都没有涉及青花瓷。直至成书于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的《新增格古要论》才记述：浮梁县瓷器"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而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曹昭原书《格古要论》中，还没有这段话。很难设想，一百多年以后方被人注意且尚被称之为"俗甚"的品种，当年就已经成为国外瓷器市场上的主要商品。任何事物的发展，虽迟速不一，但均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种认为青花瓷器一出现就立即成批进入国际市场的论点，实难苟同。

既然汪大渊出洋之时尚未出现可供大量外销的青花瓷器，他也就不可能在海外广泛、频繁地见到它。故此，《岛夷志略》中记录达十六次之多的"青白花瓷器"，不可能指的是青花瓷器。

诚然，近年来从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存中发现过青花器和瓷片，许多"青花论"者纷纷引用这些材料为佐证。可是，这些发现真的能用来作为论证"青白花瓷器"即是青花瓷器的证明吗？我们认为，必须从下述两个方面考虑：第一，发现元代青花瓷的地域是否广泛，青花瓷在当时外销瓷中占有多大的比重；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这些发现物有多少是元中期以前的产品。

海外发现元青花的国家主要有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土耳其和伊朗，其分布范围远不及元代青瓷、白瓷或者青白瓷广泛。就是那些零星发现的元青花，究竟又有多少可以断定为元中期以前的产品？下面试以发现量较多的日本、菲律宾、印度和伊朗的出土物为例，进行一些探讨。

日本出土的元代瓷器，数量最多的是青瓷，其次是白瓷，青花较少。最初的发现未能见诸报告，仅传说在镰仓海岸采集到元青花的小破片。1965年在冲绳胜连城址采集到一些元青花瓷片，基本上是壶、钵、大盘等大型容器类。接着，从冲绳读谷村的墓葬里出土较完整的龙纹兽耳罐。还在福井市郊区一乘谷的朝仓氏邸宅遗址，出土四块被认为是传世的青花瓷小片。在和歌山县的根来寺，也出土了画有莲池纹的带嘴罐。另外，在冈山县赤壁遗址出土过类似小壶的破片，釉色白浊，尚不能断定是否元青花⑩。由于未见到详细的报告和图片，对那些传说或传世残片的时代姑且不论。但对于读谷村、根来寺和胜连城的出土品，可以认为不是元中期以前的制品。因为，这都是一些"小巧精致"、"漂亮的"、"典型的"元青花，即"至正型产品"⑪。如前所述，这类产品出现于元中期以后。日本的冲绳，"在宋、元、明代，起着作为陶瓷贸易的重要中转基地作用"⑫，群岛各地的古代遗址中，无不发现十三至十五世纪的中国陶瓷，但就是未曾发现能被确认是早期的青花瓷器。

菲律宾是发现中国元代陶瓷器最多的国家之一，不仅数量多，窑口也复杂。发现元青花的地点有：马尼拉的圣安娜、吕宋和民都洛之间的维尔德岛、圣巴赫·塔耶巴和宿务岛。出土物主要是小型器物，如碟、小壶、碗、杯、小罐、小瓶之类，较大型的只见花瓶、玉壶春瓶和大罐的碎片⑬。菲律宾出土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制作技法，无论是碗和杯的足还是底，完全按枢府瓷的款式进行切削，碟子除模印装饰外，更具有枢府瓷的一切特征。而枢府瓷在

它的产地湖田窑，出现是比较晚的。还有，这些器物的青花色泽深蓝，纹饰描绘得非常细致，与“至正型产品”无异，说明是在元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特别是出土量较多的小罐，蓝色的青花装饰，色调浓淡一致，折枝花纹系一笔勾成，与湖田窑南河北岸的小罐造型相同，装饰风格相似，无疑是元代晚期的产品。

印度各地发现过不少宋元陶瓷，除北方的阿萨姆邦外，南方的迈索尔邦和马德拉斯邦是重要的发现地，《岛夷志略》中所记的小具喃（奎隆）正在这一区域内。南方两个邦出土的主要是越州窑和龙泉窑的青瓷。青花瓷片虽有发现，但经分析都是福建、广东等地烧制的粗劣品。本世纪七十年代，在德里科特拉、菲多兹沙出土过六十七件元青花残器，伴出的还有五件龙泉青瓷。根据瓷片上钻孔文字和史料记载，得知这都是当年皇家厨房用瓷⑭。在印度的麦伽帝国时代，各地的土邦王竞相搜集中国瓷器，这些东西在海德拉巴的萨拉珊博物馆中可以见到。毫无疑问，这些皇室用瓷都是精致的产品，其中就有许多青花制品与湖田窑南河南岸的遗存类似。从印度流传到国外的传世品中，也可以看到青花瓷，但这些都是十四世纪下半叶，即元末明初的制品⑮。

伊朗出土的中国宋元瓷器也不少。在北部的马什哈德博物馆中，就陈列着以元代龙泉青瓷钵、盘为主的中国瓷器。但青花瓷器，最早的也不过是十五世纪末的麒麟纹大盘和飞鹤纹钵。出土于内沙布尔的中国陶瓷，目前存放在美国纽约首都博物馆的仓库里。令人不解的是，这座在1221年遭受毁灭性兵祸，又于1276年和1280年两度被大地震夷为一片焦土的城市，竟出土一片“朴素的初期元青花瓷钵的碎片⑯”。只是，这是一座丝绸之路上的城市，离汪大渊拜访过并发现以青白花瓷贸易的加里那（在今法尔斯省）和甘埋里（今阿巴斯港附近）的直线距离亦有一千多公里。元代商船曾经到过的波斯湾沿岸，本世纪三十年代斯坦因就作过调查和发掘，从十多处遗址（包括著名的西拉福遗址）的发现来看，中国陶瓷的出土物有越州窑青瓷、龙泉窑青瓷、明初青花、十六世纪的青花和白瓷等，未见元代青花。

伊朗发现的元代青花瓷多为传世品，最著名的要数阿尔德比特神庙中的收藏，沙法维王朝的阿拔斯大王曾捐给这里一千一百六十余件中国陶瓷器。一些幸存品现陈列在德黑兰的考古博物馆，时代从南宋至明初。元代的制品中有三十七件青花瓷，全都是精美之作，“形状大方、姿态优美、色彩和图案都很精致，给人以庄重之感”⑰。显而易见，这些决不是初期的产品，而只能是典型的“至正型产品”。从其造型和纹饰来看，亦与湖田窑南河南岸的遗存类似。

上述四国发现的元青花，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一）制作精致、造型优美的成熟期产品，在湖田窑的元代晚期遗存中可以找到同类品。这一类型占发现的大部分。它们出现的年代较汪大渊从海外归来，特别是从印度洋归来时要晚；（二）福建、广东等地的民窑青花，多是一些粗劣的制品，如印度南部的出土物。其时代似较景德镇窑的产品为晚。即使有少数是元中期以前的产品，也不可能在当时的外销瓷中占多大比重；（三）一些年代难于断定的元青花，如日本南部和伊朗内沙布尔的发现物。虽然不是当时的主要外销品，又距记有“青白花瓷器”的区域甚远。

总之，海外发现的元青花，能断定时代在元中期以前的为数甚微。故不能作为“青花论”的佐证。

这里，有关文献史料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证据。

成书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的《诸蕃志》，记述当时以瓷器进行贸易的有三十五个

地区和国家。对贸易瓷大多统称为“瓷器”，但也有数处分别记为“青白瓷器”、“青瓷器”和“白瓷器”。无疑，这里的“瓷器”包括了青白、青、白等瓷品种在内。

时隔一百二十年后成书的《岛夷志略》，除记下了“青瓷”和“青白瓷”外，还记下了“青白花瓷器”和“处州瓷”。“处州瓷”即属“青瓷”。两相对照，《岛夷志略》多出了个“青白花瓷器”，且销地甚广。

入明后，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写了《瀛涯胜览》，巩珍写了《西洋番国志》，费信写了《星槎胜览》。三本书都明白无误地写到了外销的青花瓷。《瀛涯胜览》称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西洋番国志》载，占城、爪哇、锡兰等地都喜爱中国青花瓷器、青瓷盘碗。《星槎胜览》的记述则更详细。书中载及用瓷器博易的地方，按瓷器品种分类有：青碗一处、瓷碗三处、青白瓷器四处、青白花瓷器六处、青花白瓷器三处等等。这比《岛夷志略》所记又多出一个“青花白瓷器。”

《星槎胜览》成书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离《岛夷志略》成书不到一百年。如果费信认为汪大渊所记“青白花瓷器”是青花的话，为什么他又多出个“青白花瓷器”呢？显然，在他看来，《岛夷志略》中的“青白花瓷器”非指青花瓷无疑。

那么，“青白花瓷器”指的究竟是何种瓷器呢？我们想先对元代瓷器生产特别是与泉州港关系密切的几个窑场产品的概况作一介绍，并结合《岛夷志略》中的有关论述，进行对照。

如前所述，《岛夷志略》中记述贸易用瓷为青白瓷者仅三处，居四大品类之末。在我国陶瓷史上，青白瓷的生产盛于宋而元继之。南方地区的江西乐平、景德镇，福建政和、闽清、德化、泉州、同安及广东惠阳、中山等地，均发现元代青白瓷窑址⑧。这些窑场在元代的发展，大都与海外贸易的发达分不开。

以生产青白瓷为主的德化窑瓷系，主要是适应泉州港外贸需要发展起来的。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都发现过为数不少的德化窑系产品。这些青白瓷，釉层均为莹润，富有光泽。装饰技法有印、划、贴、雕多种，纹饰异常丰富，且是从釉色中映现出来，显得非常美丽。景德镇的青白瓷，在宋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在略显青色的釉色上，运用印花、刻划花、贴花等多种手法进行装饰，花纹有莲瓣纹、卷草纹、水纹、篦纹、水禽及串珠纹。有的器物上还饰以褐色或红色斑点。在东至日本，西到西亚，众多的古遗址中都可以看到这类产品。

从元代我国诸窑的烧造情况看，青白瓷的生产是大量的。此外，白瓷的烧造数量也不少。在古代，“青白瓷”与“白瓷”是不太区分的，按《岛夷志略》的分类法，似应归入青白瓷一类。所以，元代的青白瓷（包含白瓷），加上青瓷（包括处州瓷）构成了当时外销瓷中的两个主要品种，同为出口品中之大宗。但是，在《岛夷志略》中，青瓷（包括处州瓷）记有二十处，青白瓷仅记有三处，悬殊未免太大。与几乎每处出土元瓷的遗址都有青白瓷的实际相去太远，与元代外销瓷的实际情况也不符。

元代外销的瓷器，除青瓷、白瓷、青白瓷，以及色彩斑斓的钧瓷、白地黑花的磁州窑产品外，品种仍甚为丰富。这里，仅就泉州港的大批外销瓷言之，即可窥其一斑。

首先是磁灶窑产品。较之德化窑，这儿更是一处专为海外贸易需要而烧造的民窑。它出产的军持、瓶、执壶等，经常在菲律宾、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出土。釉色丰富多采，装饰花纹繁杂，是磁灶窑瓷器的特点。釉分青、绿、黄、黑酱等种；装饰纹

样有折枝花、缠枝花、梅、牡丹、凤凰、麒麟、孔雀、龙、鱼藻、卷云、弦纹、铁锈花，等等；装饰技法分印花、绘花、堆花、贴花、刻花、划花和捏花数种。菲律宾发现的双龙抢珠和缠枝牡丹军持、刻花炉，日本发现的黄釉铁绘花盘、绿釉划花和黄釉斑点器物、彩绘盆等，都是磁灶窑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器物国内很少发现⑩。

其次，我们可以看看黑釉产品。建窑黑瓷特别是兔毫盏驰名世界。在福建，除建阳外，还有许多地方烧造黑釉瓷。仅盏一项，除黑釉盏外，还有内部布满兔毫斑纹，外部垂釉凝集成油滴状结晶的黑褐釉制品，隐约可见兔毫斑纹的酱色釉制品，黑里泛红、口缘呈赭色的酱黑釉制品，以及铁锈色釉等等。江西吉州窑的黑釉瓷，以油滴釉、鹧鸪斑、玳瑁斑、剪纸贴花制品著称。黑釉瓷的兴盛时代在南宋和元代，应与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兴衰有关。

除青白瓷和青花、釉里红外，元代景德镇窑场的枢府釉及铜红釉、钴兰釉的成就，也不可忽视。东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许多地方都发现过枢府器。它的釉呈失透状，是不容易混同于青白瓷的。铜红釉制品一般采用印花装饰，在器物内壁印双云龙纹，器心划云纹。钴蓝釉有蓝釉金彩和蓝釉白花，前者在烧成的蓝釉器上用金粉描绘纹饰，再次烘烤；后者则在通体沉着的蓝釉上衬以白色花纹，蓝白相映，对比强烈。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博物馆里就有蓝釉白花的菱口大盘，上饰飞凤海马、灵芝花卉。

即使是青瓷和青白瓷，各窑口的风格也不尽一致。如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上的点彩，福建安溪窑青白瓷上的酱褐彩绘等。尤其要提到的是，福建同安窑系的产品，更具独特风格。其生产区域，包括同安、连江、浦田、安溪、泉州、厦门、德化等沿海地区。其产品在南洋各国、朝鲜、日本发现很多。日本学者称之为"珠光青瓷"。这是一种施淡褐黄釉、刻划花间以篦点纹的青瓷。浙江武义龙泉的一些窑址也生产此类瓷器，时代较早，篦纹又细又长，锥刺纹较少。

总之，元代外销的瓷器，除青瓷、青白瓷和白瓷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如装饰技法多样、釉色深浅各异的黑釉、绿釉、黄釉瓷，施以点彩或者刻划花间以篦点纹的青瓷，釉色和纹饰都独具一格的枢府瓷，数量虽少但影响较大的铜红、钴蓝以及青花、釉里红制品，在日本到处发现过的晋江窑的绿釉器、彩绘盆，磁灶窑的黑绘青瓷，建窑、吉州窑黑瓷，珠光瓷。菲律宾的出土物更是应有尽有。

这些色彩各异、纹饰丰富的产品，当然无法简单地归入"青白瓷"、"青瓷"及"处瓷"之中，而只能归于"花瓷"和"青白花瓷"中。"青白花瓷"者，不仅包括那种大量的带装饰花纹的青白瓷器，还应包括其他釉色的"花瓷器"。所以，《岛夷志略》中还有这样的记述：吉兰丹"货用……青盘、花碗、红绿烧珠、琴、鼓、板之属"，占城"货用青瓷花碗、金银首饰、酒、色布、烧珠之属。"

至此，我们可以断定：《岛夷志略》中的"青白花瓷器"指的是青白瓷中带花纹装饰的瓷器和其他花瓷器。于是，我们可以将《岛夷志略》中记述的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依类归纳为：青瓷、青白瓷（包括白瓷，有带花纹及不带花纹的）、花瓷三种。依交易的国家地域分别记录为：青瓷二十处，青白瓷十八处，花瓷十七处。于海外的发现相印证是基本相符的。

---

① 有关汪大渊的生平及《岛夷志略》所记地名的现址，均采用苏继廎在《〈岛夷志略〉校释》中的考证，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

② 〔南朝鲜〕郑良谟《新安海底发现的陶器及其问题所在》，"新安海底打捞文物"国际专题讨论

会讲演稿。

③ 李知宴、陈鹏《泉州的海外贸易和陶瓷输出》，《景德镇陶瓷》1983年总21期。

④ 何纪生《遗留在西沙群岛的古代外销陶瓷器》，1981年新会中国古代外销瓷学术讨论会论文。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4年10期。

⑤ 刘新园、白焜《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文物》，1980年11期。

⑥ 刘新园《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84年6期；《景德镇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成因考》，《文物》1980年11期。

⑦ 黄云鹏《馆藏和窑址出土的元青花、釉里红瓷》，《江西历史文物》1984年4期。

⑧ 杨静荣《元代玉溪窑青花鱼藻纹玉壶春瓶》《文物》1980年4期。

⑨ 林文明《泉州陶瓷外销问题的探讨》，《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

⑩ 〔日〕长谷部乐尔《日本出土的元明陶瓷》。

⑪ 〔日〕长谷部乐尔《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特别展览（1975年）》。

⑫ 〔日〕三上次男《元代陶瓷器和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的新资料》。

⑬ 〔英〕J·M·艾迪斯《在菲律宾出土的中国陶瓷》，M·苏来曼《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器》，《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资料》（第一辑）。

⑭ 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6期。

⑮ 〔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三杉敏夫《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

⑯ 同⑮。

⑰ 同⑮。

⑱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⑲ 陈鹏等《福建晋江磁灶古窑址》，《考古》1982年5期。

"内府"款小考

赵光林

书有"内府"款的瓷器，多见于元代磁州窑系的黑白釉梅瓶，有时在一些黑白釉或茶青色的小口大腹瓷缸上亦常见到，但以梅瓶为最多。北京地区考古中常有发现，如在元代后英房居住遗址①海淀区骚子营，房山区大峪沟和良乡镇②等地均有出土。各地博物馆及考古部门也多有收藏。"内府"款二字多写在器物的肩部，写法分墨书和刻划两种，落笔多为上下竖写，也有斜着写的。元代梅瓶一类器物肩上也有书"王府"和"都府"的，河北省邯郸南响堂寺文物保管所和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都有收藏。另外在器物上还有书"五王府"和"内府侍仲"款识的③，以姓氏定名的为私家款，以官职定名的应属其官府定烧。"都府"可能是一种武官府邸之名。"内府"款用于陶瓷，有人说始于宋代。但不见实物，且明代"内府"款的瓷器亦并不多见。常见的如"赵府造用"④、"甲戌春孟赵府造用"⑤、"沈府佳器"、"郝府佳器"⑥等都属于私家款，专为其府邸烧造。单书"内府"款的极为罕见，1973年，笔者参加中国出土文物展在日本大阪安宅公司陈列馆见到一对明代永乐白釉带盖梅瓶，器肩书有以钴料为着色剂的蓝色"内府"款识，盖以青花为饰，顶部饰桃形钮，钮上下饰仰覆莲纹，周围饰缠枝花卉，高32.8厘米。这正是麟州《窥天外乘》中所指"永乐宣德内府烧造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的那种器物。据说这对青花"内府"款梅瓶是解放前北京地区出土的，后被弄到国外。据英籍华人文物鉴赏家吴英先生讲："这种书有青花'内府'款的梅瓶在英国伦敦国泰古玩公司亦有一件（没盖）"。国内只是1979年在江西景德镇一农民手里见到过器物肩部书有青花"内府"款的明代白釉瓷罐一件，而不见梅瓶⑦。这种造型的青花和白釉梅瓶，解放后全国各地考古工作中常有发现，主要是永乐、宣德和嘉靖、万历前后的制品，嘉万期间的梅瓶多有年款，但不见"内府"款的，这大概是因为大内机构变化或永宣以后景德镇的御窑厂不再烧造"内府"款的器物。史书也都只讲明永乐、宣德内府在景德镇烧制瓷器，而永宣以后很少再提。

梅瓶在古代，起初是一种酒器，到了后来，人们才作为一种观赏品，陈设起来供人欣赏。

"内府"款书写在陶瓷器上，其含义过去很少有人专门去考证。人们常认为内府即大内，泛指宫廷而言；也有人认为内府即内务府，把元明时的内府与清代之内务府等同起来，这种认识也是不确切的。古代指内府为皇室的仓库，是管理各种钱粮物品的⑧；有的文献记载指内府为官名，是掌管九贡九赋的官职⑨；汉唐以后多不见具体记载。而把皇宫之物品，通称为内府之物。《元史·百官志》记载：典饮局，秩正七品，大使二员，副使二员，典使一员，攒典二人。掌酝酒醴，以供内府。

《朴通事谚解》上卷又曾这样记载："酒，京城槽房虽然多，街市酒打将来怎么吃？咱们向那光禄寺里讨南方来的密林擒烧酒一桶，长春酒一桶，苦酒一桶，豆酒一桶，又内府管

酒的官人们造的好酒，讨十来瓶如何？可知道好，着谁去讨？光禄寺里着姓李的馆夫去讨，内府里着姓崔的外郎讨去”。由此看来管酒的事宜不但光禄寺负责，而且内府里亦有专人操办。元明两朝在磁州窑及景德镇窑所制书有“内府”款的梅瓶，应该是当时内府在此定烧的官制酒瓶。这种酒瓶在元代为什么不在景德镇定烧而在北方的民间磁州窑烧造呢？笔者认为，景德镇虽然瓷质优良，但主要生产御用细瓷，加之路途远，运输不便易损坏，这样必然加大成本，提高价格，因此官府利用北方民窑之优势，就近烧造这种盛酒的粗器更为合算。正如明《纪录汇编》中所讲：“明朝专设窑于浮梁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所以在明代的永宣时期烧造这种“内府”款青花梅瓶并不多，除日本、英国保存的几件外，国内至今还未见到过。这种酒瓶在元代除书有“内府”款的官制品外，民间也大量使用，在釉色和款识上多样化。由于官民都用，大量生产，所以从出土和收藏情况看，各地文物部门几乎都收有此种器物。

这种梅瓶在宋元时叫作经瓶，由于美观适用，既可盛酒，又可供人欣赏，明代以后逐渐演变成为专门的观赏品了。所以，近千年来盛烧不衰，一直到现在许多窑厂还在烧制。

---

① 《北京后英房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② 《北京良乡发现的一处元代窖藏》，《考古》1972年第6期。
③ 《陶瓷鉴别参考资料》。
④ 《景德镇陶瓷》1986年第3期48页。
⑤ 《明清瓷鉴定》上册152页。
⑥ 《中国陶瓷史》408页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⑦ 此情况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欧阳世彬先生提供，是他在农民出售时所见。
⑧ 《史记·淮阴侯传》。
⑨ 《周礼·天官内府》。

话说许世华兼论德化瓷塑断代问题

王冠英

近来，先后拜读了广东省博物馆宋良璧同志撰写的《介绍几件德化窑带款白瓷塑像》（见《文物》87、第八期），和德化县文管会徐本章同志撰写的《德化窑明代瓷塑初探》（见《福建工艺美术》87.3、4期合刊）两文，颇受教益和启迪。宋、徐二文为研究德化窑明代瓷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德化瓷塑传世品的断代提出了值得引为注意的问题。本文试就这方面的实践谈点浅见。

一　也说许世华及其作品的误正

宋良璧同志在《介绍几件德化窑带款白瓷塑像》一文中，介绍了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许世华所作的瓷塑观音，并将其列为明代瓷塑。原文为："……。3.观音立像，（图版、略）高45厘米，观音头盘高髻，长圆脸，双眼微合，显得慈祥端庄，双腕带镯，胸前饰宝相花，身穿宽袖长衣，衣褶流畅、随风飘动，立于莲花波浪之上，一足露出，一足藏于浪花之中。胎质厚重、坚细洁白，施乳白色釉，像背后上方印方形阳文篆书'联谊轩制'四字戳记，下方印方形阴文篆书'许世华制'四字戳记（图：略），前者似为堂号，后者为匠师姓名。也有同志认为这件可能为清代制品。"

徐本章同志在《德化窑明代瓷塑艺术初探》一文的第三部份论述明代瓷塑的款识和窑场时，也将许世华列入明代的作者。原文为："明代德化窑瓷塑非常丰富，但有款识的作品却不多，据目前发现的带有款识的有何朝宗、张寿山、陈伟、许世华、林学宗和店号款的联谊轩等，……普遍是一件瓷塑一个款识、个别也有两个款识的，如广东省博物馆观音踩莲立像，（据德化瓷塑传统品名应称为立莲观音或渡海观音，历代未见有踩莲之称）就同时用了'联谊轩制'和'许世华制'两个印章款"。

如上所摘，宋文和徐文都将许世华列为明代的作者，徐文显然是受到宋文的影响、引用宋文的见解，但宋文在最后加了"也有同志认为这件可能为清代制品"的存疑。徐文则以肯定的语气明确地将许世华列为明代作者，尤其是徐长期从事德化县文管工作和陶瓷研究。对当地情况当然较宋为熟悉，既是徐将许世华的瓷塑肯定为明代制品，就为宋文的见解作了佐证，似可确认无疑了。到底许世华属于何时代人？据本人的考证：许世华既非明代人，也非清人？广东省馆藏的立莲观音以及他的其他作品均出于民国，确切依据如下：

许世华出生于德化县浔中乡丁溪村湖前的许厝雕塑世家，其太祖父许良西（德化县志载有其精湛的雕塑技艺事迹，可考）、祖父许起容均系德化佛像雕塑名师，父许进勇，字友义、号云麟，生于光绪十三年（1897年），卒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曾以其所雕制的瓷观音、关公（关羽）、达摩、花木兰等作品，先后参加在英国、日本和台湾、南京举办的国际和全国博览会，获得金奖，并被评为特等雕塑师，毕生从事瓷塑制作，并经营"裕源"商号，其得意作品背部盖有"许裕源制"和"许云麟制"四字方形阴文篆体印记。曾为香港玉

成轩、源源等古玩商特制不少仿明、仿清瓷塑制品。生二子，长文达、字光通，学名世华，次文概，字光一、学名世南。许世华即德化著名瓷塑师许友义之长子，出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现年八十岁。幼从父学，精瓷塑。技艺被推许友义六名得意传人之首。解放前出境，现与其弟许世南以及子侄均居留香港从事瓷塑艺业。许世华、许世南兄弟在民国期间均继父业，在家乡从事瓷塑制作，产品大部经广州、厦门、福州转香港、台湾等地销往国外，同时并应客户要求特制部分仿古瓷塑。联谊轩系此时期兄弟合作之堂号，广东省博物馆馆藏之带有联谊轩和许世华戳记的立莲观音，当为这一时期的作品。时间约在1940年前后。据此可见宋、徐二同志对许世华的作品断代确属谬误。

二　对德化瓷塑断代问题的几点浅见

广东省博物馆所藏许世华作品断代的谬误，在全国性刊物和省级刊物上发表造成了广泛的不良影响，据德化群众和港胞反映，许多人以此作为一件陶瓷学术研究的笑话，值得引起注意。其造成的原因：可能前者仅以“乳白色釉、胎质厚重”推断为明代的，后者则因未加研究考证即行抄摘引用而致误。此类情况在学术研究中亦非少见。要减少或避免此类情况的产生，首先对学术研究必须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其次必须多方进行研究考证，切忌相互抄摘引用拼凑文章、人云亦云、缺乏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对德化历代瓷塑艺术品的研究和断代，至少应注意到下述几个实际存在的因素：

1.胎质瓷色　对于德化瓷的断代，有人只是单纯以外观瓷色作区分，认为青瓷、青灰瓷、青白瓷、普白瓷属于宋、元；乳白、象牙白、孩儿红属于明代；青花瓷属于清代等等。这一观点显然是极为片面的，须知瓷色的产生不仅取决于泥釉原料的选择和配方，而且受到烧成气氛、温度、保温时间的影响和制约。例如象牙白、乳油白、桐油黄以及罕见的窑变孩儿红等瓷色，就是采用同一原料和配方，而在不同的窑型、窑位装烧、受到不同烧成气氛、温度和保温时间的影响形成的。经调查研究证实，德化瓷在元代就已出现象牙瓷，清代也有象牙瓷，明代只是其成熟期并由于应用得精巧而烧制出一些极富代表性的艺术品出了名。实际上明代不仅有青白瓷、普白瓷生产，而且是占主要地位，因为生产青白瓷的胎釉用料要求不高、配方简易，所用的石灰釉、植物碱釉配方较易掌握，又利于以松枝、木梢为燃料的龙窑烧成、可以就地取材，故被普遍采用。烧制纯白和乳白瓷的胎釉原料必须精选，充分陈腐、配方，加工要求严格，烧成气氛亦较难于控制。仅见城关及三班部份窑场生产。尤其是乳白瓷（象牙白）的胎釉质料的选择和配方要求更高，在不同烧成气氛作用下，还会产生白中泛黄，白中泛红、纯白如乳或黄中泛红等多种瓷色。一批产品难于获得一致瓷色，在没有现代科学手段控制的时代、仅适于可以单件欣赏的瓷塑艺术瓷、艺术陈设瓷和少量艺术实用品。加上当时德化的瓷业全都属于家庭手工业，从原料开采、泥釉加工到建窑装烧、瓷坯制作均为专业经营，形成一种社会分工合作的民间瓷业生产体系，特别是瓷塑艺人，除了产品创作、模具制作、白坯制作而外，一般都没有原料加工和窑炉设备。所需原料则向原料加工户订购，烧成则向窑户租烧，而且批量少，变动大，原料及窑位难以固定也是造成瓷色改变的一个因素。包括明代乳白瓷最盛期嘉靖、万历时的瓷塑，也不是全都采用乳白瓷的原料。因为此一质料性较软，易变形，质量难于保证，又不适于制作大件产品，在没有自备专门窑炉的情况下、家庭制作批量不多租用窑位自然就小，只能与他人的其他瓷种和产品混合装烧，烧成制度难以达到要求，理想的成品率不高，影响了生产者的经济效益，迫使经常采用普白或青白瓷的泥釉质料而提高制品的成功率。因此，明代德化瓷塑也有普白和青白瓷色。

此一实况说明，如果以瓷色作为德化瓷塑（包括陈设和日用瓷）的断代依据是绝对不够的。

2.款识戳记　带款识的德化瓷塑始见于明代，清以来，均有人仿效。款识主要形式为印章，有葫芦形、花瓶形、四方形、长方形四种，均盖在作品的上背部。至今见到的明代印章款有二式，一为葫芦形、一为四方形，大都篆书作者姓名。如何朝宗、陈伟、张寿山、林朝景等。清代以来增加了花瓶形和长方形二种。一件作品一个印章的大部为作者姓名或年号、店号；一件作品带两个印章的多数为上部盖葫芦形或花瓶形、阳文篆书“德化”、“何朝”、“何潮”、或“福建德化”，均为表明产地或仿制标志，也有书作者姓名的，如许云麟等。下部盖四方形印章，多数为制作者姓名、艺号，诸如何朝宗、苏蕴玉、许云麟、许世华、博及渔人、林学宗、何朝春等等，或堂号、店号，如许裕源、许财源、许宝源等皆为加一制字的阴文篆书四字印章，个别长方形印章则为年号或店号，如大明万历年制、珍和金记等，多数为阴文楷书。印章采用角质、石质、木质、瓷质制作。其中以不易磨损、碰缺的角度为佳、皆为阳文、刻制工整精细、笔划深刻清晰，原章比作品所见规格为大（因作品烧成后收缩18—20％左右）。制作时，在瓷胎主体脱膜后修光即行盖戳，以保字形清晰，如胎体湿度不足，字迹就模糊不清。带有款识戳记的产品，一为作者得意之手作，二为应顾客的要求而特别加工的产品和仿古制品，一般均可列为精品。

此外，还有一些作者用雕塑工具竹签为刀笔，在作品的底座、衣褶下等不明显之处随手刻书的款式，如苏学金手制、林、培以及数字标记等，也很有参考价值。

带款识的作品大都可作断代的依据，但应注意的是清代以来有不少仿制明代作品，这些应古玩商户要求而作的仿制品，艺人在仿制时大多留有特征；如章形较小、或加上“何潮”二字章等等，须当结合瓷色、胎质、工艺制作等加以慎重考证，以免产生谬误。

3.制作工艺　德化瓷塑制作工艺，在1934年采用石膏模注浆法以前，一概使用陶模印制。其制作工艺程序是，先由艺人进行样品的构思设计并以泥土做成实心型的主体样品，修整完备，再根据利于坯体脱模的需要，分解切成部件，然后逐件以纯净粘土制成模范，开脱后除清模中余泥杂质；修整后入窑烧成工具陶模（俗称土模）。制作瓷塑的泥料应经充分陈腐，使用前加以打练、以消除泥中的气体，增强分子结构的均匀序列和紧密度，以减少烧成过程中产生变形，开裂等缺陷并增强其半透明度。瓷塑印制时，把泥料投入洁净模中，用手推压均匀，除去余泥，候稍干离模脱出，再将脱模后的各部件进行修整（特别是头部的五官，头发的修整尤求精细），通过粘接复成整体，再加雕刻、擦水、推光，最后接上手工捏制的手、足、花饰、珠串或飘带等装饰即成。整个雕塑制作工艺，除造型设计、表情刻画、衣纹处理而外，艺人的主要技艺功底表现在捏塑技巧和推光。如手捏珠子要大小一致、颗粒匀圆，花朵则要细而薄、形态逼真，手足及指节要整体比例适当、灵活如生，推光用竹制工具的“刮子”，对衣纹、头发、五官等线条以至整体进行精工推压刮刻，要求用力均匀、深浅得宜、流利自然，不留纹迹。因此制作中的捏塑功和“刮子”功就成为衡量艺人技艺水平的一个特征，也是作为作品断代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

土模印制瓷塑的成型工艺有一个由厚到薄的发展过程，早期作品胎体厚重，利于深刻衣纹。作品内壁留有制作者用拇指推压印制的重叠指纹，后期的仿制品则少见此情况。有的出现食、中、拇指并用，或掌纹，有的出现指刮或刀削等纹迹。民国以来以注浆成型的仿古制品。虽加伪装，却绝难达到土模手印的效果，自可一目了然。至于插接式的活手产品，是为了适应长途运输破损时可作更换而产生的，约始于明末清初，大都为仿古制品或外销产品。

至于是否有些作品采用把实心体做好后再挖空的制作方法，即有人称为孤品的作品？据研究分析，其可能性甚小。首先，德化没有设过官窑。瓷塑艺人均属手工业生产者，他们创作一件作品，付出不少心力，目的是为了形成商品，谋求代价以维生计，至今尚未发现有任何瓷塑艺人为了自行收藏而作的孤品。其次，用实心再挖空的操作工艺，既费工又不符合烧成要求。较为可能的是在印坯时，感觉过厚，恐怕在烧成中水气难以挥水，在热胀作用下炸裂，同时也难以瓷化而影响烧结度，故而用刀削掉一些，以求烧成质量效果。此种情况时有出现，且大多出于徒工之手，富有经验的艺人不须多此一举。以近代德化著名的瓷塑师许友义（云麟）为例。民国十九年（1930年）为福建仙游县的龙纪寺制作的五百罗汉瓷塑（现仍保存在该寺，可资考证），五百个脸谱、五百种不同表情和姿态，制作工力如此巨大，每件代价仅一百斤谷子，而且全部仅烧制一套（至今未发现有同类产品遗传）。按说属于孤品，其制作工艺仍然采用先制模后印坯的方法，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烧成的成功率，烧制过程中如果产生变形、缺损时，可另行印制补烧，确保五百尊罗汉的完整交货。总的说来，1934年以前，德化瓷塑的生产工艺虽是全属陶模印坯制作，但各时期仍有一些不同手法的踪迹可寻，也可作为鉴别生产年代的一项参考内容。

4.作品特征　德化各时期的瓷塑，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作者的制作特性可供研究。除了瓷色胎质、款识戳记、制作工艺外，作品题材的选取、造型的变化、装饰的繁简、衣褶的处理，脸型和五官的特征、表情的刻画等都有各自的风格，由于社会风尚的影响和艺人的个性形成一种特定的艺术语言。将其认真进行研究和比较，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差别。如瓷塑观音的脸型，元代较瘦长，明代则颇丰满；胸前的宝相花有花形，有兰花形，有的不带花，珠串有长、有短，三串五串，繁简不一，形式不同，各具特色；再如达摩的须眉，有蓬松的虬髯形，有规整的螺旋形；衣纹的处理也都带有作者各自的特点。在题材方面，明代以上大多为观音、如来、达摩、罗汉、弥勒和帝君、土地（福德正神）八仙、寿星及关公等神仙佛像与动物玩具；清代以下取材日益广泛，品种不断增多，出现了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美人仕女等人物题材的作品。装饰上也不断追求繁华工巧，增加了花朵、飞带、璎珞、豪光、活动链等前所未有的配饰，观音的脸型则渐趋美人化。

此外还应注意到瓷塑艺人的成就，同样需经一个不断研究提高的过程，才能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和风格，故其前期作品与成名之作也自然不同。不少人以故宫博物院的渡江达摩和泉州市文管会的渡海观音的造型，作为鉴别何朝宗的立像作品的标准，认为何作立像造型都是束足宽肘。这一认识是不够全面的，当然这种独特造型风格是何氏成功之作的特点之一，但却不能以此作为判断何作的唯一依据，须知其前期作品均仿效宗教艺术的寺庙佛像，不可能一开始就能脱离旧传统的限制。只有通过一定阶段的瓷塑实践、在创作中升华，才能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对何作的鉴定应该考虑到这一因素，其余作者也不例外。均需细加审定。

德化瓷塑自宋始，盛行于元，著名于明，发展于清，及今绵延不断，历代艺人辈出，均有不少名品流传于世。惜乎前人留下的记载和考证资料几近空白，无以为据。今天欲准确判定传世品和出土物的生产年代及其作者颇为不易，只能对实物作实质性的研究，多方加以考察论证，找出依据，辩清真伪，方不致误。

本文限于水平，谨就三十六年来在德化从事瓷业工作和瓷塑研究的体会作些粗浅介绍，供同行参考，并借以向研究德化瓷塑的专家求教。